



何长工回忆录

# 目 录

第一章	动荡的青少年时代.....	1
	旧澜新波.....	1
	漂泊世家“楚才”梦.....	5
	从湖南到北京.....	10
第二章	青春年华.....	14
	走向新的生活.....	14
	在五四运动中.....	18
	初识毛泽东.....	22
第三章	勤工俭学在法国.....	27
	初吻巴黎.....	27
	争“三权”与拒款风潮.....	38
	抢占里昂大学与旅欧支部成立.....	45
第四章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57
	归国办学.....	57
	投笔从戎.....	62
	支援北伐.....	66
	在武汉警卫团.....	70
第五章	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	74

	警卫团的新生·····	74
	山雨欲来·····	82
	湘赣边界的风雷·····	88
	文家市会师定方向·····	94
	引兵井冈山·····	99
<b>第六章</b>	<b>难忘的使命</b> ·····	<b>108</b>
	井冈特使·····	108
	改造王佐部队·····	120
	出山入湘·····	133
	伟大的会师·····	142
<b>第七章</b>	<b>战斗在井冈山上</b> ·····	<b>153</b>
	三占永新·····	153
	改造俘虏·····	171
	井冈全盛与八月失败·····	177
	“双枪兵”的变化·····	196
	井冈山保卫战·····	203
	雄风洁质井冈青松·····	221
<b>第八章</b>	<b>开辟鄂东南与长沙之战</b> ·····	<b>236</b>
	红旗指向鄂东南·····	236
	红三军团的建立与两战长沙·····	266
	峡江会议前后·····	285
<b>第九章</b>	<b>从创办红军学校到建立红军大学</b> ·····	<b>294</b>
	受命创办红军学校·····	294

	红军大学起瑞金 .....	303
<b>第十章</b>	<b>长征前后</b> .....	<b>309</b>
	奉调粤赣军区 .....	309
	长征前的一次和谈 .....	320
	长征路上 .....	331
	毛泽东要我办荣军教导院 .....	359
<b>第十一章</b>	<b>从抗大到东北军大</b> .....	<b>366</b>
	从红大到抗大 .....	366
	抗大校风 .....	371
	抗大一分校 .....	379
	总校东迁敌后 .....	386
	突围返陕 .....	393
	赴东北开办军政大学 .....	398
<b>第十二章</b>	<b>在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战线上</b> .....	<b>406</b>
	东北军事工业的艰辛创业 .....	406
	东北军工部的成立 .....	411
	拚了命也要把军工生产抓上去 .....	419
	在重工业部 .....	434
	赴苏谈判援建航空工业 .....	439
<b>第十三章</b>	<b>投身地质事业</b> .....	<b>450</b>
	受命于地质部 .....	450
	艰难起步 .....	453
	大军指向何处 .....	456



	抓“母鸡下蛋”	464
	闯开科研关	469
	“三馆”建设	471
	建立省地质局	474
	队伍向前进	476
	战果	478
	情在山水间	489
	一点反思	497
第十四章	在动乱的日子里	501
	祸起萧墙	501
	欲加之罪	507
	在五七干校	512
	乍暖还寒	514
	劫后新生	518
后 记		522

# 第一章

## 动荡的青少年时代

### 旧 澜 新 波

我是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初八在湖南省华容县大乘区南乡大山村，第一次拥抱太阳，呼吸了大自然的气息的。将我送给祖国大地的是一个农民的家庭。

华容古称泽国，为古代云梦泽的一部分。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的名句，生动的描绘出这个大泽地带磅礴的风光地势。华容县北临长江，东眺岳阳，西系安乡，西南毗南县，正南为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所吞没。水域四通八达，地界两湖接壤，水陆交通方便，系武汉上游九省之咽喉要冲，为历代兵家所必争之战略要地。现在仍留有当年岳飞征杨么时扎营寨的卸甲山、许家城等古迹。

旧社会华容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有“游移之乡”的称号。当地群众的劳动有季节性的特征：正常年景时，

他们耕田种地，打芦苇，是农民和柴民；每当洪水泛滥时，就变成渔民和船民；收获季节是农民，冬天又变为盐民（贩卖食盐）。这里几乎家家都有船，人人会游水。这里还有不少外乡游民，他们大多是官逼民反的劳动人民：有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有逃荒躲债的逃难者。但游民中也混有不少散兵、游勇、兵痞、流氓等，为脱离兵役和拘捕而流窜到这里。此外，还有一些以抢劫为生的土匪分子和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散荡分子。这里各种会道门组织也很多，是长江以南会道门活动的中心。这些游民神通广大，他们善于勾结驻军，兵匪合一，又能适应形势不断变换面目。他们穿着军服化装为正规军，持有政府的执照和军队的委任状；换上便服又变为老百姓。这些人为生活所迫，生死不怕，时常跟政府衙差发生冲突，有时把一营官兵缴械，你想武力围剿，越剿越多，剿不胜剿，使历代官府无能为力。据说洞庭湖的湖匪是历代王朝未能征服过的。俗话说：“无湘不成军”。“湖南出兵”是有历史渊源的。因此，这里又曾被称为“冒险家的天地”。

洞庭湖原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现在的面积小于江西鄱阳湖），周围都是水网地区，这里是古代大禹治水的重点地区。（何氏祖祠附近有一座小岭，上面曾修有禹王庙和文昌阁，以资纪念，可惜被日军烧毁。）正常年景，洞庭湖周围华容、南县、汉寿、沅江、益阳等十二个县及湖北的洪湖、监利、石首、公安等几个县是我国产粮的重点地区

之一，人们称为“鱼米之乡”。俗话说：“二湖熟，天下足。”但是在黑暗统治的旧社会，这里的劳动人民过着极端悲惨的生活。农民辛勤种地经常吃不上一顿饱饭；渔民日夜捕鱼喝不上一碗鱼汤。苛捐杂税猛如虎，地主渔霸似阎王。电影《洪湖赤卫队》中有个彭霸天，在洞庭湖周围又不知有多少张霸天、李霸天。俗话说：穷人无鱼不吃饭（指捕不到鱼就换不到米），富人无鱼吃得香（指每餐要有鸡、鸭、肉、蛋等）。广大劳动人民终年劳累，到头来则衣不遮体，饭不饱腹。尤其是洪水泛滥时，不知多少家庭用血汗积累起来的财产被吞没，不知多少人被葬身鱼腹。当时，流传一副对联：“水静沙石浪，港窄岸含舟。”社会上传说，洞庭湖区什么人本事最大？逃荒避难的人本事最大。洞庭湖区什么样的人最多？口吃四海、船走八方的游移人以及当兵吃粮的兵勇和会道门最多。洞庭湖区什么东西最可怕？洪水成灾和兵匪勾结最可怕。

压迫和剥削愈重，反抗斗争就愈坚决。湖南人民一贯有不畏强暴，反抗压迫的光荣斗争传统，造就培养了一些著名的革命家。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轩辕黄帝四千多年的纪元，当时两湖（湖南、湖北）结成了巩固的政治、军事同盟。湖南的黄兴（字克强）就是孙中山大元帅的主将。记得我十一岁时，高等小学尚未毕业，学校的语文教员唐松毓是一个文秀才，他召集全校的师生，宣传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的伟大意义，揭

露清王朝腐败无能，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对外屈膝投降的罪行。当时他念了湖南省一个姓阎的都督讨伐清王朝的一篇檄文，其大意是：大别与君山对峙，湘水与汉水共流，猛回头，曾起狂呼，洞庭波一歌同调，言犹在耳事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稚之孤何托……从这篇檄文的中心内容来看，两湖在历史上向来是结成亲密的政治联盟的。后来又有湖南要人蔡锷（字松坡）摆脱了袁世凯的控制，到新加坡召开秘密会议，募捐了银钱后到云南领导云南起义，朱德、刘伯承同志参加了起义的军事行动。这不但掀起了南方各省推翻洪宪皇帝的群众运动，而且迫使袁世凯的四个心腹：湖南的张敬尧、江西的齐燮元、江苏的李纯、浙江的孙传芳（南方的“四恶”）也打电报给袁世凯，迫使他取消洪宪皇帝。这样，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被气死了。五四运动后不久，北京的一批进步教育家组织了一个湖南参观团，在岳麓山蔡锷、黄兴先生的墓前赞扬说：“中国不亡，有湖南人在。”

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省是我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发起的中心地区之一。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也是革命根据地之一。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有三处提到华容县的工作，把华容列为开展农民运动的二等县。这主要是因为华容地处两省交界，县境内游民多，开展农民运动有条件。当时我就是洞庭湖西区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在一九



二一年七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二名代表中，就有两湖代表四人。湖南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有董必武、陈潭秋。伟大的秋收起义就爆发在湖南境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以及蔡和森、彭德怀、贺龙、罗荣桓、李富春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诞生在湖南。历史传言，“唯楚有才，信不虚也”。古代的楚国即湖南、湖北。昔日之湖南为军阀混战所必争之战略要地，今日之湖南已成为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之一了。

### 漂泊世家“楚才”梦

听老人讲，何氏家族原居住在江西沱江一带。因大灾荒年，何氏祖先挑着行李逃荒到华容泽国定居。我的祖父何学铭，祖母严氏，生我父辈四兄弟二姐妹共六人。我父亲排行第二，叫何启源。母亲陈氏（系华容县大乘区王家熬人），生我们三兄弟三姐妹共六人。兄弟里我排行第三，加上姐妹我排行第五。大哥何清，三哥丛林，大姐春姐，二姐翠姐，她们都一生务农。因终年劳累，遭受折磨，积劳成疾，在我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到家乡时，都先后去世了。小妹九英，在旧社会也受了大半辈子苦，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回到我的身边生活。一九七九年，她回家乡度晚年，一九八三年因病去世了。

我全家历代靠自身劳动维持家庭半饱的生活。由于单靠务农难以维持生活，还兼捕鱼、砍柴，冒险贩盐以弥补全家生活之不足。到我父亲这一辈，除四叔父读了几年私塾外，其他三人基本上算是文盲、半文盲。我父亲自幼即喜练武术，后来终于考上了武秀才，他就以习武和教武术为生。其他三弟兄则仍以务农为生。所以全家受尽了地主、恶霸、官吏的剥削和压迫，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记得我大哥何清（当时是全家的当家的）说过：“别的本事我没有，我就是能在这样的穷苦家庭里忍受社会上的折磨。挨打、受饿、坐牢房，我习惯了。”

我就出生在这样动荡的社会，这样贫困的家庭，并在其中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因何氏家族有学艺工的一笔公田，亦有私塾，我就于六岁时入了这所私塾。又因大乘区有公田，办了初等、高等两所小学，故我有幸考取了南山区公立高等小学。由于平时刻苦攻读，学习成绩总在前三名之列。毕业考试时，全班五十多人，我名列榜首。当时，家乡父老都夸我有出息，将来必成大器。长而久之“唯楚有才”卧龙虎，成为我坚信不疑的一个信条。憧憬未来的彩色的梦，在我的精神世界里编织着一串串朦胧的，但是美好的花的长廊，激励我向上。那些不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仿佛是在向我招手，向他们靠拢，象他们那样的生活、奋斗，成了一股无形的巨大的力量推着我向前走。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境困难，父母年迈，大哥提议我弃学务农。幸得二嫂

严氏不同意，她说，何家因没有人学文化，历代打官司都输。她决心用耕种自己的二亩棉田供我继续上学，这样，我才得以在十三岁时（一九一四年），考入岳阳第三联合中学。这个学校是巴陵、平江、临湘、华容四县联合举办的。

我们的校长苏畅仁，是前清秀才，大约五十多岁。他经常戴一顶上面有红珠子的黑缎子瓜皮帽，穿一身绛色缎子长袍和黑色缎子马褂，亮闪闪的；他走起路来就象戏台上的老生走台步一样四平八稳，外八字步，长长的手指经常朝一个方向转动着，总是故意装出一种满腹经纶的学问家的样子。他对穷苦学生十分刻薄，不但体罚稍有不逊者，就是我们这些好学上进的学生，他想起来就要教训一番。这且不说，这家伙还心黑贪财，我们学习快结业时听说，他把四县补助穷苦学生的伙食津贴给吞了。大家都是中学生了，因世事艰难，学生们都已稍识世故和社会炎凉了。于是，我们群起而攻之，并选了九个代表去质问他，我当时就是九代表之一。

我们到校长室找他算帐。当时，有学问的人干这种事，且又被揭发出来是最丢身分的。所以，他死活不认帐，而且撕下一向斯文的外表破口大骂，扬言开除我们，并且打电话报告警察，说我们无端闹事，有碍校内秩序。

青年人血气方刚，制不住怒火。大家看他这样蛮横无理，早已忍不住。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对这老狗不动拳头是不行的！”“对，让他皮肉也受点苦。”话音未落，一个个

都冲了上去，拳脚交加，打得十分痛快。我当时虽然在众学友中年龄是最小的，但初生牛犊不怕虎，开始还犹豫，等大家冲上去打的差不多时，我也憋不住火了，也上去打了他两下，我说：“你这老狗，还叫不叫警察！”

过了大半个时辰，大家散了。但警察真的赶到了。一千多个同学把我们几个代表分别掩护起来。警察在校长带领下，找不到闹事的代表就胡乱抓了十几个同学带走了。

事后，我们几个代表也真的被开除了。

我回到家里，大哥向我发脾气，说：“你不好好读书，去闹学潮，拿钱去没学到学问，倒把造反的本事学回来了。你也不拍拍心口问问，读书的钱可都是咱家人的血汗啊！”母亲是个善良的人，一个劲的埋怨说：“时运不佳，咱家根子穷，被开除是报应哟！”只有嫂子同情我说：“我看弟弟闹得对，那个校长老儿坏透心了，十里八村的谁不知道他吞了孩子的伙食钱，从这么小的孩子嘴里抢吃的，是罪过呀！何况，小弟是代大伙办事的，是推举的，你们别难为他了。”听了这些话，我真不是滋味，不知道是悔是酸还是甜。

我在家里坐卧不宁，不知如何是好。当时，在闹学潮之前，就曾想到南洋去。因为，我小学时的老师罗喜闻先生曾经在南洋打过工。我在岳阳读书的时候，他就先到广东打听去南洋的消息去了；他答应在那边弄好之后，再带我去。他父亲和我父亲同岁又是朋友。他为人谦和，识

多见广，很多青年学生都愿听他的，跟他跑。这次事件一出，我就更想他了，心里早就长了“毛”。因为，有了寄托，精神宽松多了，心想，大千世界，朗朗乾坤，难道容不得我何坤这七尺之躯。想着，想着，饭也吃得下，觉也睡得实。尽管哥哥、妈妈的不快言行总在身边发生，我也不在乎了。

一天，我刚跟哥哥下地干完活，突然收到学校的一封信，信中说：你走后，学校开始了罢课斗争，校长认错了，并答应交出那笔伙食津贴；警察局抓去的学生全部放回；被开除的学生都回校开成绩单，发修业证书转学。

得到了修业证书，就等于在学业的台阶上又升高了一级。由于我学习用功，且成绩优良，何氏家族又用学艺费送我考入湖南省立的较有名气的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系（甲种工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专科。乙种工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专、中技）。何孟雄同志比我高两班。该校考试、收生很严，每个县只录取两名新生。学校是按美国学制办的，与美国订有教学技术合同。学校分三个专业，即机器制造系、纺织系、化工系。校长是蔡湘。学校有二十台机床，主要课程都由美国人用英文讲授，所学课程要背诵，经常测验考试。由于我努力苦学，成绩仍保持在全班前十名之列。

此时，回首往事，由于出身农村家庭，生活贫困，亲眼看到当时统治者腐败无能，各国的洋鬼子在中国国土上横冲直撞，任意掠夺，国内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人民倍受



凌侮，一种发奋学习，实业救国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思想开始形成，并激励着自己刻苦攻读。那时虽然调皮，爱打抱不平，有时看到富人子弟欺侮穷人孩子，我就和同学们联合起来跟他们干，直到他们不敢再欺负人为止，但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内拔尖的。我喜欢音乐、体操，生性好动，亦喜读外文。另外，我也很佩服、赞赏古人的好学。如孔康映学，匡衡凿壁，董绅垂帷，家源绝迹，韩子焚膏，穷年勿息。古文学者，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当时我把这些作为勤学苦练的座右铭。“任它年华似流水，豪情依旧似火红”。我珍惜年华，陶冶情操，勤奋好学，努力攻知识，学文化，准备做新生活的挑战者。

## 从湖南到北京

一九一七年的冬天，罗喜闻先生从广东回来了。他带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好消息，还带了几份章程回来。章程上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可以想办法借路费；还可以开法文班先学法文。我和几个同学看见章程高兴极了，几乎不相信有这样的事。

“罗先生，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可靠吗？”

“可靠不可靠那就知道了！”

后来他告诉了我们发现的经过。

有一天，他在城里街上走，忽然看见一个机器厂办事

处的门上，贴了一张留法勤工俭学的章程，上面写的负责人是黄强。他进去打听，知道黄强就是那个机器厂的厂长；厂址在城外。他到城外去找了两次，没有见到黄强，就写信给他。黄强收到信，就到饭店找他。

“章程上说可以借路费，是真的吗？”他问黄强，“如果是真的，我们要来几个人。”

“章程上说的，都可以相信。”黄强说，“不过你们是湖南人，不懂广东话，不方便，而且广东伙食高。我看不如到北京；那里也可以想办法借路费，伙食也比这里低。”

黄强给了他几份章程，并且写信介绍他去找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授李石曾接头。他拿着章程和介绍信，就回到湖南来了。

当时我们都没把握，于是罗喜闻就先寄信去和蔡元培、李石曾联系。不久，他们回信了，建议罗喜闻去和长沙教育会交涉，在长沙开一个法文班，教员由北京派，至于路费的问题，他们说，以后可以想办法。

为这事，罗喜闻在长沙呆了很久。交涉没有成功。他决定亲自到北京去。这时，我很想和他一块儿去。但是他不同意，他怕丢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学业，一定要我等他办好了，有了把握才去。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罗喜闻到北京去了。直到暑天，我才得到他有把握要我去的信。这时，我刚从甲种工业学校毕业。

我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和高风、毛羽顺等六七人，一块到了北京。一下火车，就有很多手拿打灰棍的孩子，围着给我们掸身上的灰。我们给他们几个铜板。板车工人也围上来给我们拉行李。我们就跟在板车后面走。

我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沿途一切事物，对我们都很新鲜。我们一边走，一边好奇地四处张望。北京城多么古雅！一进前门，就是长长的红墙，红墙里面，是雄伟的天安门。那里边，过去是皇帝走的街道，不许普通人走过，人们要经过天安门，只能走三道门外。

街道上有很多游人，特别是女的有很多标志，她们穿着花花绿绿的长袍，上面绣着动物和花朵，发髻挽得很高，上面带着一串串的珠子，鞋象木船一样，两头跷起来，她们碰见熟人打招呼，是两手由下方握起来，从右边拜一下。男的有时还要半跪一条腿。

街上还有一种引人注意的现象：给外国人赶马车的，都穿的是前清时一品官的礼服。他们的帽子上有红宝石的顶子，后面拖着一个野鸡翎子，对襟大袍上面，前后挂着一块绣龙或是绣鸽子的方块东西，脖颈上系着一长串朝珠。车内的外国人，仍然穿着笔挺的西装。人们说，这是外国讽刺中国做官的无能。

我们到内府库街罗喜闻住的地方，大家高兴极了。

“你们怎么来的？路上好走吗？”罗喜闻问我们。

“我们从华容县到武汉乘火车来的。”我们说，“路上不

好走。信阳的桥被水淹了，火车不通，我们就从淹了水的桥上跑过，到许昌才又上火车。”

罗喜闻热情地把我们安排了下来。

从湖南到北京，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

## 第二章

# 青春年华

### 走向新的生活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依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下，民族灾祸和阶级苦难日益深重。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受到西方思潮（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青年学生，大都苦心焦虑，希望能到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这时，恰巧一些教育界人士正在倡导勤工俭学运动，动员青年到法国半工半读。这一倡导得到了这些青年的响应。特别是其中一些已初步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先进分子，认为到欧洲更接近已取得革命胜利的俄国，更便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革命经验。因此，在湖南、四川、广东、北京等地，都有不少青年报名参加这一运动。我在一九一八年由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即从湖南到北京。九月三日，我在北京大方家胡同参加蔡元培先生主持召开的恢复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的会



议后，被派到长辛店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工业科。这是当时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之一，是勤工俭学总会在一部分社会进步力量的推动和支持下，通过蔡元培先生和长辛店铁路工厂接洽开办的。这个班一开始就是半工半读，一边紧张地进行出国前的学业上的准备，一边在铁路工厂做工自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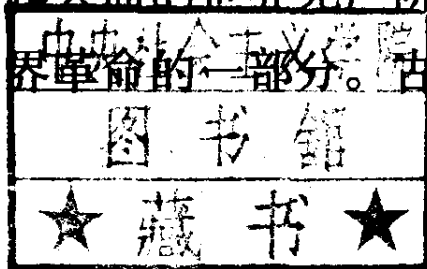
我们都是穷苦有志的青年，来到北京以后，吃住困难，便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我们大伙儿分了工，买菜、做饭、洗衣服，一切都是自己来干，我的分工是专管扫地、糊窗户、打杂。那时生活困难得很，甚至有时吃饭都靠赊欠维持。那年冬天，大家连棉衣都穿不上。下雪天，临时派人穿着夹衣上北京城里借钱去买棉花给大伙作衣裳。虽然如此，但是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欲望，如饥似渴地希望获取点滴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要求，使我们虽苦犹乐，斗志旺盛。那时只要我们手头有些钱，便急迫地订阅书报、杂志，争相阅读讨论。我们订阅报刊之多，使长辛店邮局的人都说：“需要专门派人给你们送书报、送东西。”当时北京和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象《新青年》、《湘江评论》、《国民杂志》、《每周评论》和《晨报》等，差不多我们班里都有。那上面发表的文章，到现在我印象较深的，有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分别在《新青年》、《湘江评论》上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民众大联合》等文。李大钊同志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

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作了较全面的介绍；毛泽东同志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已开始提出以人民群众大联合来反对反革命联盟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在《新青年》上，又系统介绍《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的传略等革命理论文章。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和理论文章，对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们在工厂半工半读，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穿起了工人的衣服，和工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朝夕相处，这样，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近代工业的劳动锻炼和工人阶级思想感情的熏陶。工人对我们热情诚恳，手把手、毫不保留地教我们生产技术。我们也利用业余时间，每周三次，轮流教工人们学文化，讲国内外大事与爱国反帝，宣传劳动的伟大意义与劳动神圣，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在当时，学生与工人的这种密切结合，是一个创举。学生们舍弃了统治阶级宣扬的走向上爬的道路，不顾亲友的非议，毅然摆脱了旧影响的束缚，脱下长衫，进入工厂，与工人阶级在一起。当时这样做的知识青年，虽然人数还不多，但以后革命实践证明：知识分子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组成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大军，这种新方向，是没有任何反动势力可以阻止它的。我们当时都很自豪，还自己议论着：“吴秀才（军阀吴佩孚字子玉，从前是个秀才）投笔从戎当了大帅，在社会上流为美谈，其实不过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增加一个战争贩子而已。而我们投笔

从工，从生产建设的观点来衡量，可胜过吴子玉多多了。”其实，那个吴佩孚怎么能同我们比呢？

当时，一方面十月革命影响下的先进革命力量刚在成长，另一方面中国的天空上还是阴云密布。首先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在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称帝失败后，接着又是黎元洪与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尔后辫帅张勋乘隙进京过皇帝瘾，演了场短暂的复辟丑剧。真是兵荒马乱，到处抢劫掠杀，整个国内风云突变，逐鹿中原，从护法战争到军阀间的直奉战争、直皖战争，一直炮火不断，民不聊生。当时有人为南北军阀政客的对立，作了一副对联，我只记得那上联是：“东有东海，西有西岭，看这两个东西如何调和南北”，便是比喻北方徐世昌（又叫徐东海）和南方岑春煊（又叫岑西岭）之间的不能调和、不能合作。这样动乱的军阀战争，反映了背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在这种黑暗统治下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抗也日趋广泛、日趋尖锐。终于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分赃会议上签字出卖山东主权为导火线，一个带着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更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群众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它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新阶段，并与风起云涌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古老的中国从沉睡中苏醒了。



## 在五四运动中

五四运动爆发前，我们在长辛店已经听到卖国政府准备向帝国主义屈膝的消息。北京大学学生早就和我们保持经常的联系，留法预备班北京班和保定班也和我们互通消息，我们班也常派人到北大图书馆西侧沙滩马神庙附近（那儿是北大的宿舍）去写标语。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我们怕乘火车不能如期赶到，那时自行车是有钱人骑的，我们谁也买不起，便都骑着毛驴赶赴北京城。到了天安门，见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开完大会，游行队伍一起前往新华门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不料遭到大批反动军警的镇压，许多学生被刺伤、打伤，被逮捕。军阀政府这种反动行为，更加激怒了早已愤怒着的人群，大家立即采取行动，去制裁卖国贼和反动派。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分成三路向反动派进攻：一路到赵家楼去打曹汝霖；一路到东交民巷，包围日本领事馆；一路去打德国牌坊（就是清朝卖国政府为义和团所打死的德国人克林德立的纪念碑，我们叫它“国耻纪念碑”）。我们长辛店学生参加的是东交民巷一路。事后听说，去打曹汝霖的一路，由于没有捉到曹汝霖，学生们便放火烧了他的房子和痛打了章宗祥。北洋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不仅没有吓倒我们，反而更加激发了群众斗争的怒潮。五四运动向着更大规模和更加深入的方向发

展。第二天，北京市学生总罢课，展开了救国的宣传活动。当时成立了“讲演团”、“国货维持会”、“救国十人团”等组织，到处演说，鼓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在长辛店我们也同样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到车间向工人宣传，到车站向旅客宣传，到近郊向农民宣传。工人们都很快支持我们的行动，厂里的工程师、技师大多数也同情和支持我们，车间一个老师傅陶钟和说：“开初，我把你们当成毛孩子啥也不懂，谁知道，你们竟敢上北京去惹总统。”后来我们组织的“救国十人团”在长辛店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参加下，迅速扩大起来，成了学生和工人的联合组织，其中工人团员有五百余人。

在工厂里，当时有个副厂长刘家骥反对我们的进步活动最猖狂，他是曹汝霖的女婿，和卖国贼一个鼻孔出气。他曾召集我们开会，辱骂我们说：“你们这些穷小子，爱什么国呀！不好好读书，光会闹事，你们真是劣马害群，再闹我开除你们！”我们都火了，要揍他，他看风头不对，赶忙逃跑。厂里工人和我们站在一起，他们以坚决的罢工行动反对卖国贼爪牙对我们爱国活动的破坏。五月七日，厂里工人罢工了。我们和工人商量好，去烧刘家骥的房子惩罚他。于是有些工人和我们一块拿着钳子、大锤，抬着洋油桶，直奔他的住宅，一同去的还有厂里的工程师和我们的教员。刘家骥早已闻讯吓跑了，只剩他老婆在家，门关得死死的，叫也不开，工人和我们一边向墙里扔石头，一



边把汽油往门上倒，点起火就烧了起来。由于叫门不开，大伙儿就爬上了围墙，刘家骥的老婆穿着西装裙子，站在凉台上，一看，吓得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哀求说：“各位同学先生们！工友们！他人走了，得罪了你们了……不要打伤孩子，我给你们赔罪……”最后由于法文教员的调解，我们才和工人一同散去。

我们对刘家骥示了一次威，工厂头头们的威风 and 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不少。工人抬了头，从政治上争取到了一些民主权利，可以参加一些爱国活动了。从经济上，争取到一些福利，工人向工厂借工资，也较前放宽。厂里办事人员的态度也变得稍稍温和了一些。

长辛店铁路工人，经过这一场斗争，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都有了提高。从我们与工人阶级共同生活、共同斗争的紧密结合里，已经切身体验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与智慧。如果不依靠工人，我们在长辛店“五四”前后的革命活动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这种崭新的体会与认识，立刻化为我们的行动。在五四运动高潮过去后，我们立刻展开了在工农群众中的活动，主要是搞宣传。差不多两个月，我们没有上课，也没有做工，打着长辛店救国宣传队的旗子，三五个人一组，到车间或下乡去作宣传工作。每天，带上几个窝窝头，早出晚归，一天要跑几十公里路，到处向工人、农民演说，宣传爱国反帝，劝老百姓抵制日货，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

工农群众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呼叫国家到了危亡地步，以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和阶级仇恨。

当时，北洋军阀所办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有时驻扎在长辛店，一住就是三个月。他们一般都是初中毕业，我们也抓紧机会向他们宣传，对他们讲不要打内战、不要杀自己的同胞的道理。并且瓦解他们说：“丘八丘八，人人喊杀。”“为军阀当炮灰，自己人打自己人，死了连条狗都不如。”工厂的工人，也向他们讲道理：“你们毕了业来压迫我们，对我们吹胡子瞪眼睛。”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本来看我们读书又做工，每月还有几块钱花，不但能学些生产知识，还可以放洋留学，就有些眼红，有的和我们商量：“你们中学毕业当工人，我们当丘八，能不能让我们也进来？”

五四运动从学生的游行示威开始，很快就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持。六月三日以后，上海六七万工人首先发动了大罢工，接着沪宁、沪杭两铁路工人罢工，长辛店的工人也相继而起。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参加政治斗争即显示出巨大威力，使五四运动规模更加宏大，波澜更加壮阔。接着全国各重要城市发生罢工。至此，五四运动发展成全国范围内的运动。在这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反动的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撤去了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几个大卖国贼的官职，恢复了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答应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给了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生

动的阶级教育。历来的统治阶级，总认为：所谓历史，就是英雄伟人的历史。辛亥革命也仍然是主要依靠大小军阀的起义，而没有唤起广大民众，孙中山在他的遗嘱中说：积四十年之经验才知必须唤起民众。所以“辛亥革命”带有它先天软弱性。而五四运动可就不同了。到了“六三”以后，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使运动的声势与力量大为改观，迫使反动派妥协和屈服。这就提出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新课题，谁是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要依靠谁？当时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并逐步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一支强大的革命生力军，在五四运动中表现了勇敢无畏，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五四运动中宣告结束，而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宣告开始。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五四运动后不久，长辛店工厂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就有了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当时工人运动的据点之一。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同志，当时也曾到过长辛店工人之中，指导运动。

## 初 识 毛 泽 东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一八年秋和一九一九年夏在北京搞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虽然是短短的一年时光，由于他的倡导和启发，在长辛店办起了我们预备班。这就使长辛店成为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的一块试验田。

我所知道的，毛泽东同志先后有两次来长辛店。一次是白天（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上旬），一次是晚上（一九一九年三月中旬）。白天那一次，他是了解长辛店工厂和工人的生活和生活状况以及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关系问题，看工厂是否能多容纳些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因为各地学生纷纷写信给留法勤工俭学会，要求来京进行留法预备学习，当时毛泽东同志是勤工俭学主要负责人之一。但北京预备班是北洋军阀政府所在地，北洋军阀政府总是对一班穷学生放心不下，不准在京城扩大班次，招收新生。毛泽东同志不得不亲赴长辛店考查实情，以答复各省热心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贫苦的同学们。

长辛店职工人员也没有料到，在一九一八年的残冬，在严寒的日子里，由北京秘密来了这么一位很平凡的没惹人注意的贵客。他身着灰布大棉袄，留着长发，好象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他在工人群众中寻东问西，从整个工厂的全貌到职工们的个人思想和生活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他那一次是住在我们班里。在厂里转完了，回到班里和我们一谈，我们就觉得，虽然时间这么短，但是他掌握了长辛店工厂的情况，特别是当时职工的情况非常详细。临别时，毛泽东同志特别叮嘱我们，要向工人学习，他们身上有许

多优良的品质，有纪律，吃苦性强，有斗争精神等，把这些优良品质学到手，到国外去才能和那里的工人打成一片。

毛泽东同志第二次来长辛店，记得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三月。永定河里的冰刚刚解冻，西山坡上的白雪还保持白头翁的老模样。北方的寒冷还威胁着我们南方人。对中国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正在孕育之中，正在这时毛泽东同志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出现于工人群众中。他又是先到铁路工人中间，然后回到我们班上。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的是他那天晚上坐在我的炕上，纵谈天下大事和怎样学习工人阶级唤起工人群众的道理，并说这是救中国的路。他谈笑自若，表现出高度的政治修养。虽然，毛泽东同志当时也很年轻，可我们都很佩服他，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精辟，打动人心。

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启发，以及生动的学工实践，使我们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和工人同志们相处亲密无间。回忆起这一段生活，就象永远也不能枯竭的海洋和永远也不能熄灭的太阳，使我牢牢记在心中。

长辛店的工人阶级从爱国热情出发，对我们这些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奋勉工作、学习，准备远渡重洋，寻求救国道路的青年人，百倍地爱护，并寄予无限的期望。还记得我们那麻子师傅，钳工技术很高，他拿来圆钢，要我们锉成三角形或六角形，锉完了，他就把工件放在抹油的平面样板上检验，如果有的地方没粘上油，那就是没有锉

平，还得锉。他很严格，一点不马虎。老师傅费了很多苦心来教我们，把自己的全部本领拿出来，唯恐我们学不会，希望我们在国外勤工俭学中，有生活的本领，可以多求得些救国的办法。我们也真心地关心着工人，热心帮助工人子女学习，关心工人的生活疾苦，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有一个时期，长辛店鼠疫流行，恶性传染，居民及工厂职工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反动当局也不采取具体措施，我们便不顾一切，冒着被传染的生命危险去给职工宿舍和市镇消毒，给病患者医治抢救。

至今想起来仍不禁心情激动的一件事，是出国前夕，工人们给我们饯别，组织欢送会的情景。在当时工人们生活是很苦的，但是，他们情愿请假一天，不做工，还捐了自己的血汗所得的微薄工资，来筹备这个欢送会。他们洋溢着节日般的感情，张灯结彩，挂标语，烧茶水，做点心。

在欢送会上，大家放开喉咙唱着民歌、京剧，拉着二胡，充满了工人阶级大家庭的友爱与温暖。

到我们临走的时候，工友们和家属们象送别亲人一样依依不舍地手拉着手，肩并着肩，送到长辛店车站，看着我们登上了前进的列车。我们想到从此就要远离祖国，远别亲友，渡过重洋，为祖国的未来艰苦跋涉，当时百感交集的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列车启动了，粗粗地喘着气，发出震人心弦的吼声，我们隔着窗，互相凝视着，不禁眼圈发红。我们暗中宣誓：“师傅们！我们绝不辜负你

们的期望，一定为祖国找出一条光明的出路，才有面目回来见你们。”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长辛店时间很短，但对我们来说，是意义深长的，每个人都恋恋不忘。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法国每到节假日，我们这群远离祖国的孩子们，总是面向东方，心里念着祖国，想着长辛店，想着这块给我心田里播上革命火种的地方。我们大家对祖国的前途，有着无限的希望，又难以免除顾虑。祖国人民的痛苦，何时才能解除啊！对于长辛店的工人同志们，又特别寄予深情。

后来，在长期的斗争中，我认识到长辛店的日日夜夜是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在这里，我们从幼稚走向精壮。在这里，我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与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开始改变了旧有的实业救国的世界观。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在海外国际工人运动的锻炼，我们确立了马列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坚定了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绝大多数同学，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党员，参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六十年前长辛店车站上的誓言终于实现了。

## 第三章

# 勤工俭学在法国

### 初吻巴黎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学生，经过一年左右的学习后，便开始分批陆续由上海出发，飘洋过海，前往法国。我是乘法国邮船“布尔列加号”由上海港动身的。由于贫困，只能坐三等或四等舱，那里空气混浊，特别是当海轮航行在赤道线上时，舱内闷热，更加令人难忍。许多学生都是初次航海，每当遇到大风的时候，就只好躲到舱里，饱受眩晕呕吐之苦。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之后，我们才抵达目的地——法国马赛港。当时出面接待中国学生的中国驻马赛领事，竟是一个法国人。学生们一看就凉了半截。这位“中国领事”，对学生漠不关心，就连学生说的话他也听不懂。事后得知，这种任用洋人充当中国领事的有损国家独立尊严的事，在驻美、驻英等领事馆中也同样存在。所以，当学生们一到



法国，就觉得举目无亲，都有一种海外孤儿的感觉。

在我们来到的时候，留法勤工俭学生已经有三百多人了。一部分在巴黎，一部分已经分散到外地。

战后，法国的社会生活还没有恢复常规，很多工厂在战后开不了工，因为大战期间，这些工厂都改为兵工厂，一时很难恢复正常生产，同时也缺乏原料和资金。所以法国工人失业很多，加上法郎贬值，社会生活很动荡。留法勤工俭学生大部分找不到工作，没有钱进学校，许多学生就住在华法教育会里面。华法教育会每月给少许生活补助费，那时华法教育会的房子都住满了，还在花园里搭了帐篷。

我们这一批人，刚到的时候，虽然初闻其苦，但年轻人的心总是百艰不忘一玩。刚到巴黎就先把困难放在一边，买了旅行指南，到处去游览，观赏闻名已久的巴黎风光去了。我们乘巴黎地下铁路电车开始了有趣的观光活动。这条地铁修的很新奇。塞纳河象“之”字形穿过巴黎市中心，地下电车经过塞纳河时，都是走河底，只有一段走河的上空。乘坐着电车猛的从地下冒出来，经过街顶慢慢往上升，升到塞纳河上空过河，然后又慢慢钻入地下，当我们经过这里的时候，真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好象是鲤鱼跃龙门，又象孙悟空翻筋斗，一下子由水晶宫翻到了南天门。我们观赏了巴黎别具风格的大桥小桥，公园花木，街旁的梧桐。特别观赏了世界有名的巴黎铁塔，卢夫尔宫，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尤其是凡尔赛宫，是以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

约出名的。有直通电车，载运游人。差不多两分钟就开一次。凡尔赛宫地势很高，象在一座小山上一样。我们从大理石的台阶拾级而上，一进宫，导游人首先带我们参观欧战和约签字的会议厅。这个大厅是圆形的，比地面低，象我们旧戏院的池子。走到签字的地方，导游人指着席位告诉我们，威尔逊坐在什么地方，中国代表坐在什么地方。我们听着，不禁又想起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动人情景。巴黎商店很多，大部分都是女店员。她们待客热情周到，十分认真，收入微薄，很多人租不起房子，晚上就到学校教室去睡觉。

巴黎表面上虽然看不出战争的痕迹，但是生活中还留着战争的阴影。法国的物价，平均比战前涨了三倍。法国人民一买东西就说：“这都是德国强盗害的。”人民普遍存在着厌战情绪，一遇到不如意的事就骂德国人。认为挤电车、排队买粮食，都是德国人造成的。法国人民也痛恨总统，说总统是猪猡，吸人民血汗的家伙。有个老头喝醉了酒，当众骂总统说：“你死吧，有了你，我就活不了！”巴黎在它表面繁荣的另一面还表现在近郊，那里除了风景区，贫民窟比比皆是。人们有的住在破汽车棚里，有的用烂铁皮当房子，到处晒着破烂的衣服，小孩在垃圾堆上觅食，苦工仍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在观赏中，我们遇到了更不愉快的事。在凡尔赛宫的一个陈列馆里，我们看见了很多八国联军在中国抢劫的东

西，里面有各种古代的袍服、盔甲、军衣、铜炮、宝塔、宝剑等。这都是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可是，参观中不少法国的达官贵人们却振振有词，把这种强盗行为，说成是正义行动，说什么：中国人野蛮，应该给以惩罚。帝国主义分子这种颠倒黑白的无耻勾当，使我们非常愤恨。参观回来，我们都不禁触景生情，激发着爱国义愤，仰天感叹着：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振奋起来？被人欺凌的历史应该结束了。

到达法国后，勤工俭学学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找工作。因为有了工作，才能生活，也才有可能把节省下来的钱作为学费。但是，当时的法国本国失业工人就有二十万人。所以，我们这些新来的外国人，要在法国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业自然很困难。起初我们只得天天去揽临时工做。临时工活很苦，法国人称为“马老五”，意思是苦力，不论什么活都得干。有的到市场打杂，推蔬菜，送牛奶；到火车站和轮船码头擦皮鞋；到建筑工地当小工和拌水泥拣石子；到大街去清垃圾；到饭馆当跑堂，削土豆皮等。在法国，虽然也有一个“华法教育会”的机构，它本来是应该负责照管勤工俭学学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但它是一个官僚机构，对学生的事情很少过问。勤工俭学学生经过重重困难，直到一九二〇年十月，才陆续找到仅足糊口的工作。当时失业人数众多，资本家趁机压低工资，所以这班学生整天辛勤所得，也仅够糊口

而已。还有一部分学生则一直找不到工作，只能每日向“华法教育会”领取一点微薄的“维持费”来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原来的理想——半工半读，也就烟消云散了。

我的工作是在巴黎近郊的比昂古尔区的“雷诺”汽车分厂。这是个大工厂，全厂有一万多工人。中国留学生中的赵世炎、李富春、王若飞、聂荣臻等同志都在这里做过工。后来，周恩来同志也到了这里。那时，周恩来同志多半时间从事社会活动，考察工人运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个活跃分子。他的思想境界比我们当时那种勤于做工，俭以求学，学而有成，图效救国的思想高出好一大截子。在工厂里，由于分工较细，勤工俭学生分的工种既有差别又很分散，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每当勤工俭学生集合和节假日经常看到他，有时还能听到他同国家主义派的辩论演说。他的雄辩卓见不仅吸引着勤工俭学生，还吸引着不少华工。我们不少人从“实业救国”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固然有各种原因，但是，周恩来同志、蔡和森同志、赵世炎同志等的宣传和教育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们应该说是我们转变思想的“启蒙老师”。

法国工人对我们特别关心，他们耐心的教我们学技术，有时甚至是把着手教，直到我们熟悉了，才让我们单独操作。法国的许多青年工人，更是主动的接近我们，教我们说法国话，关心我们的生活，如果发现我们不高兴，

就跑过来问长问短：“你在想什么？有什么困难？”有一次我上工迟到了，没拿到工牌，按照厂规，迟到一分钟，就不发给工牌，没有工牌就上不了工，拿不到工钱。我正在为难的时候，被一个法国青年工人看见了，他把我拉去找工头说：“给他一个牌子吧，他不过只迟到一分钟。他今天上不了工，就没法生活了。再说，他这样的熟练工误了一天工，厂方要受损失的呀！”工头似乎被他这一软一硬的话梗住了，只好发给了工牌。那青年眨眨眼，拉着我一溜烟似的跑进了工厂。在政治上，法国工人更是关心我们，告诉我们工厂里哪个是坏蛋，哪个是政府派来暗地里监视工人的，工间、业余时间，还给我们讲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后来，我才知道那些经常接近我们关心我们的，有的就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员。我们身居国外勤工俭学，开始都怀着一种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朴素愿望。一般学生都有两个担心，一是怕资本家借口开除我们而失去学习的机会；二是怕学而无成辜负国人和家人的期望。所以，做起工来，总是特别卖劲。法国工人怕我们累坏了身体，经常劝我们：“中国朋友，慢慢的，不要累垮了身体，要做持久的打算。”我们在做工中交了许多法国朋友，经常到他们家里去玩。法国老妈妈见了我们分外亲热，总是问这问那：“你是亚洲来的中国人，远离家乡，远离父母亲友，不容易呀！有志气呀！”“中国有多大？”“你想不想家？”“把你当做我家里的亲人好不好？”同时拿出最好的酒，做

最好的菜，切开很难买到的白面包招待我们。显示出工人阶级的真挚情谊。

在法国做工和读书的外国人很多，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世界大战流落国外的，有美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朝鲜人等。但是，不论白种、黑种、黄种，不论民族、国籍，大家同劳动，同学习，互相帮助，团结无间。

做了一段时间工，有了点积蓄，我就开始上学了。中国学生进学校，一般是要到巴黎、里昂、马赛、波尔多等几个大城市。我怕在大城市把心搞花了，就要求到小城市去，到一个中国学生少的学校去，跟法国人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好学法文，踏踏实实地读书。这样，我就到了远离巴黎的圣雪尔旺省的圣雪尔旺学校。

这是一个教会办的综合性中等技术学校，校长是法国共产党的党员。在我到学校不久，法国社会党内部分裂了。一小撮右派贩卖工人阶级利益，投降了帝国主义；而绝大多数忠诚的革命者则正式加入了共产党，坚持革命工人运动。而且，在我们学校里也建立了党组织。我到这里学习真是幸运。

我从繁华的巴黎来到这个接近海边的学校，感到是另一种风味。校长热情接待，同学争相慰问，使人感到虽居异国，但十分温暖。我入校后插在机械班，校长怕我赶不上功课，特地指定成绩好的学生来帮助我。校长的妻子是学校中一个得力的行政管理员，照顾得非常周到。晚上招呼我盖被子，衣服脏了她都拿去洗，破了拿去缝。在吃饭

的时候，她把面包切好，夹上厚厚的黄油，送到我手里，还说：“学习辛苦，营养要好。你是外国来的，一定很寂寞，学好会话，嘴就活了。”这时，我的确感到在国内记的法文生字太少了。这里社交多，公园、学校、工厂、农村，老年人、小孩子说话都各有不同的词汇，特别是这个滨海城市，四方杂处，语言更显得复杂了。不久，又来了一批中国学生。学校专为我们开了一个中国班，课程进度慢一些，并且编成了学习小组。学校选最优秀的学生帮助我们，选最有经验的教员教我们。但为了会话和了解法国语言，我们和法国同学混合编在一起。学校对我们采取集体教育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办法。教员不仅要教我们功课，还固定和几个同学作定期谈话。帮助我们的同学，课余领我们到海边公园去玩，边玩边复习功课，互相问答，进步很快。老校长更是关心，他看我们遇到难点，手上总离不开字典，就主动帮我们查找。为了使我们学好记熟，经常带我们到海边，教我们一组组的字。讲海，就把与海有关的东西都讲出来，什么海鸥、海带、海浪、海滩、海产等。讲天空，他就专门讲天上的东西。

校长很注意国际友谊。有的法国学生看不起我们这些黄面孔，说我们用筷子吃饭不文明；有的中国同学说法国人头发难看，眼睛吓人。遇到这种事，他总是耐心教育，叫大家不要抱民族偏见。有一次我们和意大利人赛足球，意大利球队中，有个黄头发的小伙子很厉害，我们就

秘密开会要整他。不料这件事让校长知道了，于是，他马上要大家停止比赛，把各国的人混合编队重新比赛，从而避免了冲突，增强了友谊。

我们的副校长，也是一个共产党员，退役军官，负责党的工作。有一天，他上楼梯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只脚走路很不自然。后来才知道他是在战争中残废了，一只腿没有了，安的假腿。

“能不能给我看看？”我请求他。“可以。”他把扣子一解，腿一伸，一个套子抽了出来。他说：“这条腿叫资产阶级夺去了！他们想发财，要战争，可是自己不去打仗！要消灭战争，先得消灭资产阶级！”我们学校有几十个教员是复员的残废军人，有的安上了假手、假臂。每每同他们谈到战争，无不痛恨资产阶级，说：这是人类的灾星。

学校很注意实物教育和形象教育。讲到机械，就到现场操作，讲到什么参观什么。因此，对于我们中国同学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学习方式。因为，听不懂，一看操作和实物马上懂了，记得也牢。

学校的课外活动比课内活动多，三分之一课内活动，三分之二课外活动。一年两次运动会，还有恳亲会、校庆会、游艺会、同乐会、联演会等，有时还为中国同学办演讲会，讲的时候，他们来评判。哪里不该声调高，哪里不该笑，哪里重音错了……指出来。演讲姿势也很讲究，



什么话打什么手势、有什么眼神等，这对锻炼我们运用会话的能力，很有帮助。另外，一般的社会活动，也都叫我们去参加，增加社会知识。在收获葡萄的时节，我们还到农村去帮助抢收。这就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和法国社会接触，增加了对法国社会的了解。

我所在的圣雪尔旺学校，对我们勤工俭学生真可谓是关怀备至，对我们和法国同学一视同仁。但就在我们附近农场做工学技术的同学，处境就十分可怜。在干活时，地主骑着马兜圈子，大家见了，还得给他脱帽行礼。连地主母亲坐马车经过，也得行礼，不然学监就骂学生不文明、不礼貌，怒冲冲地叫大家排队，重新行礼。他们名义上是半工半读，实际上难得上两个小时的课，每天要做十四个小时以上的工，天天从早到晚栽果树、种庄稼，累个半死。吃的也很坏，一个星期才做一次面包，放上几天，啃都啃不动，一吃肉就是臭的，场里牛奶很多，可是工人和学生喝不上。这些同学为了学一点农业技术，真不知要吃多少苦，碰多少钉子，受多少气呢。

钱快花完了。暑假，我又回到巴黎做工。当时，正式工作不容易找，干脆就做临时工。我在近郊哥伦布街租了一间房子住。这里离工厂较远，没噪音、烟尘，很清静。我什么工都做，工作服一穿，完全是个劳动者的样子。我天天半夜起床，先到市场去推蔬菜上市，送牛奶上门。天亮后，就到火车站去上货、卸货，给人搬行李、抱小孩，有

的商人赚了钱还多给一点充阔。最累的还是在地当临时工，搬砖推瓦扛水泥，打扫工地清扫马粪垃圾。最轻的活该算做纸花，做一天两个法郎，住在巴黎的勤工俭学生差不多都做过。一天工作完了，腰酸臂疼，洗个澡，疲劳似乎减轻一点。伸手到口袋里摸一摸，把一天的报酬拿出来看一看，望望天空伸个懒腰，虽然够累的，但想到多做一天工，就可以多读一天书的情景，不觉舒畅起来。回到住处往床上一躺，看看书就睡觉休息。我虽然注意调剂生活，还是累病了，痰里夹着血丝，体温升高。没办法住进了医院，一躺就是一个星期，出院以后，我在报上看到法国北部地区招工消息，我就报名出发。这里战争创伤极重，没有一处完整的森林，都烧光了，砍光了，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村庄，房子不是烧毁就是倒塌了；到处是一堆堆坟墓；公路两边散布着铁轮、大小螺丝、弹壳、钢板、人骨、马骨；街上到处看见残废的人，很多孤儿寡母上街行乞，景象十分凄惨。一到星期天，戴黑纱的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到坟山去祭奠亲人，大骂德国强盗。

我们的工作清理现场，天天拣废铜烂铁，锯木桩挖房基，盖楼房。到这里来工作的，什么人都有，有青年学生，也有农民，有从非洲来的黑人，也有赦免的犯人。黑人都懂法文，对我们特别亲热，说：“我们都是被侵略者！”大家干的是捶石压路扛砖抬瓦的重活，吃的却是硬如钢铁的黑面包，一周吃不上一顿好面包，一到吃饭时就想起祖

国、家乡，想起我特喜欢的大米饭、辣椒，此刻千头万绪齐集心头，我朝着祖国方向张望，真是痛苦万分。

这个时候，我们在巴黎做工的很多同学，都没有组织起来，四面八方，各自谋生，形势发展使大家逐渐认识到需要组织。这在五四运动中大家都感觉到了。如今到了国外，勤工俭学各闯各的路不是办法，要共同谋生存，特别在政治上要有出路，感到这是至关重要的，比眼下的黄油和面包还重要。

### 争“三权”与拒款风潮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蕴积在勤工俭学学生心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这一天的早晨，住在巴黎近郊的四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高呼着要“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斗争口号，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示威。公使陈篆蛮不讲理，学生们怒不可遏，直逼陈篆。陈篆狼狈不堪，在法国警察保护下慌忙逃脱。大家把这次斗争称作“二八运动”。这次运动，震动了巴黎，吓坏了中国的反动政府，也唤醒了勤工俭学的学生们。

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大部分是经历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人。他们在祖国垂危之际，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海外，同法国的工人、农民一起参加反对资本家和农场主的斗争。这些斗争活动，触怒了法国和中国

的反动统治阶级。就连那时在法国的反动政客李石曾、吴稚晖等，也感到十分恼火。于是，他们沆瀣一气，抛弃了“提倡勤工俭学”的假面具，对学生们进行诬蔑、打击、迫害。“华法教育会”本负有代勤工俭学学生找工作、找学校的职责，这时不但不履行职责，竟诬称学生“既无勤工之能，又乏俭学之志”，致使许多学生陷入工不能工，学不能学的困境。

这次“二八运动”还有个导火线。那时国内报纸曾刊载一则消息，说是国内的一些团体募集了三百万法郎的捐款，资助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但是这笔捐款很长时间并没分发给学生，于是学生们便去询问“华法教育会”。他们支支吾吾，不作明确答复，甚至否认其事。学生们拿出报纸作证，他们才不得不承认有这笔钱。但是他们又说什么钱是汇来了，但尚不够数；而且需要补助的学生人数有待登记，每个学生可分多少亦待确定。总之，百般推托，借故拖延。实际上，他们早已贪污中饱，将这批捐款套购外汇谋利或买古董私藏了。学生们洞悉这一真实情况后，怒火中烧，就如同点燃的火药桶一样，猛烈爆发了。

首先，当“华法教育会”及李石曾、吴稚晖等的“提倡勤工俭学”的假面具被揭露以后，一些先进的勤工俭学学生就开始聚集起来，商讨互相自救的办法。在巴黎近郊蒙达尼公学学习的李维汉、张昆弟、李富春等同志，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一方面互相自救，一方面从事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该会章程第

一条写明：“本会以行社会革命为宗旨。”

“勤工俭学励进会”成立以后，参加的同学不少，无形中成为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群众组织。它对推动勤工俭学学生的团结和争取进步，起了一定的作用。

正在这个时候，国内外对勤工俭学学生的压力日益加紧。北洋军阀政府借口“国库奇绌”，拒绝资助，并令公使馆将在法国的无工无学的学生“遣送回国”。“华法教育会”也落井下石，通知勤工俭学学生今后不再发给维持费。这一来，大多数勤工俭学学生面临绝境。当时就有个别学生被迫跳河自尽，以抗议这些反动措施。

“勤工俭学励进会”面对这一严重局势，一方面加强对同学们的互相自救，同时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另一方面派几个同学去公使馆交涉和斗争，但没有结果。

要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只有团结起来，对反动政府的驻外机构进行斗争，才有出路。这是当时大多数同学的共同呼声。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二八运动”的前夕，“勤工俭学励进会”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召开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口号，决定号召在巴黎和巴黎近郊工读的学生，第二天都去公使馆示威请愿。

第二天一早，四百多名学生陆续从巴黎各区到达公使馆前，将公使馆团团围住，派出以蔡和森同志为首的代表

十人和女生代表一人，去见公使陈篆。陈篆开始拒不见面。在学生们的压力下，才不得不答应于下午一时在公使馆附近的塞弗方公园和大家见面商谈。

下午一时，陈篆来到公园，但他对同学们的要求，即救济有困难的勤工俭学学生和设法安排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却一口拒绝。他说：“你们是‘华法教育会’组织来的，有困难应找他们去，公使馆管不了。”当同学们退一步只求他向法国政府交涉，多招收一些中国学生作工时，他仍是顽固地拒绝，说：“我办不了。我没有责任管这些事。”当时在场的学生们看到陈篆这种恶劣态度，怒火越来越大，站在前面的几十个人将陈篆围住。陈篆知道不妙，拔腿就跑。这时，突然警笛长鸣，一队预先埋伏在附近的法国警察闯入人群中，保护陈篆逃去，并举起警棍向学生们乱打。学生四处逃避，其中有四位学生代表被法警捕去。

中法反动当局这些暴行，立刻激起了旅法各界华侨的愤怒抗议，纷纷写信声援学生，并向陈篆提出严厉责问，国内也来电抗议。被打散的学生，那天并没有散去，当晚就继续在“华法教育会”楼上召开会议，一致表示要斗争到底，直到被捕的代表放回和救济问题、工读问题得到解决为止。在学生的强硬要求下，陈篆才不得不被迫请法国当局将捕去的四位学生代表释放，并将国内汇来的一部分捐款分发给有困难的同学。

这次斗争，以勤工俭学学生的胜利而结束。通过这次

斗争，学生们进一步看清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三月中旬，周恩来同志从英国来到法国，详尽的了解了这场斗争的经过，以《留法勤工俭学之大波澜》为题，写成通讯寄回国内，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华法教育会”的创办人李石曾和北洋政府驻外官僚陈篆等欺骗和迫害青年学生的罪行。这是我们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向反动当局进行的第一次群众性的斗争。

“二八运动”过后不久，即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北洋政府派出的专使朱启钤来到巴黎。据朱自己的表白，他的任务是代表总统徐世昌，来法接受巴黎大学颁发给徐的一个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但随朱同来的却有一个交通系的头子，专以出卖国家利益向外国借款为业的吴鼎昌。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朱启钤这次来法还有更为重要的任务。果不出所料，当时正在巴黎的周恩来同志，于六月十六日在法国政府一份官办的报纸上，发现了一条不太显眼但和中国命运有重要关系的消息。该消息说：

“本月十五日，法国国务会议将中国借款事列入议程，财政总长因反对此事而未列席。此人系一银行家，因此次借款之分摊，彼所主持之银行无份，故愤而离席云。”

蔡和森、赵世炎同志看到这段消息之后，结合连日外间纷传朱启钤来法是为了向法国借款，而吴鼎昌同来但又不肯公开露面等情况，警觉到此中的蛛丝马迹，现经法报这一披露，可以说是证实了。于是，他们便立刻将这一消息通

知各旅法华侨社团的负责人。这时，正在圣日尔曼公学学习的陈毅同志也从一位法国工程师的口里，听到了中法正在谈判借款的消息，他也立刻向“工学世界社”报告。一时间，消息在所有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法华工、华侨中传播开来，大家无不义愤填膺，痛恨卖国的北洋政府。

蔡和森、赵世炎等同志一面关注每天的报纸新闻，从中分析借款动向；一面利用各种关系，调查借款内幕。后来知道，这次中国政府向法国政府借款，款额多达三亿法郎（其中一亿由经手人和北洋政府瓜分中饱，二亿名义上给中法实业银行经营，实际为了买军火打内战），中国政府对借款的担保条件是出卖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修筑权……这桩肮脏交易，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中法两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同志一起，首先联合巴黎各华侨团体，如中国旅法学生会、华工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室，以及巴黎通讯社、旅欧周刊社的记者等，组成了一个“拒款委员会”，于六月三十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成立大会，掀起了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风暴。许多勤工俭学的学生，都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斗争。我当时也从法国西海岸的圣雪尔旺赶来巴黎，直接参加了拒款运动。

“拒款大会”后，蔡和森、赵世炎和陈毅等同志组织了一批勤工俭学学生、旅法华工和爱国华侨代表去会见朱启钤，当面痛斥他欺骗华侨、学生，秘密进行卖国借款的



罪恶行为。代表们还当众声明退回朱启钤为讨好勤工俭学学生而假惺惺地捐助的“维持费”，以示抗议。

在代表们的责问下，朱启钤开始还故作镇静，极力否认。但当代表们列举了许多事实予以揭露之后，朱才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说：“想借款是有其事，但还在谈判中，是否成功，还不一定。至于借款用途，主要是用来兴办实业，以富裕国家，并无其它目的……”代表们对他的答复很不满意，并举出一些事例，证明历来北洋政府所借外国款项，主要是用来购买军火，进行祸国殃民的内战。朱启钤在群众的压力下，假意表示：“你们的意见可以考虑，让我打电报回去，由政府决定。”

在代表们的严厉谴责下，朱的借款活动不能不有所收敛。当时的法国舆论界，因为看到了“拒款宣言”，也有一部分同情中国而批评法国政府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也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但是，无论是朱启钤，还是法帝国主义者，借款没有达到目的，他们是不会死心的。狡猾的朱启钤是“以退为进”，他自己溜去美国，借款的事却交由驻法公使陈篆继续秘密进行。法国政府当然也完全同意。借款的事，有一段时间好象是沉寂下来了。不料到了七月下旬，法国报纸突然披露，中法借款合同已经商妥，定于七月廿五日草签。《巴黎时报》还报道说，借款额由三亿法郎增至五亿法郎，并透露说：“这笔款项，其中一部分将用于购买军火。”

当这一消息传出以后，所有旅法侨团立刻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告，表示坚决反对。领导这次斗争的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同志，更是连日集会，商讨对策。他们决定于八月十三日在巴黎哲人厅，再一次召开由所有侨团参加的“拒款大会”，要求驻法公使陈篆出席，当众说明借款的谈判经过和借款的用途、条件等等。

八月十三日到了，陈篆不敢出席，只派他的秘书王思曾代表到会。会上大家纷纷揭露：这次借款，对外则丧权辱国，对内则祸国殃民。大家都表示誓死反对，并要求公使馆立即取消这一丧权辱国的借款条约，要王思曾表示态度。王思曾无词可对，只能支支吾吾，吞吞吐吐。群众更加气愤，坐在前面的青年学生，便一拥而上，将王拖下台来，痛打了一顿。在这种情况下，王思曾才被迫代表陈篆签署了一个“中法借款条约作废”的《声明》。这一《声明》除由“拒款委员会”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外，并送交法国外交部一份。

这次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至此才宣告胜利结束。许多勤工俭学学生欢欣鼓舞地把这次斗争称为“国外的五四运动”。

## 抢占里昂大学与旅欧支部成立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即距“拒款”斗争胜利后约

一个月，在巴黎“华法教育会”的揭示牌上，突然出现了一张通告：

“（一）九月十四日，中国公使陈篆再次面告勤工俭学学生代表称：‘这次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停发维持费，系法国外交部意见。该部认为，这次中法借款与法国在远东利益有极大关系，而中国学生不解平日受到救助的意义，竟行反对，实属忘恩负义。停发维持费，乃自食其果。’本会特此通知。

“（二）九月十二日，‘里大’（按：里昂中法大学）发出通告，谓：‘里大’为培养教授之场所，入学者须有一定财力作保证，有相当的毕业文凭，并要通过考试，才能入学。”

这一通告，立即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引起极大的愤慨，原来，在七月二十五日中法借款条约草签以后，中法反动当局就暗中指示两国合办的“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于八月一日宣布：“由八月十五日起，将领维持费的勤工俭学学生，全部免费送入学校读书。”妄图以此收买学生。那知学生不为所动，继续积极参加“拒款”斗争，直到取得胜利。中法当局因而恼羞成怒，取消了免费送入学校的诺言，还宣布停发维持费，向学生施加压力，破坏勤工俭学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

在“拒款”运动之前，李石曾等人曾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求学与生活问题为名，募集经费，在法国里昂筹办

一所“中法大学”，准备九月开学。勤工俭学学生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认为这所大学是以勤工俭学名义筹款创办的，勤工俭学学生入学，当然没有问题，不料现在“华法教育会”竟把他们的入学权利也剥夺了。这个通告，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立刻传遍，大家无不气愤。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认为：里昂中法大学之所以拒收勤工俭学学生，是同我们反对中法借款有关的，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个问题大作文章，揭露他们迫害爱国学生的罪恶行径，引起国内的注意，迫使他们取消这个通告。

正讨论中，突然又得到一个消息：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从国内招来一百二十多名学生，大部分是官僚、地主、资本家的子弟，将于九月二十四日到马赛，二十五日到里昂，进中法大学学习。消息传来，群情激愤。赵世炎同志主张先下手为强，由勤工俭学学生去抢占“里大”。蔡和森同志则表示要先礼后兵，先用函电通知各地勤工俭学学生，派出“占校先锋队”，齐集里昂，同学校谈判，谈判不成，再行进驻。最后会议决定：巴黎的勤工俭学学生代表，由蔡和森、赵世炎、陈毅同志率领，前往里昂。

在这次重大运动中，在巴黎炮厂做工的陈毅同志表现突出，斗争坚决。他代表炮厂勤工俭学学生连续起草并发出了宣言和通告。在炮厂勤工俭学学生争回“里大”运动团的宣言中，陈毅同志慷慨陈词，写道：“历史告诉我们，正当

的争攘，不是恶德，经验告诉我们，与(予)的不如取的。里昂大学，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基础。在历史上，是因为我们勤工俭学生而后有。现在突变方向，我们千数百勤工俭学生颠连无告之中，而置于不闻不问之外，所以我们要争回……我们因有一番宣言。”在谈到为什么要争回“里大”和斗争的意义时，陈毅同志追述道：“勤工俭学抱着他的极短的历史，凭着主观的见解，向着客观的事实去奋斗。这种历史告诉我们，奋斗的力量，纵然无穷，但是前途困苦……社会制度如无较大的蜕变，这种事毕竟以卵击石。然而我们毕竟忍耐着，卵不可以击石，还有待于刀斧……然而我们被抛弃了！被抛弃了！里昂大学自创办以来……突变方针，竟然与中国数十年来，派官费种种特殊待遇之贵族教育，如出一辙，为特殊阶级造成特殊势力……里昂大学对来法现处困苦中的勤工俭学生，似可以不顾，而对于教育的方针，其色彩又安能这样荒谬？里昂大学如果不致舍弃平民教育的宗旨，则对于历史有关之勤工俭学生，又何致置诸不问？”最后陈毅同志大声疾呼：“争回的意义是如此，我们处此极端困苦境地之中，当无所饰，竭诚为此宣言。”

在炮厂勤工俭学生争回“里大”运动团的通告中，陈毅同志代表一百四十七名学友向全体勤工俭学生愤怒地控诉：

“勤工俭学同志公鉴：

“勤工俭学之前途，已日趋困难，无工同学占全数十分之八，专靠维持；无日不在生活恐慌之中。近巴黎青年监护已宣布，九月十五号停止维持费，尚有遣送回国之说。已作工亦受经济恐怖之影响，大有朝不保夕之势。诸君！诸君！吾侪之希望穷矣！吾侪之末路至矣！不戮力同心，急起直追，速图全体解决之法，将何以自堪，更何以自了。”陈毅同志在深刻揭露中国反动当局千方百计攻击迫害留法勤工俭学生，阴谋从国内招收官僚、军阀子弟来法就学的丑行之后，告诫同学们如果派代表谈判，据理力争以和平争回“里大”失效之日，在“前途茫茫，危急万状”之时，号召“势不得不铤而走险，为最后之行动以求一总解决。”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九日，法国各地的勤工俭学学生代表陆续到达里昂，大家热烈地交换了意见，然后由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同志率领，到达中法大学，向学校当事人提出质问：中法学校的创办款，是用勤工俭学的名义募集来的，为什么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勤工俭学学生反对祸国借款，是爱国行为，为什么你们勾结国内的反动政府驻外的反动官僚一起迫害勤工俭学学生？

当时中法大学的负责人，是该校的秘书长后来当了大汉奸的褚民谊。在学生义正辞严的质问下，他心虚理亏，无词可对，只好推脱自己的罪责说：“这是学校的规定，我无权改变。”

中法大学校址是在一处古堡内，建有三四层的楼房共

五座。其中的学生宿舍，大约可容一千多人住宿。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见争取入学不成，遂转而要求拨出一部分房屋作为七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的宿舍。褚民谊对此也拒不接受。是可忍，孰不可忍！代表们便决定采取断然手段，进驻“里大”。

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在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同志的率领下，一百二十多名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冲进了“里大”，占驻了一座楼房并准备继续与校方谈判，解决入学问题。

勤工俭学学生激于义愤进驻“里大”的这一行动，没有想到正上了陈策的圈套。阴险狡猾的陈策，早已和法国当局以及当时“里大”的负责人策划了一个对付勤工俭学学生的阴谋。当时在克鲁梭工厂工作的学生代表去见陈策，说明如果他不替学生解决问题，学生们便要进驻“里大”。陈策不仅没有表示反对，反而拍着胸脯担保，如果法国方面干预，他负责去交涉，最后，他还慷慨地发给了这批学生去里昂的路费。可是学生一离开使馆，他便立即打电话给法国外交部，诬告勤工俭学学生是什么“极端分子”，已经组织了一批人去里昂，强占中法大学，扰乱治安，请他们立刻派军警前去镇压。

结果，就在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进驻“里大”的第二天，里昂警察局便遵照法国当局严厉镇压的反动指令，派去了二百多名武装警察，包围了“里大”。首先以检查姓名为由，

骗走了学生们的护照，随后便以野蛮手段，实行逮捕。两个警察挟着一个学生，拖上警车，押进了里昂的一个兵营。

反动派的暴行擦亮了大家的眼睛，在关押中，同学们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十月十日，在陈毅同志带动下，发动全体被押同学进行绝食斗争，以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绝食中，陈毅同志不但自己保持斗争气节，还严肃地教育别人。当他发现一个好友偷偷吃一口面包，破坏绝食纪律时，他当众给以严厉批评，并讲述了团结斗争的道理。铁窗的威严和饥寒困苦没有使陈毅同志灰心，反而使他更加乐观和坚强。他和同学们除了唱歌、赋诗外，还同大家在监狱院内采集了黑白石子各一百八十颗，制成了一副别具一格的围棋，着棋取乐，鼓励士气，解除了大家思想的负担和铁窗生活的寂寞。

这时，留在巴黎的周恩来、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等同志听到了这一消息，立刻四处奔走，进行营救。他们听说所谓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已带着一百二十名从国内来的学生到了“里大”，吴也是华法教育会负责人之一。于是，决定派王若飞、徐特立同志到里昂找吴稚晖，要他设法交涉释放学生代表。这个所谓“名流”、“学者”，其实同陈策之流是一丘之貉。他先是骂学生不守纪律，被拘禁活该，继而表示自己没有办法，要同学们去找陈策。

中法两国反动当局，共同策划要把这批学生代表驱逐回国，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因此，无论留下的代表如何



多方奔走营救，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十月十三日，法国军警把被押学生架上木板封闭的卡车，秘密开往火车站，把学生强行塞进火车，直抵马赛港口，再押上一艘到中国换防的法国兵船。蔡和森、陈毅同志等一百零四人都被押送回国，赵世炎同志作为被押学生代表，在聂荣臻同志营救下借机逃脱，幸免押回。

在旅欧学生中，如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同志，早就酝酿在旅欧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通过一年多的斗争，特别是在拒款风潮以后，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为建立党的组织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因而进一步认识到建立这个组织的迫切性和可能性。

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周恩来同志由巴黎前往柏林，在留德学生中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旅德支部，然后又回到巴黎，与赵世炎等同志着手筹备建立旅欧总支部的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积极筹备，旅欧总支部终于在六月下旬成立。当时，从德国、比利时和法国各地来的代表约二十名左右，都以出席勤工俭学学生会的名义来到巴黎，在代表中，周恩来同志代表旅德支部；李富春、高风、毛羽顺等同志代表旅法支部；聂荣臻、刘伯坚同志代表旅比支部。为了避免法国当局的注意和干涉，成立会在巴黎西效布伦森林中一个小广场举行。会场布置极为简朴，除每人一把

坐椅围成一个圆圈外，别的装饰一无所有。周恩来同志曾风趣地说：这样布置很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成立大会由赵世炎同志主持。周恩来同志向大会宣读了由他起草的党纲和党章。会议一共开了三天。第一天，讨论和一致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并同意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党的名称定为“少年共产党”。（同年十月，经过全体投票通过，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根据团中央从国内发来的指示，正式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第二天，选举总支领导人，赵世炎任总支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第三天，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同志领导下，又详细地讨论和决定了旅欧总支部的各项工作。一九二二年八月，经支部建议，由中央决定，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总支部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一个旅馆里。总支部下辖三个支部，即：旅法支部、旅德支部和旅比支部。赵世炎和周恩来同志都担任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

旅欧总支部建立的消息，象春风一样立刻传遍了在法国各地以及在德国、比利时等地勤工俭学的学生之中。许多进步学生纷纷来信，要求加入。我就在这时听到好友高风、毛羽顺来信告诉我成立旅欧支部的消息，我立即写信给支部，表示愿意参加支部生活，参加新的斗争。不久，

组织通知我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成员。

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同志为了寻求革命真理，远涉重洋，到达柏林，终于找到了党。在周恩来同志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党的组织并成为总支部的骨干。

旅欧总支部成立后，在赵世炎、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我们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大家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斗争的方向，决心通过“共产革命”来根本改造中国。但是，身处异国他乡，斗争应从何入手呢？在讨论中，周恩来同志提出：我们党组织是新建立起来的，党员的思想水平还不高。因此，当前任务，应着重于思想建设，即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学共产主义”，并强调应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大家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意见，规定了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在总支下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出版一种油印刊物《少年》（即共产少年之意，一九二三年改为《赤光》），在旅欧学生和华工中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九二三年，旅欧总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党员人数增加许多。当时年纪最小的邓小平同志，也被选为总支委员，并和陈延年同志共同负责《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

当时，在留欧学生中（包括官费和自费），持各种政治思想的派别不少，各派都出版自己的刊物以宣扬其政治主

张。无政府主义者以《工余》杂志为喉舌，大肆鼓吹无政府主义；基督教徒用《青年会星期报》来宣扬上帝；国家主义派的曾琦、李璜之流所办的《醒狮》杂志，大肆散布实业救国的改良主义的反动理论，欺骗与毒害了不少具有纯朴的爱国思想的青年人。《赤光》出版以后，除了大力介绍马克思主义之外，还经常对上述各种反动思潮给以无情的揭露与批驳。由于为《赤光》写稿的同志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那些宣扬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的反动言论进行揭露，遂使一些受过它们毒害的青年逐渐转变了思想，因而许多过去阅读《醒狮》的人，变成了热爱《赤光》的读者。《赤光》不但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中广泛发行，甚至在国内也有不少读者，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还专门向全国青年推荐过这个刊物。

《赤光》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好的宣传效果，首先是因为周恩来同志一直非常重视并亲自领导的结果。他亲自撰写文章，以他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教育大家坚信共产主义。

从一九二三年开始，为了加速培养干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旅欧总支部便有计划地选送大批同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周恩来同志每次都亲自送他们到柏林，并代他们办好去莫斯科的手续。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熊雄、聂荣臻、高风、李卓然（原名李俊哲）、白风等几十个同志，都先后去了苏联，经过一段时间的

学习后又陆续回到祖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实现，大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急需大批干部，因此，旅欧总支部的骨干和成员，大批先后奉调回国。周恩来同志是一九二四年八月回到广州的。当时旅欧总支部即由尚留在法国的李富春、傅钟等同志继续领导开展工作。周恩来同志回国后，仍然非常关心旅欧总支部的工作。他离法前曾面告留下的同志，要把旅欧总支部的文件和出版物及时地寄给他，以便了解情况和指导总支部的工作。当时在国内负责转递这些文件和刊物的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同志。

旅欧总支部的工作，直到李富春等同志离法回国后才结束。

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是我党最早在海外建立的坚强组织，在我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作用。它集中了当时留法、留德和留比利时各国勤工俭学学生中最优秀的分子，为宣传马列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和坚强的革命活动家。他们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有的同志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有的同志则一直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成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鞠躬尽瘁，为党的事业贡献了一生。有的同志至今仍然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日夜操劳。这是旅欧总支部的光荣，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光荣。

## 第四章

#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 归国办学

我们从法国回归祖国时，正是国内政局黑暗的时代。北洋政府一九二三年著名的只有选上台的总统曹锟，<sup>1</sup>同美帝国主义代理人、曾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屠杀京汉铁路罢工工人的吴佩孚合称“曹吴”，一九二四年在与张作霖战争中失败，失却了北京政权，军阀明争暗斗，百姓人心浮动，致使局势倍加动荡，反动军阀统治百孔千疮。这时，革命形势日趋成熟，北伐战争已在酝酿之中，特别是一九二四年的国共合作，迎来了革命形势的新高涨。同年五月，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并主张扶助农工，耕者有其田等，旧三民主义因此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三大政策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

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办了黄埔军校。当时，以广东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因此，国内领导革命的骨干力量需求量激增。为此，从一九二三年初开始，在中央指示下，中共旅欧支部在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领导下，培养的大批骨干力量，为迎接国内即将到来的大革命，有计划地回归国内担负军事和工农运动的领导工作。我们留法勤工俭学的党员骨干基本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送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去深造，一部分回到国内充实革命领导力量。

一九二三年冬，我奉组织安排由比利时劳动大学，经久居留学做工的法国回国。在上海期间，党组织派人了解我们的意向准备安排我们的工作。我初回祖国，尤其来到上海这个庞大而极为复杂的城市，一切都陌生，毫无感性认识，更谈不上有什么理性的水平啦。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独立地应付旧社会的黑暗势力了，就是在艰巨斗争的逆境中能自理就不错了。于是，我要求回湖南，到我的家乡华容开展工作。当时，想的很简单，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从同事和家乡挚友来信中知道湖南有我认识的毛泽东同志在负责党的工作，并不断派有党、团、农民协会的特派员在湖西区南县、华容、安乡、沅江几个重点县具体指导工作。第二，我的家乡在湖南，社会关系较熟，尤其是华容，我们何氏家族为大姓，我可以利用家族关系开展工作。第三，有当时湖南省政府资助我留学的背景打掩护。

因为，我出国留学不是靠丰厚的家资，主要依靠何氏家族有笔学艺工的公田及湖南省政府存于白俄在北京开设的道胜银行中一笔粮余、盐余奖金。这笔钱操在湖南名流熊希龄、范源廉、胡子静手中。后来，由于杨怀中先生和毛泽东、李富春、罗喜闻等千方百计周旋，求得每人四百光洋的津贴，大家才成行的。我由于家族关系和华容的另外九名同学是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静生）保送赴法的，因此，我们的护身符就比一般同学多了一张。那时，各省政府都有一个虚假的面孔，为了装饰自己的身价，以博众心归服，往往采取奖学育才之法以征人心。另外一个目的，就是通过留洋国外，培养一批能为维护他们反动统治而效犬马之力的奴才。虽然我们在国外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这些遗老遗少们并不全知。所以，我们回来，他们不得不在面子上留情一、二，并且为一看二拉创造条件。为此，我回湖南立地生根对于我这样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人来说是适宜的。

组织上接受了我的请求。一九二四年春天，我便返回湖南省华容县老家从事革命斗争。当时，党指示在湖南开展的工作主要是建立湖西区的党团组织，抓教育。根据当时斗争形势，我们华容从国外陆续回来的十二个人中大部投入到对旧教育界的斗争中来了，开辟新教育界，兴办新式学校。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洋学



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们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后来才知道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帮助不了农民，反而变为他们讨厌的人，所以，农民宁要私塾，不要“洋学堂”。我们回乡创新教育会（学务委员会）、办新的学校，从一开始就从农民利益出发的。为了和旧的教育界展开有力的斗争，在组织上毛泽东同志直接派欧阳迪如等同志负责指导我们开展工作。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我们让党员任各校校长，教员多数是党员和共青团员，其他也大都是农民协会的秘书长和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教学内容也一反往常，主要讲外国革新，国内革新，时事、地理，同时开展体育教育，提倡爱祖国、爱劳动的思想，彻底屏弃了孔孟的一套旧思想，农民子弟入学后，不但学到了知识，还可以了解国家大事，懂得救国救民的道理。新华学校，就是这时期由我经手创办的。当时叫私立新华中学，校址在花园靠王氏家族的宗祠。

为了更好的培养具有新知识觉悟的青年，开展新学校教育，我们新华中学还开办了师资训练班。

为了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由我主持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如规定每逢周一第一节举行周会，集合全体师生，或亲自或邀请名流学者如罗喜闻、蔡协民、熊迪、韩国栋等人作时事报告及学术报告、讲演，主要介绍西欧教

育、海外风情，特别着重讲巴黎公社和马列主义在国外传播的情况；规定每天早上上学举行“朝会”，放晚学前举行“夕会”，师生齐唱《朝会歌》、《夕会歌》，游行要唱《打倒列强歌》。歌词大意我还记得。《朝会歌》是：“朝会、朝会乐如何，昨夜未会过。今朝会，快乐多，同唱快乐歌。我们早上早起，我们心里快活，真快活，真快活！”《夕会歌》是：“夕阳西，课业毕，一同来到操坪里，排个队儿整整齐齐。大家行个夕会礼，叫一声兄弟姐妹，明天会呀，明天会！”《打倒列强歌》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我同时要求全校师生员工树立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思想，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规定学校教职工每月不发工资，仅领一点伙食费，学生则根据自家条件，不拘多少地缴纳学费，伙食、灯油费等则主要靠勤工俭学解决。这样，农家子弟入学后，不但可以学到知识，还可以了解国家大事，懂得救国救民的道理。因此，学校颇为当地群众欢迎。为了教育学生遵循孙中山先生“宁可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遗嘱，我还经常组织、带领师生开展社会调查活动。记得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时候，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我还主持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大会的除新华师生外，还有附近群众近千人。会上大家齐唱“悼歌”：“专制除，共和成；复汉业，民国兴。最可敬，孙先生，为祖国，为人民，除列强，保和平；功未竟，身

先殒，精神不死，浩气长存。”会后还举行了颇具声势的游行。这次大会，在当时社会上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

一九二五年夏，因斗争需要，我调离学校赴华容县政府任职。行前我召开了学校董事会，对学校扩班招生等做了安排，招收一批有志青年入校学习。

到县政府后，担任县学务委员会主任。我们以新华中学为基础更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办学运动。后来，我又被选为华容县学务委员会主任，负责十个区新教育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华容一两年的时间里就完全改造了旧私塾，办起了二三百所新学校。新学校不单学而有用，而且，学而有成，不少学生经过新学校的培养后，被陆续选送到更高级的革命基地去深造。一九二五年我们就选送了一批骨干考入了黄埔军校，以后黄埔一、二、三、四期都有我们华容的学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一期就考取华容学生二十多人，不少人还被送往农讲所学习，如后来为革命捐躯的蔡协民等同志就是农讲所毕业的华容学生。实践证明，党在农村办校的方针是极为正确的，它既为农民群众所接受，又能直接为大革命准备了骨干，为在华容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 投 笔 从 戎

随着大革命形势的高涨，党在华容成立地委。地委由

华容县委兼，县委常委也是地委常委，我是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这时，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战争已经在广东开始了。湖南反动势力在这一派革命形势面前，惊慌失措，省议会、旧教育界、反动势力的地方武装团防局等反动人物纷纷弃权而逃，不少人惶惶不可终日。在这样一个有利的局势面前，党指示我们新教育界的党的干部在办学的基础上注意掌握武装。其实这个思想我们早就从毛泽东同志从城市转入农村，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思想中了解到了。但是，怎样抓武装，我们过去没有实践过。这次党明确指出，接收团防局，变团防局为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也是极有意义的。因为华容地处湘鄂川三省交界的八百里洞庭湖的湖网地区，其势磅礴。正如古人范仲淹所著《岳阳楼记》中所载，“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特别是它形势险要，地处长江和南北纵贯大铁路的交叉点附近，扼九省水陆交通的枢纽，是中原的咽喉，又可以控制长江中游，直接威胁着当时反革命统治的重要据点武汉和周围一些市镇。南县、华容等县曾为历代王朝必争之地。当时，华容地区是军阀统治薄弱的地方，极利武装斗争的开展。据此，毛泽东同志决定把湖西区的南县、华容列为重点，抓枪杆子，掌握武装。那时华容县有一个民团团总叫龚芹如，系保定军校毕业的，他是周围几个县地主武装的总头子，他可以直接指挥好几个县的武装，有相当的力量。仅华容

县团防局就有一二百条枪。北伐革命战争开始以后，民团团总龚芹如跑了。这时，县的教育局、坝工局、财政局等积极讨论拥推合适人选接收团防局。当时，我们那里虽然国民党的影响还不大，但各种旧势力很大，一些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权威势重，如果搞的太明显，必定势单力孤，影响大局。因此，党决定以智取为宜。并认为我出任团防局局长最合适。因为，我自从法国回湖南以后，从来没公开身份，再加上办新教育得力，会得到各界拥戴。另有新教育界在县里和其他各界相比较，势力占优势。特别是新教育界关系广泛，在全县八大族中都有影响，各族族长多是省议员、县议员，因此，让我出面上下可以呼应。再有，通过党在各种势力之中做工作，在讨论确定团防局长的会议上，我可能被选为华容县团防局的局长，这样对党直接掌握武装斗争有利。果然不出组织所料，在选举团防局长的会议上，虽然出现了各种纷争，但最后都同意由我出面来接收团防局。当时，我清醒的看到，除新教育界和留法同人支持我是出于革新革命的愿望外，其他各种势力的支持是有他们自己动机的。何氏家族的人投我的票是因为他们相信何姓的掌权会替本家族谋利益，在枪杆子的掩护下，不遭外族侵扰。老一点的名流推崇我，是因为他们感到我是留洋学生，单纯，不会用枪杆子“为非作歹”，社会关系单纯，把武装交到我手，可以尽心为他们的利益效力。旧社会各法团拥护我，是想借武装之力，维持其不稳的地位。

总之，经过这么一番活动之后，我由办学变成了统领武装的团防局长。由一直当学生搞教育到投笔从戎这个变化，对于我来讲真是天上地下，矛盾重重，困难累累。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改造这支旧式武装问题。华容的群众多为游移不定，所以游民甚众。尤其洪水历年为灾，游民多而杂。特别是这一地区群众受家族势力影响，常常为土地等问题在族与族之间，会门与会门之间发生械斗。参加团防局的人大多数是在这些冲杀之中选取的，他们性驃悍、恶习烈，常有作歹劣行。而负责带他们的团军官和班排长又多是旧军人，有的几代军官。如果盲目的撤换军官，必然带来严重后果。为此，我们对他们采取上不大动，而下暗动的方针，即在他们统管的部队中逐渐加入党团骨干力量，使他的自身发生质的变化。同时还建立其他组织来壮大革命势力。一九二五年冬，我们在积极做农民运动工作中，通过各种形式组织了秘密农民团。接着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建立了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成立后，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划分阶级成分。那时，洞庭湖区有三部分人。一部分为农民，一部分为渔民，还有一部分是打柴为生的柴民。我们根据他们的各自以何业为主划定了成分，分别组织了三个协会。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始了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当北伐军来到湖南以后，我们民团配合农会仅在华容就处决了三百多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反动阶级的威风扫地，广大贫苦

农民、渔民、柴民扬眉吐气。一九二六年秋天，湖南省召开了农民协会代表会议，省农协委员长(党内是农民部长)易礼容主持大会。会议决定将七十五个县的民团一律改为农民自卫军，让我主持湖西区和湖北区的江南公安、石首两个县以华容为重点的联县治匪会议，并出任总指挥。结果，我这样一个不懂武装的人，不是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下了洞庭湖，开始了真正武装斗争的生涯。

## 支援北伐

大革命的疾风暴雨，给我们自卫军壮了声威，我们开展革命斗争也较以前顺利多了。但是，农民自卫军担负的任务也更加重了。仅就我回忆起来的就有十三件大事呢。

第一件，上级党命令我们肃清湖匪，保证战略地区的水陆交通。这件事是最使我头痛的。那时当地人都知道，湖匪几乎和洞庭湖是同时存在的，历代王朝及北洋政府都没有剿灭过。如今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要剿灭湖匪谈何容易。但是，那时不知那来的那么一股蛮劲，只要组织上交待了，我就下决心去干。当然那些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首先，这一地区的人多习惯于当兵，男人成年家长即向外赶，说什么，当兵吃粮才能有出息，拿起枪来就是起家之本。所谓“无湘不成军”就是从这来的。再加上天灾人祸，散兵游勇、枪贩兵痞搅在一起，民匪难分，稍不注意，

不是剿了好人，就是反被匪剿。特别难办的是湖匪总是同正规军和土豪劣绅有密切的勾结，再加上落后游民往往结伙成群为匪为盗。当时华容地区贩盐是一大行当。每当冬季湖水低落时期，各类人们便组成成百上千的贩盐大军入川偷运盐巴。为了谋取高利而又不被关卡和军队限制，他们甚至和正规军勾结，让军队出护照买上关卡证件，无阻无挡。北伐军到湖南以后，湖匪勾结土豪劣绅鼓动落后群众哄抢北伐军粮饷，破坏北伐军后勤供给。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感到对北伐威胁最大的是同湖匪勾结的土豪劣绅，于是，我们首先通过调查了解抓住并镇压了一批和湖匪勾结、破坏北伐军供给的土豪劣绅，然后公布出去，打击了湖匪的气焰。接着，发动群众封湖困匪，断其陆上供应，造成湖匪中意见分歧。随后，我们采取政治招抚为主和武力清剿为辅政策对待湖匪。对罪大恶极的匪首进行无情镇压，对被骗和生活所迫为匪者一律教育释放。这样一来，效果很好，湖匪肆无忌惮地哄抢军用物资情况减少了，北伐军的粮食运输线畅通了。

第二件，为了使广大农民、渔民、柴民各得其所，生活有着落，我们农民自卫军用耐心说服的方法，解决农协、工会、渔柴协、盐协之间的各类矛盾，保持团结，保证对北伐军的粮草筹集和物资补充。

第三件，农民自卫军除保证运输线和调解各团体之间关系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持社会治安，保证各革



命团体顺利进行工作。那个年月，有了枪杆子说话办事就是硬棒呢。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一户土豪平时对待渔柴民很坏，他收柴要干透的，收渔要欢蹦的，不但付价极低，而且大部分是欠账。北伐军一到，渔柴民纷至讨账，他乖乖的付清了结。当北伐军一过，农协去找他为北伐军派款出粮时，他哭穷叫难，不想应承。可是，当他一听农协会长要去找自卫军时，马上就变了副面孔，一口一个照办，痛痛快快的答应下来，并当场出钱纳粮。

第四件，继续配合农民协会，普遍调查土豪劣绅的罪行，进行惩治和镇压，并且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地、分船具，建立各种革命群众团体。

第五件，组织县、区、乡调解仲裁委员会，解决诉讼问题。这件事是得人心的，但也是很复杂的。洞庭湖西区是十年九不收的地方，群众落后，会道门、宗族关系多，仅我想得起要处理的矛盾纷争就有七八类。如柴、渔、盐、农及其它各种不定居游民及他们自己之间组织界线与权力分配的纷争；封建宗法、宗族间的纷争；争水域河流、渔塘、池塘菱角莲藕的纷争；婚姻买卖和反买卖的纷争；新旧教育界的纷争；关卡税收摊派的纷争；公产财物处理的纷争；对神堂庙宇的保护与否的纷争；区乡修路与交通通信的纷争。另外还要解决自卫军、农协会干部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总之，一个仲裁委员会，就是一个小政府呢！

第六件，解决社会各团体之间存在的矛盾，争取团

结。

第七件，保证春耕、夏收、秋收、发展工农业生产，监督公款公用，反对贪污浪费，不准大吃大喝，集中全力支援北伐军。

第八件，用武力解散邻县岳阳的两个反动民团，保证北伐军后方安全。

第九件，整顿自卫军内部，挑选优秀分子担任干部和骨干，逐渐换掉品行不端、干过湖匪的一些兵痞，使部队基本群众成分占多数。

第十件，督促全县修筑道路，以利交通。设立水路交通站，水上采用固定的船只定期行船，陆上设立陆马站，每十里为一站接连传送信件。并改善邮局邮差成分，用工人代替旧邮差，适时传递北伐军来往信电。

第十一件，控制警察局及电报局。

第十二件，武力解散了敌人一个别动队，击毙了伪团长阎希贤。

第十三件，发动群众，动员农民自卫军一举击溃四川军阀杨森叛变革命的一个旅的进攻。

革命的斗争，艰巨的任务，锻炼了我们的领导能力，也提高了自卫军的战斗力，壮大了人民的武装。从一九二五年到“马日事变”，这短短的时间中，我们自卫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仅华容一县就有枪八百多支，人员二千余，虽然不是浩浩荡荡，也可称兵强马壮了！

## 在武汉警卫团

大革命失败以后，虽然革命高潮过去了，但是，我们湖南革命的武装力量一直存在着，只是变换了形式。我们地区的农民武装，从“马日事变”以后，便按党的指示分散活动了，主力分布于长江边上，准备时机成熟后，即集零为整直入湖北境地。这时，我们听说毛泽东同志在武汉代理管湖南省委的工作，曾派张子清同志到中共岳阳特委找我们联系并指示行动方向。可惜因反动军警检查甚严，没法联系上。只由岳阳特委刘士骥同志派交通员告诉我们，当时，正赶上我带部队下湖执行任务，未接到指示。为了尽速了解中央今后斗争方针和我们行动的具体安排，我同蔡协民、徐履仁、程学敬、欧阳健等同志专程去武昌找到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在办公的一个小旅馆里亲切地接见我们。记得毛泽东同志开始讲了这样一些话，他说：陈独秀是机会主义，马日事变我们主张用武力解决，但陈独秀反对。接着毛泽东同志问我们的武装情况，我们把部队分散活动，等待条件成熟集中等情况一一作了报告。毛泽东同志听过后，指示说，现在革命处于低潮，但是，总会有高潮的到来，实践证明，高潮时，需要武装力量，低潮时，更需要武装力量，而且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他指示，何坤、蔡协民、程学敬、欧阳健，你们四个已经暴露了，

不宜回华南了，要转出去学习，徐履仁因病没露过面仍回华南任书记，组织保存革命火种，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斗争。接着毛泽东同志具体告诉我们的去处。他说：将来革命需要力量，你们需要锻炼、深造。现在我们很多骨干都在武汉警卫团训练培养，你们几个人也要到那里去。但有一条，你们要改名字，尤其何坤，反动派对你已经了解，列为“大暴徒”之一。当时，蔡协民同志说他不改了，协民就是农民协会的意思，他舍不得改，何坤要改就往“工”上改，我们来个工农联盟嘛！毛泽东同志听了后，笑了笑说：那好嘛！何坤同志一九一八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就叫何长工吧！从此，我就一直叫这个名字。

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安排下，蔡协民同志分到二方面军司令部工作，我同欧阳健、程学敬同志到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武汉国民警卫团实际上是第二次北伐回来后，以叶挺独立团一个营为基础扩编的，是张发奎二方面军的警卫团，也是国民政府警卫团，大约有三千多人。这是我党当时掌握的一支较大的革命武装。由于这支部队受大革命影响较深，再加上党有意识地把骨干力量不断输入进来，因此，它更加倾向革命。

到警卫团之后，我被编到五连（干部连），这个连有不少是大革命时期的县委书记、农会干部和大学生。当时，熊寿琪同志、宛希先同志、何挺颖同志都是大学生。这个连是警卫团的骨干，杨立三同志是当时警卫团的招募委员。

我在五连一个星期后，被任命为班长。还有熊寿琪、何挺颖、宛希先同志也都当了班长。别人认为，一个地区的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当了班长很可惜。我说，可惜什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如今部队大减，要那么多空官架子干什么。尽管如此，因为这个原由，很多同志都来看我，尤其是蔡协民、徐履仁等同志都来过，言谈之中都有大材小用的意思，我当时并不觉得。后来，发现有的同志把这个事还当个问题反映给了省委。

两个星期后，徐履仁同志（任县委书记）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请示，准备要五个懂外语的同志去莫斯科学习特种技术，叫我也去，说是后两天就动身。第二天，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派人来叫我去，到团部以后，团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等都在场。卢团长问我知不知道去莫斯科学习一事，我说知道了，但我不想去，想扎扎实实地在国内干点事。卢说：你不同意去，可以去别人换你下来，部队要扩编，下一步有新的行动。他还谦虚地说：你干总指挥有经验，要多给我们出主意。现在叫你当班长是临时的，待部队行动后，你到团部当参谋。后来，我留下了，听说让杨幼磷同志去了莫斯科。

我当了一段班长，又当了排长、副连长，部队到修水休整后，当了参谋，秋收起义时我当了六连党代表。

警卫团训练十分紧张，那时候每天开出去训练，打野外。由于该部仍在唐生智、何键控制下，执行任务仍然是

控制武（昌）长（沙）铁路，抑制革命。同时，还负责警卫汉阳兵工厂、银行的任务。

不久，张发奎突然出发了，连机关八大处都没有带走。张发奎走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为教导团，有二千余人，该校全称是国民革命军军官教导团，归警卫团指挥。

## 第五章

# 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

### 警卫团的新生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深夜，在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卢德铭团长那里接到两个不同的命令：一个是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发来的，要我们星夜开赴九江；一个是我党从南昌发来的，要我们尽快开往南昌。团长卢德铭同志召集团指导员辛焕文和参谋长韩浚开会研究，果断地决定去南昌，不去九江。但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仍打着开往九江的旗号。警卫团是张发奎成立的，编有一、二、三、四四个营，有炮兵连，通讯等直属单位。出发时，除警卫团外，尾随跟进的还有八大处、军官教导团等，共约六千来人。

当时，从武汉出发是不容易的，团里虽然主要领导干部是共产党员，部队中有不少安源工人及湘、鄂两省工农运动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但终因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目标很大，且在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森严的武汉驻防，这么一支

大队伍要脱离张发奎的指挥，公开走上革命道路，这是件极困难的事情。为此，卢团长只在极少数团领导间统一了认识，我们谁也不知道。只记得八月一日夜晚，部队突然集合出发，我们看到团长卢德铭面色严肃，心情沉重，大家盘算着大概有什么重要情况发生了。部队先派一艘侦察船，整个部队乘两艘大船由武昌乘船沿长江东下。经过一天的行程部队到达黄石港，此时，部队停止前进，卢团长主持团里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很秘密，是在船上开的。大意是南昌已暴动了，党让我们参加暴动，因为张发奎没有参加，九江他已有布防，直去九江，张发奎一定要缴我们的械。我们准备弃水路走陆路，从南岸黄颡口登陆，以急行军赶南昌起义主力。各连要抓紧士兵思想工作，不要出事，不要出意外，凡是有不当的言行要及时反映到团部来。我们这个行动是起义的行动，从此以后，我们就脱离张发奎的控制了。党员同志一定要严守秘密，不能泄露。

于是，各连宣布有新的行动，船继续东进！

这时，我们明确了出发的真正意图，心情十分激动，伫立船头，望着后浪推前浪的波涛，听着江水拍打船头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仿佛看到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洪流的到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人民在被蒋介石屠杀的血泊中又站起来了。

从阳新县的黄颡口登陆以后，正逢发大水，稻田河网



一片汪洋。为了保证部队按计划进行，我们临时征集了二三百只船，准备经克乐园、风下园翻过九宫山向武宁县前进。这时，只见四周山上，人丁出没，枪声不断，子弹不时打到水里激起一簇簇水花。冷枪阻路，行动困难。于是，就组织士兵喊话：“喂！我们是正规军，是借路到前边去的，你们不要打枪，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为了使他们相信，我建议卢德铭团长命令部队无论如何不要回击，我说，一回击问题就麻烦了，不但行路困难，恐怕部队也要被困在水里，蒙受重大损失。因为我生在洞庭湖畔，参加革命后，又在洞庭湖一带进行活动，对它和长江两岸的情况熟悉，特别是各会道门的组织和武装情况很了解。这里有相当多的会道门，复杂得很。长江两岸又是军阀集聚的地方。到处都有以不同形式组织起来的会道门进行活动，他们的动机各异，成分复杂，行动诡秘，兵民难分。尤其是阳新县克乐园、风下园一带的红枪会十分厉害。这两个地方是民众集居最多的大庄子，足有两千多户。这里交通方便，物产丰足，还有小煤窑，群众为了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大多都参加了红枪会。红枪会和国民党军阀有矛盾，时刻都怀有戒心。今天，我们这么多船浩浩荡荡一下子开过来，他们不了解真相，以为我们来征剿他们，所以，连发冷枪，虽经多次喊话，仍不解其疑。

这时，我想对付这些会道门光靠喊话是不解决问题的。于是，我就找到卢团长说：“要有个彻底的解决办法才行。

眼下只有去找他们的头人交涉。请团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明天我带两个侦察员上山，找他们接头，同他们谈判，申明大义，晓以利害，使这些组织不帮助我们，起码也不反对我们，允许我们通过。”卢团长当即同意了 my 建议。

第二天，我就带着两个侦察员在排右附近找到红枪会头人居住的地方。这是很讲究的一排青砖大瓦房，房前青竹掩映，梯阶曲径，房门口站着几个拿大刀片、鸟铳和快枪的大汉，头上围着青布包头，好不森严。当他们看到我们这几个穿军装的人上来，显得又紧张又充满敌意，高声喊叫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回答道：“我们是革命军的代表，是来找你们头人谈判的。”他们把我们引到堂屋过后，仍怀有疑惧地围着我们，指派一个去请他们的头人。不大一会，头人来了，围着我们的人撤到堂屋的两侧。红枪会的头人一看我们只三个人，长枪在肩，短枪在腰，一派不戒备的态度，就很谦虚地说：“不知贵军到此有何公干，昨日会众不明贵军企图，误放冷枪惊扰，实在抱谦得很，请多加原谅。”这时，我就将我军过境借路东进的意图及其讨伐军阀、安邦定国的道理宣传一番，使他们感到我们此行并不危及乡里，更不危及红枪会自身。这一来解除了他们的顾虑。然后，他请我们入座，详细的听取了 we 阐述谈判的具体内容。第一，我们借路而行，所经之处，秋毫无犯，不拉兵、不借房、不征税，所用粮秣，均以价付款；第二，从谈判条款生效日起，红枪会应离开我军一公里，保持一

定距离，避免摩擦；第三，请贵会派出得力头人为向导，和我们同船而行，以防万一，我们保证向导安全。由于他们了解了我军人多势众，且对他们无伤害之意，也乐得顺水推舟。结果，谈判成功了。在相处过程里，红枪会的会众和头人看我军买卖公平，办事认真，不但保证了我们过境的安全，帮助筹办粮秣，陆路行军时，还主动帮助我们收容了三十多名掉队的士兵，由头人护送到我们团部。这时，部队已全部上岸开始了连续行军。由于部队运动迅速，且道路坎坷，由武汉出发时，随队行动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就倍感困难。经研究决定，又同红枪会达成协议，请他们提供方便，帮助把女生队分别遣散回乡。这件事对于刚刚走向革命的官兵说真是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大家都感到和民众搞好关系对于军队来讲是一种无穷的力量！由于我军的影响，后来，这些红枪会的组织，不少也实行了共产党的主张，打起红旗，分田地，成为革命武装。我军通过他们的关系，还打通了汉阳兵工厂的关系，帮助我军修理枪炮和搞了不少子弹。

路越走越艰苦，越赶南昌起义部队撤退的路线越渺茫。思想政治工作也越来越不好做。原来，我们在黄石港对部队只讲另有任务东进，没有宣布起义，起义的事只有党员知道。大家虽然知道警卫团脱离了张发奎的领导，追赶南昌起义的部队是一条正路，因此，情绪高昂。但由于警卫团成分比较复杂，虽然共产党员和倾向革命的人占多数，

也有一些非革命的成分需要警惕，需要改造。所以，党在行军中，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巩固部队，把枪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防止开小差和其他意外事故。当时不少人走不动了，党员就主动帮助他们扛枪，背背包，带领大家唱歌子以鼓舞部队的情绪。

就这样，我们一路行军，在鄂赣边境翻了一天的九宫山，打了几股土匪之后，终于到了武宁县。

在武宁，遇到了余贲民同志率领的平江农军。两支部队相约同去修水。

平江农军是在北伐军解放平江后，我党接收当地民团武装组建起来的。开始叫团防队，由共产党员余贲民同志任队长。以后，这支队伍收缴了一些外来散兵的枪支，不断补充了党组织和各乡镇农会输送来的人员，队伍扩大到五百人左右。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中央指示他们和浏阳农军合编为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十军独立团。他们和浏阳农军和平江长寿街会合后开往南昌。八月五日到达涂家埠，得知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经南下，前面又有张发奎的军队阻路，无法通过，于是，平江农军经武宁开往修水，正好遇到我们警卫团。当时，余贲民同志十分高兴，他对我说：“长工，过去，由于方向不明，又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部队比较混乱，我们只能在九宫山、武宁一带徘徊，始终不敢把队伍拉出去。如果你们不来，南昌起义部队又追不上，那这个部队就难带了。”于是，我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团里，团里对

这一情况也已掌握。于是，团里动员党的活动分子、干部展开了宣传活动，讲革命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希望很大，南昌起义部队不是被消灭了，而是在转移中，只要我们跟上去，同他们结合起来，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原地不动和分散开来都是不可取的，最易被反动派“清乡”清出来，当反革命更是没有好结果。经过一番宣传教育，两支部队的劲足了，决心一起找南昌起义部队去。

我警卫团进驻修水县城以后，为提高部队军政素质，两支部队进行了改编，混合编队，交流军、政骨干，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到修水后，我调到团部当参谋。不久卢德铭团长等领导干部去武汉向党中央报告工作，部队由第一营营长余洒度指挥。不久，警卫团又和驻铜鼓的浏阳农军取得了联系。

浏阳农军是在县委书记潘心源同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一九二七年春，浏阳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潘心源同志按照毛泽东同志“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正确方针，领导群众夺取了地主豪绅的武装，建立了农民武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决定把全县各区的农民武装集中起来，加紧训练，组成了一支拥有六百余人的浏阳工农义勇队。“马日事变”后，潘心源同志领导浏阳工农义勇队和上万的农民，参加了围攻长沙许克祥叛军的战斗，后撤出战斗，退回浏阳。以后他们又和平江农军一起赶赴南昌未成，于是，经奉新、高安、上高进驻铜鼓。

通过整顿，部队的战斗力加强了，思想提高了，一反大转折时期那种低沉的局面。看着这生机勃勃的大好局势，大家都十分感慨，想到大革命的低潮真是不容易熬啊。四方无靠，举目无亲，目标不一，人心思动。虽然有少数人参加过北伐战争，但不少是不自觉的，正如卢德铭团长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北伐是哄起来的。军阀是吓垮的，官不自觉，兵无目的，血勇义气。”通过整顿，以革命精神灌注于军队之中，就引起如此大的变化，大家心里都感到，大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再次到来的。

八月下旬，警卫团、平江、浏阳农军等单位的负责人在修水的山口镇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把这几支武装力量合组为一个师，由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同志任副师长。以警卫团为一团，浏阳农军为三团，平江农军则分别补入这两个团。一团团长是钟文璋，三团团长是苏先骏。到秋收起义时，就以这个师为基础，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三团编制未变，安源革命武装编为第二团，团长是王新亚同志。卢德铭同志从中央回来，担任部队的总指挥。由我负责设计并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枚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紧靠旗杆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十分威武、漂亮。

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安源的革命武装。它的基本成分是安源工人武装和萍乡、醴陵、衡山、安福、莲花等地农军。

安源原来有一个矿警队，是资本家镇压工人的反动武装。毛泽东同志等到安源发动工人运动和建立党、团组织后，安源党组织就派了杨士杰同志等一批工人党、团员打入矿警队，经过多年的秘密工作，已经掌握了这支武装。另外，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就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安源的工人武装参加了围攻长沙的斗争，他们会同醴陵的农军，在易家湾和叛军激战。后来撤回安源，同时退入矿区的还有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军，以及醴陵等地党的负责同志。秋收起义前，安源莲花的农军会合宁冈的农军攻打永新城失利，也开来安源休整。秋收起义时，就把上述武装力量合编为第二团。

上述这三个团的兵力，合计有五千人左右。此外，余洒度等在秋收起义前，还收编了一支当地的土匪武装，当时编为第四团，团长邱国轩是一个极反动的家伙，在起义中叛变了。

## 山雨欲来

在卢德铭团长去武汉向党中央汇报、我军在修水整编时，江西的朱培德派人来跟我们谈判，要求把我们改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当时，我们分析，朱培德势力很大，我们一下拒绝他，恐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我们就来个冷水冲茶，“泡”起来看。表面上我们半推半就，你来

我往进行谈判。目的是麻痹他，拖延时间，等待中央消息。这样使朱培德不能随便找借口来进攻我们。后来，在接触中，我们逐渐了解到，朱培德主动找我们谈判收编，他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原来，朱培德看我们羽翼逐日丰满，在湘鄂赣边界上闹得他睡不着觉，总有一天成为与其匹敌的劲旅，因此，他曾想攻而吞之。但又碍于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了，他派主力跟踪追击，如果再伸一只拳头打我们，又怕南昌起义部队转回头来，陷入被前后夹攻之境，所以，只好息兵以文，登门谈判。再有张发奎与朱培德互相勾心斗角，当时我们还打着张发奎的旗号，朱要进攻我们，无疑触动了张、朱旧疾，必然反目成仇，引火自焚。另外，朱培德的部队由革命军向反革命转化，内部矛盾相当尖锐，他进攻我们，不但不能奏效，也怕内部起火。因此，公开谈判也好稳定内部，加强其统治。我们抓住他的这个心理状态，采取“蘑菇战术”，谈谈停停，停停谈谈，谈判不断，效果极小。朱培德虽有愠怒于心，但又有难言之苦。我军就在这谈谈停停之中，加紧整训，待命行动。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的一天，卢德铭总指挥由党中央回到部队，大家高兴极了。第二天，卢团长就向大家传达了八七会议决定进行秋收暴动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决定。特别使我难忘的是从传达中，我们听到了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决定独树一帜，单独干，接受和保存大革命的遗产，在湖南、湖北、江西、广



东几个革命基础比较好的省发动秋收起义，并派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秋收暴动的消息，高兴的彻夜不眠。这是何等振奋人心的消息啊！它使我们在暗夜中看到了北极星。

接着卢德铭团长又向党的活动分子传达了具体的秋收暴动的计划。起义部队以夺取长沙为目标，行动计划是：一团由修水出发进攻平江。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发展。二团自安源进攻醴陵与萍乡，同株洲的农民相结合，对长沙取包围态势。三团自铜鼓出发，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农民四乡暴动。各路得手后，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相机攻克长沙。

关于攻打长沙问题，九月五日毛泽东同志自安源写给省委的信中指出：长沙城内暴动必须与前方的军队配合，待我军逼近长沙时方能实行，不可轻举妄动。当时唐生智的部队大半在湖北、安徽一带与蒋介石、李宗仁对峙，留在湖南的又多调往湘南防范勾结广东军阀许克祥部。湘东敌军比较空虚，形势对我们有利，所以湖南省委有夺取长沙的计划。但是，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看出，长沙毕竟是敌人统治的中心，没有充分的军事力量配合支持，城市暴动是难以取胜的。因此，对于夺取长沙作了稳妥准备，这对于后来省委在形势不利时及时作出停止长沙暴动的正确决定，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又听到了解细情的同志讲，毛泽东同志为了准备和组织秋收起义，奔走于萍乡、醴陵、浏阳、铜鼓之间，

在从安源去铜鼓途中，曾在浏阳县张家坊被地主武装团防军扣留。在押送县城的路上，毛泽东同志假装腿疼，落在后边，又给跟在身边的团防军一点钱，借机逃跑，隐蔽在一个水沟里，后来遇到一位农民，从谈话中知道他是农协会员，请他帮助买了一双草鞋和一点食物，并带路走到江西地界，于九月十日到达铜鼓。毛泽东同志排除万难，历尽艰险，宣传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鼓舞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斗志，组织革命力量，具体地部署了行动计划，因此，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组织得很好的一个地区，成为全国秋收起义的中心。

红旗象开满青山的杜鹃花到处打了起来，革命象一股春风唤起了千万群众的热情。我党关于秋收起义的伟大战略部署和号召，在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战士的心中，燃起了熊熊烈火，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踊跃参加起义队伍，紧张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安源煤矿，动员和布置武装起义的党员和工人骨干会议，充满着热烈紧张的战斗气氛。会后人们奔走相告：毛委员又到安源来了，我们又要开展新的斗争了。大批工人报名参加秋收起义，光是共青团员就有四百多人。在工人俱乐部的大厅里，地上铺满了准备在秋收起义时张贴的大标语，参加起义的工人们兴奋地准备着杀敌的武器——枪支、弹药、炸药包、铁镐、长矛、大刀。人们兴奋的唱道：

干革命，心要强，没得洋枪扛土枪。

梭镖矛子好武器，锄头扁担当刀枪。

只要武器抓到手，幸福日子万年长。

安源矿的工人中，有许多使用炸药的能手，他们日夜赶制一种名叫“洋蒿（音轿）古”的手榴弹，它是用布把炸药和铁屑捆包成一个圆球，上边拖着一根导火索，样子很象当地群众食用的蒿头菜，因此得名。这种武器在和地主武装作战时大显威风，打得敌人叫苦不迭，说是：“洋蒿古打死人，棺材装尸装不赢。”

九月四日深夜，杨士杰同志根据组织决定，把矿警队中阴谋投敌的八名叛徒秘密处决了。矿警队成了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部队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画着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工农革命军的战斗红旗，映红了战士们的面庞，激励着千万革命群众的心。

各地的贫苦农民，在秘密恢复的农民协会的串连下，又悄悄地集合和组织起来。在山沟里，在密林中，人们兴奋地传播和议论着向往已久的党的英明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实行土地革命。农民们怀着对地主豪绅和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拿起鸟枪、土炮、梭镖、大刀，参加自己的队伍。他们唱道：

朝打铁，晚打铁，打把梭镖送农协；

农民兄弟暴动起，豪绅地主定消灭。

平江、浏阳的农民不断派代表到我们一团和三团驻地去探望自己的部队，用红纸包了猪肉慰问官兵，欢迎他们打回平江、浏阳去，支援农民暴动。人们兴奋地互相传说：共产党又来了，农民协会又起来了。有的农民挺起胸膛到反动民团团总家里，当面警告他：我们的梭镖是有数的，你要好好保存，我们要办自卫军了。吓得那个家伙不敢说个不字。醴陵的农民在党和农协的领导下，向土豪劣绅发起猛烈进攻，设巧计杀掉了罪大恶极的劣绅贺勋成和杀人魔王“清乡”队长彭成美，并贴出通告说：

自从马日事变，豪绅更加横行。  
勾结彭匪成美，企图镇压工农。  
惨杀革命同志，实在可恶痛心。  
今年八月十四(农历为九月九日)，密决彭匪命终。  
工农联合起来，实行武装暴动。  
大家同心协力，都是勇敢先锋。  
捉得敌人有赏，获得武器有功。  
不当敌人向导，不替敌人探信。  
紧紧团结一致，样似一个铁钉。  
革命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个通告义正辞严，大长了革命人民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工农革命的各支部队，都在紧张地进行着战前准备工作。驻修水的师部，赶制了大批工农革命军的鲜艳红旗和

红领带、臂章发给部队。战士们磨刀擦枪，检查弹药，加紧战斗准备。各团抓紧进行军事训练，同志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斗志昂扬，引吭高歌：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

我们勇敢，我们奋斗，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

杀向那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大本营，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驻在各处的部队还积极支持当地农民向土豪劣绅进攻，修水西乡上坑有个大恶霸地主曹礼成，外号叫“曹老虎”，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农民恨之入骨，曾经组织两次打“虎”，都没有成功。秋收起义前夕，我们的一团派出一部分兵力，配合三千多农民第三次攻打“虎”穴，终于取得胜利，活捉了“曹老虎”，没收了他家的财产、粮食分给贫苦农民，为民除了大害。三团也在铜鼓逮捕了靖卫团大队长帅尚奎，枪毙了恶霸刘文先，打开牢房救出一百多名革命同志和受难群众。这些革命行动，大大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革命的风暴就要来临了。

## 湘赣边界的春雷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前敌委员

会领导下，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了！

“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

“暴动，农民夺取土地！”

“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

暴动的口号山鸣谷应，革命的怒潮汹涌澎湃。起义队伍高擎革命的大旗，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阶级，展开了英勇顽强，气吞山河的斗争。

当时，曾有鼓舞人心、热情歌颂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一首词——

《西江月·秋收暴动》：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暴动。

起义应从破路开始算起。破路是暴动的第一步。起义的铁路工人及农民在九月九日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一直到十五日，敌人的火车始终不能顺利的通行。

我工农革命军一团，同日从江西修水出发，向长寿街

进攻。长寿街是湘赣两省交界的要冲，城很坚固，敌人有一个团的兵力把守。我团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向敌人发动猛烈攻势。九月十日拿下了朱溪厂，随后越过平、修边界，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在当我团向平江县城进军的时候，敌人在平江增兵一个团。这时，混入革命队伍的邱国轩部，乘机叛变。邱匪把队伍埋伏在距长寿街八公里的金坪附近，当我团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邱国轩贼子发动突然袭击，使我团背腹受敌。经两小时激战，我团损失二百多人枪，团长钟文璋失踪。大家互相招呼集合，第二天相约往铜鼓集中，在路上找到了师长一同撤退，向浏阳张家坊、白沙一带与三团会合。

九月十日正值中秋节，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当晚十二点，二团下达了攻打萍乡的命令，部队于拂晓赶至萍乡外围，准备偷袭，后因前锋爆炸队被敌发觉，敌人已经有准备，失去了偷袭的机会，于是决定强攻。部队把县城团团围住，由八连主攻东门，他们先用土炮攻击，连轰数炮无效，勇敢的战士们便强行登城，连续几次都被反击下来，此时战斗已达一天多，城未攻下，又闻宜春敌人驰援萍乡。于是，二团决定停止攻击萍乡，而改变攻击目标，把矛头直指老关。为迷惑敌人，撤离之前，土枪、土炮和炸药一齐向萍乡城敌人开火，敌军以为我们又要攻城，殊不知工农革命军和起义的农民，在猛烈的爆炸声中，迅速撤离了萍乡，直趋老关，消灭敌人一个排，缴获枪支

十余，占领老关。十二日，二团乘胜进攻醴陵。当时，铁路控制在工人手里，起义部队乘火车，打着红旗，浩浩荡荡的开往醴陵火车站，下车后汇合当地起义农民于当日下午二三点钟分三路开始攻城。

醴陵三面临河，平静的渌江从东南西三面围绕醴陵城。城里集聚一营多敌人，企图依仗渌江顽抗。二团和当地农民自卫军分三路进攻。三营八连为右路主攻东门，乘敌人不备，迅速涉水扑到东门口，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时，前一天晚上潜入东门的一部分安源起义工人从敌人后面发起进攻，用“洋蕃古”轰击敌人，里应外合，迅速摧毁了在营盘山上的敌人机枪阵地，顺利的控制了制高点，大队乘势一拥而入，解决了东门战斗。在右路攻打东门时，中路一个营从渌江桥面进攻。他们以一部佯攻桥面，主力则涉水过河攻打状元洲，很快拿下状元洲上的状元府，直趋江北岸，插向县城中心。此时左路队伍也已打进城里，三路进攻部队胜利会合，此次共俘敌百余，枪七八十支。

二团在醴陵得手，宣传群众，营救革命同志，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做群众工作。几天后，闻敌以优势兵力压缩过来。二团乘夜秘密开往浏阳，在浏阳当地农民武装配合下，于十五日早晨顺利地占领了全城，从狱中救出革命同志和群众三百多人。

在胜利的形势下，团长王新亚同志骄傲自满，麻痹轻敌，错误地认为，不要三天，就可以拿下长沙。他拒绝听



取同志们提出的及时把部队撤出浏阳城的正确建议，结果在十六日陷入优势之敌的重围。部队大部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许多同志英勇牺牲，团长王新亚当场殉难。

九月十一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在铜鼓起义。十一日，在铜鼓县城桥头沙洲上，毛泽东同志检阅了起义的部队。然后率领三团向白沙镇挺进。白沙镇三面高山环抱，中间是一片洼地，另一面是一人多深的茅草水坑地，靠山脚只有一条人行路，是铜鼓通往浏阳的要道。部队到达白沙就同敌遭遇。三团一连冒着弹雨，迅速地抢占了镇右侧的一个小山包。团部命一连掩护二连，从镇的左翼迂回到敌人后面，包围敌人。随即，三团发起攻击，直插敌阵，一下冲垮敌人，乘势抢占白沙镇，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十二日，三团直扑浏阳东门市，在东门市不远的十二墩与敌相遇，经厮杀击溃敌人，毙敌排长一名，乘胜夺取东门市。由于我们一团在长寿街失利，右路失去配合。敌新八军两个团迅速向三团迂回过来。十四日上午，敌人由东门市反动团总和地主带路，从东门过金钟桥，分两路包围三团：一路由唐家冲占领羊牯脑制高点；一路越过左河，走杨家湾插施家塘、上车，企图夺取马鞍山制高点，与羊牯脑相呼应，夹击我军。三团在正面受敌火力压制，侧翼又遭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全体官兵与敌人激战六小时之久，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最后从马鞍山脚下向上坪撤退。

在工农革命军起义的同时，湘东各县的劳动人民纷纷响应。九月十一日，长沙郊外农民起义，捣毁反动的团防局，缴枪八十多支；九月十二日，粤汉铁路和株萍铁路上的重镇——株洲的群众，发动武装起义，缴获敌人十余支枪。平江起义农民，镇压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曾攻打平江县城。但在工农革命军的主力遭受挫折以后，各地群众起义，也被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镇压下去了。就这样，湘赣边区的秋收起义，由于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回顾往昔，痛定思痛。那时，我们还相当幼稚，打仗还是按照黄埔军校的思想体系来的。即是采用北伐时期的正规战，死拼硬打的战术。另外，我们还不懂得集中优势兵力的战法，而是分兵出击，不是选择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敌人，相反把部队分成几路打敌人的强点，且兵力分散，指挥失调，结果反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一团就吃了这个亏。卢德铭总指挥是个好同志，但在秋收暴动的部署和指挥上是有问题的。我们是一支孤军，又是长途奔袭之疲劳之师，兵力分散肯定是要吃亏的。由于卢德铭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使部队在人员、枪支上受到不小的损失，在精神上也受到不小的影响。

工农革命军的主力 and 各地群众起义遭受挫折以后，部队怎么办？在这紧急关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在上坪，召集三团负责人开了紧急会议。他当机立断改变了攻

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

## 文家市会师定方向

各路起义部队，经过艰苦的战斗，于九月十九日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胜利会师。师部驻在街后的里仁学校。学校门口的上方挂着一面工农革命军的鲜艳红旗，门的两旁由两名卫兵站岗。

文家市是大革命时期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方，群众对我们很热情，我们一到市里也立即开展了群众工作，不少干部亲自提着白灰桶，到处刷写标语。下午，听杨立三同志喊：“长工，你来，润之同志来了，他找你。”那时，我们都亲切地称毛泽东同志为润之同志或毛委员。在里仁学校里，我向他做了汇报。他问得很详细，如官兵的思想动向怎么样，士兵都有哪些想法，战斗情绪如何，生病的多不多，等等。最后，他和我讲，今晚要召开前敌委员会，你和立三同志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九月十九日晚上，毛泽东同志在部队宿营就绪之后，不顾长途跋涉和战斗的劳累，当晚就在部队驻地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由于作会务工作，对会议情况了解的比较具体。会开了一整夜，是个“定向”的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分析形势，认为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转

入低潮，起义部队遭到挫折，敌人的主要力量在城市，目前我们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要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才能保存我们的力量。在农村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并发展革命力量。

那么，到什么地方比较适宜呢？

毛泽东同志拿着一份从学校借来的地图，指着湘赣边界山形最宽的部分，用生动形象的譬喻说：这里象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中段，最适合做我们的落脚点，我们要到那里去当“山大王”。

罗霄山脉地处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四省的交界，由北而南，形成江西、湖南两省的分界线。其北段，地势不如中段险要，太靠近大城市，敌人统治力量比较强。南段，地势比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中段地势险要，崇山峻岭，峭壁林立，林丰树茂，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由于离大城市较远，是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而革命一举一动又可以影响到湘赣两省的南部，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这里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特别是井冈山地区，是积草屯粮、养兵集众、积蓄革命力量的好地方。

听了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分析，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同志的主张，也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觉得革命了半天，却革到山上做“山大王”了，这叫什么革命

呢。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真理。卢德铭总指挥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和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之险。

经过工作，前委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但却遭到了师长余洒度的极力反对。他看不到革命形势的变化，看不到向农村转移的重要意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幻想在城市一举取得成功，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主张，实质是军事冒险主义。对余洒度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同志据理力争，并进行了严肃批评。特别是在卢德铭同志投了赞成票之后，大多数同志因仰慕卢总指挥的才干和为人，纷纷举手赞同，他的支持，对向罗霄山脉进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会后，毛泽东同志由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请到里仁学校新斋第二间房子里休息。睡觉的地方，仅有一张门板。杨立三同志见毛泽东同志脚趾溃烂，便问他是怎么溃烂的？他说，是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爬山扎烂的。杨立三同志十分感动，并说：我早就在报上看过你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过去他们总说我们“过火”，实在呕气的要命。你那篇报告，对我们湖南做农民运动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

的鼓舞。

第二天清早，天气晴朗，初升的太阳，照耀着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沐浴着一片金色的光辉。工农革命军有一千五百多人集合在这里，以十分激动和急切的心情，等待着毛泽东同志的来临。

“毛委员来了！毛委员来了！”只见一个身材魁梧，大约三十多岁的人，脸晒得通红，身穿老蓝布的农民衣服，脚穿草鞋，在师、团长的陪同下，满面笑容地向队伍走过来了。

值班干部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并大声宣布：“现在请中央来的毛委员讲话。”

毛泽东同志向大家挥手，亲切地说，同志们，请坐下吧！接着，他根据前敌委员会会议精神，向大家讲了话。他说，我们是一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北伐军打到南京，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正在大肆屠杀工农群众。我们为了反抗敌人的血腥屠杀，继续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坚决斗争到底，舍此再没有第二条活路。要和反动派作斗争，就一定要有枪杆子，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因此，一定要有革命的武装。这就要求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个同志，都要有远大的理想和不怕牺牲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还满怀信心的说，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常言

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现今我们有湘、鄂、赣、粤四省已经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紧，继续勇敢战斗，终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有些经不起考验的人，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这算不了什么。革命队伍中少了这些三心二意的人，只会更加巩固。俗话说的好，“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要怕困难。

最后，毛泽东同志就打长沙问题又做了说明，他指出，秋收起义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呆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的地方或难得管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到罗霄山脉中段去找一个好的落脚点。

毛委员的话通俗易懂，使大家在困难之中受到极大的鼓舞。记得后来我曾在江西《红色中华》上写文章说秋收起义我们被打败了。毛泽东同志看到后，对我说：“长工，虽然我们打了几个败仗，但我们还有千把人，这是革命的本钱。”

毛泽东同志正是在革命处于最危险的时刻，领导我们进行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开始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从此，中国革命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走上了工农武装割

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了不起的转折点，我们要感谢伟大的毛泽东同志，只有他走在我们的前头，解决了这个关系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这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也是马克思主义“本本”上没有的。过去巴黎公社在城市，俄国十月革命也在城市。十月革命是先建立苏维埃，后建立红军。我们则不同，是先建立红军，发展之中成立苏维埃。这个说来简单，但真正做起来可不容易啊！是多少烈士的鲜血，多少次起义的经验教训换来的，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发展马列主义，谱写的崭新的篇章。

这天上午，工农革命军与群众告别后，在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下，怀着坚定的信念，高举红旗，离开文家市，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伟大战略进军。

## 引兵井冈山

秋收起义的组织和发动是艰难的，而引兵井冈也不是容易的。江南的秋阳，炎威尚烈，在山岭丛林中穿行，道路崎岖，举步艰难，疟疾、痢疾蔓延，部队病员增加。疲劳和疾病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更危险的是国民党军队及地主武装把我们看作洪水猛兽，尾追堵击，穷凶极恶。

屋漏又逢连阴雨，篷破又遇顶头风。部队经江西萍乡的桐木、小枧，二十二日到泸溪镇宿营。第二天清早出发



时，由于侦察不力，情况不明，遭到朱培德部特务营和保安团的伏击。我们仓卒应战，损失数百人。在部队危险时刻，总指挥卢德铭同志挺身而出，率领一个连抢占路旁的一个高地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不幸中弹牺牲。

卢德铭同志，生于一九〇五年，四川省宜宾县双石铺狮子湾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在叶挺独立团曾担任连长、营长和国民革命军七十三团参谋长等职。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出色的军事干部，在北伐战争中，表现英勇顽强，灵活机动，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党组织和叶挺同志对他很了解。当国民政府建立警卫团的时候，叶挺想让他去任团长，但考虑自己政治色彩太浓，张发奎不会同意，就请张云逸同志代荐。张云逸同志是粤军老军务，为人正直朴实，在粤军中很有声誉，一荐即准，卢德铭出任武汉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同志利用这一合法地位，吸收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左派作各级干部，使这个警卫团成为我党直接领导的部队，在秋收起义中有力地配合了起义的主力部队。卢总指挥在组建警卫团和秋收起义中是有重大贡献的，是毛泽东同志军事上的主要支持者。他在进军井冈山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无疑是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更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我回忆他的一段往事，也是寄托我这个老兵对卢总指挥的彰扬和哀思。

部队在泸溪冲破敌人的堵击后，继续前进，九月二十四日下午到达莲花县甘家村，这时已摆脱了敌人。此时，

毛泽东同志从当地党的负责人甘明山、贺庆国等同志的汇报中，了解到，在九月十八日，莲花县农民自卫队攻城失利，七十多人被捕，三十多人牺牲。于是，召开地方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攻打莲花县城。二十五日早晨，在甘家村召开了军民大会，枪决了从萍乡抓来的六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打击了反革命势力，鼓舞了群众斗志。会后，部队立即出发，中午到达莲花县城，此时正大雨滂沱，部队未待休息即发动进攻，不到半小时就攻克莲花县城，守城的一个保安队大部逃跑。进城后，打开监狱，解救了被捕的党员和群众，打开伪县政府的积谷仓，分给贫苦群众。二十六日清晨，毛泽东同志在县城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座谈会，对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随后，部队继续出发，二十九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

三湾处在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交界的地方。由陈家、钟家、上李家、下李家和三湾街组成，合称三湾村，有五十多户人家，在山区可算是大村子了。

部队到达三湾的当晚，毛泽东同志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起义部队到三湾时，已不足千人，但仍是起义前的编制，有的团、营官多兵少，枪多人少，这样的组织不利于

作战。在部队成员中，多数是各地工农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有许多党、团员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遭受反动派的摧残迫害，他们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背井离乡参加革命队伍。到部队后，经受艰苦战斗环境的考验，受到革命的思想教育，斗志更坚定了，这是部队的主流。但也有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在战斗失利和艰苦环境面前，悲观动摇。有些人甚至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里去？”思想相当混乱，有的甚至不辞而别。在有的部队中一些军官旧习未改，仍施军阀主义淫威，动不动就打骂士兵，严重影响官兵团结，削弱部队战斗力。很显然，不改变这种状态，长期的艰苦环境难以适应，革命的艰巨任务肯定无法完成。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大刀阔斧地解决了我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整编中他着重办了三件事：

一是整编组织，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二个营七个连，另设军官队和卫生队。把多余的干部编入军官队，把战斗员和伤员分开，部队更精干了，战斗力大大提高了。对动摇不定的人，在做大量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采取自愿原则，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发给三元至五元的路费，开具证明允许离队，并希望他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

二是在部队建立各级党组织，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党在

北伐军中建立组织的经验，决定将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的小组。这是一个重要措施，比北伐时党建在团上是一个大的进步。因为，连队是部队的基层作战单位，部队的作战、训练和生活，多是以连队为单位的。支部建在连上，就可以具体的了解士兵情况，更好地教育和团结士兵，有力的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后证明，“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决定重要问题都要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毛泽东同志第一次为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对保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使我军成为执行政治任务的可靠工具，具有决定的意义。

在整编中重新任命了干部：团长陈浩；一营营长员一民，党代表宛希先；三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特务连连长朱建胜，党代表罗荣桓；军官队队长吕赤；卫生队队长曹铎，党代表何长工。

三是实行民主制度。毛泽东同志决定废除军阀军队旧制度及其影响，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礼节，建立新的带兵方法，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为了保障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组织。士兵委员会的主

席和委员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官长也参加士兵委员会，也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官长被选举者不得超过委员会人数三分之一。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领导士兵的文娱生活，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等。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之权，军官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处分。

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是增强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它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军队官兵对立的关系，有利于加强官兵团结和提高战斗力。正如后来毛泽东同志总结的，“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正是由于整编，军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改编后，我担任卫生队的党代表，专门收养病号和伤员。当时正赶上季节性的传染病，部队又整天打仗，住不好，吃不好，生活很苦，可是大家没有叫苦、发牢骚的，不少伤病员仍坚持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它建立了一套政策，这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在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向宁冈县古城进发，十月三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到达古城。当天，毛泽东同志在文昌宫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敌委员

会委员，部队营以上的党员干部和党的活动分子，还有中共宁冈县委龙超清、龙国恩、萧子南等同志，会议历时两天，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我上午参加了半天会议，下午接受侦察任务外出了，会议结论我没听到，是以后别人告诉我的。

会议讨论确定了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问题。这是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袁文才、王佐，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虽然都叫“农民赤卫军”，可不是我们党领导的。他们劫富济贫，是标准的“绿林豪杰”。对他们到底持什么态度？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同志却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何况，他们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很深。虽然有地方主义、“绿林”习气等缺点，但是可以教育改造的。我们不能采取旧军阀大鱼吃小鱼的吞并办法。现在的形势逼迫他们要革命，要靠近我们，因此，此时绝不可以动武，应该主动搞好关系，积极争取他们革命，并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的广大群众。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确定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

会议还确定在茅坪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决定派人

分头与中央、湖南省委和南昌起义部队取得联系。

会后毛泽东亲自做袁文才的工作，送给他一百多支枪，和他交朋友，并且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同志到袁文才部队工作。后来又派我去做团结、争取王佐的工作，要把王佐、袁文才都转变为好同志，把他们的部队改造成为工农革命军。

毛泽东同志正确对待群众，广泛争取团结各种革命力量，不仅使我们在井冈山站住了脚，扎下了根，而且通过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吸取许多营养。毛泽东同志曾说：我毛泽东不是一上井冈山就有现在这个水平的，我是摸索试探前进的，我们的经验是打出来的。这固然是毛泽东同志谦虚，事实也正是这样。毛泽东思想确实是党和革命群众智慧的结晶，是无数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是几十年革命实践的产物。这里我讲一个小故事：井冈山原来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非常厉害。地主武装怎么也整不倒他。他的作战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同志听到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他说，前一句话不对，后一句话很好，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干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化装成老百姓）。后来，毛泽东同志就把这些做法总结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我军有名的战术原则。

从三湾改编到古城会议，解决了军队建设和建立根据

地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把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终于燃遍了全中国。



## 第六章

# 难忘的使命

### 井冈特使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的一天，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之后，英姿焕发地向井冈山区的古城进军。

在行军路上，毛泽东同志和张子清参谋长边走边谈。

毛泽东同志说：

“子清，南昌起义部队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听说前一段已到了汕头，不知现在下落如何。”

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同志说：

“这支队伍可是革命的火种啊！我们打了几仗已经找到了生存发展的地区，不知道他们现在做何打算？我想找个人下山去找他们，建立起联系，有事也好互相呼应。再有我们和省委、衡阳特委也失去了联系，应该尽早恢复关系，以便得到上级党的指示精神。”

“我完全同意，您看派谁好呢？”

“何长工怎么样?”

“可以，现在已通知卫生队让他赶到古城参加会议，开完会就可以和他谈……”

古城会议我上午参加半天，下午没有参加，派我带一个小分队去新城方向侦察敌情。由于当时敌人有新的动向，我报告后，第二天部队随即转移到十都。在十都张子清参谋长对我说：“长工，毛委员指示，有任务。”

“什么任务?”

“急什么！今晚毛委员会找你谈的，是重担子苦差事哟。”说完张子清同志神秘的一笑。当晚我住在离团部不远的的一个房子中。

夜里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望着那无垠的星空，打开思想的闸门，把近一段的大事统统演映了一番。从九月秋收起义打大城市到进军井冈山地区，在这有限的时空中，来了一个大变化。这个变化是多么不易啊！是在很多人“逃跑主义”、“继续攻打大城市”的紧锣密鼓当中实行的。毛委员不为纷繁杂议而左右，坚持向井冈山地区进军的方针，进行了三湾改编，制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党的建设原则以及建军原则，为革命的兴旺保留了力量，找到了基地。现在任务很多，很艰巨，做为一个党员，随时都要准备担起革命的新的重托……

“砰！砰！”大约在十点钟左右，两声清亮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索。“谁？什么事？”

“毛委员请你去！”

开门一看是团部的同志。“好！我就去。”

深夜的十都早已灯火全无，只在团部院子里还有灯光透出。我一走进办公室，就看到毛委员和张参谋长正在查阅地图。毛委员一看见我赶忙过来握手。我们互致问候，接着毛委员把我拉到井冈山地区的地图旁说：“长工你看，现在我们要在这里落地生根了，这仅仅是建立根据地的开始，今后斗争还长，必须要迅速壮大我们的力量，要和上级取得联系才行。我们前委决定让你出山去，联系湖南省委和衡阳特委，设法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你看怎么样？”接着，子清把毛委员和他在路上的打算一五一十告诉了我。由于头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我思想没有准备，说：“任务很重要，可我没有把握。第一，没有交通线，找省委、南昌起义部队象大海捞针，怕完成不了。再有，我长期戴军帽，摆弄枪支，头上的白印手上的老茧易暴露。万一出事，给革命就会带来损失。”这时，张子清参谋长拍了拍我的肩头说：“我们派你去本钱是大了点，但是，山外各个地方你的熟人多，同志多，关系多，多跑几个地方，多会会旧交，一定会联系上省委、特委，找到南昌起义部队的。至于头上的特征，那好办，你就干脆说是从毛泽东队伍中跑出来的逃兵。你被他们抓住，就这么说，只要能把敌人迷惑住就行。”毛委员半开玩笑地说：“长工，你可以自由活动，但要记住白皮红心哟。”毛委员的信任，党的委托，给了我极大

的鼓舞和力量。我说：“请毛委员放心，我一定千方百计完成任务。”

经过化妆后，我成了一个“逃兵”模样。身着一套破旧衣裳，背着两只猪娃子，一双旧草鞋两腿泥巴，奔上了“逃亡之路”。

天有不测风云，刚走到郟县沔都，就遇上了民团的哨兵。

“干什么的？”

“当兵的！”

“当什么兵？”

“革命军！”

“啊！”说着哨兵就将枪口对准了我的胸口，满怀敌意地嚷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逃出来的，准备回家去。”我故意不紧不慢地说。一听我是回家的，哨兵先自软了，就上前搜身，想发点“洋财”。一摸里衣一下子摸出十块光洋，这家伙乐滋滋地就要往怀里揣。我一把抓了过来，说：“当兵吃粮，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和尚不亲帽儿亲，人不亲枪杆亲，你拿了我的钱，我怎么回家，全家老小怎么活？”那个哨兵大发其火：“妈的，老子管你活不活？”从我这过，哪个敢不留下买路钱。”说着伸手又夺。情急生智，我大喊一声：“慢着，你再抢我就找你们贾团长。”这一手真灵，哨兵乖乖的收回手去，眨了眨眼睛说：“找团长也便宜不了你，走！”

沔都的民团头目叫贾存题，为人心狠手辣，对革命军

恨之入骨，但这家伙又特别讨好他的上司，是个有名的坏蛋，又是一个有名的走狗。一见面，他就说：“杀了他！”我说：“团长，你杀了我容易办到，可你要知道，将来有人要你赔何某人的人头，那时你就不容易办到了。”说完，我故意冷眼瞟了瞟那个家伙。这时，两个团丁凑到主子耳边叽咕了几句，一个说：“这个姓何的恐怕和何键省长有什么瓜葛吧？”另一个说：“慢来，弄不好惹出来麻烦！”于是，这个民团团长火气顿消，改变口气说：“你既然是从毛泽东那里逃出来的，我问你，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故作姿态地讲：“就在十都，很快就打到你们这里来，你们抓了我，等毛泽东的部队一来，你我都活不成。”正巧，十都方向不知怎么真的响起一片枪声。民团团长一听说毛泽东在十都，吓得顾不得审我了，拉起队伍就跑，一气赶到民团住地。这时天已黑了，团丁将我关进一间黑通通的房子里。这里已有二十几人了。我一看，敌人并没注意我的身分，加之事先我那胡编的一通情况，使他们来不及顾及被关押的人们了。“对！这正是脱险的好机会。”于是，我动员大家一起大喊冤枉，要他们放人。民团团长的家就在牢房附近，这一吵真见效。只听那个家伙粗声大气的嚷道：“行了，行了，明天放你们出去！”

第二天，天不亮，房门就打开了。民团团长训话说：“你们赶快向革命军的相反方向走，不许给他们报信，否则统统枪毙！”当人们走散之后，唯独剩下我没走。民团团

长奇怪地问道：“你这革命军怎么不走？”我以退为攻地说：

“我想走，但是走不多远还得被抓住，逃不脱你们的手心。干脆我给你当个马夫吧！”“不行！不行！”民团团长的脑袋摇的象个货郎鼓。“那怎么办？”“好吧，我给你开个路条，这一带百十里的民团都和我有交情。”“那感情好！”我禁不住内心的喜悦忙不迭地说。

弄到了“护身符”，一路顺风。靠着它直抵郧县的曹石镇，由此搭船直抵长沙。

此时的长沙，一片恐怖阴森。一张张杀人告示贴在大街小巷，如狼似虎的军警交错巡行。我在街里行走一段之后，就站在一堵墙前假装观看告示。突然，背后有人使劲拉了我一把，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警卫团的参谋戴菊秋，他是司令部先于我派来侦察敌情的。真是喜从天降。看到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忙说：“小戴，这里形势吃紧，我们赶紧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你现在干什么？在哪里住？”他说：“我的公开身分是长沙纱厂的工会会员，我在家里住，有事才到街里来。我看你就住在我家吧。”戴菊秋家住离城不远的乡下，是个小地主。我想，自己到长沙找组织，住在乡下不方便，就说：“不去了，长沙纱厂有不少当年一起读甲种工业学校的同学，我找他们想办法吧。现在厂里有没有党的组织？”“不一定有，不过有个车间主任叫欧阳泄，这个人很可靠，说不定知道上级党的下落。”

“那太好了，我找他。”就这样通过欧阳泄同志找到了省委，

汇报了工作，接上了联系。我汇报中，讲了四个问题：一是从武汉出发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我军详细情况；二是希望省委、衡阳特委及时通报军情，设立秘密交通同山上联系，山上也及时把情况向省委汇报；三是省委、特委要及时给予指示；四是我还要找南昌起义的部队，希望给予帮助。汇报之后，我又在戴菊秋家里写了一份二万余字的汇报材料给省委。省委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决定派人上井冈山。于是，我和戴菊秋同志又踏上了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征途。

省委安排我们乘坐的是日本轮船。这个轮船是日本代盛昌公司的。这个公司在武汉、九江、安庆、宜昌均有码头，他们的船军阀从来“高抬贵手”，只查货不查人。所以，我们党的秘密交通都以这条船为掩护进行活动。

到了武汉，我二人住进了高升客栈。由于钱快用光了，由戴菊秋出面找熟人张罗筹资。他找到一个原警卫团的老人彭致正把武汉三镇的情况了解了一番，搞到一笔款项。买了当日的英国船票直赴香港，稍事停留便赶赴广州。

到了广州，我和戴菊秋一下子“活”了。原来，戴的三叔在中山大学任教，二叔戴新炳在军阀方殿英手下当政治主任。他的一个黄姓亲属又在广州的华宁里开旅馆。我们下船，就住进了黄氏旅馆的高级客房。旅馆主人是个老成的先生。这个旅馆门面不大，但背景不小。原来，这是方殿英、许克祥的新十三军的后方。方殿英的老婆就住在这

里。这时，方、许两部都在广东军指挥下，跟湖南军阀打仗，广州显得乱糟糟的一团。

时间一长，黄老先生同我们两人熟了，一天我顺便问他：“老先生，您知道这里有湖南的学生吗？”他说：“多得是哟！”“有个黄祖科，黄埔第二期的，你认识吗？”“晓得的，他在军官教导团，您认识？”“认识，黄祖科是留法前夕同我一起学习的同乡同学。”第二天，我跑到教导团去看他，结果，黄祖科又找来二十多个华容同乡的黄埔学生来看我。黄祖科向我介绍了黄埔情况，谈到了叶剑英团长，张太雷（当时广东省委书记）副官长，并讲了他们同广东省委的关系。主动询问道：“你是不是想见到省委同志？”我说：“不，在这样严密的情况下，我没有见省委的任务。我唯一希望省委和通过你们教导团把朱德同志的行动方向、目标告诉我，只有找到他们，我才好回井冈山复命。”

于是，黄祖科简要讲了南昌起义情况后说：“南昌起义的部队，现在是朱德同志带队，前几天在军阀报纸上看到他们在三河坝活动，失败以后，报纸上一直没有消息。”

“那么，我只有自己去找了。不过，路费得麻烦您了。”

“没关系。”我在黄祖科处了解了戴新炳的情况，知道他过去是左的，虽然在方殿英手下当主任，但他的侄子是共产党，他掩护其侄子，必不会随便出卖与他侄子同来的不知底细的人的。

和教导团接上了联系，有了戴新炳的掩护，广东省委



帮助打听消息，经济上有了保障，我就开始活动了。我先和小戴到郴州，以看戴的叔父为名到了九宫山，但没有打听到消息。十二月十日又回到广州。这时，正好广州暴动失败了，反动军阀到处抓人，警车昼夜嘶鸣，无数革命者倒在敌人屠刀下，广州到韶关的铁路也被破坏了。我和戴菊秋回到旅馆后，决定分开居住。戴住进了他叔父的“后方旅馆”，我在黄老先生的掩护下，装作病人。老先生为防万一，还更换了我住宿的登记卡片的日期，避开了十二月十日来广州的嫌疑，故意往前添了几天。为不引人注意，我千方百计取得同住一个旅馆中方殿英太太的欢心和好感。本来我不会推牌九，但在方太太的一再要求下，索性打了起来。开始不会，后来会了，也故意装糊涂，让给她们赢。不久，关系搞熟了，又多了一层掩护。

十月二十日，火车路修通了。黄祖科跑到旅馆对我说：“长工，朱德的队伍有消息了。听说是钻到范石生的队伍里去了，你是否到范的管区寻摸寻摸？我就要到上海去找党组织。”说完，他顺手摘下一颗金戒指说：“实在对不起，身无长物，只好以此相赠为路程之资啦！”然后匆匆离去。

广州不是久留之地。我当即找到小戴决定乘车去韶关。这时，戴菊秋已是一身军官打扮。原来，他通过其叔父关系暂时当了个副官掩掩风雨，并且给我也封了个“秘书”。我坚决不同意，说：“我懂外文，在这种场合最易露马脚。你先在这顶着，我一个人去韶关。”

南昌起义部队十分难找。他们伪装得很好，时隐时现。朱德同志很会作统一战线工作，和范石生又是同学有特殊关系。因此，他们有时用范的番号，有时又用其他的名称，把敌人弄得迷迷糊糊。当时《江西日报》有的记者千方百计打探和报道这方面的消息，也无可奈何。

我到犁铺头滞留一天，毫无消息，第二天，我到韶关的一个澡塘洗澡，正好范石生部的一些军官在那里议论。他们很随便，对我一点也没有戒意。一个说：“那个王楷，原来叫朱玉阶，跟我们军长是同学。”另一个说：“同学归同学，朱部暴徒很多，我们还是要注意防范才是。”听了之后我暗暗高兴，没等洗完澡便赶回住处打点行装上路了。

当时，广东的华侨很多，一般军队对这些人不大敢过问和盘查。因为这些人的身世各异，有的还大有来头。我发现了这个窍门，也就将计就计，我穿着呢子大衣，黄皮靴，装成个财大气粗的官家子弟。结果，顺利的通过了范石生部队的岗哨和警戒，没有遇到什么检查。可是，当快要到朱德的防区时，盘查十分严格。我没有走多远就被捆绑起来，解往朱德司令部。

一进门，迎面碰上蔡协民同志。我同他在洞庭湖一带一起作过秘密工作，是我们华容的县委书记，老警卫团的，处得很熟。但现在已认不得他了，他已留起了胡子。只是口音很象，我说：“我是何长工。”蔡协民仔细一端详，赶忙扑上来边替我松绑边说：“哎呀！老何，委屈你了，你不

知道我们居人篱下过日子，不得不防啊！”我揉了揉酸麻的双臂说：“我是毛委员那边派来找你们队伍的，来找朱德同志的，你们这儿还有什么人哪？”“还有陈毅、王尔琢同志。”“陈毅我认识，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的。”这时王尔琢同志来了，他虽然认识我，但对我的来历不放心。后来，蔡协民同志详细介绍了我的政治身分，才打消了王尔琢的顾虑。这时，他说：“老何，你怎么来了？”我简要的讲了一下来找南昌起义部队的任务和曲折经历后，陈毅同志出来了，他虽然老成了，但还是当年那种豪放潇洒的劲头，一见面就开起了玩笑：“哎呀，过去相会在欧洲巴黎，现在见面在犁铺头，有点感想吧！”正说着，朱德同志从里屋出来了。他的头发和胡须较长，但是两眼炯炯有神。穿着一身灰军装，打着一副绑腿，精神抖擞，有说有笑，我虽然在法国就知道朱德的名字，但是，见到朱德本人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

朱德同志看着我穿着西装大衣，象个假洋鬼子，有点不放心，就象测验似的询问起部队的情况怎样，井冈山的情况。我把部队在武昌出发，到秋收起义，开赴井冈山的情况一一做了介绍后说：“井冈山的具体情况，我因为出来的早不太清楚。但各县党的领导人我清楚。井冈山的地形、道路和周围的地主武装，我了解一些。”朱德同志又问：“部队有多少人？”“大约一千人，编两个营，一个特务连，一个军官队，还有卫生处。”“您干什么工作呢？”“秋收起义时，我当连党代表，大革命时期是湘西农民赤卫军的总指

挥。”这时，蔡协民又补充了我的其他职务。朱德同志又询问了领导人的情况，我都一一做了回答。朱德同志听了十分高兴，接着和我一起就能否屯兵、打仗等问题认真的研究起井冈山的地势来。朱德同志详细了解了井冈山地区的地形、群众、物产等情况后，十分满意，怀着羡慕和赞赏之情说：“我们跑来跑去就是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们已经派毛泽覃同志去找毛润之了，如果不发生意外，估计已经到了。”

这时我看到，朱德同志一边同我谈话，一边有很多人来向他汇报请示工作，非常繁忙。我说：“看来这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朱德同志会心的笑了笑说：“是啊！我们要搞一个大暴动，把队伍拉大一点，把根据地搞起来。因为事情忙，我就不多陪了，有什么事情和陈毅同志讲。”他看了看表说：“哟，已经三点了，赶快吃饭，饿坏了吧！”陈毅说：“长工返回去没有交通，是不是有危险？”朱德同志说：“他的安全我负责，等吃完饭后，我跟几个委员说说。”朱德同志是北江委员会三个委员之一，北江委员会有可靠的秘密交通和联络员。

阴历十月，我由井冈山出发，离开犁铺头时已是阴历十一月多了。深夜，船在凛冽的寒风中向前移动，我的心里如同燃烧着一团火。我看到南昌起义的部队在朱德同志领导下，不但没有垮，而且转战出来，开始了更积极的武装斗争，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欣慰。

## 改造王佐部队

一九二八年初，毛泽东同志指挥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坑消灭了肖家壁的反动民团，乘胜占领了遂川城，迎来了井冈山第一个胜利的春天。我从粤北联系南昌起义部队返回不久，一天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看着我笑，一会儿说：“长工，我还要打你的主意。”我说：“打我什么主意呢？”他说：“决定派你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怎么样？”我问：“去多少人？”毛泽东同志笑笑说：“又不是去打仗，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你先去做‘长工’。人还是要派去的，只是现在不是时候。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请我们的人上山。”

听说要我自己上山，心里真有几分犹豫。王佐是井冈山上的一支农民武装首领，他和袁文才，一文一武，是土客籍的两个领袖，如今虽然打的是农民自卫军的旗号，反抗旧势力，但这支武装，阶级观念模糊，流寇思想、游民习气很重，纯粹是靠封建的红帮关系维持他们的内部，完全是闯江湖的一套。我独自一人，怎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呢？

“不要怕。”毛泽东同志看出我的顾虑，便鼓励我说：“去了以后，困难是有的，要边工作，边学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参谋长张子清同志在一旁说：“毛委员的意思要迅速改造这支部队。他们在山上，我们在山下，如果山上出了问

题，我们就有后顾之忧。毛委员已经直接做了许多工作，宁冈县委已跟袁文才谈妥了。你去吧，只要按照毛委员的指示去做，一定成功。”

毛泽东同志给了我许多指示，他特别强调指示，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毛泽东同志常说的一句话），巩固了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各县土客籍之间矛盾很深，我们可以通过对王佐、袁文才的团结，去联系广大群众。

我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带着他亲笔写给王佐的信，背起一个小包袱就出发了。

井冈山，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一座高峰，方圆五百五十里，周围有七个县，十五个市镇，山上有一片平地 and 许多梯田，王佐带领一支队伍，就住在山区的中心——茨坪；袁文才带领另一支队伍住茅坪。他们一个山上，一个山下，把守了通向井冈山的各条道路，其中有五条主要上山路，以后我们叫五大哨口。

工农革命军开始进入井冈山地区的时候，他们对我们不了解，有戒心，不愿意接受我党的领导。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在古城会议讨论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时，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了这种思想，强调指出，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

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的武装。为此便通过地方党的关系，对王佐、袁文才进行了说服教育，并且送给了他们一些枪弹。毛泽东同志的名字，王、袁是早已熟悉的。因此我到山上，一说是毛委员派来的，王佐便以宾客相待。

王佐这人，只有三十来岁。个子不高，白面，胖胖的，两条眉毛浓黑，穿一身直贡缎的黑色短衣，挎一支新式的驳壳枪。他有一身好武艺。听说有一次十几个敌人把他包围了，他拿着一条板凳，就打出了重围，然后摸过一根竹竿，嗖地一下，跳上了房顶。他原来是文盲，这时已能读一般的文件了。他读了毛泽东同志写的信，连声叫道：

“好，好！欢迎，欢迎！”

说了一会话，王佐便命人摆酒设宴，说要为毛委员派来的人接风。

他们的生活作风，颇象当年的绿林好汉，大碗饮酒，大块吃肉。虽是靠山为营，但吃的都是山珍海味。饮酒中王佐盘开了我的“家底”。毛泽东同志曾嘱咐过，说他们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疑心重。和他们谈话时，一方面要讲政策，要灵活，同时要坦率。遵照毛泽东同志指示的这条原则，我毫不掩饰地讲了自己的出身、经历。

王佐听了面带笑容。看来他对我坦率的回答颇为满意，随即也将他自己的出身、经历说了一番。最后感慨地说：

“我也是劳动人民出身，当过裁缝，种过田；因不满地主豪绅的压迫，才起来闹革命。”接着他谈起几年的战斗生活，

谈到他的劲敌尹道一。

尹道一，是井冈山七县反动民团总指挥，有名的恶霸地头蛇。王佐和他打了多年，结下了血海深仇。这支反动武装，也是我们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一大障碍。听王佐一说，我便应道：我们一定想法把尹道一收拾掉，把七县的地主武装民团肃清，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第二天，王佐集合队伍，当众宣布说：“弟兄们！毛委员给我们派来了党代表，今后大家要尊重党代表，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发展我们的事业……”他的言词流利，富有鼓动性。

王佐手下约有四五百士兵，多是土籍人。他们实行季节性和临时雇佣性的兵役制。无事窝兵务农，有事揭竿而起。士兵个个强悍，都穿着杂色衣服，蓄着长发，善爬山。听人说，他们下得山去，若是被打散了，便会自动地跑回来。这些士兵对我的来到，也无敌意，这就使我增强了信心。

可是，事情要比预料的困难得多。当时王佐看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想靠近我们，但又怕我们拆他的台。因此戒心很重，故意说，在司令部不方便，便把我安置在离他一里路之外的一处小房里，并且派了一个颇不简单的“勤务兵”照顾我，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王佐还特别对我说：“你初来山上，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发生意外！”这话，听起来客气，实际上，是给我的警



告：不许私下活动，不准与士兵接近。

我没有来以前，他们摆香堂、拜把子是公开的活动。我来以后，因为他知道我们党反对这些，他们就背着我搞。最初几天，我也很小心谨慎，只要他们不让我去的地方，我就不去。他们开会、宴客不请我参加，我就当做不知道。

我每天吃罢饭，就看看书，看倦了，就出门散散步，看看山上的景色。站在门前的山峰上，向四处望去：山峦巍峨，古木参天，绿竹满目。再远处：东有秦岭帐，西有金狮面，南有金竹山，北有旗锣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崑崙险峻的井冈山，真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发展壮大的好地方！可是，眼下有个王佐在此，要争取他，不知道要做多少工作，“既不能缓，又不能急”，这是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原则，每当想到这句话，心里总是很着急。

为了消除王佐对我的戒心，我便经常到他家里去坐坐，有时还帮他办些家务事，趁机向他的母亲、哥哥、妻子宣传些革命道理。王佐对我到他家里去并不反感，认为我这个人“爱朋友”、“讲交情”。这就开了方便之门。我便通过他的家属，对他做些宣传工作。渐渐地，王佐也主动来接近我了。

王佐有三个心腹朋友，一是袁文才，二是刁飞林，三是李克昌。他有什么大事，总是和这些人商量。而经常在他身边的，又是刁、李二人。他们是王佐的左右二将。这两个人性情豪爽，重义气，颇易接近。当我发现这个门路

后，使主动地和他们接近，找他们谈心，很快就搞熟了。谁想，有一天刁飞林突然提出要和我“饮鸡血酒”。

这事就使我为难了。饮鸡血酒，就是磕头结拜。不答应，怕伤了他的情面；答应了，显然是有害的。我经过慎重考虑，便婉言暂时推开了。

原先王佐最担心的是怕我会拆他的台。过了一个时期，他见我并没有拆台的意思，又加上他母亲、刁飞林等人从中说了些好话，疑心便渐渐消退了。有一天，他来和我商量收拾尹道一的办法。

尹道一一向很轻视王佐，他仗着人多势力大，每次和王佐打仗，总是穷追一气。当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建议王佐，设法把尹道一引上山来，选择一个有利地形，打他的埋伏。

王佐听了，两眼眨眨转了几转，两手一拍叫道：“着！此计甚妙。不把这个贼子灭了，我决不甘心！”

我们仔细地研究了行动计划，在一个夜晚，率领部队下了山。

尹道一的司令部，驻扎在永新县东乡的拿山，从那里到茨坪，中间要经过一个险要山坳，叫旗锣坳。据说，从前井冈山出过一个翰林，这里是举旗鸣锣接翰林的地方。我们估计，尹道一不追便罢，要追，一定经过此地。因此，我和刁飞林带一个连埋伏在这里，王佐和李克昌带一支人马赶到尹道一所在地拿山。他们拂晓打响，天一亮回头便

跑。尹道一不知是计，带领民团，猛追出来。

天将中午，他们追到了旗锣垌。先头部队追上了山，尹道一的指挥部驻下吃饭休息。

我们埋伏的部队看见尹道一上了圈套，一个猛冲，打了下去。他们有的在吃饭，有的把枪放在一边睡觉，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着，顿时慌作一团，四处奔逃。尹道一当场被打死。刁飞林把他的头颅斩下，用包袱包好，收拾了胜利品，便收兵回山。

到了山上，天已大黑。消息早有人报给了王佐。他连声问道：“真的把贼子除了？”

“请看这是什么！”刁飞林展开包袱，把尹道一的头抛在地上。

王佐端过灯一看，拍着手大叫道：“着！就是这个贼子，就是这个贼子！你害死了多少老百姓！作尽了恶，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说罢便令人摆酒设宴，庆祝胜利。

这一夜，山上灯火通宵不熄，如同过年一般。王佐喝了个大醉，不时把大拇指伸到我面前，连声说：“毛委员派来的人，有办法！”

其实这个小伏击战，对我们工农革命军每个指挥员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这是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的基本作战方法，但在王佐的眼里，却是了不起的事。

第二天，王佐派人抬上尹道一的头颅，到各村镇去游乡示威。一连闹了几天。这次战斗的胜利，对他们来说，

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喜事。从干部到战士，思想情绪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人笑逐颜开，个个斗志昂扬，出出进进歌声不断。于是，我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部队展开了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我发现他们唱的歌是些山歌、小调，缺乏现实斗争的政治内容。一天，我对王佐说：“你们歌唱得不齐（没说不好）。”于是，便从各连抽调出三名士兵，组织了一个“学歌”小队。这当然是个好机会，通过教歌，对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又通过他们去宣传别人，从此打开了接近士兵的大门。

打完尹道一，王佐提出要扩充部队。我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建议王、袁两支部队合编成一个团。

王佐也有此心，便说去和他们“老庚”商讨。

他所说的“老庚”，就是袁文才。这人是个知识分子，参加过大革命，思想比王佐进步些。他是客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同志曾对他做过一些争取工作。王佐既然愿意改编，他那一关就不难通过了。

一切条件成熟以后，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便在宁冈大陇举行了庆祝合编大会。正式宣布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毛泽东同志到了会，并作了重要讲话。根据他们自己的提议：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实际上领兵的是他）。党任命我为该团党代表。宁冈、遂川县委发动了当地群众，对他们进行了热情慰问。袁文才、王佐带头举行了宣誓：拥护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

提出口号：向第一团学习。

这时，井冈山四周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党的影响日益扩大，形势很好。在这种情况下，王佐要求给他们派遣干部。就在这个进步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又派了徐彦刚、游雪程等二十几个干部，先后来到这个新生的团队。徐彦刚任参谋长，游雪程任政治处主任，其余同志分别担任各营、连长和党代表。团里成立了党代表办公室，以及工农运动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处）。从此，党的政治工作，便在这支部队里生了根。

毛泽东同志对改造这支部队，是费了不少心血的。他利用一切机会，亲自和袁文才、王佐谈话。给他们讲解形势，讲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并借古喻今以教育他们。王佐最高兴跟毛委员谈话。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从茨坪路过，和王佐谈了多半夜。事后王佐兴冲冲地向我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对于他们的工作，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很及时，很具体，经常给我们指出工作中的重点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后，他又指示说：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要继续加紧部队的政治工作。

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就是如何使这支为少数人掌握的武装，变为党绝对领导的武装；使绿林作风、游民习气很重的部队，变为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部队；在部队内部的关系方面，要以革命的上下级关系、

同志关系来代替封建雇佣的关系；如何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等等。

从第一团又派去了二十几个同志，都是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分析研究了部队的特点，做出了工作计划。首先通过开展文娱活动，发现士兵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党的发展工作；同时开始建立了政治课、文化课的制度。通过新旧事物的对比教育、环境（即时事）教育启发广大士兵的阶级觉悟。连队的一切制度和建设都以第一团为榜样。并组织下级军官和士兵去第一团参观。第一团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这支秋收起义的部队，经过三湾改编，树立了良好的革命秩序。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和群众的关系密切，部队思想觉悟很高。去参观的人，无不羡慕。甚至有的士兵参观后，都不想回来了。

王佐虽然没有去参观（他是不轻易下山的），但听得他手下人称赞第一团，他也说：“咱们向他们学习，他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于是，士兵委员会、纪律检查组便先后组织起来。

士兵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剪去了长发，换上了新军衣，学唱歌、学演戏，茨坪山上充满了新的气象。王佐看到这一切，也感慨地说：“共产党真是会领兵，会做群众工作，深得群众拥护，照这样下去，怎能不打胜仗！”

三月，井冈山的部队，应湘南特委的要求，去支援湘南起义，同时掩护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和湘南起义

部队到井冈山同毛委员率领的部队会师。因此新生的第二团也踏上了征途。这是它走向较大规模作战的开始，也是它在政治上得到进一步改造的良好时机。

每到一处，群众夹道欢迎，送茶送水，十分亲切。这是王佐和他手下的人从来没见过过的。每逢有人欢迎，王佐就把手举得高高的，使劲地鼓掌，并不时兴奋地回头向我说：“党代表，党代表，人民群众对我们太好了，太好了。”

王佐从来没出过远门，没见过大世面。出了山，他对一切都觉得新鲜。

部队驻下以后，他到街上去逛，眼更不够使了。东看西看，看到电灯也奇怪地说：“嘿！好古怪的东西！不点火会亮！”

这次出征，使王佐扩大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受到了群众革命斗争的教育，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心。晚上，他兴奋地谈着自己的见闻，谈着人民如何热烈地欢迎他，自言自语地说：“三十年来，住在山区里，真不知外面还有这样好的世面。”

这时，我便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剥削阶级，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更美好的生活。同时对他讲，一个革命者，首先为大多数人民着想，决不是为着个人。他听了点头说：“此话有理！此话有理！”

这次下山，王佐原来是有顾虑的，担心回不了井冈山，

担心部队垮了。资兴县滁口一仗，在湘南第七师配合下，打垮了敌人两个团，缴获了很多枪支，王佐的信心高了。特别是不久以后，井冈山成立了红四军，二团改为红四军三十二团，对他更是很大的鼓舞。

回到井冈山后，一天吃罢饭闲谈，他突然问我：

“党代表，你说，象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入党？”

听他这话，以及他从湘南回来的许多表现，可以看出他内心起了很大变化。这是半年多来党的政策对他的影响的结果，同时，红军日益扩大，人民拥护党、拥护革命军的真诚行动，也使他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的出路。

改造王佐这个人是不容易的，改变这支部队的一套旧制度、旧作风，更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组织士兵委员会，很多连长反对，他们说：

“什么都要士兵讨论，还要官干什么！”连队公布伙食帐，有的连长发脾气说：“公布什么帐，我贪污？”士兵唱歌演戏，有的连长说：“这是兵营，还是戏班子？”为着这些，营连的党代表不知说了多少话，磨破嘴皮地和他们谈。特别是废除打骂制度，开始时遭到很多人反对。有的甚至说：“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不打不骂怎么成！”

我们说服了王佐、袁文才，并要他们下命令，不准打人。这样，公开打人的现象逐渐地减少了，但又出现了许多变相的打：如扭耳朵、扭眼皮、罚站。为了彻底纠正打



骂士兵的军阀残余习气，各连党代表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当时打人最凶的是七连副连长。一天行军中，有个士兵犯了小错误，他当即拿绳子绑了起来。该连的党代表说服无效，路上别的连队党代表看见了，就鼓动士兵一齐喊口号：

“反对绑人！”

“反对军阀残余！”

那个副连长在群众的压力下，和其他同志帮助下，只好认错，把人放了。经过一番内心斗争，事后找党代表做了检讨。

随后部队建立了党的组织，党员的人数一天天增多，更加速了部队的改造。许多旧习气、旧作风也慢慢改变了。加上边区的发展，土客籍广大群众拥护党、拥护革命，这就大大影响了部队士兵。士兵的进步，推动了袁文才、王佐进步；他们两人以及许多下层干部的进步，也影响着部队。从上而下，从下而上，从外部到内部，许许多多因素，促使着这支部队迅速改变着面貌，从落后变先进，从游击变正规，从分散变集中……

虽然也有个别流氓习气重的人拒绝改造，逃跑叛变了，但绝大多数的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做了新人。王佐后来也入了党。一九二九年部队扩编为红军第五纵队，王佐做了副司令。原来在王佐手下的一名号兵，在红军长征时也做了政治委员。

## 出山入湘

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朱德、陈毅率领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的一部，转移至江西安远，在天心圩整编为一个团后，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间，乘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湘南敌军空虚期间进入湘南，与湘南特委在宜章搞了暴动，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湘、粤两省敌人急忙调动军队，直逼暴动总指挥部湘南郴州。

湖南省委以支援湘南暴动和扰乱湘粤交通的名义调我们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去湘南。其实，湖南省委及湘南特委是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那一套。本来，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经过艰苦斗争，使井冈山根据地初具规模。但是，湖南省委不同意向井冈山进军和建立湘赣边红色政权的正确行动，指责毛泽东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等，他们要组织全省的总暴动，把我们工农革命军也列入湘南地区的武装力量总暴动计划中，要我们去湘南的目的是实现打通湘粤大道的计划，以此支援湘南暴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使瞿秋白同志的“左”倾盲动主义形成高潮，错误的估量形势，混淆革命性质，实行惩办主义。以秋收起义失败为名，开

除了毛泽东同志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指示湖南省委派人去井冈山改造军中的党。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旬，湖南省军委特派员、湖南特委军事部长名叫周鲁的带着特殊使命来到井冈山，取消了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将前委改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单管军中事，毛泽东改任师长。三湾改编后，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做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何挺颖同志为党代表。

对这件事大家思想都通不过，所以周鲁找我们谈话。在谈话中，我质问他：“你们要撤毛委员的书记是哪里的命令，哪里的决定？毛委员在频繁的战斗里，在险恶的环境下，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插稳了红旗，这是很不容易的。毛委员是有威信的，这样好的领导者你们都要撤掉，党的原则哪里去了！当然何挺颖是个优秀的同志，当党代表没有问题，但毛委员是毛委员，是中央委员，他的威信、水平都不同。”当时何挺颖同志也在座，他生气地说：“我不能胜任。你们这么搞，组织手续不当，怎么一个特委的特派员可以把我们的前委书记的职务撤掉了呢？前委是秋收起义之前经湖南省委决定的，起码也得经湖南省委报中央批准。”周鲁蛮横地讲：“特委代表省委，省委代表中央，中央代表国际。”他这一代就代上天了，搞得我们目瞪口呆。当大多数领导同志仍持反对意见时，周鲁推托说：“我是奉命来撤他的，我没有办法，你们有意见向省委、特委报告好了。”那时我年轻血气方刚，对这种事看不下去，指责周鲁

说：“你在这里把毛委员撤了，把井冈山的红旗也拔了，到湘南还能不能插稳？”他默不作声。

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撤了毛泽东同志的前委书记。原来要我们去湘南，他们的意图不是到那里掩护朱德同志向井冈山撤，而是要增加湘南的力量，粉碎湘粤两省敌人对郴州的进攻。遵照这一指示，我们途经睦村、沔渡、酃城到达水口誓师，支持湘南五县暴动。毛泽东同志不愧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他虽被撤掉前委书记职务当师长，但对革命事业没有半点含糊。我清楚记得，在宣读了撤销他职务决定后，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师长，大家当参谋长，我这个师长就好当了，也不愁打不好仗。”会师以后，部队分两路：毛泽东同志带第一团走桂东、下汝城；我们第二团向彭公庙、资兴方向前进。这里特别值得回忆的是中村政治教育和沙田颁布纪律。三月十八日，毛泽东率第一团到达中村，从第二天开始，他就采取半天讲话，半天讨论的方法，进行政治教育。他详细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特点，通俗的讲解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军阀混战，论述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并指出：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这次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和战士的政治觉悟，也是对轻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左”倾机

会主义路线的有力抵制和批判。

在中村驻留中，得知湘南暴动失败的消息。

这次暴动首先从宜章开始，并建立起红色政权农会和地方武装。在粤北的国民党反动派许克祥很快就来进攻。这个在“马日事变”中臭名昭著的反动军阀，将他的一个师摆开九十里，向宜章扑来。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在宜章农军和革命群众配合下，一天之内就打垮了许克祥三个团和一个师部，许克祥残部向粤北狼狈逃窜，起义军和农军立即向北进攻，占领郴州。接着，资兴、永兴、耒阳的党组织也领导群众暴动起来。五县很快地建立起红色政权和农民协会，武装了的农民开展了打土豪斗争。尽管起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因敌强我弱，起义终于失败。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于是，我们即把进军湘南，转变为掩护湘南暴动部队和农军撤退。

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为了阻击敌人，掩护接应从湘南撤退的部队，从酃县中村进入桂东。三月三十日到达桂东沙田。同时，指示我们二团向资兴方向前进。当毛泽东同志率队进入沙田村时，由于受反动宣传，群众纷纷逃避。于是，在沙田万寿宫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干部会议，决定组织宣传队深入沙田一带进行调查研究和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工农革命军为工农谋利益的革命宗旨，号召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四月三日毛泽东

同志在沙田圩老虎冲大田的集会上，向工农革命军逐条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八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七，洗澡避女人；八，不搜俘虏腰包。这些纪律，是工农革命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的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都起了重大的作用。随后，建立红色政权，成立桂东赤卫队，陈奇任大队长，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在沙田领导桂东人民建立了县工农兵政府，由陈奇同志任主席，开始插牌分田。十月六日，毛泽东同志率队离开沙田，向汝城进发，途中同反动地主武装何其朗部交火，我军将其歼灭后，直赴汝城。

我们二团奉令向资兴进发，到资兴首先遇到了湖南起义撤过来的第七师邓允庭、李奇中同志带领的部队。我们在资兴滁口附近和范石生第十六军的部队打了一仗，打了两天两夜。范石生打我们是消极的，他的队伍连工事也没有做就被我们包围了。开始他瞧不起我们的土枪，打了一天以后，他们害怕了，边打边筑工事。我们打他们也不过分，看在他是朱德同志的老朋友份上，打了以后就走，抓到他们的人也不缴械。真是子弹呼呼叫，战事挺热闹。当我们发起总攻时，边打边喊口号：“你们快撤，不撤就消灭

你们。”他们看我们人多，应付一下就往后撤。当时第七师有农军一千多人，还有在资兴附近发动起来的一部分农民，看起来我们漫山的红旗，遍野的人群。其实，我们二团只有二个营，大概有六七百人枪。战斗力也不强。我们在东面打一下，又迂回到西面敲一下，敌人就全线撤退，我们立即组织追击，途中遇敌主力，我们又撤往资兴。此时，听说何键部队已经出动，直逼郴州。当时，虽然情况紧急，但撤退和掩护是要有安排的。于是，我们便写了一封信，由党交通组织连夜传送郴州，建议朱德同志迅速撤出，以免遭南北夹击。当我们继续往北撤时，不意在资兴城会合了陈毅同志，他还带着特委机关。我们从陈毅同志那里知道朱德同志撤向安仁、茶陵一带向我们靠拢。我对陈毅同志说：“我们到资兴城来掩护你们到彭公庙，然后往井冈山撤。”陈毅同志说：“对。”朱德、陈毅同志从郴州撤退到井冈山会师是很明确的。当我们到达彭公庙时，得知朱德同志到了安仁，向茶陵、宁冈靠。在彭公庙碰到了曹里怀同志。第二天到离资兴城七八十里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步的行动计划。在会上湖南省特委书记杨福涛和团特委书记席克思，提出要回衡阳。他们一共几十人，党、团委机关，还有一套油印机。杨福涛问我：“润之同志什么时候到？”我说：“你不用着急，隔一两天就来了。”当时我想，我们两路从桂东、资兴平行过来的，毛泽东同志事先预料起义部队会从郴州彭公庙一线撤退的，现在我们这边一打响，毛泽

东同志就会知道起义部队下来了，一定会往这边靠拢，顶多三天。可是，这些同志说什么也不等了，坚持要回衡阳。原来特委在衡阳，一九二七年才秘密搬到郴州。他们这些工人出身的同志很不冷静，五县暴动把脑子搞得太热了。我对陈毅同志说：“你给他们说硬的，因为你熟悉他们；我说软的，因为我是陌生人。我们来个软硬兼施。”于是，陈毅同志便对杨福涛说开了：“杨福涛你头脑要冷静，你们男女老少，东西南北的口音，几十口子的人，靠几支短枪能闯过民团的关卡吗？”我不时从中插话：“同志哟，现在赤白对立，剑拔弩张，各县都很警惕我们，怕共产党渗透，湘南敌人的指挥所在衡阳，唐生智派有重兵驻守。广东粤北指挥所在韶关，两方面的军队夹击郴州，想把我们一网打尽。你们现在要到衡阳，无疑是自投罗网。我的意见还是跟我们上井冈山为好。以后，再设法化装分批送你们走。”谁知杨福涛同志却火冒三丈，说：“我是湘南特委，到你井冈山干什么！”席克思也说：“共产党应该不避艰险。我们湘南特委逃到井冈山这是可耻的行为！”我说：“不是你们逃到井冈山，没有你的我的，现在重要的是你们的安全。以后毛委员要责备我们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爱护同志，假如你们牺牲了，那损失太大了，我劝同志们还是要理智一点。”当时，我也顾不上态度了，深为他们这种盲动行为而气愤。结果，我和陈毅同志说破了嘴皮，他们就是不干。我们是军队，又对他们强制不得，只好让他们走。下午三



点多钟，我们和杨福涛、席克思边走边谈，最后希望他们接受我们的意见。陈毅同志说：“杨福涛同志，你们这一去肯定凶多吉少，就这样白白牺牲两个特委，将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们没说服你们心里感到很沉痛，说句不吉利的话吧，不如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再走，毫无疑问，敌人现在已经红了眼，你们肯定会被抓住砍头的。”我们好说歹说，均无效果，最后，他们还是上路了。后来听说他们到耒阳、安仁边界，就被民团抓住，统统杀掉了。大革命失败的初期，“左”倾盲动主义真是害死人。以后，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这件事时，他说：“你们强迫一点嘛！”我说：“强迫也不能把他们抓起来，态度硬一点，他们都说你们是枪杆子还是党？陈毅同志跟他们共事很久、关系很深的人都说不服他们，我这个人哪行呢。”毛泽东同志深感惋惜。以后，我和陈毅同志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时，还一个劲的后悔，心有余痛。我曾对陈毅同志讲：“是不是我们当时说话的方式不好，得罪了他们。”他说：“不是，那个时候他们这些同志‘革命’的很哟，经不得半点挫折，把上山看做是可耻的事，恐怕被杀前还认为是光荣的，不知道保留革命力量。血的教训啊！”

送走了湘南特委同志，我和陈毅同志的队伍，还有一些县的农民自卫军、县委机关往井冈山撤退。我们快到酃县沔渡时，便衣侦察回来报告说：“朱德同志带领的队伍已经到了沔都了！”大家一听都高兴地加快了脚步，飞速赶去。

进街后，果然看见一些军人来来往往，有的穿军装，大部分穿便衣，颜色有黑有灰，帽子各不一致，但个个精神抖擞，神气得很。我随着陈毅、邓允庭同志，以及几个县委书记，一齐来到朱德同志住处，由于战斗紧张，朱德同志的脸更黑了，胡子也更长了。王尔琢同志的头发又黑又密。他在犁铺头时曾对陈毅同志开玩笑地说过：“革命不成功，一不剃胡子，二不理发，三不娶老婆。”朱德同志一见到我，笑呵呵地和我们握手。我们问他：“这次没有受损失吧！”他说：“很好，没有受损失，就是忙没有理发，胡子长得也盛了。不过家底还是很大的，缴了武器，队伍也扩大了，干部也充实了。”我说：“我们拚命往南打，想不到撤退这么利索。”他说：“你们的行动，直接掩护了我们的撤退。”接着他又问我：“长工，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能到？”我说：“两天左右可能会到宁冈。”我接着说：“我带二团到宁冈准备房子、粮食欢迎你们。”朱德同志说：“你是主人，你说怎样办就怎样办。”他没有说更多的，只是让房子准备多一点，给湘南农民和地方干部，对地方党、农民领袖和一些站不住脚的家属尤其要妥善安排。我会心地点着头说：“是，你想的很周到，我尽力去办。”于是，陈毅、邓允庭、李奇中同志归回本队，我星夜兼程，于四月二十二日赶回宁冈筹备房子、粮食，准备会师事宜。我回到耒市两天后，朱德、陈毅同志带着一部分直属部队也进了山，分住在耒市附近的几个小村庄里。

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汝城阻击敌人，掩护湘南部队安全转移后，经土桥、田庄、邓家湾，在资兴的龙溪中洞接到了肖克同志带领的宜章黄沙区农军。他们有五百人枪，号称“梭镖营”，响应湘南暴动，揭竿而起。赶到暴动地区时，听说起义失败了，于是，他们就追赶起义主力。现在，他们同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主力会合后，四月二十八日由毛泽东同志率领经青腰、彭公庙、中村、水口、酃城、沔渡回到宁冈砦市。

毛泽东同志回砦市，带回一个不幸的消息，在酃县和国民党第八军一个营打仗时，一颗子弹打进张子清参谋长的脚骨里，以后发炎感染，全身浮肿，牺牲了。

两军会合之后，成立了军委，前委尚未恢复。前委直到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才恢复起来。那时，恢复前委需经省委、中央批准，由于交通不便，战事紧急，一拖就是几个月。成立军委后，陈毅同志任军委书记。

## 伟大的会师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峨井冈山象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漫野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地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我们跟在毛泽东同志的身边，注视着他那高大稳健的身影，大家心潮澎湃。是他在大革

命失败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树立起了第一面鲜艳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浪潮，将要从这里推向全国。

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会见地点是在宁冈砦市的龙江书院。毛泽东同志一到砦市，得知朱德、陈毅同志住在龙江书院，顾不上一路征尘，立即带领干部向龙江书院走去。朱德同志听说毛泽东同志来了，赶忙与陈毅、王尔琢同志等主要干部出门迎接。我远远看见他们，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朱德身后的那位是王尔琢同志。”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快走近书院时，朱德同志抢先几步迎上去，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又那么深情。毛泽东同朱德同志这次历史的会见，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进了龙江书院，毛泽东同志把我们介绍给朱德同志，朱德同志也将周围的干部，向毛泽东同志作了介绍。

毛泽东同志带着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能整倒你！”

朱德同志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谈了一阵军情以后，毛泽东同志热情地说：“趁‘五四’纪念日，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个热闹的联欢大会，两方面的负责同志和大家见见面。”说着，转过身叫我负责准备一下大会，详细地指示了该准备些什么，最后特别强调说：“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

等他指示完毕，我们几个跟他来的同志就告辞出来，让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可以安静地商谈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走出龙江书院，看见田野山坡，村庄周围，到处是一簇簇人群。两军会合，同志们喜气洋洋。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省份，语言不同，但有着一个共同志愿，跟随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建设井冈山，发展井冈山，把这星星之火，传播全中国。战友们象亲兄弟一样，互诉盼望之情，谈论革命的经历，展望未来前途。到处是两军相会的欢乐景象。

五月四日这一天，山明水秀的砦市，显得更加美丽可爱，山茶花更红，油菜花更黄，溪水更清，秋田更绿。在砦市南边的一个草坪上，有一个用门板和竹竿搭起来的主席台，被无数的云霞似的红旗簇拥着。主席台两旁插满了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队伍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板。

一清早，人们川流不息地向会场走来，不到十点钟，二十里路外的部队也都赶到了会场。当两支部队进入会场时，千百双眼睛凝视着这支威武的人民武装，无比的兴奋，

万分的激动。整齐的部队和湘南农军约一万多人，同喧腾的人群汇成了人山、旗海，歌声、笑语，此起彼伏。从秋收暴动、南昌起义以来，广大指战员从没有象今天这样欢乐过。

十点钟，由党、政、军、工、农各界组成的主席团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我担任大会司仪，高声宣布：

“大会开始！放鞭炮！”于是，从树顶直垂地面的鞭炮立刻响起来，经久不绝；排列在主席台前的司号员一齐吹响军号，号音整齐嘹亮，威武雄壮，远近的山峰都传来回音。

军乐一停，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同志就宣布大会开始。他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今天来开会庆祝两支部队的胜利会师，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接着他宣布，根据红四军军委的决定，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参谋长王尔琢同志，政治部主任陈毅同志。同时宣布了师、团编制及负责人。

朱德同志接着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大了，又有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最后，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

要加强团结。他又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分田的利益。他的话音刚结束，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是党代表毛泽东同志讲话。当毛泽东同志健步走上讲台时，全场广大指战员和革命群众都目不转睛的仰望着他。来自南昌起义的指战员们，心情十分振奋。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但早就知道毛委员。不少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前读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今天终于见到了毛委员，都止不住内心的激动。秋收起义的同志，想起了毛委员领导秋收起义和上井冈山的艰苦斗争历程，桩桩往事涌上心头。是毛委员点燃了秋收起义的烈火；是毛委员在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毅然率领他们来到了井冈山；是毛委员亲自在连队中发展党员，保留革命骨干；是毛委员要把支部建在连上；是毛委员指明了革命的道路。今天，朱、毛两股力量汇在一起了，革命前途光明，胜利有望。毛泽东同志那洪亮有力的讲话，把大家的情绪推向了高潮。他指出了这次会师的历史意义，同时分析了红军部队的光明前途。讲到红军任务时，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我们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

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这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有弱有强，“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即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玩“捉迷藏”的游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里玩。毛泽东同志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同志讲了军民关系的问题。各方面的代表也都讲了话。大家都满腔热情地祝贺新成立的红四军，在将来跟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根据地能逐渐的发展和巩固。

为纪念这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后来朱德同志赋诗记怀：

红军会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

领导有方经百炼，人民专政靠兵权。

井冈山会师，在中华革命运动史上有极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这两支部队是大革命的宝贵遗产，这两支部队的会师，使领导加强了，战斗力提高了。假如这两支部队不会师，井冈山根据地能不能巩固还是个问题。许多人对井冈山根据地认识不足，有些还不信服，认为，你有根据地，我也有，你不能把井冈山吹得那么红，那么香，意义那么大。国际上一些



人也不理解，说井冈山那么一个弹丸之地，为什么能星火燎原呢？红军是什么人，为什么打不垮又拖不烂呢？他们不认识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破天荒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建立第一支由党独立领导并指挥的工农红军，这是伟大的革命实践。在这以前的国际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都是首先在城市起义的，巴黎公社起义，彼得格勒起义，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炮声，都是在城市打响。唯独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暴动在农村，以后，又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农村会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从此，开辟一个革命的新阶段。由城市到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武装割据，把土地革命运动、人民战争、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结合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一创举，不仅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也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两支部队的胜利会师，为我们集中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革命力量，把井冈山建成一个象样的根据地，在国际国内革命运动中作了个示范。以后，其它根据地也相继建立了，把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运用到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如众星拱北斗，黑暗中瞻顾启明那样向着井冈山。当时，我们羽翼尚未丰满，井冈山根据地还处于比较幼稚的初创时期，缺乏经验，还在艰苦尝试和摸索之中前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把井冈山根据地建设好。《毛泽东选集》里讲过，井冈山有相当的党的基础，相当的群众，

相当的军队，相当的经济力量和相当有利的地势。

两支力量会师以后，领导、战斗力都加强了，敌人对我们的“围剿”就比较谨慎，不敢那么旁若无人，那么放肆了。我们力量加强了，敌人也就不放松我们了。他们调兵遣将，连续进行几次“围剿”，“围剿”的时间、距离都缩短了。但是，客观上也锻炼了我们干部、战士，人越打越精，仗越打越好。同时，也学会了在夹缝中生存的独特本领，就是利用矛盾，掌握战略。江西、湖南的敌人有矛盾，革命战争就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敌人，瓦解敌人，有的还搞起了暂时的统一战线。我们讲的统一战线三个法宝，是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才提出来的，但是，三个法宝的实际运用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一样，没有宣布以前，实际上已经酝酿成熟了。江西的敌人是我们手下败将，闻风丧胆。湖南的敌人要硬一点，但是我们避实就虚，湖南的敌人也有硬有软，我们首先打湘东，把他们的保卫师、保安队几乎一扫而光，把缴获的武器武装我们，来个“移花接木”，开出革命的胜利战果，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上井冈山以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当时鄂豫皖的红军要我们井冈山的根据地部队称第一军，他们称第四军。毛泽东同志说：“不在第一和第四，我们叫第四军行了，因为我们都是中国革命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是天下一军嘛！”在第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后，部队的党代表，一

律改为政治委员。当时党代表和北伐时不一样，北伐时，党代表许多是国民党左派，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当党代表，但是没有直接抓枪杆子。那时，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不知抓军权，因此，我们的党员在军队中当党代表的人数多，而当军事领导人的却很少。通过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起义，我们才开始真正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才开始建设军队。如果在大革命时我们党就抓枪杆子，那么“马日事变”就不会成为那个样子，我们就不会吃那么大的亏。所以，我们的失败完全是党内机会主义者造成的。他们不认识农民的重要性，不认识武装的重要性。他们只要统一战线，只要联合，不要斗争，总代表是陈独秀。而张国焘只要工人，不要农民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指出的：“我们党的许多领导者之所以犯错误，就是不认识农民，中国是东方农业大国，农民是主要成分，而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有他革命性的一面。”同时指出，那时陈独秀、张国焘都不重视武装斗争。

会师、改编、整顿、训练、成立军委，使井冈山革命斗争，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有了可靠的力量和物质基础。因为这是搞武装割据，根据地的建设是靠武装，搞人民战争。发展革命战争、土地革命运动、根据地建设三者必然结合。你不搞土地革命就没有群众，你搞土地革命，就要保卫胜利果实，这就要有自己的军队，有了军队才能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还要搞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建设，搞经济建

设，搞根据地的建设。齐燕铭同志写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经济》，费了不少的脑筋，把井冈山的经济建设基本概括了。

在斗争过程中，朱德同志始终同毛泽东同志并肩战斗，既互相帮助，又密切合作。朱德同志既是军长又是参谋长。他建立的功勋是永远不能磨灭的。他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高尚的政治品质，在当时，他的领导水平和指挥艺术还没有人能够超过。朱、毛的结合、团结，使敌人害怕，使军队振奋，使群众高兴。当时，作为朱、毛结合的象征，大家造了一个“朱”字在部队流行。

尤其让我难忘的一件事，可以看出朱德同志的政治素质是何等之好。会师以后，一些南昌起义的同志和秋收起义的同志互相有点看不起。朱德、陈毅同志敏感的觉察到这个问题之后，主动向毛泽东同志建议，由于两个部队不同的来源，改编的时候，两个部队的干部相互交流一下，特别是南昌起义的部队要强化政治思想工作。那时，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工作人员没有多大区别，你能打仗，他也能打仗，你能做政治工作，他也能作，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工作人员互相能够代替。

整编中组织决定，我从三十二团王佐部队调到二十八团。当时，心里真有点发怵。二十八团是正规部队，在北伐中是有功劳的，是南昌起义后积蓄下的宝贵财富。这些人大部分是黄埔一、二、三、四期的。上井冈山的时候，

在湖南耒阳打了一仗，第一营营长周子昆带了花，林彪代理营长，唐天际同志也由第一连党代表升任为第一营党代表。我们调到这个团的时候，朱德同志热情欢迎，以后工作中总是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地教育我们，我们也以小学生的态度向他学习。

会师以后，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这是三湾改编的精神，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进了决议。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发展，是我军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文件。

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两支部队会师以后，促使了敌人官兵之间，中央军和地方军之间，嫡系军队与杂牌军队之间的矛盾一天天加深。凡同我军接触过的部队、士兵、军官，都受到我军对敌宣传工作的影响。一般士兵和下级军官往往都发生怀疑，究竟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客观上壮了我军的声威，增强了革命的力量。

伟大的会师，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 第七章

## 战斗在井冈山上

### 三占永新

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以后，我们的力量空前壮大，朱、毛运筹帷幄，珠联璧合，两支部队相互交流，相得益彰。特别是边界党的“一大”召开以后，部队又增加了精神力量，接连打了许多胜仗，三占永新县城是井冈山斗争初创时期，在“一大”鼓舞下最典型的战例。

两师云集井冈山地区之后，在毛泽东同志“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建设”的思想指引下，湘赣边界地方党的组织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了统一边界党的领导和发展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适应新的斗争需要，在边界各级党的组织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五月二十日在宁冈茅坪谢氏慎公祠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这次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军队党和永新、宁冈、莲花、遂川、酃县五个县委及茶陵特别区委的负责同志共六

十多人。大会开了三天。这次会议总结了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右倾悲观论调，研究制定了根据地发展的政策，成立了湘赣边界特委。

这次会议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振奋了革命精神，一扫湘南失败以后的悲观情绪，可以说它是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的精神基础，也是战斗胜利的根本保证。三月失败以后，在红军和边界的部分人中存在着一种悲观情绪，过高地估计反革命力量，过低地估计革命力量，看不见红军和“工农武装割据”的胜利前途，认为南昌起义失败了，甚至错误地认为，秋收起义也失败了，感到井冈山的斗争“前途渺茫”，于是冒出来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论调。林彪一上山就摇头不已，在领导层中散布“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能打得下天下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当这种说法反映给毛泽东同志时，他感到林彪当时尚年轻，只批评了他一下。当时，毛泽东同志曾经和我讲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子之见”。但是，毛泽东同志十分注意这不单是林彪的看法，而是一种右倾悲观思潮，是红军和边界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极大障碍。于是，他在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及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阐明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强调了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指明了革命的胜利前途。我清楚记得，毛泽东同志有这样一段十分感人的话语。他说：红军要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

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现在我们有了“家”，就不要乱跑，要在这里“发家”，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要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要不断扩大红色政权，并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通过长期的反复斗争，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极大的鼓舞了红军将士和根据地人民的胜利信心。

在边界党的“一大”上，讨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问题，还讨论了地方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工农武装建设的问题，研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为边界斗争和各项工作指出了正确方向。会议选举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同志被选为特委书记。特委是湘赣边界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下有县委、区委、乡党支部。特委机关设在茅坪攀龙书院。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的召开，是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大会后，湘赣边界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出现了新的局面。特别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一大”起着根本的保证作用。

这时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边界斗争，完全是军事斗争。”“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十八个团。”红四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井冈山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三占永新城的辉煌战绩，胜



利地粉碎了数倍于红军的湘赣两省反动武装对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进入了边界的全盛时期。

### 五斗江战斗——一占永新。

两军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震动了敌人。蒋介石把红军的存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驱使赣敌向井冈山“进剿”，妄图将红军扼杀在摇篮里。一九二八年五月初，盘踞在永新城内的赣敌二十七师杨如轩部分兵从龙源口、拿山向我进犯。五月上旬，红军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部署，在朱德同志指挥下，采取声东击西、避敌正面、攻击侧面的战术，打败敌人的进攻，消灭敌第八十一团。这一战役共进行了三次战斗：

第一次战斗是攻打黄坳。五月上旬，我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奉命带了几天干粮，从砦市出发，走大陇、茨坪、小行洲，到达黄坳。佯攻遂川，迷惑敌人。敌八十一团慌忙从拿山派遣一个营到黄坳阻击，其主力继续向五斗江推进。红军二十九团走在前面，与敌先遣营相遇。敌人立即抢占黄坳街后面的两座山头。红军二十九团一出口子即投入战斗，漫山遍野的梭镖队，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发起冲锋，不到两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打垮敌人一个正规营，缴枪四十五支。

第二个战斗：奔袭五斗江。黄坳战斗后，敌军从五斗江溃败下去，退至拿山集结。我二十八团在王尔琢团长率领下，根据原定部署，迂回拿山，打其侧翼，直扑五斗江。

此时，三十团担任前锋部队，把二十九团换成后卫。我军分别驻扎潘屋、玉屋和街上。从旗山茛、棺材岭、坳坪背至长窝口一带，修筑工事，摆开阵势，等待敌人投入罗网。敌八十一团团团长周体仁听黄坳残部报告，说打黄坳的都是梭镖队，不是红军主力，乃决定夜袭五斗江。五月上旬的一天早晨，天下着大雨，敌人从拿山出发，在南坑分两路到达沿河境、烂泥坑一带。拂晓后，战斗打响了，红军冒着大雨猛烈反击。我二十八团三个营打冲锋都是很厉害的。朱德同志指挥一营消灭了敌人一个多营。敌人原以为红军尽是梭镖队，开始满不在乎。此时虽然遭我团反击，枪多是“来路货”，兵尽是正规军，仓皇之中敌人狼狈而逃，从仓下、烂泥坑向永新方向鼠窜。我们乘势追击，打垮敌人一个团，缴枪二、三百支。五斗江战斗胜利后，在拿山，朱德同志把我介绍给部队。他风趣的说：“你们有个连党代表叫邓挑夫，你们团党代表叫何长工，有夫有工，工农结合。”

第三个战斗：首占永新城。五斗口战斗后，次日早晨，红二十八、二十九团在朱德同志亲自指挥下，乘胜追击，直捣永新，在离城七八里的北田一战，敌军大败。至此，敌八十一团大部被歼，七十九团被击溃，逃至吉安。红军当晚占领永新县城。随后，红三十一团亦从宁冈进占永新。这是红四军成立后的第一次战役。这一战役击破赣敌对我根据地的第二次进犯，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占领永新以后，部队休整了两天。五月九日，召开了欢迎红军庆祝胜利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现在我们打了胜仗，要打土豪分田地，军民合作，消灭民团土豪，收缴民团枪支。同时还交代了政策，农民自由来往，商人自由买卖，公买公卖等。在群众大会上，选举了永新县工农兵政府委员，成立了永新县工农兵政府。

占领永新县城后，除我二十八团休整待战外，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永新境内的石灰桥、高桥、象形、天河、南洋等地，分兵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政权，组织革命武装，收缴地主武装。一直搞了二十多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总结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发动群众的结果，扩大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发展了我们的军队，对敌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过去敌人一向轻视我们，骂我们是“土匪”，是“乌合之众”，现在不得不极为重视。因此，“围剿”和反“围剿”之间的空隙缩短了，战斗频繁，我们休养生息，做群众工作的时间就少了。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常常逼得我们一夜要换几个地方。这时，每个人除了背一支枪以外，还要提一个石灰桶子，到处写标语，发动群众，打土豪。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指导组织了许多工作队，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是我们的三大任务。

草市坳战斗——二占永新。

我军一占永新半月之后，五月中旬，江西军阀朱培德的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亲自率四个团，从吉安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剿”，第一攻击目标就是永新。敌人重兵压境，红四军为求全歼敌人，根据毛泽东同志“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主动撤出永新退至宁冈。敌人踌躇满志，洋洋自得，向主子朱培德发电告捷，并将师部和许多军需物资由吉安搬至永新，准备以永新为据点向龙源口、古城、砻市进犯。

我红四军在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指挥下，采取声东击西战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进犯。这一战役共进行了三次战斗。

佯攻高陇，调动敌人为第一个战斗。当时，红四军以三十一团一营攻打茶陵之高陇。那时，三十一团只有一、三营，没有二营。一营营长是员一民，三营营长是武中豪。一营在攻打高陇时遇到优势敌人，不幸营长牺牲。此时，我二十八团奉命驰援高陇，终于打垮敌人，歼敌一个连，缴枪百余支。员营长牺牲后，士气比较低落。朱德同志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他说：“同志们，要振作起来，牺牲一个同志，特别是一个指挥员，是一个严重的损失；但是，我们不能过份悲痛，要化悲痛为力量，因为反动派是不怕眼泪的，他们怕我们这个队伍人人是铁是钢，怕我们人人是指挥员，他们怕什么我们就准备什么，我们人人要炼成铁，炼成钢，炼成一个合格的指挥员，这是我们对员营长

牺牲的最好的纪念。”于是，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决心要打好仗，为营长复仇。

草市坳伏击，出奇制胜为第二个战斗。高陇战斗打响后，敌军退往腰附。在腰附，我们歼敌一个营，把三十一团一营的损失全部补了回来。到腰附以后，朱德同志亲临前线用望远镜观察，他说：“敌人还不是大溃退，种种迹象表明是有秩序的撤退。他们不败而走，其中定有原因，很大可能纠集茶陵之敌今晚向我们杀‘回马枪’，我们要退回高陇，退它三十里宿营。”于是，部队按照朱军长的命令，急速回撤高陇。在高陇接到毛泽东同志一封信，信中讲，高陇战斗伊始，敌军以为红军主力已转向湖南，便对我根据地发起新的进攻，除留一个团守城外，派出两个团进犯，前锋已抵达龙源口。永新城是杨如轩指挥，有一个教导大队，三百多人。高陇到永新城有一百八十多里。敌人新的“会剿”开始了，这里有几个方案供你们选择：第一、你们回到根据地来，我们在根据地跟他打，关门打狗；第二、你们袭击茶陵、酃县的敌人，最后解决茶陵的敌人。他还说，要在外面打，首先要打破湖南的一个缺口，江西我们看守，在新老七溪岭守着。当时，毛泽东同志没有具体指示我们突袭永新城，以解龙源口之危。朱德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高陇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决定奔袭永新城，解除敌人对龙源口的压力。朱德同志说：“打蛇打七寸，打狼要打头。我们就是要打敌人的心脏，打他们

指挥机关，打他们脑袋瓜子，一铁棒把他们脑袋打碎，他们就完了。”同时，指挥我们解决攻城的器具。为了迷惑敌人，以二十九团一部伪装包围龙源口，造成我军困守七溪岭，攻打龙源口的假象。

这时，摆在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怎样补充三十一团的武器弹药。林彪反对补充。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讨论他就是不同意，以行政命他补充，他仍置之不理。他反而说：“现在要比赛，各缴的武器各带，捉俘虏兵也是一样，那个捉的多那个就多补一点。”搞本位主义。我们都不同意他的意见。如果按他的意见办，装备好、战斗力强的部队就装备弹药用不完，而装备差、战斗力弱的团队就永远得不到充足的补充，再说，也不利于团结。这时，陈毅同志出了个主意，他说：“长工啊，召集两个团的士兵委员会开会吧。”当时，士兵委员会是很有权威的，它的成员有一个条件，不当过战士的没有资格参加士兵委员会，更不能当士兵委员会的主任。我们两个团的党代表都当过战士，有资格参加士兵委员会，还可以出任领导。士兵委员会权力不小，开始时，可以打官长的屁股。后来，毛泽东同志讲打屁股不文明，不准打了。但是，干部如果有问题，士兵委员会提了出来，例如，军阀主义有几条，落实后就可以撤销他的职务。经济和伙食士兵委员会也参加管理，经济账目、伙食尾子都公开。

两个团的士兵委员会开联席会议，各连都有代表参加。

朱德同志品质高尚，毫无本位主义。他在向部队介绍秋收起义和干部时，总是强调要加强团结，要消除两军的你我之分。他说：“秋收起义部队，南昌起义部队，各有各的成绩，要互相支援互相学习，分你我不利于团结。今后谁也不要犯本位主义，大家都是亲兄弟。”那时三十一团没有机炮连，我们二十八团大概有八门迫击炮，还有好多轻重机枪，战斗力稍强一些。朱德同志提议要与三十一团战斗力适当平衡，把战斗力稍弱的三十一团、二十九团平衡起来。特别是三十一团，质量是好的，它有大革命、北伐军队，又有平江、浏阳的义勇军、地方武装，三十一团强大起来，对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全局有利。这样，两个士兵委员会做出决定，要补充三十一团武器弹药。第二天早晨，三十一团就搞了一个宣传棚，刷标语，以三十一团士兵委员会的名义书写“感谢二十八团老大哥给我们补充武器弹药，补充我们的装备”。会议决定二十八团给三十一团迫击炮三门、机关枪两挺，成立机炮连。要求二十八团的战士每人拿出一些子弹给三十一团，一颗或一排都可以。那时二十八团同志的弹药也不多，每人百发而已。子弹被战士视为命根子，一是鲜血换来的，二是子弹是杀敌取胜的保障，没有子弹，枪支就不如一根梭镖呢。经过教育大家思想通了，人人献上自己心爱的一发或一排闪亮的子弹，有的还献上了两排。这一举动林彪十分生气，但又毫无办法，这样，仅一天时间就把三十一团补充起来了。第二天下午红军主

力便从高陇向东杀了一个回马枪，一天急行军六十多公里，飞兵里田。此时，我带二十八团三营跟朱德同到草市场。这里距离永新大概十几公里。敌人不明红军主力已返永新，便派七十九团出城向西搜索前进。我们吃过午饭，还未睡过觉，就闻听敌人来了。朱德同志和我商量，我们十个营打他一个团，还是绰绰有余的。尤其有三十一团三营和二十八团一营两个主力，胜利的把握更大。于是，朱德同志让我带肖劲的三营在前头，一营去迂迴包抄。在人民群众支援下，全部人马埋伏在草市场，当敌人进到伏击圈以后，红军战士发起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惊恐万状，即向永新方向逃窜。我军立刻组织密集火力网，将敌包围在草市场的大桥头，激战一个多小时，全歼敌人一个团，缴枪数百，并当场击毙敌团长刘胡子。白军首领一死，指挥失灵，部队一下子垮了下去。我们把刘胡子的兵俘虏之后，即令他们脱下军装尽由我们自己战士穿上，混杂在溃兵之中混入城去做内应，整个部队边打边追，直抵永新城下。

飞兵攻城，再占永新为第三个战斗。当我军飞兵向永新进发时，敌师长杨如轩还在城里打麻将，听留声机，逃兵向他报告说：“刘胡子被打死，团队败北了。”他还不相信，说：“哎！红军是一股小部队，敢打我的一个团。小丑跳梁，小丑跳梁，决不会是红军，他们来不了。”傍晚，红军攻入县城，杨如轩闻枪声大作才惊慌失措，从东城跳墙逃跑时被我军击伤后逃往吉安。我军乘胜出城追击十多



公里，那天一夜未睡。我军胜利进占永新城，消灭敌人一个营，打垮敌人师部，缴枪四百余支，机关枪数挺，迫击炮数门，以及整师的辐重。向龙源口方向运动的敌军两个团，得知永新失守，经拿山向吉安逃窜。在整个战役中，红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远道奔袭，消灭了进犯之敌，攻占了永新城，打伤了敌师长，捣毁了敌指挥部，胜利地粉碎了赣敌对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这次战斗，我们两支部队协同作战彼此更加了解了。原来，我们二十八团有的战士认为三十一团多是学生兵，善辞令，多刁滑；三十一团有的战士则说二十八团有的战士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样子。会师时二十八团穿的不是一身军装，而是杂色衣服，碰上什么布做什么服装，帽子也有软有硬，鞋子有布有草，虽然外观不雅，但能打仗。三十一团的衣服尽管是一色的浅灰色，但战斗力比不上二十八团。这次战斗互相配合，取长补短，仗都打的不错。经过这一仗，大家感到，不在衣服好坏，关键是仗打的好赖，从此，两支部队更亲密了。

我军这次奔袭草市场，二占永新城的战斗，把我军的作战水平又大大提高一步。会师以后，我们两支部队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在朱德同志的指挥下，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讲究“快”，快跑、快打、快结束、快转移。因为我们的队伍小，打了以后，敌人的援兵马上就

要过来。当时，凡是领导者心里都明白，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里，小范围内我们包围敌人，大范围内敌人包围我们；白色区域是个面，红色根据地是个点。特别在初创时期，井冈山的点和其它革命根据地的点尚未取得联系。二占永新城还提高了我们急行军的能力，训练了快速部队，发展了快速战术，飞兵奔袭趁虚而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同志专门进行了总结。以后在打长沙战斗中又活用了长途奔袭，诱敌出城，歼敌主力，化装进城等战术。

#### 龙源口大捷——三占永新。

红军二占永新的胜利和湘赣边界割据局面的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当时，正是南京方面统治集团暂时稳定的时候。于是蒋介石调动湘赣两省的军队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联合会剿”。湘敌第八军吴尚部五个团，企图由茶陵向宁冈推进，赣敌第九师杨池生部、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共五个团，从吉安向永新推进，企图分进合击，攻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亲自部署和指挥了这次战斗，导演出一场以少胜多，以弱击强，灵活机动，威武雄壮的活剧。

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根据敌人“会剿”情况，首先命令红军于五月底主动退出永新城，集结于宁冈休整，伺机歼敌。

湘赣两敌奉命“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慑于红军的声威，不敢贸然出击，湘敌吴尚部住在茶陵按兵不动。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龟缩永新城，不敢前进。为了把躲在永新城里的敌人引出来歼灭，红军经过整训之后，于十月上旬开始佯攻酃县。红军三十一团在酃县虎爪歼敌一个团，我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在酃县云风仙击溃了地主武装会合以后，旋即经虎爪回宁冈大陇集结。这时，赣敌闻讯，以为我军远出湘南，企图乘机“会剿”，占领宁冈。“会剿”的主力是江西的“两只羊”（即杨池生和杨如轩部）。他们原是云南的队伍，装备好，受过正规训练，战斗力强。这次进攻由杨池生担任前敌总指挥，指挥部设在永新城。敌人分两路前进：杨如轩为前线指挥，率领两个团，从白口沿老七溪岭进攻；杨池生部的一个团由龙源口沿新七溪岭进攻；杨池生亲率两个团盘踞永新城。我军侦察获悉敌人进攻方向后，在宁冈新城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围绕着打不打的问题争论十分激烈。我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畏敌如虎，主张不打，我和王尔琢团长主张坚决打。会议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决定粉碎敌人的“会剿”，保卫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集中兵力在新、老七溪岭一带歼灭江西进犯之敌。根据敌情，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及时部署了歼敌计划，决定三十一团一营和二十九团迎击由新七溪岭进攻之敌；我们二十八团迎击老七溪岭进攻之敌；三十二团的一个连埋伏在武功潭迎击敌人。朱德同志为前线指挥，

率领军部直属队和机关枪连、迫击炮连扼守在新七溪岭蛤蟆湖。毛泽东同志为总指挥，部署和指挥整个战役。三十一团三营，在睦村至酃县方向的湘赣大道上，监视与牵制湖南方向的敌人；三十二团对遂川、酃县方向采取佯动。同时发动宁冈等县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红军作战。

六月二十三日，战斗打响了。战斗从清晨一直激战到下午四时，敌人三次冲锋均被我打垮。守卫在新七溪岭上的红军战士，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一直坚持战斗，守住制高点。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朱德同志手提花机关枪（冲锋枪）赶至望月亭，组织力量把敌人压下去了。我们二十八团因路途较远，且有竹木阻路，行军慢了一点，结果，敌人抢先占领了老七溪岭的制高点。王尔琢团长和我率领部队组织三次冲锋均未成功。这时新七溪岭打的比较激烈。十一点多钟，山岭上简直象爆豆一样，子弹好象在脑壳上响。在这关键时刻，我发现林彪把团长王尔琢拉到一边，我很怀疑，心想，新七溪岭打得这样紧张，林彪是第一营，本应很快组织部队全力突破老七溪岭的阵地，支援新七溪岭，老七溪岭比新七溪岭高一点，我们打下制高点，一可支援新七溪岭，二可鼓舞他们的士气。这个时候怎么还犹豫呢！不出所料，王尔琢团长走到我的跟前说：“林彪说，看来新七溪岭已经失守了，枪声已经到了我们的侧翼。新七溪岭一失手，我们将被包围，不如撤退后，再做计议。我没有同意。”我说：“对，撤退就是临阵脱逃，见死不救。”

在友邻部队受威胁时，我们不能直接支援，也要用火力援助。现在只有尽快拿下老七溪岭才能减轻新七溪岭的压力，挽回战斗的危局。”我向王尔琢建议，由我组织敢死队一百多人，带一挺机关枪和一支冲锋枪，分六七拨，每拨几十人，用迫击炮掩护连续冲锋，拿下制高点。团长同意我的建议，亲自组织掩护。由三营长肖劲同志率领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由一营负责追击任务。肖劲同志率领三营战士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冲锋三次终于抢占了制高点，整整激战一个小时。这时，事先埋伏在白口武功潭山上的红军三十二团的一个连，以密集的火攻攻击白口敌前线指挥部。敌前线指挥受到突然袭击，顿时乱了阵脚。我二十八团乘胜直抄龙源口，三十一团和二十九团立即向敌人出击，龙源口枪声大作。在红军前后夹击下，敌人腹背受击，全线崩溃，缴枪就俘。残敌向永新逃窜，红军乘胜追击，第三次占领永新城。这一仗我军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缴枪千余支，取得了龙源口大捷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湘赣敌人的第一次“联合会剿”，也是第四次击溃赣敌对我根据地的进犯，红军乘胜三占永新城。

龙源口大捷后，红军二十九团全部换上了步枪，原有梭镖交给了地方武装。从此，“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真好真好，快畅快畅”的红色歌谣便传遍了井冈山。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永新县禾川中学礼堂召集红四军班以上干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负责人开会。

会议总结了龙源口大捷的经验，研究了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问题。会后立即开始分兵。我二十八团去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去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境。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用大力造成党与群众的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能够做较长时间的抵抗而不伤元气。

回首往事，更清楚的看到，毛泽东同志领导边界军民胜利的作战，是和游击战基本原则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充实分不开的。在创造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始终注重对红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研究。在工农革命军进入湘赣边界不久，毛泽东同志就和部队讲过井冈山“山大王”朱聋子的故事。朱聋子曾说，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强敌相对，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缴获，就象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为红军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在兵力使用上的“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的经验，指出：“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

“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

毛泽东同志不但指导红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总结战争经验，而且善于把战争经验不断升华，形成战争指导原则。在攻打茶陵和攻打遂川的战斗中，在新城和五斗江战斗中，不断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逐步地形成了适应当时情况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龙源口大捷则是毛泽东同志十六字诀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成功运用。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括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括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括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后来，一九二九年五月五日，毛泽东同志代表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对井冈山时期红军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作了如下的概括：“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

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红军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形成，是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原则，结合当时敌我情况在军事上的伟大创举，是对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宝贵贡献。

## 改造俘虏

毛泽东、朱德同志继改造王佐部队的经验之后，又逐渐把它运用到瓦解敌人，改造俘虏及旧军队官兵上来，极大的丰富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内容，加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

我军政治工作有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在井冈山斗争中，我军就十分注意瓦解敌军。改造王佐部队之后，毛泽东同志曾亲自对我说：“长工同志，你不要看王佐、袁文才这么一点儿，要放大起来看。”我们还要把敌人变为我们的朋友，把敌人的敌人也变为我们的朋友。意思是说，改造王佐部队是我军改造旧军队的起点，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将影响整个国民党军队。朱德同志也很注意瓦解敌人，很重视对旧式军队的改造，这一点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完全一致。朱德同志说过：“这是一条战线，是一条既看到又看不到的战线，做得好就看得见。做得不好，就看不见。”



我军对做俘虏工作是很有办法的。《毛泽东选集》里讲到：江西没有省防军，江西民团也比较薄弱。刘士毅等人的队伍，只一两个旅，不象湖南，光民团就可以编十多个师。湖南的民团都是老兵油子。龙岗一役我军俘虏敌人万余人，把他们编成几个“新兵团”，称谓“新同志”，我们要求革命队伍的干部战士不能骂他们，也不能说伤人的话，争取他们在感情上转化、思想上变化。有的虽然受反动宣传毒化很深，我们重点做了他们的工作后，也放他们回去，争取他们在火线上消极也就达到目的了。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瓦解敌军的政策影响下，比如，有一个士兵是湖南人，他先后带过来七条枪，每次我们都给他三块光洋，有一次他对我说：“何同志，我这是第七次了，我背过来七条枪。你们心里可要有个数啊！”我说：“这很好，你对革命有贡献，蒋介石是兵工厂的厂长，又是运输大队长，你这样一连背过七条枪来，蒋介石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说罢我们相对大笑。后来，我劝他当红军，他说：“报告首长，我家有困难。上有老下有小，红军又不是薪饷制，没得办法，当兵吃粮拿点饷，混日月哟！”结果我们又把他放了。在俘虏中士兵可以放回，军官也可以放回。在宁冈战斗中俘虏敌军一个旅长，经过工作，我们也把他放了，对敌人震动很大。

对俘虏的政治和宣传工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打下了基础，到五次反“围剿”时就相当活跃了，比如唱歌，教唱根据地流行的歌，唱活捉张辉瓒的歌，每人至少学会唱五

首。我还清楚记得，在龙源口战斗前后，我编了一首《二十唱》的歌词，经朱德同志修改后，教给俘虏们唱。这个歌子的原始歌词没有了，但我几乎都能背出来。这种歌是利用当时群众流行的一些谱子，我们结合斗争需要填词。别看这些歌子很一般，当时对改造俘虏还起过很大作用呢。下面将根据江西土调编的《二十唱》回忆如下：

国民党是反革命，保护土豪和劣绅，受尽苦  
啊工农兵，哎哟喂哟，受尽苦啊工农兵。

国民革命四十年，天天打仗抢地盘，不革命  
怎得安全，哎哟喂哟，不革命啊怎得安全。

升官发财不要脸，三民主义丢一边，新军阀  
罪恶滔天，哎哟喂哟，新军阀罪恶滔天。

我们工人和农民，莫给军阀去当兵，咱们是  
工农出身，哎哟喂哟，我们是一家亲人。

如今世界大闹翻，无产阶级要共产，俄罗斯  
有好榜样，哎哟喂哟，井冈山走在前。

工人农民暴动起，地主豪绅莫欢喜，打土豪  
分田地，哎哟喂哟，打土豪要分田地。

共同消费共生产，莫交税不还粮，这就是共  
产党的主张，哎哟喂哟，这就是共产党的主张。

三十九军官兵对我讲，士兵半年冒发饷，官  
喝兵血逼送命，哎哟喂哟，官喝兵血逼送命。

红军就是共产党，青天白日反革命。工农

兵认清敌我，哎哟咦哟，工农兵认清敌我。

敌军下级军官佐，带领士兵来投诚，红军里格外欢迎，哎哟咦哟，红军里格外欢迎。

今天打仗要认清，切莫打倒自己人，持枪来免得伤人，哎哟咦哟，持枪来免得伤人。

要把革命挂在心，不怕死来不顾身，干革命多么光荣，哎哟咦哟，干革命多么光荣。

土豪劣绅要反抗，买通军阀害工农，兄弟们莫受利用，哎哟咦哟，兄弟们莫受利用。

红军当兵都快来，官兵发饷一样多，讲平等自由生活，哎哟咦哟，讲平等自由生活。

江西兵少难布防，到处都是共产党，王军(均)才失了主张，哎哟咦哟，王军(均)才失了主张。

共产党来到了，三六九军快起跑，杨如轩带花先逃，哎哟咦哟，杨如轩带花先逃。

广东湖南大举兵，千千万万是红军，总暴动使敌人心疼，哎哟咦哟，总暴动使敌人心疼。

毛委员坐镇井冈山，朱军长指挥打胜仗，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哎哟咦哟，打败江西两只羊。

三六九军真是宝，碰到红军向南昌逃，蒋介石大发牢骚，哎哟咦哟，这疯狗狂吠乱咬。

红军攻势如山倒，朱培德落荒而跑。蒋介石

挥舞战刀，哎哟咦哟，朱培德性命难保。

龙源口大捷中，抓到的俘虏主要由我和杨立三同志负责处理。当时，我们不但教他们唱歌，而且给他们洗脚洗澡，有病还为他们治病，负伤的还请群众带到赣江边用船送去南昌治疗。因为，那时我们的医疗困难，红军受伤后，也要辗转去南昌就医。住了几天后，宣布第二天放行，每人发光洋三块。

这天，天快黑了，阴云密布要下雨，俘虏们怕第二天变卦，乱嚷着要走，有的干脆钱也不要了。由于人多，我和杨立三同志被他们一拥，就拥到龙源河里去了。那天我俩都穿着大衣，准备处理完俘虏后就跟部队转移，为第二次反“围剿”做准备。我们从水里上来，不动气，不发火，继续发钱、发路条。这一下，他们受了感动，不少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发钱时，有的敬个军礼。有的连说：“谢谢！”有的还边走边说：“红军好，够朋友。”不少俘虏和我们还远远打招呼：“红军同志，以后战场上相会。”有的很受感动，钱和路条都不领了，要求留下来。

经请示领导，最后同意，凡是当兵年把的，属贫苦农民出身的，我们接受了不少，主要是张辉瓒部队的。对于三十九军和“二杨”的兵，我们一般不收，因为他们多是“双枪兵”。

在改造俘虏利用旧军官上，我们也有教训。比如，第一次反“围剿”时在龙岗，我们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本来是

不准备杀他的，毛泽东、朱德同志也不主张处决他。准备以他做为向敌人讨价还价的筹码。湖南的鲁涤平，还有程潜、唐生智、何键、谭延恺、范石生等，都背着蒋介石派代表同我们谈判，不要杀张辉瓒，并由上海三家银行作担保。听说要给我们多少枪支，多少子弹，多少光洋，多少担西药等，还有机关枪和迫击炮。我们也派了代表去跟他们谈判。

可是代表一走，群众知道了消息，就开起了大会，坚决要求处决张辉瓒，并派代表找毛泽东同志请愿，要求把张辉瓒拉到会场上去，戴高帽，杀他的头，不杀张辉瓒不散会。不少人哭诉张辉瓒的军队烧了根据地十五公里的房子，杀死无数根据地的人，群众太气愤了。情况突变，当时我负责带部队看守张辉瓒，毛泽东同志就来和我商量，我们感到让张到会可以，但不能杀，建议毛泽东同志不要到会。当时，毛泽东同志决定不参加会，让做好大会的组织工作，不要杀了张辉瓒，因为，毛泽东同志考虑张在湖南军阀中有影响。那时湖南反动军队中有几个派系，主要是，胡宗南的黄埔系，陈诚的保定系，汤恩伯的日本士官系，程潜、唐生智的讲武堂系。张辉瓒是讲武堂兼保定军官系的，抓住对张的处理机会可以利用几个派系的关系，办一些对革命有利的事。另外，看押中，张辉瓒几次找毛泽东同志谈话，称毛泽东同志为润之先生，言谈中也有释放回去之后愿意付出若干代价之意。

那时，群众的政策观念很差，有些干部也有偏激情绪，

尽管会上做了安排，对张辉瓒注意保护，但会议一开起来，就控制不住了，迫于群众压力，到底把张辉瓒处决了。

我们的代表是下午两点钟到南昌的，张辉瓒的老婆在上午十一点钟就到了南昌附近的永修车站。我们代表一到，张辉瓒被处决的消息也传到了南昌，谈判已无意义。当时，我们的代表处于危险之中。于是，我们一方面利用共产国际及苏联和湖南军阀的关系，利用三家银行担保的许诺来帮助代表。我们对三家银行讲，如果我们的代表有损失，那我们的特务队、便衣队就把你们的银行打掉。结果，保住了代表。但是，我们想利用张辉瓒这张牌的打算也落空了，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总之，改造旧的武装、旧的军队，在我军的历史上是有着光荣传统的，当然也有教训，了解这方面的历史，对于了解我党我军的历史是很有教益的。

## 井冈全盛与八月失败

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十分明确地规定了红色政权发展的方针，必须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根据地三者密切结合在一起。他说，有根据地，有计划的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三者密切结合的结果，是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的根本保证。为什么必须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呢？

第一，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以农村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没有武装，土地革命便不能有效地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因为陈独秀放弃对于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所以农民的土地革命也终于失败。同样的道理，没有武装存在，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存在。革命根据地是用武装开辟、创造和巩固的。因此在中国，武装斗争十分重要，要进行土地革命，要建立根据地，必须依靠武装，放手发展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的运用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形成了一整套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极其科学地解决了革命战争初期必须采取的战略防御和最终转入战略反攻的有机结合；与从战术上解决了革命力量在战略防御中如何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创造条件，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以最终转入战略反攻，与反革命进行决战等问题，概括了游击战的经验，总结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十六字诀等。

第二，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红军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援，红军本身也就没有来源，武装斗争就会失败。八一南昌起义的缺憾，正是因为武装斗争没有和农民土地革命相结合。同样，没有

土地革命不能发动农民起来，根据地就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还指出：根据地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很好的群众”。要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就不能离开土地革命。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土地革命问题。可以说，边界的土地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领导的伟大的土地革命运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游击暴动，揭开土地革命的序幕，为第一阶段。一九二七年十月以后，红军在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就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的斗争，扫清土地革命的障碍，为分田做准备，同时又筹款子，解决红军和边界的经济给养问题。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深入边界地区的广大贫苦农民之中，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分析和掌握了边界土地占有状况，农村阶级关系，为土地革命的发动、土地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宁冈坎上一带，深入群众，进行社会调查。一九二八年二月底，他率领部队来到永新县秋溪乡一带进行社会调查，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的斗争。随后，毛泽东同志写下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结果，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边界



各县地主占有土地情况具体如下：遂川百分之八十，永新百分之七十，万安百分之六十，莲花百分之十，茶陵百分之七十，酃县百分之七十。毛泽东同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了湘赣边界农村的阶级状况。指出“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湘赣边界三种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以永新小西江区波阳乡为例：全村二百七十五户，共有土地二千七百四十亩。其中雇农十二户；中农贫农共二百五十户，共有土地五百六十四亩，占全村土地的百分之二十点五；富农二户，共有土地九十三亩，占全村土地百分之二点八；地主三户，共有土地二千零九十一亩，占全村土地百分之七十六点七。由此可见。湘赣边界的土地问题和全国一样，也是极不合理的。土地的高度集中，反映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对立。土地问题是摆在边界党与红军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革命也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条件。无产阶级只有正确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才能彻底扫清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解放，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起来支援革命战争，加强革命根据地建设，建立无产阶级在农村的强大可靠的革命堡垒。

实行土地革命，首先必须领导农民打倒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开展游击暴动，建立农民协会和红色政权，把农

民的权力掌握起来，把土豪劣绅的势力打下去。根据地初创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亲自布置和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攻打茶陵、遂川、宁冈等县时，就建立了暴动队、赤卫队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的斗争，成立了工农兵政府，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这一阶段的土地革命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在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特别是遂川、永新二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成绩都还好。这个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

深入开展打土豪、插牌分田运动，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为第二阶段。一九二八年二月底，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在桂东沙田一带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土豪、插牌分田运动，帮助地方建立赤卫队和红色政权，扩大了革命影响。“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日两度分配土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土地革命必须在根据地内全面开展，才能适应武装割据的需要，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大会后，边界各县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书记的湘赣边边界特委的领导下，县、区、乡都普遍设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从组织上加强了对土地革命的领导。这个时期，红军战争的胜利又推动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可以这样说，每一次战斗后，总是伴随着进行一次土地革命的高潮。据我经历过的几个

大的战斗看就是如此。五斗江战斗后，永新小西江区分了田。草市坳战斗后，宁冈分了田。龙源口大捷后，红色区域迅速推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红军战士遵照毛泽东同志“分兵以发动群众”的指示，分赴安福、莲花、吉安边境，组成小分队，深入农村，广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在永新夏幽一带搞点，总结土地革命的典型经验，指导全局。毛泽东同志在塘边住了四十多天，亲自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还派了很多红军战士下乡加强地方工作。分田以前，以乡或村组织土地委员会。委员会由当地农民协会委员、工农兵政府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组成，调查土地，登记人口，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在做好调查和动员工作的基础上开始分田。分田以村为单位还是以乡为单位呢？开始没经验，以村分田，结果证明效果不好，由于封建宗族关系，容易被地主、富农利用。他们以姓氏封建关系蒙蔽群众，造成假分田；另外，村庄有大有小，大的村庄往往地主多，土地多，肥田多，分配土地时，好的土地仍然落在地主、富农手里，小村庄的贫苦农民仍旧耕种贫瘠的土地。这样，还是满足不了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地主、富农还会利用封建宗族观念，制造矛盾，挑起姓氏宗族冲突，不利于贫苦农民之间的团结。后来，毛泽东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摸索总结经验，改为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才收到了良

好的效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分田运动，在实践中是坚持以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极少数山多田少的地方，如永新小西江区，也有三四个乡为一个分配单位的。土地分配以后，就插上一个分田牌。分田的同时，还开展了废债运动。分完后，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分田胜利。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在白银湖写了分田牌，鼓舞了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

分田运动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千方百计恐吓贫农，延宕分田，隐瞒土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这种斗争同时也反映到党和红军中来，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右的倾向，表现为有的不敢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缺乏斗争的信心，以至分到的土地和财物不敢接收。另一种是“左”的倾向，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使党的组织脱离群众，影响土地革命的深入。在土地革命中，毛泽东同志同党内这种右的和“左”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也纠正了这两种错误倾向实行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争取中间阶级，反水农民照样分田，以及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等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克服“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干扰，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为第三阶段。正当边界土地革命运动深入开展并进入高潮的时候，湖南省委派代表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推行“左”

倾盲动主义路线，干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把红军主力强行拉往湘南，以致给湖南和边界斗争造成八月失败。就在这时，地主豪绅纷纷出笼，反攻倒算，夺回土地，逼债收租，烧屋杀人。当时正是收割季节，由于地主阶级的反扑，眼见丰收在望的谷子被地主豪绅一抢而去，弄得两手空空。这种“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的局面，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给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带来的恶果。在这种严重时刻，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前往桂东迎还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收复宁冈全县和遂川、酃县和永新各一部，领导边界群众夺回了土地，重新进行了分配。并打开了地主豪绅的粮仓，把粮食分给农民。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贫苦农民和革命群众扬眉吐气，当家作主，成了土地的主人。根据地掀起了保卫胜利果实，参军参战，送粮送鞋支援前线的高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的胜利开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使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红军游击战争，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通过一年来的土地革命运动的斗争实践，党和红军取得了初步经验，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土地革命的法令——《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对于废除旧中国极不合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动广大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推动当时的工农武装割

据，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土地革命的经验，这个土地法有它一定的局限性。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在《农村调查》中指出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

第三，根据地是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依靠。没有建立根据地，土地革命就不巩固，不能坚持，武装也就会变成流寇式的武装，不容易和人民群众结合成一体。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不要根据地的单纯武装斗争思想，并常常告诫我们，不愿做艰苦工作和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扩大政治影响的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红军取得龙源口战斗的胜利后，革命根据地巩固了，红军政权建立了，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坚实的堡垒。它包括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等五个县，吉安、安福各一部。在红色地区的土地大部分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此时，不但边界已成立了工农兵政府，宁冈、永新、莲花、遂川也成立了工农兵政府，区、乡的工农兵政府也普遍建立起来。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有赤卫队。革命声势空前壮大，长沙的学生，安源的工人，醴陵的农民以及各地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大批奔向井冈山，甚至白军也成营成连地拖枪前来投降。毛泽东同

志称这个时期为湘赣边界的“全盛时期”。

回顾历史，我感到井冈山全盛时期的形成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正确分析形势，大力巩固发展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建设。当时，正是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期，湘赣两省派来进攻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期达十八个团之多。而我们的兵力不足四个团。为什么边界割据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中还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呢。这就是，边界党和边界特委的政策是正确的。坚定地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进行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的党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的武装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之边界地形有利于斗争的开展，湘赣两省进攻之敌的各怀鬼胎，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又一次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干扰。湖南省委对于边界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一再改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以湖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带着湖南省委于六月十九日给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的

信，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信中说，“以罗霄山脉为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并指示特委、军委积极发展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暴动，造成以工农主力的割据局面。可是第二次杜修经以湖南省委代表的身份，杨开明以湖南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身份，于一月三十日来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声称“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同时，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硬性指示“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面对着错误路线指导下的湖南省委的硬性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在这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前途的严重时刻，毛泽东同志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于六月三十日在永新城主持召开的特委、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宛希先，有我们二十八团团团长王尔琢及谭震林、陈正人等同志以及永新县委的负责同志，袁德生、杜修经也参加了会议。攻占永新后，我们在永新做了两个星期的群众工作后部队就分开了。二十八团在安福、吉安边缘，二十九团在莲花、茶陵方向，三十一团由永新北向安福方向。我带着二营到安福，在安福周围又做了两个星期的群众工作。这时，王尔琢团长开联席会议在永新。我们到永新时，毛泽东同志已在永新开完



了会。我和王尔琢团长当面向毛委员汇报了龙源口战斗经过情况、新老七溪岭战斗情况和各营营长的表现情况。我特别讲到林彪，当七溪岭战斗最危险的时候，贪生怕死，企图临阵脱逃，把部队撤到莲花，我说：“好在王尔琢团长很坚定，坚持战斗到胜利。”随后，毛泽东同志简要向我谈了永新联席会议的精神。王尔琢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会议情况。会议开了一天一夜。白天研究了分兵发动群众及土地革命等工作。夜晚，讨论湖南省委来信，直到深夜才结束。会上争论很厉害，杜修经极力主张红军去湘南，毛泽东同志坚决不同意，他正确地分析了湘赣两省的形势，认为对江西的敌人取攻势，对湖南的敌人取守势，目前还没有任何条件改变这种策略，因此，不同意杜修经打湘南的错误意见，主张红军主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联席会议根据实际情况，摆事实，讲道理，陈述了六条理由：一是“主张建立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四军“不宜轻率变动”。二是“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力厚强，不似赣敌易攻……此时不宜向湘南冲击，反而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遭全军覆灭之祸”。三是宁冈为我军事大本营，山势险要，路通两省，“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四是“现在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挺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

利的把握”。五是“此刻到湘南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不可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界才有法想”。六是“伤兵增至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会议结果，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为绝大多数同志所拥护。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决议红四军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继续巩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为了更有利于革命斗争，不为“左”倾盲动主义者留下口实，七月四日，特委、军委根据六月三十日的联席会议精神，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向湖南省委写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从政治、敌情、军事、地方、经济、伤员等方面列举了六条理由，重申“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之前，尚不能离开宁冈、永新、莲花往湘南”。“决定红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特委、军委的这个报告，既符合组织原则，又旗帜鲜明的抵制了省委指示的错误主张，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为可贵的。

决议是作了，向省委的报告也写了，但是，那个杜修经就是不放松，死拖着我们要打湘南。朱德同志是不同意去湘南的，特别是不主张打范石生。因为范是统战对象，在朱德同志最困难的时候，掩护过南昌起义的部队，还有秋收起义队伍的伍中豪的三营都穿过他的新军服，装备过他们的枪支弹药。范石生那时候给我们东西是冒风险的，

蒋介石查出来是要杀头的。我们二十八团不同意打湘南，王尔琢去开联席会议时，我们就统一了认识，打郴州到赣南就食。那时我们有万把人上井冈山，单靠宁冈受不了，中心地区还有点粮荒，虽然不甚厉害，但时间一长肯定要把老百姓的粮食吃光，尽管部队有些生产，但终非久远之策。我们主张屁股坐在井冈山的边缘，到赣南就食，一有事马上回来。我们开始就不同意回永新，而进军到余口。这样做毛泽东同志是同意的，而且有很好的评价，后来，在《毛选》中也讲到了我们二十八团。但杜修经仍不死心，找到我们发脾气。王尔琢团长拍着桌子骂他：“你这个娃娃，你这个屁股没有收。你懂得什么！你毫不了解井冈山地区的处境，也不听我们的意见，只管拿省委的指示压我们，是什么道理。”我也对他说：“杜修经，如果我们失败了，我非用开水把你煮了不可！”他煽动我们不动，杜修经就利用省委指示，不顾联席会议决议，乘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之机，主张部队不回永新与三十一团会合，而冒进湘南。军委闻讯即召开扩大会议、士兵代表会议，但阻止无效。此时，毛泽东同志又派人送信至酃县指示部队不要去湘南，打了茶陵回宁冈。朱德同志随即召集士兵讲演，多方动员。而杜修经则乘机煽风点火，强迫部队向湘南进发，鼓动二十九团围攻朱德同志，要求回湘南家乡去。“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从而酿成“八月失败”开始的一幕。

原来，这个团大部分干部战士是由湘南暴动出来的。

由于战斗紧张，一时没有混编，还是一个县编一个团，二十九团百分之八十是宜章的。那个时候环境艰苦，很多战士是第一次离开家乡，虽经党组织的教育，家乡观念还很重，曾有“树梢兵”之称，就是说看着家乡的树梢当兵，如果看不到了，就不干了。七月十七日部队开始向湘南进军，从酃县沔渡出发，经资兴向郴州前进。七月二十四日与范敌战于郴州，在那里打垮了湘南反动军队的一个团，攻入郴州。我们团部命令林彪的一营追击敌人二十公里，他不听命令，只追十公里就跑回城里住进了小洋楼，穿起了西装，享起了“洋福”来了。此役共缴枪二百余支。此时，二十九团到郴州，部队就不听招呼了，特别是在二十九团一个营长叫朱仙峨的煽动下，围住朱德军长提出要回乡的要求。有的说：“我们离家一眨眼就是一年了。树随山栽，人随田转，我们要请假回乡收秋。”“春起秋头，累死水牛。这个时候不回去，一家老小怎得活哟！”有的还起誓发愿地讲：

“军长，给得我们假日，忙得收秋，我们立即归队。”个别战士还骂叽叽地说：“不批得假期，我也得回去，不信能砍我脑壳！”我们二十八团团王尔琢政治上很强，军事上也好，又是二十九团来的。当他听说二十九团部分干部战士包围军长硬磨着回家的情况时，正在吃饭，一气之下摔下饭碗，大声喊道：“党代表，吃过饭后集合。”我说：“集合干什么？”他说：“我要缴二十九团的械。朱军长讲话时，他们包围朱军长，要求军长下命令让他们回宜章，你说荒不荒

唐！”我说：“错就错在当初没有各县混合编团，一个县编一个团最易引起农民的乡土观念。现在二十九团百分之八十都有枪了，战斗力也很强，这干不得。”我接着又问他：“朱军长怎么说的？”他说：“朱军长让我下来和你商量一下。看怎样处理好。”我说：“不能硬缴枪，否则要打一场恶战，那不就是红军打红军吗！白军一定会攻击我们内讧，把自己的军心、团结都打散了。最好开个连长、指导员联席会议，讨论讨论，做他们三天思想工作，说服他们。”我们统一意见后，尚未和朱军长报告。下午四五点钟就听到了由于林彪追敌不远，敌人经过休整之后，反扑过来了。我们紧急商量后，认为敌人已在郴州河拉开了打的架势，我们立足未稳，交火肯定吃亏。于是，决定赶快撤退，不跟敌交锋，边撤退边向军部报告。天将麻麻亮，我已经通过了郴州河。二十九团是从桥上通过的，军部命令他们撤离郴州，过郴州河东十几公里的地方集合，避免打村落战。如果敌人追击，我们打野战有把握，如果打城市村落战，街道复杂，搞不清楚，不利于作战。由于战事匆忙，失去了深入作二十九团工作的时机。他们趁撤退之机，一反军部指示精神，径直朝宜章撤退。当时，湘南暴动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把这一地区当成了“暴乱区”，三天一搜，五天一“剿”，搞得田园荒芜，断壁残墙。人民群众吃菜不敢入园，收割不敢下地，整个湘南被敌人控制了。别说分散回乡，就是一支小的武装进去也无济于事。结果，二十九团到宜章境内，不

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袭击，大部分被打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措，当日收拢不足百人。团长胡少海及党代表等三人很坚强，把团部直属队一个警卫连带回了井冈山。三天以后，肖克同志也在克服重重困难后，把他所在的连队拉回根据地。当时，毛泽东同志表扬他说：“肖克同志是有功的。”

所谓“八月失败”实际上是两处失败。一处是赴湘南部队本身损失一个团，只剩下两个连；另一处是边区的失败，因为那时红军大队正由宁冈进攻酃县、茶陵，并在酃县变化折赴湘南。而江西敌人第三军王钧、金汉鼎部五个团，第六军胡文斗部六个团，协力进攻永新。此时，我军只有一个团在永新，在广大群众掩护下，四面伏击，将敌十一个团围困在永新附近十五公里内达二十五天之久。最后因敌猛攻失去永新，随后又失去莲花、宁冈。这时，江西敌人忽然发生内讧，胡文斗的第六军仓皇退出，随即和王钧之第三军战于樟树。留下的赣军五个团，亦仓促缩入永新城。如果我军大队不往湘南，必能击退该敌，使根据地不但不会丢，反而能扩及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可能的。

八月失败以后，红军大队正在永新，毛泽东同志闻讯后，亲自率伍中豪一营兵力往湘南桂东方向，迎还红军大队。我们二十八团走到沙田附近肃反，把周才兴、朴辛田、戴或丙三个营级干部枪毙了，因为他们鼓动叛变，制

造分裂。我是军委委员，枪毙他们是经军委会议决定的。但是，我们也吃了亏，二营长袁崇全隐蔽得很深，他争着作前卫，然后，借机蒙蔽二营一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迫击炮连跑了。并送给我们一封信，署名的有七个人。信中除咒骂党和红军外，指名要枪毙我们几个人。更可恶的是把朱德、陈毅同志列入除掉的对象。朱德同志指示说：“长工啊！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七个败类抓回来，把受蒙蔽的部队引导回来，只要我们想办法点破袁崇全的阴谋，士兵们会觉悟的，一定会反戈一击”。于是，我们带上林彪的一个营和教导队三百多人去追，一直追到恩顺，天都亮了。王尔琢指挥部队包围了村子，并要亲自带通信员去看看。我说：“不行，等天亮以后，我们派人去联系。过去这帮贼子是红皮白心，现在成白皮白心更歹毒了，弄不好他们凭屋而守，我们毫无戒备的上去怕要吃亏。”王尔琢团长胆子大，说：“没事！”于是，我也就跟他上去了。这时天还未亮，看到前面有所房子，王尔琢同志大声呼喊起来：“喂！你们是二营的吗？我是你们的团长王尔琢，我同党代表来接你们来了。”这时，袁崇全从屋子里开了枪，当场把王尔琢同志打死了，随后他们落荒而逃。经过喊话，两个连全都归回了本队。在这次湘南八月失败中，王尔琢同志的牺牲，是最使人痛心的一个大损失。

失败是成功之母，“八月失败”后在桂东城西唐家大屋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交换了分兵

以后的情况，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分兵向湖南冒然挺进的错误，决定重回井冈山。取得了一战遂川城，占领遂川；二战坳头垅，恢复宁冈全县；三战新城和龙源口，进占永新的三战三捷的胜利。随后恢复了井冈山，开始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工作，并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在宁冈县步云山召开了湘赣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巩固了军事根据地。这次大会上我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悲观主义，再一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就是这个决议案的一部分。大会讨论了如何巩固根据地；讨论了土地问题，并通过了《井冈山土地法》；讨论了《工会组织法》和整顿党的组织等问题。大会选举了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朱昌偕（永新县赤卫队党代表）、刘天干（永新县委书记）、园盘珠（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谭思聪（茶陵特区区委书记）、谭兵（酃县人）、李却非（酃县县委书记）、朱亦岳（莲花县委书记）、袁文才（三十二团团长）、王佐农（遂川人）、陈正人（遂川县委书记）、宛希先（曾任前委、特委委员）、王佐（三十二团副团长）、杨开明（湖南省委特派员）、何挺颖（三十一团党代表）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委员。谭震林同志为书记，陈正人同志为副书记。



大会根据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分析，确定边界党的中心任务，准备打破敌人的第三次“会剿”，进一步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边界党的“二大”不久，即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六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重新组织了以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为书记。前委统一领导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前委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边界党的“二大”之后，又较好的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悲观主义，挽回了“八月失败”的影响。根据“二大”确定的中心任务，井冈山军民立即紧张行动起来，巩固军事根据地，建立坚实的军事堡垒，迎击敌人的重兵“会剿”，保卫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

## “双枪兵”的变化

一九二八年八月失败之后，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正确指挥下，自九月以来，我军进占遂川，回师井冈，收复宁冈全县，形势又逐渐好转。

这时，我带二十八团第一营在桂东县城周围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不久奉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指示，迂回赣南，准备搞些补充，缴点枪支弹药，扩大一下红军。我部进至大汾、左安一带，宣传群众，张贴标语。于九月

底的一天，驻桂东沙田村的毕占云一个营，举起义旗，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投奔我军来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说的：“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

毕占云原系川军向成杰部，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挡红军进攻湘东南，临时调归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阎仲儒旅指挥，驻桂东沙田。毕占云深受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来到这里，又受湘军歧视，对湘军心怀不满，对我们红军有一定的认识，尤其是朱德、陈毅同志在川军中的影响，官兵们想找出路，再加上我们在桂东的宣传，书写标语，大讲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因此，他们同我们打起仗来，只是消极应付。在一次战斗中，我们俘虏了他一个连。根据毛泽东同志优待俘虏的政策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我们对他们不仅不打骂、不侮辱、不杀害、不搜腰包，还特地杀了一口猪款待他们，经过三天教育后，就让他们回去了。“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他们回去之后，不仅揭穿了湘军对红军的诬蔑和欺骗宣传，而且还当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都说红军好。有的甚至还跑到毕占云那里劝其反水，参加红军。毕占云身为营长，虽饱尝军阀们大鱼吃小鱼之苦，但一下子拉到红军这边来还瞻前顾后，举棋不定，正在他走钢丝的时候，朱德、陈毅同志指示我给他写信，申明大义，晓以利害，劝其早日起义，弃旧图

新，站到人民这边来。当他接到信的第三天，就带一个营的人马起义参加我们的队伍了。

接着滇军张渭，因受了朱德同志在滇军中的影响，从江西的樟树镇也带一个营起义到我们这里，后来编为红四军的独立营。

对于他们弃暗投明，毅然起义参加革命，加入红军，我们军民由衷地欢迎，热烈祝贺这支部队的新生。但是怎样改造他们呢？这在我军初创时期，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毛泽东、朱德同志决定同我们一起，参加变革如何把起义部队改造成为真正工农红军的实践，并把这一具体任务交给了我。

一天，毛泽东同志找我去，说：过去你在洞庭湖区搞农民自卫军时，改造过湖匪武装，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又改造过王佐部队，积有点经验。这次的任务还是得由你来完成喽。一听说叫我完成这一任务，心里着实有些发愁。我沉思片刻，把两手一摊，说：不好办。王佐部队和毕占云、张渭起义部队不同。王佐同志的部队是被逼上梁山的绿林好汉，底子素，好改造。而这两支部队，除少数兵痞外，他们虽然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生活贫苦，有的被生活驱使，卖身当了雇佣军；但大部分是被国民党抓来、逼来当兵的。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此话虽不全面，但这是对旧军队的写照。特别是吸食鸦片成风，不少人成为“双枪兵”，使他们由旧变新，由白

变红，转变他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成为真正的工农红军，对我们来说这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同志笑着坚毅地说：“难是自然，万事开头难”，“我们要走出一条改造起义部队的路子来”。

我受领任务之后，着手对这两支部队的改造工作。几天以后，毛泽东、陈毅同志又来到我们营地。一见面我就叫起苦来，说：“这些兵油子到底要不要？我还是那句话，难改造。”毛泽东同志听后严肃地说：怎么不要？人家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起义是义举嘛，不要就不好了。不要是消极的，要积极改造，若改造不好证明我们没本事。马克思曾经讲过，改造社会的同时还要改造人，这是与我们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相一致的。当然改造是艰巨的，可是要记住，中国有三山五岳，地方部队、山大王多得很，对这部分人的工作做好了可影响一大片。改造这支部队的经验，将来，以至全国解放后，都是有用的。

我思想上通是通了，但怎样改造呢？我建议说：“把这伙烟鬼关他二十天，烟枪缴掉算了。”毛泽东同志摇了摇头说：“那还行？那样办说明我们和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什么区别了。是说服还是压服，两种办法，两个前途。”于是他和陈毅同志坐下来跟我商量怎样改造这两支部队，以及改造的具体办法。毛泽东同志说，你当戒烟“所长”，从戒烟入手，在思想上打通。为此，必须讲清我军的性质和任务、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这样从根本上提高觉悟，转变他

们的立场和世界观。这时，陈毅同志插话说，对抽大烟还可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多弄点烟叶子，逐渐取而代之。同时，多搞点文体活动，这方面的时间多了，想抽烟的时间就少了。

“是说服，还是压服，两种办法，两个前途”。毛泽东同志的话，使我沉思在改造王佐部队的回顾之中，在毛泽东同志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对王佐部队改造的胜利，激励着我去完成改造这支旧军队的任务。我按照毛泽东和陈毅同志的指示和过去的经验，开始了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开头一段还好，过了些日子，不少人的大烟瘾犯了，哭声连天，喊叫不已。有些烟瘾特大的，还跑到我面前苦苦哀求：“让我吸一口大烟，死了也不冤枉。”我说：“死要死得光荣，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不能带着烟鬼的臭名死掉。现在觉得苦，等以后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而受到人民的欢迎时，就会觉得甜了。这一难关一定要突破！”我们把住戒烟这一关的同时，还注意改善伙食，增加文体活动时间，动员干部带头戒烟，同时特别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把时事政策教育作为中心的一环来抓。此时，陈毅同志亲自给部队作形势报告，对大家教育很深。我们还讲了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商业政策等等。到农村，请老农讲阶级教育课，弄清苦根甜源。这样一来，政治思想教育如春风化雨，点滴入土，使大家心地豁然开朗，把吸大烟与不吸大烟提高到了红、白军本质不同上来加以认

识，人民的军队只要手中的钢枪，不要自杀的毒枪；鸦片枪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而只能招致失败。随之，其他劣根陋习也逐渐被改造。

为了把这两支部队彻底改造好，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们把部队拉出去，在行动中改造，在斗争中锻炼，在群众中受教育。这样内外夹攻，上下结合，使其加速改造进程。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指示我带这支部队去莲花县黄陂九都，迎接平江起义的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领的五军一部分同志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于是我们利用部队经过毛泽东同志亲手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来教育大家。部队每经过一个地方，我们都把这支特殊部队的情况告知地方党组织和群众，让他们帮助、教育这支部队。当经过三湾时，群众争相慰问，犒劳部队。有的群众还讲述了他们以三岁伢子去换五斗谷的悲惨事例，启发和教育我们的部队，勉励我们保卫好红色政权。人民群众语重心长的话语，滋润着每个战士的心田。毕占云同志还在这里讲了话，他激动地说，我们是起义过来的部队，也要在这著名的三湾改编，在这个开始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基础的地方使我们新生。广大干部战士也深感红军和白军的本质不同，于是他们逐渐地扔掉鸦片枪，克服各种恶习。

接着又在莲花的路口打了一仗。原来这里麇集着永新北乡和莲花的反动靖卫团，据莲花县委书记朱亦岳同志报

告，有三百余敌人。我说蛮好的，这是在斗争中改造部队的好机会，也是对部队初步改造成果的检验，对送上门来的“肉”，不“吃”就不好了。我们合计了一下实力，加上赤卫队共有800余人，决计打他一下。当即作部署，战斗从拂晓发起，没多久就解决了问题。大家战斗英勇，首战告捷。既消灭了敌人，又锻炼了部队，还甩掉了烟枪。但不幸的是莲花县赤卫大队长夏炎同志，以身殉职。我们正在开追悼会，忽接哨兵跑来报告，武功山那里黑压压的来了队伍。我们正在诧异，……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来迎接的彭德怀、滕代远同志所率领的红五军上井冈山的部队。次日夜晚，我们假打莲花县城，牵制了敌人，掩护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领红五军上井冈山。

十二月中旬，我们接到毛泽东同志的信，说红五军已到达宁冈新城，要我们回去参加红五军与红四军的会师联欢大会。此后，为了进一步改造这两支部队，毛泽东同志在百忙中，还亲临部队作报告，用深入浅出的道理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分清敌我，从根本上提高觉悟。

就这样，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关怀和指示下，使这两支部队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毕占云、张渭部队分别编为红四军的特务营和独立营。在以后的征战中，为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和开辟湘鄂赣以及建立中央苏区的过程中，都凝结着这两支部队的血和汗。张渭在红四军下山去开辟赣南根据地的途中，不幸为国捐躯。在长征中不少同志成为红

军干部。全国解放后，我和毕占云（当时已是中将）在北京久别重逢，我们回首往事，感慨不已。他十分感谢党对他们的教育，使之迈向革命的道路。

## 井冈山保卫战

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边界形势很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了不断巩固和发展。

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编成的红五军主力，经过三个半月的艰苦转战来到这里。毛泽东同志派我率部队接应他们上井冈山，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抵达砦市（宁冈），与红四军胜利会师。之后，两军召开了庆祝大会。这是继毛泽东同志与朱德、陈毅同志率部在这里会师之后的又一次会师。从此，湘赣边界斗争的声势蔚为壮观，红军的力量更加雄厚了。

我们的力量越是壮大，反动派越是坐卧不宁，视作心腹之患。于是蒋介石之辈新军阀更慌了手脚，急调湘粤赣三个省的反动军队，共有十八个团的兵力，其中湘敌主力十二个团，以何键为总指挥，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反革命“会剿”，妄想一举把这面飘扬在井冈山的红旗砍掉。

在形势日趋严重的时刻，党的前敌委员会业已恢复，



毛泽东同志仍为前委书记<sup>①</sup>。前委对于粉碎敌人的“会剿”，曾进行了多次研究。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在宁冈县柏露村一个书院里召开了由前委四军军委、五军军委和特委的联席会议，或叫前委扩大会议，因在柏露村召开，又称“柏露会议”。我参加了会议，记得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军委和特委委员；边界各县委书记和有关负责人；红四军团以上干部也参加了会议，共有六十人左右。会议除通过毛泽东同志写给党中央的关于《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之外，着重研究了如何粉碎三省敌人联合“会剿”问题。在会议期间传来了在莫斯科郊区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在讨论制定反“会剿”作战方针时，会上发言热烈，各人发表各人的看法。有的主张仿照从前粉碎敌人“会剿”的办法，集中兵力猛攻一路，消灭一股敌人，其他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但这次和以前不同，敌人来势凶猛，多路进攻，力量比我们多几倍甚至十几倍，而且武器装备比我们优越，这样做恐难奏效，对我们反“会剿”不利。有的则主张让敌人占领我们的根据地，我们转到根据地外线去，敌人闯入根据地，会感到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又因地形不熟没有群众，变成聋

---

① 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任命毛泽东同志为前委书记。翌年三月上旬，因湖南特委的意见而取消前委，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八月部队经湖南时，组成湖南省委任命之前委，陈毅为书记。湘南八月失败之后，取消前委，组织行动委员会，十一月又恢复了前委，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

子和瞎子。我们择其弱点伺机不断袭击之。可这样根据地就会遭到烧杀淫掠的严重破坏，得不偿失，我们就会失去有利地形和同根据地人民的密切联系，也不妥当。还有的主张凭借有利地形死守井冈山，不但有红军的英勇善战，而且又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坚持死守到底，同敌人作拼死的斗争。但这种办法也行不通，固然可借井冈山的五大哨口踞险而守，然而，范围不大，而我们的人又很多，施展不开，日子一长，枪弹和生活供给都会成问题，万一被攻破了，没有退路。

毛委员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详细地分析了各种情况后，他综合大家的意见认为，井冈山这块根据地一定要守，不能轻易丢失这面红旗，但不能死守，要采取积极行动，要善于钻敌人的空子，敌人大军围困井冈山，必然前重后轻，后方空虚。就有隙可乘。他说：“我们的办法是，一部分守山；主力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敌人从这边打进来，我们从那边打出去，打他一个‘太极拳’。这样就牵制了敌人，分散了他们的精力，使之顾了这边，顾不了那边，敌人不但不能消灭我们，反而给我们一个机会，发展新的根据地。这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南方起云有北方，条条道路通胜利，就看走得对不对。”毛委员这一英明论断，得到全体同志赞成和拥护。

怎么打的方针已经确定，但是主力向哪里出击，到什么地方发展？又成了会议争论的中心问题。当时有人提议

到湖南去，有人提议到湘赣边界去，也有人提议到赣南去。对这些问题，在争论中毛委员也作了具体分析。他认为湘敌强赣敌弱，群众斗争受到摧残；革命处于低潮，交通方便，敌人易于聚集，不易前去；湘鄂赣距大城市较近，在武汉、南昌、长沙的中间，东有赣江，西有湘江，南有株萍铁路，北有长江，敌人运输方便，地区太狭小，我军难于周旋，到那里去也很危险；赣南地区广大，有九连山和武夷山脉作屏障，我军可以迂回转战于赣南、闽西、粤北广大地区，那里物产丰富，有足够的给养供应，而且山岭河川交通不便，敌人来往困难。况且赣敌较弱，又多是客籍军队。本省刘士毅部已经几次被我们打败，战斗力不强。再说，赣南、闽西一带受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容易发动，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有较好的基础，党的领导力量强；赣东北有方志敏红军；赣西南有称“小井冈”的吉安、东固，并有红二、四团可以互为犄角。根据这些情况衡量利弊，会议一致同意到赣南去。既要守山，又要到赣南去，这样就决定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向敌后出击，实行“围魏救赵”，并可相机发展和扩大新的革命根据地，在发展新区中求得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江西敌军已集结于永新；湖南敌军已集中在茶陵等处，准备向井冈山进犯。形势更为紧张。前委要求红五军接替红四军在井冈山的防务，红四军抓紧下山的准备工作。为保卫井冈山，掀起了一个备战、练兵和向山上运粮的热潮。朱德、毛泽

东等领导同志也和大家一样，向山上担粮食，“朱德扁担”的故事，就是这时传开的，至今成为人们颂扬的佳话。经过备粮、整训和战场的准备工作，红四军一部分队伍先行向井冈山南侧的大汾、大坑出发了。一月十三日，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前委又在下庄召开扩大会，朱德、陈毅、谭震林、陈正人、邓乾元、彭德怀、滕代远、邓萍、贺国忠、张纯清（刘宗义）、艾成斌、我和袁文才、王佐都参加了，因形势吃紧，只开了一个多小时的会，没时间讨论，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对井冈山的斗争又作了安排。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前委“柏露会议”的继续。本来上次会议决定要红五军守山，但由于红五军到来不久，对井冈山地形不熟，情况了解不多，不好开展游击战，对守保井冈山有顾虑，会议决定从红四军中留下一些部队协助守山。于是，留下红四军王佐三十二团。这个团大多数是大革命时的农民自卫军，土生土长，对井冈山的情况非常熟，除袁文才跟红四军走外，全部留下来，归红五军统一指挥。张子清同志对井冈山情况也熟悉，在人们心目中有一定威信，又因他腿部受伤，行军不大方便，留下来任边界特委副书记。特委书记是邓乾元。我当时是二十八团党代表，原来准备随红四军行动的。可是，红五军被决定留下来守山之后，彭德怀同志提出：“要五军留下可以，但必须把何长工留下。”这样就在会议上来了个“两何对调”，即把我调到三十二团任党代表，把何挺颖调到二十八团。在决定去留的时候，

我故意用手撑着半个脸坐着没有讲话，怕把我留下来，但还是被毛委员看见了，他朝我说：“长工同志，不要蒙着脸，你也留下来吧。”没有办法，我只好笑着说：“为革命扛长工嘛，什么担子都挑起来。”于是，他任命我为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三十二团党代表，并参加特委常委工作，指挥湘赣边界六县赤卫军，在山下箝制敌人，破坏交通，打击来往的敌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山上斗争互相配合，共同完成保卫井冈山的战斗。

山下六个县是指宁冈、永新、莲花、遂川、茶陵、酃县，还有桂东、攸县、安仁、资兴四个边缘县，方圆近千里。过去我个人虽然单独完成过联系南昌起义部队和迎接平江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及改造王佐部队等任务，但眼下要组织这么多县农民武装，坚守井冈山，对于我来说是个新的严重考验。我感到担子很重，就悄悄地和毛委员说，这个任务很艰巨，我担心完成不好，还是让我在二十八团随四军下山开辟新区去吧。再说，井冈山已有了特委，为什么还要中心县委呢？毛委员亲切耐心地对我说：“彭德怀同志要你留下，就说明了解你，信任你，知道你对井冈山情况熟悉，跟王佐合得来，又有相当的组织能力，你应该勇敢地承担这个光荣艰巨的任务。井冈山特委现已名存实亡，谭震林、袁文才两同志要跟随四军行动，宛希先同志已调赣南，张子清同志负伤，常委中只有邓乾元同志一个人，中心县委就是起特委的主要助手作用，领导各县党组

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展武装，战胜敌人。过去交给你单独完成很多艰巨任务，都完成很好，相信你这次也会完成得好。”他的一片热心的教导和鼓励，给我增加了信心和力量，我愉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彭德怀、滕代远同志要我在山上停留一天，参加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彭德怀、滕代远、贺国中、王佐、我和各大队长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到半夜。主要研究怎么守山问题。会上他们都很担心，提出万一守不住怎么办？我当时没有正面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而首先给他们分析了敌我情况。指出，虽然这次三省敌人受蒋介石的重金收买，对我根据地发动“围剿”，兵力装备对比，敌人占绝对优势，但敌人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是永远不可调和的，这一次三省敌人必然各保实力，互不协调；而我们红军在井冈山经过短期训练，军政素质比以前大有提高，更重要的是井冈山根据地经过两年多的建设，毛委员总结的五个有利条件现在又有了发展，各县的农民武装已经组织起来，人民群众真心地支援红军，山上有王佐给我们作向导，山下我为你们设好营，为你们准备好吃的住的，每个点用藤子编圈做记号，并派有联络员，随时接待你们，我们是军民同心打击敌人。再说，敌人由远道而来，是疲劳之师，到根据地后必然交通补给困难，人地生疏，就象盲人骑瞎马，一个个都变成了聋子瞎子；而我们养精蓄锐，人熟地熟，井冈山象绿色的海洋，我们就好比潜艇，任我

们自由地游弋，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敌人在明处，找我们找不到、打不着；我们在暗处，想在哪里打它，就可以在哪里打它，愿意怎么打它，就可以怎么打它。使他们处处挨打，日夜不宁。这样，敌人就是上了山，最多一个星期，也就不战而垮，主动撤退。我们一定要让敌人背着枪来，交了枪走，有来路，无去路，保证我们的伤员、仓库安然无恙，使井冈山这个革命根据地永远飘扬着革命的红旗。我就这样巧妙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们听了我的发言，也就释疑不再说什么了。会议还研究了一些具体部署。

红四军走后，红五军和井冈山人民群众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备战工作。一切为了保卫井冈山，一切为了粉碎敌人“会剿”，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中心问题。同志们早晨操练，上午挖工事，下午到山下背粮，晚上每个人都削上几个竹钉，不怕劳苦，不辞艰辛，整天整晚地工作。不几天，粮食背足了，工事筑好了，一些重要哨口的周围，钉成一道几十里路长的竹钉防线。

井冈山四周高山环绕，地形非常险峻，只有五条羊肠小道可以通向山外。五条小道上各有一处天险，这就是桐木岭、黄洋界、八面山、金狮面、朱砂冲。当时，我们凭险进行了军事部署：红五军李灿和张纯清同志率一大队坚守黄洋界；贺国中同志带领八、九大队坚守白泥湖；彭宝才和李克玉同志率十大队守八面山；黄龙同志带领十二大队守金狮面；王佐率三十二团一部守朱砂冲。

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齐集井冈山山下，封锁了所有通往山上的道路。一月十七日战斗打响了。敌人分路向井冈山猛攻，湖南敌人以两个师的兵力猛攻黄洋界和八面山，我们每处的兵力最多不超过两个连，凭险抵抗。敌人仗着人多势大，用猛烈的炮火轰击一阵后，便组织冲锋。我们的战士则岿然不动，沉着应战，看着敌军士兵们在反动军官的逼迫下，拖着疲惫的双腿，气喘吁吁地冲上来。敌人冲到竹钉防线边沿，看到遍地竹钉象刀山一样，密密麻麻锋利无比就胆寒了，再也不敢前进，有的慢慢地往后退缩。敌军官见此情景，就象疯狗一样咆哮着：“冲呀！冲呀！谁退缩就打死谁。”敌人在军官的威迫下，一步一步地走进了竹钉阵地。这时，我们的大队长一声命令：“打！”短枪、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子弹象雨点一般射向敌人。敌人陷在竹钉阵内，跑不得，爬不得，稍一转动就被刺得鲜血淋漓，疼痛难忍，叫苦连天。疯狂的敌人一天组织好多次冲锋，每次冲锋都是留下一大堆死尸抱头鼠窜而逃。敌人遭受惨重的失败后，又集中炮火，进行报复性的轰击，而我们的阵地始终屹立在敌人面前。

战斗持续了七天七晚，敌人无法得逞，一筹莫展。那年的冬天，整天是大雾弥漫，五十多米以外就看不见人影。敌人在山下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迫使一个当地富农带路，趁大雾茫茫的天气从捉“石拐”（一种小动物，能食用）的小路包抄黄洋界哨口的后路，致使黄洋界阵地失陷。



接着于一月二十八日早晨，八面山峭口的木排工事也被敌人用大炮轰塌。十大队被压在下面，只有二三十人冲出，八面山也相继失守。八面山是井冈山的门户，敌人占领了八面山，可直下大小五井，夺取井冈山的腹地茨坪。我们正在组织兵力和敌人展开浴血的战斗，忽然听说敌人从黄洋界的后面抄上来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再和敌人拼下去是对我们不利的。毛委员经常教育大家，打仗主要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在于保守或夺取地方，“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有了人力，什么情况都会转变的。为了保存实力，红五军领导立即决定主力撤出井冈山，留一部分人打游击，与敌人周旋。

红五军三个大队齐集时，井冈山的人民也汇拢来了，他们把准备过年的鸡、鱼、肉、蛋等所有能吃的东西，都送给红军，他们说，这些东西同志们能带走的就带走吧，我们的东西一点也不能留给敌人。井冈山的人民在保卫井冈山的斗争中，表现了英勇顽强的精神，不论男女老幼，都全力投入支援红军的战斗，和红军并肩杀敌，修工事、运军火、送菜饭、抢救和看护伤员，红军在哪里就支援到哪里，在这紧急的关头，还是那么沉着坚强。他们说，同志们放心走吧，我们一定坚持斗争，等你们回来。他们还向我们表示，请告诉毛委员，井冈山的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毛委员与敌人战斗到底！红军听了这些话，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真舍不得离开这块红色根据地，舍不得离开

毛委员亲自教育的可爱的人民。但是，为了党，为了革命，为了将来的胜利，我们不得不挥泪而别。

四面道路都被敌人封锁住了，红军在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引导下，爬悬崖，走绝壁，过深谷，越鸿沟，辗转到了遂川的大汾镇，在这里一鼓作气冲跨了敌人两个团的兵力，突出了重围。

驻守在下庄、小行洲一带朱砂冲哨口的红四军三十二团的一部，在王佐带领下，由茨坪、草坪撤入金狮面的森林里，坚持游击战斗。

当时，在茨坪附近的老仙崖，关押着一百来个从各地捉来的土豪劣绅。这些反动家伙听见反动派进山就幸灾乐祸起来，以为有了救星。我们看守这里的两个班，二十几个红军战士，坚决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押着其余六十多个土豪向大森林转移，在路上碰到了闯过来的一股土匪，便以一个班阻击敌人，经过英勇奋战，打退了敌人，安全转入了金狮面，和王佐部队会合。

井冈山的人民群众在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下，全部进入深山，把粮食和一切能带能吃的东西都带走了，带不走的也都埋藏了。

奋战在黄洋界哨口的两百名红军战士，处境是非常艰险，前面要受一个旅的敌人攻击，后面又有大量偷袭进来的敌人截住退路，左右两边是绝崖陡壁，下面是万丈深谷。在这千钧一发的严重情况下，在李灿和张纯清同志领导下，

一面抗击前后夹击的敌人，一面解下每个人的绑腿，结成长绳，顺着长绳一个个从悬崖滑下撤出阵地，钻进深山岩洞，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才和在外围打击敌人的三十二团的队伍会合了。

敌人调动湘赣粤三省大军围攻井冈山，满以为可以消灭红军，哪知消耗了好几个团的兵力后，所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山。敌人计划失败了，于是便进行报复性的残酷屠杀。敌人象疯狗一样叫嚷：“石头过刀，茅草过火，人要换种。”他们见人就杀，小井红军医院来不及撤走的手无寸铁的一百多名红军重伤病员被集体屠杀了。老百姓的房子也被烧光了。敌人的残酷罪行，更加激起人们的仇恨，复仇的火焰在每个人的心里燃烧。

撤到深山的几支红军会合后，李灿和我以及王佐等几个同志负责领导，进行了游击斗争。我们以班为单位，出没于森林峡谷，不断地打击敌人。山上的游击队、赤卫队、暴动队也配合行动。我们地形熟、动作快，整天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转来转去，一有机会，用闪电战、麻雀战的方法，突然袭击一下，给敌人以杀伤后，马上转移到别的地方。我们看得见敌人每一个行动，敌人却摸不清我们的底细。我们当时的方针就是：避开敌人的主力，打击和消灭零散敌人，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以多胜少。对付三个一群、五个一股的敌人，我们就集中几个班的力量，选择有利条件，诱敌深入，象捉迷藏一样，弄得敌人晕头

转向，最后把他们吃掉。这样，小股敌人不敢随便流窜，而大队敌人耳目不灵，消息不通，又找不到我们的目标，有力无处使。

对于驻扎的敌人，我们的办法是不让敌人有片刻的安静，敌人扎到哪里，我们就扰到哪里。有时在敌人面前故意暴露目标或袭击一下，愚蠢的敌人便穷追猛打，等敌人追远了，我们再悄悄绕到敌人后面，在敌人的老窝里，杀他个落花流水。有时我们在山上选择一条死洞，燃起一堆大火，敌人看到烈火腾腾，青烟滚滚，以为找到了红军游击队的目标，就偷偷地摸过去，想把我们一举消灭，等到敌人上了当时，四面枪声一响，打得敌人屁滚尿流。一到夜晚，更是我们的天下，红军游击队、赤卫队、暴动队活动在敌人驻地的周围，摸岗哨、捉散兵，吓得敌人都躲在房里，不敢外出一步，一出来就有被打死的危险。有机会有把握时，我们还摸进村庄，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消灭一股敌人。在大队敌人驻扎的地方，我们常在山前山后打上几枪，引得敌人乒乒乓乓乱放枪，使敌人心惶惶，彻夜不安。我们的行踪敌人捉摸不透，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时而出现，转瞬即逝，敌人防不胜防，终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敌人恼羞成怒，便组织了几十个团的兵力大举搜山。岂知井冈山林海茫茫，无边无际，一两万军队就象大海里捞针，哪里找得到一个人影。嚷了半天，累了半天，叫得

声嘶力竭，拖得精疲力尽，只不过踩死几棵小草，惊起几只山鸡、野兔而已。对付敌人搜山，我们的办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绕，绕不赢就化（化装）”。敌人踏不到我们的脑壳，就捉不到我们。山林里都是我们的天下，每一条小路，每一条山沟，我们都了如指掌，在绿色的海洋里，我们就象龙游大海，鱼入深潭，悠然自得，行动自如，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或浮或沉，时隐时现。

敌人想尽了各种办法都奈何我们不得，便对山上进行宣传，想从政治上瓦解和动摇我们的斗争。敌人知道我们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活动，就爬到山头上叫嚷：“父老兄弟们，回来安居乐业啊！不要跟土匪走。”大家听了毫不理睬那些狗东西的狂吠。有些血气方刚的青年，跑到另外的山头上和敌人对骂：“你们才是土匪！烧了我们的房子，杀了我们的人，杀人放火不是土匪是什么？”等敌人追来，大家都跑了。敌人对王佐也进行了很多分裂活动，叫王佐投入国民党，给官做，发大财。王佐和王佐部队经过改造和锻炼，此时表现得很坚决，很能打，他们回答敌人说：“你们的命活不长，我们要消灭你们这些反动家伙，天下都是我们的。谁做你们的臭官！谁要你们的臭钱！”为了配合宣传，国民党还用飞机散发了很多传单。传单上写着：“看你哪里走，看你哪里逃，我们有炮隔山调，我们在空中把炮弹抛，有机枪遍地扫，看你哪里走，看你哪里逃。”同志们讲：“国民党

放屁。老子有的是地方，你们有本事到山里来。”敌人宣传有官做、有钱用，我们就说：“优待俘虏，缴枪不杀。”针锋相对。我们讲的是真理，敌人搞的是诱骗，一对比，敌人的阴谋就破产了。

在那些日子里，斗争是非常艰苦和残酷的。敌人占村庄，我们占山林，我们不仅要和敌人作斗争，还要和饥饿寒冷作斗争。这年的冬天，气候特别冷，整天浓雾弥漫，大雪纷飞，直下了四十多天雪，山上的柴草树木都裹上了厚厚的一层冰雪，整个大地都被冰雪封住了，井冈山变成了一个银光玻璃世界。在这冰天雪地里，飞鸟都找不到一点食物，野草都冻死了。我们的战士都是单衣薄裳，身上没有棉衣，宿营没有房子，饿了没有粮食。敌人不断搜山，一天得打好几仗，转移好几个地方，又累又饿又冷。在这困难的情况下，要熬过这漫长的冬天并战胜敌人的“会剿”，对一般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战士，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天大的困难有党的领导，有坚强的革命意志，都能克服和战胜。岁寒见松柏，疾风知劲草。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更显示出了党和人民的伟大力量。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红军战士对摆在面前的一切困难都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井冈山柴草树木很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我们在很多山沟都扎起了茅棚。有时这一个茅棚被敌人烧坏了，到别的地方又扎起来。我们还找到一些石壁山洞，驱走毒蛇猛兽。穴居

其中，这比茅棚就好得多了。没有吃的就吃冰雪，剥树皮，扒开厚雪挖竹笋。有时碰到被撵出来的野猪、山羊，更成了我们最好的食品，但它们并不是随便就能弄得到的。弄得不好，我们三五天或一个星期吃不饱肚子，但还是照样坚持斗争。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大多数同志是坚定的，也有少部分同志从白军那里刚过来不久，改造和锻炼得还不够，便产生了一些悲观失望的情绪，提出死在山上不如死在平地的说法。针对这种思想，党组织及时进行了教育和说服，指出我们有困难，敌人也有困难。我们有党的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有全体红军，还有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的同心协力，有红四军和红五军主力在敌后创建新的根据地，全国革命在继续高涨，这些都是有利条件，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坚持就能胜利；而敌人的困难是没有办法克服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加深，“会剿”只是暂时的，不久就会破产。敌军几十个团深入山区，交通不便，给养困难，天气严寒，士兵是被迫来的，不愿意卖命，不愿意在这里挨饿受冻，军官都想升官发财，更不能吃苦。敌人的烧杀政策，把自己陷入绝境，没有人民，独守空山，房子烧光了，他们自己也只好在雪地里过夜。在我游击队的不断打击下，敌人已被拖得精疲力尽，处于四面楚歌、惶惶不安的局面。敌人军心涣散，厌军厌战已达到顶点。所有这些矛盾都无法克服。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战胜

困难，坚持到底，坚定了大家的斗争意志。

在斗争的年月里，党和人民群众进一步加强了血肉相关的联系。根据地的人民不怕任何艰险，克服一切困难，尽力支援红军。有一个老太婆随着儿媳妇躲在深山中的破庙里，一天，她看见一个被敌人打成重伤的红军战士倒在雪地里，还有一口气，便背回庙，挖草药，敷伤口，象对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细心调治，情愿一家人吃树皮草根，用仅有的一点米汤给伤员喝。在老人的照顾下，伤员不久就痊愈了。当这位红军战士辞别老人去找部队的时候，老人家将最后的一点干粮和一块银洋都送给了这位战士。战士哪里肯接受。老人含着泪说：“只要你找到了红军，那比什么都高兴；这点东西如果你不带走，我会感到难受的。”这位战士激动万分地向老人表示：“我绝不会忘记你的恩情，为了打倒反动派，解放受苦人，我回部队后一定坚决战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还有一对夫妇，知道了红军的地址，便把家里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不幸他们被敌人捉住了，但他们情愿经受敌人的严刑，牺牲三个亲儿子和自己的生命，也没有说出红军的住处。在当时，象这样可歌可泣的事例是很多很多的。红军对人民群众也是无微不至地关怀，找到一个好一点的岩洞或山棚，自己不住，留给群众；从敌人那里缴获到一点吃的东西，自己不吃，也留给群众。为了群众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解放，我们红军不惜任何牺牲。人民觉得红军是靠山，红军觉得人民是



亲人，军民相依为命，骨肉相连，结成了一个战斗的整体，成了革命力量的伟大源泉。

山上的军民与反动派进行了顽强的搏斗，山下的人民也与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边界特委和宁冈中心县委的统一领导下，井冈山附近六县的农民广泛地组织了游击队，到处打击敌人，扰乱敌人后方。游击队打击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的运输队。当时井冈山道路狭窄，崎岖险峻，因为是山路，马不便行，车不能通，要运送物资，只有靠人背肩挑。敌人来的很多，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援，没有给养，什么都得从山下运来。由于东西多，靠人力挑，队伍拖的很长，目标很大，我们选择了敌人这一弱点，专打运输队。听说运输队来了，选好有利地形，来一个突然袭击，押运的敌人听见枪声，摸不清底细，吓得四散奔逃。挑夫都是捉来的农民，一见游击队来了，便顺水推舟，丢下担子，往山里钻，跑得无影无踪。有些被敌人当挑夫捉来的赤卫队员，这时便抄起扁担和敌人搏斗。

敌人被我们和井冈山的广大人民群众用游击战的方法困在井冈山上，孤立无援，又冷又饿，这样的“罪”他受不了，又到处受到打击，更加惶惶不安，军心动摇，士气低落，极望及早脱离井冈山，逃脱险境。

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桂军阀终于爆发战争，反动派慌忙调整各路军队，投入军阀混战，蒋系军队在樟树集结，桂系军队在萍乡集合。在井冈山上的反动军队听说

下山，匆匆忙忙地夹起尾巴就逃。我们立即组织游击队，配合红军沿途追击。白军此时已失去战斗力，在我广大军民追截下，一触即溃，纷纷逃窜。国民党正规军从井冈山撤走时，留下的一部分挨户团更不值一打。记得留在茨坪的二百多名挨户团，在一个早晨，没有半个钟点，就全部被我们消灭，没有一个漏网。

这一次打得非常漂亮，缴枪三千余支，缴获军用物资、医药、子弹无数，捉到很多俘虏。到红五军主力回到井冈山时，胜利的红旗已在井冈山到处飘扬了。边界的人民群众经过这一次磨炼，更加英勇顽强，纷纷加入红军。我们的队伍发展到五千多人，除了充实各个纵队外，以原红四军三十二团为基础，编成了红五军第五纵队，纵队长是李灿同志，党代表由我担任。以后，第五纵队恢复湘鄂赣，开辟鄂东南，发展为红八军，连同红五军发展成红三军团。我们告别井冈山后，井冈山各县的地方武装也得到很大发展，成立了独立营和独立团。

## 雄风洁质井冈青松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是一九三六年陈毅同志在叛徒告密，梅山根据地被围的危急形势中，“虑不得脱”而写下的三首诗里的一首。

诗言志，诗若其人。每当我读到这首诗时，自然地想起在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井冈山会师以后，一直到红军长征时同陈毅接触和共同战斗的那些难忘的岁月。陈毅同志在斗争实践中认识领袖，确信“指津自有北辰星”，在斗争实战中磨炼革命意志，“真红不枯槁”。特别是他对原则敢于坚持，对错误勇于修正，正直无私，磊落光明，可谓雄风洁质，井冈青松。

我和陈毅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同学。一九二二年因为他参加留法学生抢占里昂大学的正义斗争，被法国当局和中国公使馆以“红党”的罪名押送回国了。以后，我们一直没有见面，更无联系。直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派我下山去找朱德同志，在广东曲江的犁铺头才再次见到他。在法国留学时，陈毅同志很活跃，几次反对中国公使馆的爱国斗争他都参加了，被反动当局列为“暴徒”。这次见到他，我们都已经是共产党员，多少都有些阅历。年仅二十六岁的陈毅同志虽然变得老成了，但他那豪放洒脱的性格依如往日。陈毅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井冈山根据地很感兴趣。在我们深入交谈中，他问了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及其部队的政治教育情况。他特别赞赏毛泽东同志三湾改编中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说：“不能用老的套套带部队，毛委员的办法是治本的。我们在整编中把党团员分到连队去作用就是大呢！”从他的言语中，看出了他对毛泽东同志的信仰，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向

往。事隔不久，湘南暴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之后，正是陈毅同志协同朱德同志一起率领部队奔向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胜利会师的。那时上山不象后人想的那么简单，在“左”倾盲动主义者的眼里，上山是逃跑主义，是顶不光彩的。陈毅同志在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同志会师问题上的决心是很大的。那时，采取这种行动，如果没有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有一定的正确认识，那是难以想象的。

井冈山会师以后，在部队改编时陈毅同志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他和朱德同志一起辅佐毛泽东同志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个革命者的成长、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经过无数次的成功和失败的历程。并且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跟上时代的步伐。陈毅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是这样一个革命者。他有了成绩从不炫耀，而犯有错误却毫不隐晦，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更加忠于革命，忠于党和领袖。这是我和陈毅同志交往中印象最深的一点。一九二八年湘南暴动时，由于对党和军队的关系缺少实践的认识，特别是起义部队中党的干部不十分健全，士兵多是旧军人和历次的俘虏，一些下级军官存有单纯军事观点的倾向，认为只要能打仗就是好队伍。因此，忽视党的领导，有时党员的意志高于党的意志，在

紧张的战斗中，有一段曾取消了党代表。但是，通过实践后，陈毅同志感到放松了党的领导部队问题就多，旧军队的老一套又流行起来。于是，他又同朱德同志一起对部队进行整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到边界后，朱德、陈毅同志又在部队中恢复了党代表制度。这件事现在看来好象不可理解，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马列主义的认识相当肤浅，对党的认识也不深刻，更没有什么“路线斗争”一类的观点。那时干革命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怎样干好革命，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而出现上述情况是极为正常的事。对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的认识也是如此，在正确与错误的反复中提高认识的。那时候，走州过府行军作战并不是难事，最难的是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当时，部队成份大部来自旧军队，一般都带有单纯军事观点，极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而愿意搞游击作战。由于对形势认识不正确和单纯军事观点的影响，陈毅同志的思想认识也是有个过程的。因此，在斗争中领导之间为了某一个具体问题发生争论和不同意见的发表是极为常见的。在某些问题上做出错误的决定也是有的。其中进军湘南遭致“八月失败”就属于这方面的例子。陈毅同志从来不否认自己的这个缺点和错误。特别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总是从路线高度严于解剖自己，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看问题就要分析，把这些错误全算到朱德、陈毅同志

的头上是违背历史的，是不公平的。这些问题是同当时湖南省委的盲动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的压力和影响有着重要关系。井冈山会师后，部队合编为红四军，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朱德同志任军长，陈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四月底召开军党委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军委书记。五月二十日，边界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湘赣特委，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书记，军委书记改由陈毅同志担任。七月，省委杜修经，派特委书记杨开明要部队开往湘南，擅自取消军委，成立前委，由陈毅同志任书记，杨开明代理特委书记。由此可见，这种改变绝不是陈毅同志出于某种个人动机积极活动的结果，而是当时湖南省委推行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利用红四军中的单纯军事观点，并对朱德、陈毅同志施加组织压力造成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湖南省委对于进军湘南的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的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支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接着又第三次来人，强令我们向湘南进发。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朱德、陈毅同志就是在毛泽东同志去职、湖南省委的高压下带领队伍去湘南的，结果酿成八月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次失败是坏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却造成了推行毛泽东同志

正确路线的有利条件。陈毅同志在这次失败后及时的吸取了教训，总结了经验。他在红四军的情况报告中写道：“红军回到宁冈，二十八、三十一团损失虽不见大，但数量质量均不如前，不过在一次失败以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纯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逐次改变，军队有相当的休养。”事实使陈毅同志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对的，出兵湘南无功而返，是错误的。后来中央六月四日来信，十一月收到，决定重组前敌委员会，指定毛泽东同志为书记，陈毅同志是拥护的。所以，这种错误是客观形势中形成的，绝不是后来林彪、“四人帮”人为编织的那种朱德、陈毅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斗争。

陈毅同志仗义直言，坚持原则，知错必改的精神成为传世美谈。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尤其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前后，表现尤为突出。在“七大”中，在党领导军队问题上，存有争论。毛泽东同志认为，军事应服从于政治，军事斗争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有力的手段，因此，党应该绝对领导军队，凡军队的一切重大的问题，不论是军事工作，政治工作，还是后勤工作，都应由党委讨论决定，然后再分别负责执行。一些同志则认为，过去是个人说了算，现在是党说了算，感到党的权力过大，觉得不自由；对政治工作也认为麻烦。毛泽东同志当时主张军队要有民主，但是，要的是有限制的民主，反对极端民主；一

些同志认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看不到充分发扬民主，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主张建立士兵委员会，监督军官打骂士兵，维护组织纪律，而一部分旧军官对此不满等。

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大多数同志没有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陈毅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观点也持有不同的意见。最后通过选举，毛泽东同志落了选，并离职养病（确实有病）。这件事从政治上看，不该使红四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落选，是个错误。但从组织上看，并不象林彪、“四人帮”攻击的那样，毛泽东同志的去职是朱德、陈毅同志夺了毛泽东同志的权。

从后来事情发展上就可以雄辩的说明这一点。“七大”以后，决定陈毅同志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和汇报红四军内的争论问题。在向中央汇报时，陈毅同志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和纯洁气质。汇报中，他如实地向周恩来同志、李立三同志反映了双方争论的问题和双方对问题的看法，毫无保留和毫无偏见。根据陈毅同志的客观报告，周恩来同志指示，由陈毅同志记录并整理的近万言的指示信，由陈毅同志亲自带回。指示信中对当时革命斗争的形势，敌我双方的力量的对比，红四军采取的策略；对红四军行动的方向，党的建设和政治、军事、经济等都作了详尽的指示，并要求红四军请毛泽东同志返回领导岗位。在写信的时候，中央还当面向陈毅同志谈了若干重要问题。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重要指示，使这位年仅二十七



岁的年轻政治部主任豁然开朗。他表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团结全军于毛泽东同志建军原则的基础之上。于是，他化装成华侨商人，星夜驰返苏区。陈毅同志返回时，正赶上朱德同志率部出击东江，在广东松口，他遇到了红四军部队。陈毅同志到红四军后，不但完好的带回并传达了中央来信，而且亲自赶往闽西汀州苏家坡请回边养病边指导闽西党和红军工作的毛泽东同志。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多次经验教训，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后，攻打焦岭、梅县失利，部队受损失的事例，使陈毅同志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同志主张的正确。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陈毅同志亲自作了反对枪毙逃兵和废止肉刑的报告。

“指津自有北辰星”。这句诗是陈毅同志经过自己的实践写出来的。陈毅同志对待革命领袖的崇敬和对革命路线的坚信是从实践中确立的。在他未认识之前从不盲从，在他认识之后，绝不变更。这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的高尚品质。

“真红不枯槁”，这是陈毅同志又一个可贵之点。翻开井冈山斗争的史册，不论在政治工作上和维护部队内部团结上，陈毅同志都是模范。

陈毅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先驱者之一。可以这样说，在井冈山斗争中，朱德同志在军事上襄佐毛泽东同志，陈毅同志则在政治工作上襄助了毛泽东同志。井冈山会师不久，陈毅同志发现南昌起义部队有的干部、战士一上山就

带着某种优越感，认为自己人众枪多，能打胜仗。个别人瞧不起秋收起义的部队，认为他们多是湘南的学生兵，文质彬彬的。而秋收起义的部队则认为南昌起义部队军阀作风太重，是“油子兵”，纪律差。因此，有时出现不团结的苗头。于是，陈毅同志首先向毛泽东同志建议，两个部队不同的来源，改编的时候，两个部队的干部互相交流一下，特别是南昌起义的部队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一建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认为，这是加强两军团结，巩固部队的重要组织措施。改编后，陈毅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工作，亲自抓各部队的士兵委员会。他经常集中士兵委员会的骨干，亲自讲课宣传红军的革命性质、红军的任务、官兵一致的关系，特别注意宣传两军团结的重要意义。并身先士卒作团结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

另外，在政治工作上陈毅同志又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协助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对旧军队的改造。陈毅同志十分注意瓦解敌军的工作，重视对旧军队和地方武装的改造。在我改造王佐部队、改造毕占云部队时，陈毅同志都亲自找我谈话，出主意想办法，方法十分灵活。比如，毕占云同志起义的一个营中，多数是“双枪兵”。教育改造他们的任务交给我们后，感到发怵，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问我怎么办时，我说：“我首先要当戒烟所所长，先要他们戒大烟。同时，进行革命道理的宣传。一是申明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不准抽大烟；二是红军根本没有大烟供给。”这时，

陈毅同志出主意说：“不让抽大烟一开始可能够受的，为了使事情更稳妥，最好多弄点烟叶，采取‘偷梁换柱’之法。同时，多搞点集体活动，如集体唱歌，集体游戏，爬山比赛等。”在教育改造中，陈毅同志还三次到部队来看望，并且作了形势报告，对起义部队教育很深。解放以后，毕占云同志已经是中将了，在一次谈话中，谈及这段历史时，他还说：毛泽东、朱老总、陈总对改造旧式军队花了很多心血，想了很多办法，经验是宝贵的。陈总那次报告，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总之，陈毅同志在井冈山斗争中一心想着革命，一心为着革命，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政治部主任。

井冈山斗争中，陈毅同志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大任务的决定执行者之一。陈毅同志对我军政治工作和内部团结上具有很高的建树，在军事上、政治建设上、发动群众上也有很大的成就。

在军事上，从我经历过的几个大的战斗来看，陈毅同志不单是前线指挥员，而且，担任着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参谋长的角色。每次战斗前，陈毅同志都参予进去，同毛泽东、朱德同志谋划军事，指挥战斗。从三战永新城到回师井冈山的三战三捷都有陈毅同志的功劳。

在新老七溪岭战斗之前，我们正在宁冈整顿，朱德同志、陈毅同志负责训练部队。陈毅同志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和对新补充的解放战士的思想工作，我经常看到他和战士

们一起摸爬滚打。在新老七溪岭战前紧急会上，陈毅同志做了战斗动员。他说：“敌人前二次失败还没有甘心，又要重新同我们比试一番，我们这一仗一定要打好。打好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就会一落千丈，而我们革命根据地就会保存下来，发展起来。这次敌人进攻是狗急跳墙，各个部队，一定要把困难想得更多些，无论如何要战胜敌人，取得胜利”。会议结束时，他和我说：这一仗肯定是场恶战，你们这次抢古老七溪岭的战斗不是奔袭，而是和敌人抢夺阵地。时间不多，看谁腿长，谁先抢占制高点，谁就掌握了主动。你们各级党支部都要开会进行党员动员和士兵动员。我说，请主任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会后，我们来不及侦察地形、道路，匆忙准备了干粮、担架就出发了。朱德、陈毅同志赶大路向新七溪岭进发，预先决定军指挥部设在新七溪岭，陈毅同志当时还兼任十二师师长，二十九团的主力归他指挥。

新七溪岭战斗打响以后，朱德、陈毅同志沉着指挥战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朱德同志的帽子都被打穿了，陈毅同志的衣服也给打破了。但他仍然活跃在火线上，协助朱德同志指挥，并用强有力的口号鼓舞干部战士，狠狠打击敌人，巩固革命根据地。这样，敌人一次次的冲锋被打垮了。

战斗结束后，大约在下午四点钟，陈毅同志来了。他看见我以后，一下子跳下马，高兴地跳跃起来，连连说：

“打得好！打得好！！”接着他讲了新七溪岭的战况：“我们打得相当激烈。如果你们老七溪岭战斗再迟半个钟头，我们的阵地就危险了，敌人以为老七溪岭已经拿下来了，因此，他们进攻一次比一次疯狂。”这一仗是会师后的三个大仗之一。这一来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扩大了。在这三次战斗中，陈毅同志从谋划部署到战斗实施，都亲自参加了。战斗中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宣传员，很受大家尊敬、爱慕，背地不少同志都称赞陈毅同志是文精武通的全才呢。

陈毅同志在军事上是内行，在政治建设上和做群众工作上更是饮誉井冈山苏区。古田会议之后，朱德同志带一部分队伍回江西，毛泽东同志随后出发，在宁都会师。以后又到兴国、乐安、蒲田、宿田开了“二七会议”，成立了二、四、六军。陈毅同志被调任六军政委。在这之前，陈毅同志留守在蒲田做群众工作。那时，这些地区虽然在红军影响下有群众基础，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红军经常处于游击状态，红军一来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一走反动派又回来杀人放火。群众心里向着红军，但表面都不表示什么。特别是有的党员都不大愿意出头露面干工作。那时，地方上有不少党员是北伐时期入党的，以后又和红军联系起来恢复关系的。当时红军只有二千多人枪，穿的破破烂烂，有些机会主义很重的党员同志，怕红军站不住脚，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党员。陈毅同志发现这种情况后，亲自去

找他们出来工作。他们说，对党对革命我们是相信的，但是出来工作很困难。有的人别别扭扭，效果不大。于是，陈毅同志采取了“逼上梁山”之计。每到一個村镇，他首先组织大家召开群众大会，接着动员群众找出党员来，并推他上台讲话，这样就公开了他的身份，逼上梁山，然后再大张旗鼓的宣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并发给他们一些枪支弹药。这样一来，他们就轰轰烈烈的干起来了，建立了红色政权，成立了赤卫队。

一九三二年春，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率领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三月十四日在长岭寨一举歼灭反动军队一个旅，旅长郭凤鸣被击毙，红军解放长汀城。这时，红四军在长汀城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深入长汀县附近农村，分兵发动群众。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强调指出：在此军事时期，红军必须在赣南、闽西二十余县坚持游击战，发动群众，务要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会后陈毅同志即带第一纵队奔赴十五公里外的新桥做群众工作。来到新桥，陈毅同志不进深宅大院，不吃白米鱼肉，专门选了一户住土屋的共产党员王仰颜家里。白天他走遍新桥山山水水，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晚上，松明灯下，土屋前集聚着男女老少，陈毅同志热心的向他们宣传着打土豪、分田地、武装夺取政权的意义，把党和毛委员的温暖送到群众心上。不久，陈毅同志根据掌握了的情况，在大岗召开了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天新桥的

群众都来开会，那种高兴劲就和过节一样。大会开始后，陈毅同志讲话，他说：乡亲们，郭凤鸣被我们消灭了，土豪劣绅、地主老财没有靠山了。朱、毛红军打下了长汀，来到新桥，就是要把革命的烈火烧到新桥来，打土豪、分田地，要把印把子握到咱们穷人手里来！说着，他抓起一把分给群众的银毫、铜板说：这是打土豪的钱。地主豪绅每一个铜板都浸透着我们穷人的血汗，今天我们要把它分了，让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再回到劳动人民手中去。就这样在陈毅同志亲自发动下，五天时间打土豪十八家。那几天，陈毅同志和战士帮助群众到处烧契废债、杀猪出谷、分田分地、筹粮筹款，穷苦人真正翻身了。为了保卫胜利果实，陈毅同志亲自帮助成立了农民赤卫队。听说这支赤卫队后来还攻打过清流县县政府呢。

他在江西苏区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和江西省军区司令时，对扩充红军是最有办法的。他当赣西南特委书记时，出色的搞好政权建设，特别是发动群众休养生息，开展生产运动，改善人民生活。在此基础上运用各种方式宣传鼓动了許多农民参军，后来，他就把他们带到中央苏区交给毛泽东、朱德同志的主力部队。交结后再去组织。这样一批批的扩大，使红军的力量日益增长，有力地保证了粉碎敌人数次“围剿”的胜利。

陈毅同志担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期间，同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在发动群众、巩固后方、补充红军

等方面成绩更为突出。那时中央苏区共分四个军区。有江西省军区，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军区司令是陈毅同志；湘赣军区由蔡会文同志为司令兼政委；闽赣军区叶剑英同志为司令兼政委；我在粤赣军区任司令兼政委。那时，我和陈毅同志虽然来往不多，但大事还是了解的。当时，陈毅同志负责的江西包括宁都、兴口、会昌、润丰等十多个地区，是根据地的核心部位。到红军开始长征时，仅在江西省军区，陈毅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就动员了工人师、青年师、模范师三个师的兵力，极大的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过去一个时期里，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讲军史，写历史，总把朱德、陈毅同志在井冈山斗争这一段视为“禁区”。认为这段历史复杂，朱德、陈毅同志曾取代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在某些问题上犯过错误。因此，时间一长，这段历史就被否定了，朱德、陈毅等同志的功绩也没人敢去说。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历史，科学评价历史人物，是每一个革命者的责任。我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个老兵，我写陈毅同志这一段的目的，就是让事实来证明陈毅同志是红四军的缔造者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缺点和错误无损于他的高大形象。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陈毅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第八章

# 开辟鄂东南与长沙之战

### 红旗指向鄂东南

记得陈毅同志在关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会剿”给党中央的一个报告里写过这样几句话：“所谓三省会剿，实际只到井冈山游了一次，除红军因战略引退而外，所谓三省大兵对成千整万之赤色群众只有一个‘莫可如何’，所以不到一个礼拜即行撤退，边界区域仍然在赤色群众之掌握中……”高度概括了井冈山地区军民第三次反“会剿”的情景。

敌人走后，我们发动群众又把井冈山恢复了。王佐部队和五军守黄洋界的李灿大队也基本上没有损失，反而得到了补充和扩大。可想，如果五军不离开井冈山，敌人的失败将更惨重，五军也不至于受到那样严重的损失。

敌人刚从井冈山撤退，毛主席就从敌人的报纸上了解到我们恢复井冈山的情况。五军在瑞金和四军一会师，毛

主席就把敌人的报纸送给彭德怀同志看，并指着报纸说，敌人报道“一股恶匪何长工又重新盘踞井冈”，这就说明，井冈山又回到我们手中，你们应赶快回去，进一步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毛主席还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五军这次损失很大，但五军的旗子不能倒，指示我尽快把五军补充起来。这时把坚守井冈山的部队编为五军一个纵队，并让我任政治委员，李灿任纵队司令，王佐任纵队副司令，尔后协助彭德怀同志扩大井冈山根据地。五月上旬，彭德怀同志率五军两个大队从瑞金回到井冈山，由于这时敌人忙于应付内部混战，一路上除少数民团外，未遇其他敌人，而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广大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这时他们队伍已发展到七八百人。

五军回到井冈山那天，我组织群众进行热烈欢迎。另外，我又搞了一些井冈山陈放二十多年的米酒，杀了好几头猪，生活上给他们大大改善一番，并发动群众为每人做了两套衣服，使五军更加感到根据地温暖。接着，根据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把经过战斗和培训的骨干二三百人（一个教导队）补充到五军做骨干，同时发动根据地青年积极参加红军，五军随即整编为四、五两个纵队，四纵队司令贺国中，政治委员张纯清；五纵队司令李灿，副司令王佐，参谋长徐彦刚，政治部主任游雪程，我任五纵队政治委员。这时，敌人蒋、桂之间矛盾日趋尖锐，双方都积极准备战争，这对我们发展和扩大根据地是个极为有利的条件。于是部

队经过短期的休整后，我们就投入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当时的发展方针是，向外扩大新区，从发展中恢复和巩固老区。首先我们打了酃县、桂东，消灭了桂东反动民团二百多人，救出了在狱中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接着又打下了广东境内的重要商埠城口，缴商团枪二百余支，子弹三万多发，筹款三万余元，后来又攻占了南雄，缴获还略多于城口，并购买了大批药品、食盐和布匹等急需物资，补充了大量的服装、装备，红军本身又进一步得到了补充。这次行动，我们让王佐也随军前进，战斗中他亲眼看到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群众纪律以及群众欢迎红军的热烈场面，使他很受感动。我们又把缴获的枪械物资平均分配，共同补充，使他更受教育，从而更加坚定了他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的信念，他工作战斗的积极性比以前更高了。可惜王佐、袁文才这两位建设井冈山的有功之士不幸被我们自己内部杀害了，回想往事，我们后人今天更加怀念他们。

大约七月中旬一天，部队向安福、永新进发。我们五纵队走在前面担任前卫。这时正值暑季，天气特别炎热。约中午十一点左右，烈日当头气温更高，战士们个个汗流浹背，口燥舌干。那时又无防暑设备，我怕部队中暑，就让先头部队休息吃饭，午后再走。突然前面侦察员来报告说，在离我们不远的迎宾桥（距安福十五公里）附近发现有敌人的工兵营。我考虑敌情不明，敌人又没有发现我们，而我军也很疲劳，现不宜和敌人打仗。于是我就命令部队

注意隐蔽，先头部队加强警戒，密切注意敌人动向，做好战斗准备。军部和四纵队赶到后，我即向他们汇报了前面的敌情和处置意见，可是他们一定要打这股敌人。我说，从敌情上判断，敌人工兵后面一般都有步兵，后边敌人是一个团还是一个师，我们没有侦察清楚；从地形上看迎宾桥一边是石山，一边是隘路，下面洪水泛滥，不能徒涉，对我军行动很不利；我们部队又没有得到休息，况且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所以还是不主动打为好。可是他们仍坚持下命令向敌人阵地冲锋。可惜地形对敌人有利，我们正好冲入敌人火网中，四纵队司令贺国中当场牺牲，部队也受些伤亡。经过我军猛烈拼杀，才把敌人击溃，其余敌人向安福逃窜。这时，彭德怀同志仍要追赶敌人进攻安福，我这时也有点激动了，说：“军长，这次战斗已经损失不小，我们再不能莽撞从事了。攻打安福一是城内敌情不明，二是部队毫无准备，尤其是攻城不比打遭遇战、伏击战，没有充分准备怎么能行呢？再说，贺国中同志牺牲了，部队又受到损失，战士情绪不好，现不宜再战，我们千万不能简单地图报复啊！”结果还是把部队开到安福城下。当我们几个纵队以上指挥员在城下观察地形时，突然敌人的一排排炮弹就在我们附近爆炸，几乎把我们炸死。这说明敌人已发现我们，而我们也发现该城城墙高而坚固，城内已有严密防范，城墙上几十米就有一个哨兵走动，部队没有云梯根本上不去，城周围护城河也不好通过。观察后，几个

纵队领导也都不同意再强行进攻。彭德怀同志这才同意部队沿原路向永新北乡撤退。我怕部队再中埋伏，建议他不走原路改从小道返回。他却坚持说，走原路沿途村庄多，宿营方便，遇到敌人还能捞回一点。于是部队挖灶做饭，饭后稍休息就出发了。拂晓前，当部队前进到迎宾桥附近时，突然又遭到敌人的三面阻击，前面左右都有敌人打枪，当时我们部队仍走在前面，军部也进入敌人埋伏圈，经过我们两个多小时拼命反击，才杀出一条血路，突破敌人包围。这一次部队损失更惨重，十一个大队长伤亡九个（其中牺牲五个），四纵队参谋长刘之志阵亡，我们纵队司令李灿也挂了花。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同志在一个小山坡上心痛地说：我们好多指挥员被打死了，平江暴动时的一些各级领导同志也在这里牺牲了……我们心里都十分沉痛。

到了永新，我首先召开了中心县委各书记会议，号召各县动员青年参军，充实五军。我说，这次红军受些损失，但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新五军，钢铁的五军。我又把一个教导队的骨干补充去做骨干，并号召地方优秀干部参加五军建设，王佐也把仓库的武器弹药拿出来装备部队。纵队领导也进行了调整。开始要我兼五纵队司令，把李灿调四纵队顶替贺国中。我说，我腿已负伤，体力怕受不了，还是让李灿留在五纵队，彭德怀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就让郭炳生任四纵队司令，张纯清仍为政委，这样部队基本得到了恢复。我们又抓紧进行军事训练，要求部队尽快掌握

基本的技术战术。同时对这次安福失利进行了总结。大家认为这次失利主要在政治上对敌人缺乏阶级分析，只看到敌人表面上的矛盾，没有看清他们本质对待红军是一致的，后来迎宾桥所遭的埋伏就是永新、安福、莲花三个县的敌人联合起来搞的；在军事上不弄清敌情就打莽撞仗；这主要是前段红军在发展根据地中取得一些成绩，就产生骄傲轻敌思想，领导上听不进下边意见所致。通过总结，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领导思想活跃了，互相之间更团结了，部队军政素质也提高了，战士情绪更加高昂。彭德怀同志心情一直不太好，经大家互相谈心后，也有说有笑了，他对李灿同志说：长工对我是苦口婆心，真心帮助我，五军两次损失，都是他想办法补充起来的，我从心底里佩服他。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一起战斗二年多，直到后来抗美援朝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我是军工部长负责后勤保障，他一直对我都很尊重，我也很敬佩他。尤其是他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刚直不阿的精神，值得我永远学习。

我们去永新、宁冈休整了一个月（因永新离敌太近，便移师宁冈休整），这时我向彭德怀同志建议说，我们五纵队基础比较好，有好几位县委书记，如陈奇、郭一清、谢翰文等都在里边，是否五纵队不上井冈山，让原来留湘鄂赣的五军副军长黄公略指挥我们，或再增加一个纵队，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彭德怀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在

九二九年八月，红五军四、五两个纵队，由井冈山地区重返湘鄂赣边。

记得是九月间，在铜鼓一座古庙里举行了湘鄂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上彭德怀同志讲了话，他首先讲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宝贵经验。接着分析了形势：当前敌人内部矛盾更加扩大，蒋桂新军阀已经集结部队，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江西鲁涤平和朱培德也矛盾深化。客观形势对我们开展的土地革命战争非常有利。五军要打通井冈山脉、幕阜山脉和九宫山脉的联系，把湘鄂赣苏区恢复和扩大，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连成一片。会上规定了各纵队的“割据”地区：由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率领第四纵队返回井冈山，巩固和扩大罗霄山中段革命根据地；黄公略、吴溉之等同志仍带领第一、二、三纵队留在平江、浏阳、铜鼓和修水一带进行游击活动；而李灿同志和我则带着第五纵队向北挺进，前往鄂东南地区开辟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

所谓鄂东南地区，包括通城、崇阳、蒲圻、嘉鱼、咸宁、通山、阳新、大冶、蕲春、浠水、黄梅和广济等湖北省东南部的十几个县份，周围七百余里。这里山岳、平原、湖沼、河川交错相间，林木茂密，田地肥沃，盛产棉粮，又有大冶的煤、铁，是一个极为富庶的地区。在地理形势上，长江天堑横贯于北，幕阜山脉环绕于南，介乎罗霄山脉、大别山脉和洪湖地区三大苏区之间，我们如果控制了

这一地区，则不但可以扼控敌人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直接威胁九江、武汉，对湘、鄂、赣三省的政治形势以强烈的影响，同时又可以成为联络我各个苏区的交通枢纽。因此，在这一地区开辟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实在有着十分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

在联席会议上，我们没有忽视对我们的不利条件。大家认为，由于这一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和它对武汉、九江等大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威胁，因而也就易于引起敌人的注视；同时也正由于交通发达，就更便于敌人调兵遣将；而当时我们只有一千多人，五百多条枪，实力并不雄厚，况且又是远道行军，人地两生，这就更增加了执行任务的困难。可以预料，我们未来的斗争是十分艰苦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许多有利于我们的条件，那时正是英、美、日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日益剧烈的时候，蒋、桂、冯、阎军阀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敌人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就给我们造成了可乘之机；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有基础，又是武汉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经过的地方，播下了革命种子，大革命的影响还深深地留在这一地区的群众中。特别是大冶的产业工人中，群众觉悟程度普遍较高，并且一直保存有坚强的地方党组织，这正是我们最可靠的保证。因此，会议认为，在这块敌人防守比较薄弱的地区，创造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会后，第四纵队即返回井冈山。九月下旬，第一、三、五纵队掩护四纵南下通过了铜鼓之后，第一、三纵队就回到平江、浏阳一带去了。我们第五纵队即回头北上，向着鄂东南地区挺进。

第五纵队在陌生地区中行军，不了解沿途的情况，因此，我们的进军便采取了极为隐蔽的游击姿态。我们选拔了三十名机警、精干的战士，化装成农民、工人、商贩等各行各业的人，作为前锋走在头里，离大部队拉开十公里左右的距离，边侦察边前进，如果发现了大股敌军，就通知后续部队绕道通过；若是敌人不多，我们大部队就赶上去将它消灭。部队中所有的红旗都暂时收藏起来，战士们身上的符号、臂章也都摘下来，使外人无法辨认我们是什么队伍。部队多是在夜间行军，破晓宿营。开初，我们经湘赣边境的山区时，正逢月黑之夜，山路难行，还可以点起火把照路，一眼望去，宛如一条火蛇在山上蜿蜒爬动。但是当部队经过平原和进入新区时，就不能再举火把了。只能在每人胳膊上扎上一条白布，后面的人盯住前面的白点，一个紧跟着一个，默默无声地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掉了队的人只能轻轻地拍掌联络，咳嗽的人也要捂住嘴不让咳出声来。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差不多每夜都得走完六七十公里的艰难路程，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停止行军，就地隐蔽在山谷、田野或树林里吃饭、休息，等到天黑，再继续前进。

我们经过了十几天的艰苦行军，十分疲劳。在跨过了雄伟险峻的幕阜山之后，踏进了鄂东南地区。

进入鄂东南以后，我们按照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消灭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发展扩大红军主力和农民武装的方针，首先和各县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和他们一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然后采取从弱处下手，各个击破的办法，根据情况，相机向敌人发动攻击。

经过了长途行军，进入鄂东南地区之后，部队已经十分疲乏，亟需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进行休整补充。但我们初到新区，人地陌生，情况不明。什么地方才好落脚呢？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找到当地的党组织。可是当时地方党还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我们往哪儿找呢？

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旬，我军行抵崇阳附近，经侦察部队查明，崇阳城内仅驻敌人一个连。我们决定打下该城，使部队得以休整几天。

部队于头天晚上赶到崇阳城下，第二天拂晓突然发起攻击，只打了两三小时，守城的敌人就被我们全部歼灭。我红五军第五纵队旗开得胜，打响了进军鄂东南的头炮。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就在这里落脚，我们只在城里休息了三天，补充些给养，便急忙离开崇阳，仍以游击姿态沿着幕阜山脉的边缘向东北挺进。这时已属深秋，山上林木开始凋零，路边野草正在枯

萎，秋风冷雨，寒气袭人，战士们身上还是五月间在井冈山发的两套单军衣，已经由灰色褪成了白色，补钉上又加了补钉，脚上没有鞋袜，只能赤脚穿着磨穿了底的草鞋，再加上几个月连续行军、作战的艰苦生活，使大家变得又黑又瘦了。虽然战士们对眼前的艰苦生活毫无怨言，行军途中仍然象以前那样愉快的谈笑和唱歌，但是我们这些肩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却不能不为面临的物质困难而忧心，我们深知部队的寒衣、给养、休息等这些迫切的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势必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需要尽快地找到地方党和落脚点。

从崇阳出发，又走了四五天，我们到达了通山县的一家大院。我们见这个村子四面环山，地形险要，而且北距县城有三十余公里，就决定休息几天再走。

这时我们的“旗号”仍然没有公开亮出来，村中老乡们不晓得我们是什么队伍，都有些惶恐不安，不敢和我们接近，只是闪在远处冷冷地瞧着我们，到了黄昏，纷纷将屋外的东西收到屋里，家家关门闭户，显得异常冷淡。

我们为了避免打扰群众，决定不住民房，部队找了一所大祠堂住下来，容纳不下的，就在屋檐下或门廊里开铺。我们严明的纪律和对老乡和蔼的态度立即博得了群众的好感，第二天就有人愿意找我们攀谈了，有几个十多岁的孩子竟试探地向战士们问道：“你们是不是红军？”“是不是彭德怀的队伍？”看他们那个吞吞吐吐的表情，显然是受

了大人物的指使才问的，说明这个村子的群众对红军不是毫无所知的。当天，我们布置战士们暗地打听了一下该村的政治情况，才知道这个村庄的居民中有许多是革命烈士家属，他们的亲人都是因为参加大革命而被反动派成批捕杀的。根据以上情况，我们估计该村可能有我们党的秘密组织，但是怎样才能和他们取上联系呢？

当天下午，我们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公开宣布我们就是湖南、江西过来的红军，并且宣传了我们的宗旨和政策。会后，老乡们的态度完全变了，争相热情地帮助我们，有的给战士们送来棉被、铺板等用具，有的端来大碗的菜，有的立即腾出自己的住房硬要让给战士们住……昨天那种疑惧冷淡的表情完全消失了。

当天夜里，一个身体魁梧的中年农民找到我们纵队部来，声称要找党代表，原来他就是该村的党支部书记。我们兴奋地一直谈到深夜，这位同志告诉我们，通山城里只驻扎了敌人夏斗寅部的一个营，附近各个市镇只有一些“常联队”，都超不过百把人，通山一带也有我们党的秘密组织在活动，但县委却不易找到。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决定先把通山附近的横石潭、扶石、大畈等地的反动民团消灭，以便设法与通山县委取得联系。

有了群众和地方党员同志的帮助，我们就不再是两眼乌黑了，我们很快地掌握了这几个集镇驻敌的详细情况。因此，我们得以奇袭的手段，接连消灭了驻守横石潭、扶

石、大畈三个集镇的“常联队”，缴获了三百多条枪和许多弹药。在打下横石潭的那天，正巧该镇逢集，我们当即向赶集的群众进行宣传。我们捉到的俘虏在进行简短的政治教育之后立即发给路费释放回家。因此，我们消灭“常联队”的胜利消息就迅速在通山一带传播开来，老乡们很快地知道了这里出现了一支红军队伍。

打进大畈的当天下午，在我们指挥部门口，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正忙着写标语，画宣传画，一大群老百姓被这吸引着，都在围着看。我正在旁边观察群众的反映和情绪，忽然看见从人群里走出三四个中年农民，他们低声商量了几句，便朝着指挥部门口走来，其中一位高个子走到我跟前，先打量了我一下，突然很严肃地问道：

“请问，你们的官长在不在？”

“你们找他干什么？”我也很奇怪地打量着这几个人，觉得他们似乎与一般农民不同。

“我们是通山县委会的，想找你们的官长谈谈。”

“你们有没有证件？”

“有证件。”高个子立刻从怀里掏出了一颗木质的圆形图章，我接来一看，果然是我们通山县委会的公章。

“他就是我们通山县委书记叶金波同志。”旁边一个瘦小的年轻人指着那位高个子向我作了直截了当的介绍。

“啊！”我就象在异乡突然遇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简直是说不出的兴奋，一时热泪涌满了眼眶。我紧紧地握住

叶金波同志的手，激动地说：“我就是这个部队的党代表，可找到你们了！可找到你们了！”

当我们走进指挥部和李灿同志等人见面时，他们也都高兴地跳起来。叶金波同志立即写了好几份通知，叫各区委马上派人来大畈开会，并且还写了一张“中国共产党通山县委员会”的大纸条贴在了指挥部的大门上。

这天晚上，我们尽情地交谈了一整夜。叶金波同志告诉我们：在鄂东南地区，各县都有党的组织，由大冶中心县委领导，大冶中心县委的负责人是湖北省委特派员吴梓民同志，还有一支地方武装，番号是“红十二军”，有百多条枪，由谢振亚同志领导。敌人在这个地区防守比较薄弱，仅通山、阳新、咸宁、崇阳等县县城里驻有正规部队，其他县镇只有“常联队”。叶金波同志十分热情地表示要尽力支援我们，再三询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提出了寒衣和兵员补充两个问题，他毫不迟疑地答应给我们解决。此外，他还建议我们选择黄沙镇作为部队落脚的基点。

叶金波同志是那么的了如指掌地向我们介绍了黄沙镇的情况：黄沙镇位于通山东北，距通山四十公里，地处一块大坪地的中央，高山密林环绕于四周，只有两个隘口出进，地势十分险峻。镇上有一千多户居民，各种店铺、作坊都较齐全。市镇附近是肥沃的稻田，棉粮不缺。在那里已经公开地建立了革命政权和农民协会、赤卫队等群众组织，群众的革命情绪很高，我们到那里去落脚是非常合适的。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叶金波同志带着我们从大畈到了黄沙镇。这天，镇上象过年过节一般，到处悬挂红旗，喜气洋洋。据说，大清早，街道两旁就挤满了群众，都在翘首盼望着。当天午后，我们部队才到，先在镇外稍事休息，便整队以雄壮的步伐开进镇街，人群里立刻鞭炮齐放，锣鼓喧天，响起了雷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我们每个战士都为群众这种热烈的欢迎而深深地感动了。

我们到了黄沙镇，真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处处受到当地群众热情的关怀。老乡们为了使每个战士都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他们早已把自己的住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让给战士们住。赤卫队员日夜代替战士们站岗放哨，老大娘们抢着替部队烧饭做菜，青年妇女成群结队地来替战士们洗衣服。通山县委迅速地动员组织了镇上所有的裁缝和大批妇女为部队赶制棉衣，只一个星期，我们一千多人的队伍全部都换上了冬装。许多年轻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纷纷来找我们要求参加红军。类似这些群众热爱红军的事例，一时是说不完的。

部队战士们也以实际行动回答了群众的关怀，战士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帮助群众挑水、打柴，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这就使得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们不但找到了落脚点，而且深深地扎下了根。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旬，我们在黄沙镇举行了大冶中心县委和第五纵队党委扩大联席会议，湖北省委特派员吴

梓民同志和大冶、阳新、通城、崇阳、咸宁等县县委负责同志都赶来出席。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确定我们当时在鄂东南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消灭本区的反革命武装；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主力，发展农民自卫武装，争取在鄂东南地区造成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会上责成吴梓民和一支队党代表游雪程同志执笔写上送党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报告。

部队在黄沙镇休整了半个多月，我们便按照预定的计划，开始了攻打通山城的战斗行动。

我们从黄沙镇出发，一千多农民拿着梭镖、鸟枪一同前往助战。由于事先经过了周密的调查，我们对通山城守敌的情况已了如指掌，该城只驻敌夏斗寅部的一个营，他们与地方民团不融洽，与阳新城守敌范石生部也无联系，只靠驻崇阳、咸宁夏斗寅另一部出援，且通山与该两城均相距百余里，敌人增援是不容易的，因此，我们估计敌人守不住城时一定要向咸宁、崇阳方向逃窜，而这条道路的两边都是山岭，山上林深叶密，最适于打埋伏。于是，我军主力和五百名赤卫队员就连夜插过去，在大路的两边设下了一个伏击圈；另外，以两个连会同五百名赤卫队员悄悄开抵通山城东郊，趁着皎洁的月色布好阵地，准备攻城。

翌日拂晓，我军开始攻城，敌人据城顽抗，打了三个多钟头，城门被我炮火轰开。敌人伤亡惨重，看势不好，



即打开西门往咸宁方向仓皇逃窜，这正好陷入我伏击圈内。突然一声号响，两山红旗齐举，杀声震天，时间不长，即将敌全部歼灭，捉了三百多俘虏，缴获了三百多支枪和许多弹药及一个小的修械所。

战斗结束以后，为了庆祝胜利，当时我们编了一首歌：“九月里来是重阳，红军挺进鄂东南，通山首战打胜仗，缴获敌人兵工厂。”我们在通山城里驻扎了五六天，就回到了黄沙镇。这时，地方党已经动员了一千多名工农积极分子前来参加红军，我们便抽调一批老战士和他们合编为一个新兵营。在当时的游击战争环境里，对新兵哪能够施行正规的训练呢，我们仅仅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射击训练，教会新兵瞄准和放枪，就又出发执行新的战斗任务了。

我们向西北方向展开了游击活动。十一月间，我们侦察到敌人在大冶城内只驻了一个百余人的“常联队”，乃决定攻打该城。这天中午，部队开抵大冶城郊树林里隐蔽起来。大冶城位于韦源湖畔，三面环水，只能从西面进攻。我们于黄昏发起攻击，枪声一响，敌人慌忙拥上城楼守城。我军几十个“爬城队”队员都是些勇敢矫健的青年战士，个个熟练爬城技术，并且有活动云梯、铁刺脚蹬等爬城利器，爬起城来象壁虎一样的敏捷迅速，大家都称他们为“爬城将军”。这次他们一冲到城下，立刻架起竹筒制的活动云梯，在机关枪火力的掩护下，勇敢地爬上城去。那些“常联队”哪里经过这样的情形，不敢再行抵抗，只好乖乖地

缴械投降了。

我们打了大冶之后，接连又消灭了刘仁八、白沙铺、小箕铺、三溪口……等十几个市镇的“常联队”，并且还攻开阳新县城，将驻守该城的敌正规军范石生部的两个营完全歼灭。

一月之间，我军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横扫了大冶、阳新、通山三县，将敌人在这三县的驻军和反动民团武装基本消灭了。先后共缴获迫击炮十多门，重机枪三十多挺，步枪一千余支，还有大批的弹药物资，这就大大地改善了我们部队的装备。我们的队伍也迅速地发展到四千多人，扩编为两个支队，由刘文琪和李才志两同志分任第一、二支队的队长。

经过一连串的军事胜利，我们的活动地区扩大了，部队的武装力量也更强了，鄂东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初步地打出来了。

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思想指导，红五军第五纵队在鄂东南地方党的配合下，在取得一连串武装斗争胜利的同时，在政治上也赢得了很大的胜利。

我们每打下一个城镇，都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在新区，我们特别强调宣传工作，部队每个班就是一个宣传队，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是宣传员。当我们攻占通山县城时，枪声刚停，战士们便分散到大街小巷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战士们的宣传工作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的，有的进行个别

交谈，有的邀请群众开座谈会，有的写标语。战士们创造了标语钢印，把红军的政治口号铸成铁模，打在门窗木器上，就会留下一个不易消磨掉的字痕。在进入通山县的第三天，我们曾举行了一个六千多人的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宗旨和政策。

我们打开了通山县反动政府的“义仓”，把粮食分给贫苦群众；我们打开监狱，解放了受难的无辜人民；我们当时对城中的豪绅巨富一般不杀，只向他们捐一些军饷，对中等商人则不征不捐。这些政策的执行，再加上我军对群众秋毫无犯的实际表现，很快地就打破了敌人污蔑我军“杀人放火”的反动宣传，一些群众过去对红军的误解消除了。

我们从通山县邮局找到几个出身贫寒的邮差，个别地进行了政治教育，争取他们给红军做秘密交通工作。后来就经常地给我们传递消息，送报纸，甚至把敌人的军、政公文也弄给我们，使我们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在通山县城内，我们还缴获了一个修械所，经过我们深入宣传动员，全所三十多个技术工人都愿意为红军工作。我们将该所的车床、烘炉等全套机械设备搬到九宫山下的龙港镇，从此，鄂东南根据地就有了一所小型的兵工厂。这个修械所的所长和工人过去都是敌人汉阳兵工厂的技工，他们经常通过私人关系把自己不能修的枪炮送到汉阳兵工厂去修理。后来，这个修械所搬上了井冈山，加上长沙战斗中争取的部分工人和缴获的部分机器，成了

红军江西兵工厂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我们先后捉到大批俘虏，仅通山战斗就捉了三百多名。我们对他们进行了适当的政治教育，不杀不辱，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且挑选出一些表现较好的施以秘密教育，派他们回到敌军内部去做瓦解工作，他们回去后就向白军士兵宣传红军的好处，给我军送情报，有的就在火线上带动白军士兵向红军缴械投诚。所有的俘虏在经过短期的政治教育后即全部释放，并且每人还发给几块光洋当路费。被释放的俘虏成了红军的宣传员，当有人问他们“红军是不是见人就杀”时，他们立即反驳说：“鬼话！红军不但不杀，还给我们发了几块光洋哩！”这就使红军的政治影响深入到敌军内部，使敌人士兵斗志涣散，一经与红军接触，就纷纷败退或者干脆交枪投降。

有一次，有一个农民跑来向我们报告说：刘仁八镇上来了一队白军，可是打着红旗，正在镇上开饭。我们也觉得很奇怪，我就和十几个侦察员化装成农民前去看个究竟。我们挤进围着看热闹的人群中，只见地上果然插着一面红旗，一百多名白军士兵刚刚吃完饭，只见一个年轻的军官站出来大声地说：“大家都是工农子弟，谁愿跟我投红军的举手！”士兵们都举起手来，接着就热烈鼓掌，周围群众也鼓掌表示欢迎。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这是一支起义的队伍。正巧那位军官又大声地邀请群众讲话，我就站出来向他们讲了一些红军的政策和生活情形，我说：我见到的红军都

是如此。讲完之后，那位军官半信半疑地望着我说：“我看你不象个老乡？”我说：“我就是个农民，红军就驻在我们村上，所以我了解他们，如果你们要投红军，我可以给你们带路。”随后，他们就跟着我到了红军驻地，直到进了指挥部以后，那位军官才知道了我的身份，笑着对我说：“我早就看出来，你不象个农民！”这个白军连队是从大冶拉过来的，那位年轻军官名叫王愚，是该连连长。我们当即将这个连编入了第二支队。

随着我军的节节胜利，鄂东南地区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各县、各乡、各镇纷纷建立了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民主政权，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也组织起来。农村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通山、阳新、大冶等基础较好的县都展开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我们将大批的武器交给各县建立赤卫队、农民自卫军等群众革命武装。小学校的课本也都改为革命的内容，革命歌曲到处流行，广大工农群众的心完全向着我们了，党的政治影响已深入人心，妇女们一边摇着摇篮，一边还轻声地唱着：

“儿呀！儿呀！快点长吧！长大去见毛委员！”

鄂东南广大工农群众热爱自己的红军，我们不断地接到各地群众的慰问信，有的信里热情地写着：“我们的猪已杀好，就盼着红军来吃，你们快来吧！”参军形成热潮，“参加工农队伍！”“当红军去！”成为广大青年们普遍的愿望。当我们打开大冶县城后，经该县县委的动员和介绍，很快

就有两百多名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了红军。

这就是我们在鄂东南地区政治上的胜利，这是比军事上更大的胜利。从此，我们在鄂东南地区才算真正站稳了脚跟。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中央派柯庆施同志由上海赶来，交给我们一项紧急任务，叫我们拦江截取四川军阀杨森的两艘载运军火的轮船。当晚，纵队党委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派遣第一支队全部化装为渔民，以急行军赶到韦源湖通长江的韦源湖口截击敌船，并连夜通知阳新、大冶两县县委紧急动员韦源湖一带的渔民集中三百条小渔船。但是，当我军先头部队赶到韦源湖口时，才查明敌人两艘满载军火的轮船早已在两天以前由此溯江而上了。

部队扑空，决定折回黄沙。行至中途，又接到湖北省委派赵品三、郭子明两同志送来的指示，内言敌独立十五旅有党的秘密组织，内有几个党员，系由程子华同志负责，程在敌军中任排长，该团驻大冶，叫我们通过程的关系设法瓦解消灭敌旅。

这个独立十五旅是十月下旬才开到鄂东南来的，三个团分驻在阳新、大冶、石灰窑一线，敌旅长唐云山率旅部驻石灰窑。我们接到这个指示之后，就将部队开到了韦源湖东岸兴隆铺、曹家大院一线。曹家大院是阳新县苏维埃主席曹德全又名曹大炮同志的家乡，我们就在他家里举行了大冶中心县委与第五纵队党委的扩大联席会议。参加这

次会议的有李灿、陈奇、游雪程、吴梓民、徐策、李琳、柯庆施、赵品三、郭子明、刘省三、曹德全等三十多个同志，经过讨论之后，决定立即与程子华同志取得联系，里应外合，攻取大冶城，乘胜消灭十五旅。

次日，我们即派郭子明同志到大冶去找程子华同志接头。郭子明原在白军曹万顺师任连长，曹师是十五旅的前身，所以当时驻大冶的敌军中有许多人是他的旧同事，他可以利用这些关系进行工作。他临走时，我们与他约定：我军开始攻击时，在湖东岸鸣放三声土炮为暗号，他们听到后，就在城里带领起义队伍策应攻城。

对战斗中可能遇到的情况，我们事先也作了慎重的估计。大冶城突出在韦源湖中（因此也叫大冶湖），三面环水，夏陆通黄石港与石灰窑有大冶两条矿山铁路，所以，只能从西面进攻。如果攻城不能迅速奏效，则石灰窑之敌必来增援，我军就会有两面受敌的危险，而我军撤兵只有一条安全退路，即从湖中的横堤上撤到东岸去，如果横堤大桥遭敌控制或破坏，就只能绕道韦源湖西南一带的山区，而这一带环驻敌军，我们很可能又在途中遭到包围。考虑到以上情况，我们就挑选了一百多名精悍勇敢的战士，化装成渔民，暗藏驳壳枪和手榴弹，分乘二十多条渔船，隐伏在横堤大桥附近，一俟打响之后，他们就迅速地消灭大桥上的守敌，将大桥控制起来，以保障我军退路的安全。

我们又考虑到我们这支四千人的队伍不可能从环驻敌

军的地区经过而不暴露目标，因此，秘密和突然的行动是此次战斗取胜的关键。由于我们决定不走大冶西部的旱路，而打算乘船在黑夜里偷渡韦源湖，原先准备用来截取敌人轮船的三百多条小渔船正好在这里起了作用。

第三天黄昏时分，我军开到了韦源湖边，战士们在田野里饱饱地吃了晚饭，便依次登船，等火红的太阳刚刚落水，三百多条渔船便迎着水天一色的晚霞，一齐向对岸进发。这时正是隆冬季节，寒气袭人，韦源湖上夜色茫茫，星光朦胧，万籁俱寂。大家坐在船上屏息无声，只听咿呀呀的划桨声和船头的浪花声，只看见隐约的大群黑点在湖面上迅速移动，深夜十一时，我军全部在湖西岸登陆了。

部队登陆之后，第二支队即插入大冶与石灰窑之间的公路两侧设伏，准备迎击敌人由石灰窑开来的援军。李灿同志和我带着一支队担任主攻，插到大冶西郊，埋伏在夏陆车站与大冶城之间的山上。

这时，我们又考虑到如果敌人据城不出，我军又不能迅速攻进城去，时间一拖延，会给我军造成许多困难，于是，我们决定先设法诱敌出城，在城外消灭敌人。

翌日拂晓，我们先派一个排到城下佯攻。这个排的排长叫洪超，过去是朱德同志的警卫员（长征开始时任红军师长），是一个非常勇敢机灵的小伙子。他带着战士一下冲到城下，朝城上打了几排枪，敌人团长朱麻子在城上看到人少可欺，就亲自带了一个营出城反扑。洪超同志带着战



战士们扭头就跑，敌人紧追不舍，刚好落入我军伏击圈，两边山上的机关枪、迫击炮、步枪突然一齐开火，军号声、呐喊声震动山岳。洪超同志又带领全排回转身冲过来，两边山上的战士们也一齐杀下来，把这营敌人全部歼灭，敌人团长朱麻子负重伤也被我们活捉了。

我们知道城内还有敌人两个营，立即命令刚被俘虏的敌军司号长吹号调动两营敌人跑步增援，敌人听到声音，果然两个营都跑步赶出城来，我军当即以猛烈炮火夹击敌人，并命令俘虏们大声喊话：

“你们不要打啦！朱团长都在这里呀！”敌人动摇了，骚动了。我军趁机冲上去，敌人这两个营就全部缴械投降了。

这一仗，我军俘敌千余名，活捉了大冶县长吴屏阶和咸宁县长黄思犹，解放了饶正锡等同志（在美国办的医院里当护士），缴枪九百多支，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红军的勇敢和机智。敌人团长朱麻子被俘虏后说：“昨天下午，我们侦探回来，还说附近没有发现红军，真想不到今天早上你们一下子就来了几千人，真是出奇制胜！”夺取大冶城，活捉反动县长吴屏阶和咸宁县长黄思犹，更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当时，群众中流行这样两首歌谣：“十二月里冬风凉（寒），大冶湖中运军忙，夏陆一役打胜仗，人民政权万年长。”“大冶兵暴影响大，独十五旅硬打垮，工农群众笑哈哈，热烈欢迎程子华。”

从战斗开始到我们顺利地进入大冶城，一直未见程子华同志的消息，他们既未出城打接应，我军进城后又不见他来找我们；郭子明同志也失去了联系，我们派人四处打听，也未找到他的下落，究竟出了什么意外呢？

当天正午时分，通信员带着一位年轻的所谓“白军军官”进指挥部来，他一进门就向我报告。原来他就是程子华同志。大家见他来到，都很高兴，热情地围着他问长问短。程子华同志告诉我们：在昨天夜里十一点半，他就组织本连（五连）党员和班长开始行动，干净利落地解决了连里的反动军官，把士兵们集合起来，接着就让党员、班长带领各班分头去解决六连、七连和营部。因为七连在起义前不久调到团部编为迫击炮连，现在的七连是新调来的，连里还没有党的工作，加上天黑，各部分时间没有掌握好，派出去的同志先和七连开了枪。敌人听到枪声后都有了警觉，营部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幸而六连党的工作强，在几个党员班长带领下，把大部分队伍拉了出来。为了减少伤亡，他们没有和敌人硬打，就将这约两个连兵力收拢一下撤出城去，在城郊的一个山头上隐蔽起来。上午只听得激烈的枪响声，但不知我军胜负如何，一直等到正午，从群众口里听到确实情况后，才进城来找你们。

程子华同志还告诉我们，在敌人独立十五旅内的党组织，连他在内只有三十来个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李灿同志大吃一惊说：“这多玄啦！”大家都笑了。

当天夜里，我军就带着一千多名俘虏撤离了大冶城。部队回到三溪口一带进行扩编，经过动员教育，我们争取了一千多名俘虏自愿参加了红军，这是我们部队第一次吸收俘虏成份，我们将他们编为第二支队，由程子华同志任支队长，陈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又将地方武装谢振亚部与我军原第二支队合并编为第三支队，由谢任支队长，游雪程同志为政治委员，这样把第三支队也充实了。这时，我们第五纵队已经扩大到六千多人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下旬，大冶中心县委在刘仁八召开扩大会议，当时五纵队正在黄沙一带整训，纵队党委决定派我和陈奇、郭一清同志前往参加。这次会议，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讨论了当时鄂东南的斗争形势，指出我们必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鄂东南革命根据地。

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我军先后在一九三〇年春节期间和三月中向敌占城镇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游击活动，这就是当时在鄂东南有名的“年关斗争”和“三一八咸宁和汀泗桥的大示威”。

在春节前后的十几天内，我们分散为十几个突击小组，分头向长江北岸和粤汉路沿线出击，以神出鬼没的奇袭手段，予金牛、保安、柏墩、汀泗桥、马桥、贺胜桥、官埠桥等集镇的反动地方武装以严重打击，一共歼灭了十几个反动民团，缴获了四百多条枪和大批给养，活捉了敌咸宁县长黄思犹，并且筹得光洋三万多元。这笔钱和缴获的一

批武器弹药分装为十几个担子，全部送到幕阜山，交给了湘赣省委，记得当时前来接款的是丘训民同志。

三月十八日是巴黎公社成立纪念日，也是段祺瑞等卖国军阀在北京惨杀爱国学生的纪念日。我们选定了这个可歌可泣的日子，向粤汉路沿线城镇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示威。我们猛烈袭击了夏斗寅以两个团据守的咸宁城，又一次扫荡了贺胜桥、官埠桥、马桥、汀泗桥等地的反动民团，破袭了几十公里的铁路，使敌人在粤汉路上的交通停顿了十几天。我们所到之处，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到处都留下了标语和宣传画。这次示威，扩大了红军的影响，鼓舞了敌区人民，震惊了反动派，甚至连武汉、长沙等地的反动当局都恐慌起来，并准备向我们联合进攻。

一九三〇年三月下旬，我奉湖北省委通知，前往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及鄂省党的代表大会。

在我离开鄂东南的四月期间，我军结束了在三溪口、小箕铺一带的休整，出发攻打阳新、瑞昌、皆未克，我军略有损失，瑞昌一役，纵队司令员李灿同志、二支队长程子华同志负伤，最可惜的是牺牲了第二支队党代表游雪程同志。五月间，彭德怀同志率领第四纵队由井冈山来鄂东南，李灿同志率五纵队南下迎接，在修水城歼灭敌人一个团，与四纵队会师。会师后，在彭德怀同志统一指挥下，第四、五两纵队会攻平江，歼敌近二个团，之后，两个纵

队即一同来到了鄂东南苏区。

五月初，在上海召开的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结束了。我带着中央派到我们部队工作的几位同志乘船由上海返回鄂东南。

接着，红五军在刘仁八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第五纵队扩建为红八军，派我担任军长，邓乾元同志为政治委员，柯庆施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何时达，政委郭一清，副政委彭雪枫，在第一次打长沙时，郭牺牲，彭为政委；第二纵队司令员侯中英，政委石衡中；第三纵队司令员谢振亚，政委黄克诚。在这次会议上，同时宣布成立红军第三军团，下辖红五军、红八军两个军（稍后又成立了十六军），由彭德怀同志任总指挥，黄公略同志为副总指挥，滕代远同志为政委，邓萍同志为参谋长。这时候，红八军已经发展到八千多人，红五军也已经扩大到七千多人了。

扩建五纵为八军、成立三军团之后，群情振奋，士气高昂，接着就攻开了大冶和石灰窑、黄石港高地，歼敌两个团，并在黄石港与日寇兵舰交过战。七月中旬，部队在通山、崇阳一带集结，准备开向湘赣地区，红八军主力和红五军一道离开了鄂东南，不久就在三军团统一指挥下，参加了攻克长沙城的战斗。后与一军团会师，在浏阳永和市成立第一方面军，这支部队就成了红一方面军的基础。总之，红五、八军构成红军第三军团，与彭德怀、黄公略同

志平江暴动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在我党建军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红八军主力离开鄂东南时，为了坚持当地苏区的武装斗争，红八军留下了两个营由陈奇、柯庆施、郭子明、刘省三等同志领导，帮助根据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发动群众，打击敌人，保卫革命成果。他们遵循毛泽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不断打胜仗，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同时在红三军团南下节节胜利，攻克长沙的政治形势的鼓舞下，群众也踊跃参加红军。他们在战斗中不断扩大自己力量。一九三一年二月，就以这两个营的主力 and 地方武装沿江游击队等及红五军、红八军留下的少部分伤员为基础，在阳新龙港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是郭子明，副师长刘省三，政治委员陈奇，政治部主任李溪石。这一年七月又将红三师主力扩编为红十五军，军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政治部主任李溪石（以后红十五军渡江北上，到鄂豫皖根据地编入红四方面军）。但在鄂东南地区仍保留了一个红三师的建制，在当地坚持长期斗争。

开辟鄂东南，解放了十几县的人民，使党和红军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根据地。这样，就使湘鄂西、鄂豫皖和鄂东南三块根据地形成三足鼎立、包围武汉的态势，大大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同时为红一、四方面军充实了大批战斗骨干，为当地各级党组织培养了大批干部。鄂东南根据

地对红军和配合各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 红三军团的建立与两战长沙

一九三〇年六月在大冶刘仁八建立了红三军团。它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领导平江起义后编成的红五军的基础上，经过登上井冈山，重返湘鄂赣的艰难曲折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红三军团当时已是一万五千多人的红军部队。一九三〇年初，我们利用军阀混战重演的时机，大大发展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争蔓延到全国十一个省的范围。

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党内的“左”倾错误逐渐抬头。一九三〇年三月下旬，我作为鄂东南区军事代表和红五军代表双重身份去上海参加三个会议，即苏区代表大会，鄂省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我同去的还有几位县委书记和苏维埃代表，其中有湖北省委常驻鄂东南特派员吴梓民，该区苏维埃代表曹德全（又叫曹大炮），通山县委书记易金波，阳新县委书记方步舟，大冶铁矿产业工人代表余海侠（又名徐泽）等，吴是代表团团长。记得湖北省委是任弼时和一位姓段的省委书记等同志去参加，洪湖的代表是段德昌、周逸群，湖南是任荻钦，江西是曾山和熊寿奇，另外一个同志代表四军，我们五军除了我还有滕代远和谭政文同志。会议布置得很周密，先是中央派代表

来把每个参加会议的人分别取了代号，规定了到上海的接头时间、地点和暗号，尔后我们每个人又扮成各式各样人物才乘船出发，我的代号叫沈学杰，打扮成富商模样。那次我特别紧张，因为组织上让我把鄂东南筹集的金子带给中央，幸好途中没有出事。记得当时因为金子在根据地是用土等子称的，到了上海用洋戥子一称，多出了几十两。中央叫我自己用这批金子把家属接出来，把爱人安排在上海，把孩子送去苏联培养。我说金子是根据地人民送给中央的，还是用它为党服务，可从狱中多救出几个同志为党工作。我坚持全部交给了中央。听说后来周以栗等同志被敌人抓去以后就是用这批金子活动出来的。在上海，我们住在指定的启昌旅馆等来人接头，一直住了二三天才接上暗号。开会时根据各人特征，会议把与会人员又重新化装，编了代号，我又扮成了大老爷。会场是租的一栋楼，周围组织了武装便衣队，会场也作了应付突然情况的布置：楼下是我们的一些同志扮成小商贩、修补破烂等；二楼设置成“医院”，也都是我们的人；楼上放了很多油桶、酒精桶；楼后租了一些汽车，万一敌人来了，就点燃汽油酒精，掩护与会人员从楼后乘汽车撤退。正式会场布置成赌场，放了好几副排九、骰子，敌人来了就伪装成赌博模样。所以我当时深感，中央在上海警卫如此森严，比起苏区来工作是多么不便啊！可他们仍不愿搬到农村苏区，坚持城市。

会议由李立三同志主持(当时的中央秘书长)，向忠发、



项英、关向应、董必武、陈潭秋、任弼时、段德昌、李一氓、周逸群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先开了苏区代表大会，由各苏区代表汇报本区党的建设、苏区建设的情况，尔后分析苏区建设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如何吸取各地经验教训，纠正政策上的不统一，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扩大苏区等问题。我于五月六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汇报红五军第五纵队开辟鄂东南的情况。会议开了一半，因发现周围敌人活动反常，停会休息一个星期。接着又开了鄂省代表大会。最后开了红军会议，由各根据地军事代表和各军代表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适应苏区形势的发展，加强红军建设问题和红军的编制体制问题，还决定了军以上干部的配备。会上对扩大苏区、扩大红军，迎接革命高潮到来造了一些舆论，以后我才认识到：这次会议实际上为立三路线的形成作了准备。会议期间，中央给我们鄂东南根据地派了十几个干部，有彭雪枫、黄克诚、卢毅才、张涛、姚醒吾、杨光池、肖振纲、周桓、刘镇、周维、邓乾元、何时达、石衡中、黄应龙……他们既经过理论学习，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优秀同志，因此我特别高兴。会后，分别化装，我装扮商人，周桓当我的小伙计，搭乘英国“太古公司”的大汽轮，陆续回到鄂东南，滕代远和谭政文同志和我们同船回来。船走了五六天，抵达黄石港。因该地敌人检查甚严，我们怕在黄石港上岸可能发生意外，于是，在船靠岸时，我们即在码头附近雇了一只渔船往回

走，在石灰窑以东数十公里之太子庙上岸。李灿同志已派了一个便衣队在那里接我们。我们到了三溪口，会见了彭德怀同志，他高兴地紧握着我的手，说：“长工师傅成为‘暴发户’了。”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六日，在大冶刘仁八召开了五军军委扩大会议，会上由滕代远和我传达了上海三个会议精神。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成立八军和红三军团。军团长为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军团司令部由五军军部兼，五军的军长和政治委员分别由彭德怀和滕代远兼，部队有七千多人。以后由邓萍和张纯清接任。我们五纵队扩编为八军，管辖三个纵队和几个直属队，共约八千多人。我为军长，政治委员是邓乾元，李灿是副军长，参谋长是卢毅才，副参谋长洪超，政治部主任柯庆施。第一纵队司令员何时达，政委郭一清，副政委彭雪枫，在第一次攻打长沙时，郭牺牲后彭为政委；第二纵队司令员侯中英，政委石衡中；第三纵队司令员谢振亚，政委黄克诚。另外，原五军一纵和湘赣地区地方武装编为独立十六师，师长孔荷宠；在一打长沙后扩编为红十六军。原八军的留守部队与鄂东南地方武装编为独立第三师，师长郭子明，政治委员陈奇，以后到鄂豫皖扩编为红十五军，军长蔡申熙，政委陈奇，政治部主任李溪石，参谋长郭子明。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军事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彭德怀同志任书记，军以上干部均为

军事委员会委员。军里也成立了军委会，我为八军军委会书记。那时，军队都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对外。会议还决定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战术，扩大苏维埃区域，扩大红军，以威胁武汉，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根据当时中央上海会议的内容作出的。

三军团成立后，我们又一起第三次解放了大冶城，并相继打开了黄石港、石灰窑等重要城镇。记得在打黄石港时，江面上的日本舰艇向我岸上开炮示威。我随即命令用我们缴获的迫击炮向敌艇还击，把敌舰打了好几个窟窿，据说打死了四十多个敌人，敌舰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以后我们又打下了鄂城、金牛、保安等大的城镇，筹了大批军饷和装备。

回顾红三军团这一段曲折发展的历史，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形成对政治和军事的正确领导。

七月初，三军团在通山县召开了前委会议，主要研究下一步军事行动问题。会议分析了敌情，认为岳州钱大钧部已调到武昌，中央要求攻打武汉已不可能，岳州城内空虚，我军应趁机攻占岳州城，尔后相机行动。

通山会议后，部队随即向岳州进发。这时敌人在岳州还有王东原旅部及一个多团。因为我从小在岳州读过中学，对城内地形很熟。我就首先组织八军一个小分队趁敌人不注意，隐蔽地从北门人梯爬上城楼，尔后用机枪从城墙上

向下俯射，顿时城内敌人乱作一团。接着我们又乘机搞了几节火车皮，让部队乘坐在火车内进城。战士们一下车就向敌人猛打猛冲，经过几个小时的市内争夺，消灭了敌人一个多团，其余残敌乘船仓促逃往后山。占领岳州后，江面上英、美、日兵舰又向城岸开炮乱轰，我们用打岳州缴获的钢炮奋起还击，打得敌舰狼狈逃窜。打开岳州我们还活捉了十几个关卡主任及太太，我了解到他们都有很大一笔财产，就命令部队优待他们，派了汽车送他们回去，结果他们给我们送了很多银元。这次打岳州收获很大，我们缴获了一火车武器弹药和大批大米、服装，并收入五万多块银元。在岳州城陵矶对岸的白螺矶有段德昌前来策应的游击队，我们及时和他们取得了联系。他们派来了十几个人乘两条小船来，经请示军团领导，我们送给他们两小船武器弹药和粮食等。还邀请他们参观了我们的部队，并要他们注意我们的行动。我还给段德昌、周逸群同志亲自写了一封信让他们捎去。

七月十五日左右，部队开到平江，准备短期休整。这时三军团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有两个军的师以上负责同志参加。会上分析了敌我力量变化。认为当时正处于蒋阎、蒋张（张发奎）等军阀内战正酣之际，长沙何键的主力离开长沙去打桂军了，城内只剩下七个旅，其中五个步兵旅，一个炮兵旅，一个骑兵旅，除何键的女婿李觉旅（是湘军王牌）战斗力较强外，其他都是杂牌部队；而我们打下岳

州后，武器弹药都得到了补充，每个军都还保持着一个教导队可随时补充部队干部。我军对长沙地形、敌情也比较了解。更重要的是长沙这个湖南反动统治的巢穴，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何键在这里，继上海“四·一二”、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以后，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五·二一”马日事变，长沙城十多万革命干部和群众死于反动派屠刀之下，真是鲜血染红湘江水，尸骨堆满橘子洲。还仍有一大批革命同志被关在狱中，亟待解救。所以解放长沙城，活捉何键，为十万死难烈士报仇已成为全体官兵和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会议决定趁虚袭击长沙城。记得当时会上除个别同志持保留意见外，其他同志也都一致同意。会后，各部队抓紧军政训练，并准备于七月二十二日举行庆祝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活动。战士们听说要解放长沙城，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在大战长沙中杀敌立功。

敌人知道我攻打长沙的消息后，于七月二十二日派了四个旅，以师长刘建绪为指挥，从长沙先向我平江发动了进攻。敌人分两个梯队，当第一梯队两个旅进至晋坑时（距平江城十五公里），遭到我八军的正面阻击。我们背后就是江镇，江下水深不能徒涉，红军背水作战，因此指战员英勇奋战，顽强杀敌，打退了敌人好几次进攻，敌人也没能前进一步。在八军正面阻击下，彭德怀同志率五军迂回至敌人两侧，这时，两翼奋起夹击，很快把敌人歼灭，少数残敌拼命向回逃窜。这次战斗消灭敌人近两个团，俘虏

敌人一千多，缴获两千多支枪和一些武器弹药。为了阻止敌人主力向长沙增援，我立即派了一个排去炸汨罗江大桥。因为当时没有炸药，我们就在每个桥墩上连续浇二十四桶汽油燃烧。用这个办法炸毁了两个桥墩，阻击敌人援兵不能从桥上通过。战斗结束后，我又抓紧审问俘虏，进一步了解敌情。我从俘虏的一个敌人副营长口供中得知：湘军从北伐战争时期的一支革命军到马日事变逐步转变为反动军队，与人民为敌。士兵和下层军官大都是被抓、被逼或逃命而来的穷人，他们病残、年大退伍后，生活上毫无保障。少数上层军官还保留有革命思想，他们对何键整天成千上万地残害群众日益不满，对前途非常悲观。再加上敌军内部又层层剥削，互相敲诈，军官为了自己捞腰包，不但虚报实力冒领薪饷，还层层克扣，士兵所得无几。因此，官兵矛盾非常尖锐。另外，嫡系部队与其他杂牌队伍矛盾也很突出，王牌李觉旅新式装备都优先补充，给养也充足，而杂牌部队则装备陈旧，给养奇缺，但战斗中却把他们部署在前面当炮灰，因此所谓湘军“不可战胜”现在已名存实亡，内部互相矛盾，士气低落。了解敌情后，我立即向军团作了报告，这样就更坚定了我们乘胜攻占长沙的决心。

红军在消灭晋坑敌人后，乘胜向敌人的二梯队金井发起进攻。金井离晋坑约十五公里，碰到敌人四个旅，前面两个旅是比较能打的，这样八军正面打，五军打包抄。为了扩大战果，就把十六师主力加上来，反复争夺阵地，把

敌人打下去了。此时，我从桥上下来，滕代远拎着驳壳枪跑来，说：“长工，敌人主力被我们打垮了，可以直取长沙城。在我们猛烈扩大炮火下，继续打击溃败之敌，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在晋坑告捷后，乘胜前进，八军仍担任正面主攻任务。这一仗打得虽有所失，但部队士气仍十分高昂。而敌人没有估计到我们有这么强的战斗力，火力这样猛。此时我组织连队一些特等射手，专门打敌人的旗子，敌人一看自己旗子一倒，就象无头苍蝇乱作一团。战士们一鼓作气，越战越猛，打得敌人纷纷缴枪投降。五军仍担任迂回断敌退路的任务，这样前后攻击，使敌人不知所措，更加慌乱。这次又消灭敌人近一个团，活捉敌人一个团长。但由于五军迂回得慢一些，我军也受些损失。纵队司令何时达，政委郭一清都牺牲了，部队也遭受一些伤亡。

打下金井后，我们赶到长沙近郊永安市，军团又召开了各军负责人紧急会议，会上进一步分析了当前敌情，认为何键主力在桂林和张发奎相持不下，无法回来，而长沙之敌经过晋坑、金井两个恶仗已损失了两个多旅，真正保持元气的只有湘军王牌——李觉一个旅了；而我们部队经过各军自己的教导队补充，仍保持原有的建制。部队士气高昂，越战越勇，而敌人则士气沮丧，越战越怕。因此，根据敌我基本力量的变化对比，认为夺取长沙城的条件已经成熟，机不可失，我们应乘胜打下长沙城，解放全市人民和狱中同志，为死难的烈士报仇。另外还研究了攻城的

部署。八军作为总预备队，相机迂回，要我相机而行。记得在这次会上，原来对打长沙持保留意见的同志也转变了态度，拥护攻占长沙城，并积极要求分配工作。会后，各部队抓紧作攻城准备。战士们听说马上要打长沙城，活捉杀人刽子手何键，更是勇气倍增。记得我们还编了一些宣传口号发给部队，在战斗中鼓舞士气。如：坚决捣毁反革命老巢长沙城，解放受苦受难人民！”“坚决消灭湘军王牌李觉旅，打破湘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活捉何键，为马日事变中死难的烈士报仇！”等等。而敌人一贯过高地估计自己力量，看不起刚刚建立不久的年轻红军。何键老贼把他的看家王牌李觉旅共四个团部署在七里港、乌梅岭一带坚固工事里，构筑了好几道防御阵地，并亲自到前线督战。他狂妄地嚎叫：“我长沙城固若金汤，一只红军小丑竟敢跳梁？你们乖乖地当俘虏吧。”敌人的如意算盘从来都是落空的。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十点钟左右，就在敌人得意忘形的时候，彭德怀指挥红五军已经向长沙近郊朗黎浮桥发起猛攻，继续向敌人主阵地乌梅岭、七里港发展。八军担任侧后迂回任务。我组织了三百多人的敢死队，沿河搜集了几十条小船，前面船上还用铁皮、沙子、棉花等搞了几层象坦克炮塔一样，保护机关枪手的射击，战士们称为土坦克。战斗发起后，在纵队司令谢振亚统一指挥下，敢死队驾驶着小船在前面一边划船前进，一面猛烈地向岸上敌人扫射，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二、三纵队在他们的掩护下，



利用船渡、游渡，紧紧在后面跟进，他们很快到达对岸——杉木港。一上岸就勇猛地冲入敌人阵地。岸上敌人顿时混乱，我军趁势一阵猛打猛冲，很快就夺取了阵地，消灭敌人约一个团。接着就向七里港、乌梅岭敌主阵地攻击。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能强渡杉木港，插到他们侧后，所以主阵地的敌人也慌了手脚。我们边打边向敌人喊话：“湘军弟兄们，我们都是工农出身，我们都是一家穷人，你们不要为何键刽子手卖命啦！”“和尚不亲帽儿亲，人不亲枪杆子亲，我们穷人不打穷人，你们赶快缴枪吧！”“何键主力已被打垮，长沙城将立即被占，你们赶快起义立功吧！”原来敌人主力都部署在前面一、二道防线坚守，后边都是一些警察和杂牌队伍，我们一打，又经过政治宣传，敌人纷纷投降，有的就拼命向城里逃跑。我军指战员发现敌人进城逃命，就按照军的原来命令，立即换上白军衣服一起混进城。守门敌人也辨认不清，只估计是他们自己队伍被敌人打败逃回，因此毫不阻拦。这时，五军和敌人争夺仍很激烈，我和军参谋长到朗黎市浮桥一侧高地向阵地观察时，发现他们几次冲进阵地又被反击下来，部队有的已经溃乱向浮桥撤退。我立即带领第一纵队跑上浮桥增援，并对往回撤退的五军同志大声说：“五军同志注意，我是八军军长，八军已占领杉木港迂回到敌后，敌人全线动摇，很快就要被打垮，你们不要紧张，一切听我指挥，向城内进攻。”这时果然敌人的射击逐渐稀疏，有的已向回逃跑。我知道我

二、三纵队按计划已经奏效，于是立即指挥他们进城。记得前进中看见五军师长郭炳生，他一见到我，就说：“军长，军长，我们怎么办？我的队伍都散了。”我说你立即集合队伍进城，去荷花池背武器（因我早知道荷花池是敌人武器库）。接着又在一个土堆旁看到彭德怀同志，他说：“长工，你来得正及时，赶快指挥部队占领城市后向南追击敌人。”我说城内已经有了布置，请你赶快下命令，五军归我指挥随我进城扩张战果。他表示同意。我就继续指挥一纵队和五军少数部队进了城。这时已经是深夜十点多钟。城内敌人一看红军进城，就慌忙逃跑。何键也顾不得指挥队伍，带领少数侍从逃命。后来从俘虏口供中得知，红军只差几分钟没活捉到何键，我们感到很遗憾。在攻打长沙的第二天，有一万农民进城，帮助运输、抢伤员，对我们鼓舞很大。

进城后，军部设在小吴门外韭菜园圣经学校。我立即指挥二纵队派一个大队占领伪省政府，缴获所有反动文件和反动武装；一个大队占领所有监狱，释放狱中同志，保护他们安全转移；一个大队占领三个城门，与五军东南面部队取得联系，监视增援敌人，并派部队占领荷花池武器库，组织群众协助我军把武器搬运至城外保存。三纵队派一部分部队占领发电厂、面粉厂、米厂，封锁米船不让逃走；一部分部队占领坡子街闹市，封闭一切银行，当铺和金银铺，不让资金外流，并负责维持社会秩序，严防坏人捣乱。

军团政治部立即组织宣传群众，没收官僚买办资本，救济穷苦工人，并组织群众成立各级工会和各级苏维埃政权。按照军团统一意图，我和参谋长、政治部负责同志迅速拟了一个安民布告，布告以八军革命委员会主任何长工的名义签发。主要内容是：一、我军宗旨是民权革命，红军保护各界和所有外国人正当的利益，除官僚买办资本和大土豪劣绅外，一律在保护之列，各行各业各界要正常营业，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定，有捣乱者，一律查办不殆。二、所有敌军官兵，迅速将武器缴送本军，本军一律优待，负责保护生命安全，欢迎参加红军，回家者发给路费，违抗者严惩。三、所有外国兵舰立即撤离湘江，离开岳州以外水域，违者炮击。四、没收（封闭）一切银行，所有货币流通无阻，商店照常营业，一切货物不得随意涨价，尤其是米、菜食品，不准囤积居奇，违者惩罚。五、所有交通民警一律照常维持秩序，邮政电报恢复正常营业，学校一切公共事业正常工作，发电厂不准借故停电，不得消极怠工，违者处罚。六、本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公买公卖，不得无偿征用群众劳动力，不能无故进驻私房和外国人住地。有违犯者请群众检举揭发。八月一日，我们在教育坪召开了一个各界群众大会，大约有十万人参加。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主席李立三，执行委员有何长工、彭德怀、王首道、滕代远、杨幼磷、袁国平、张启龙等同志，我为军事部长。在大会上我和彭德怀同志讲了话，群众代

表也讲了话，进一步宣传了党的“六大”纲领和各项政策，揭露敌人罪行，宣传占领长沙的胜利。会上还惩处了破坏我党长江局、害死湖南省委书记郭亮同志的叛徒苏先骏（秋收起义团长）以及一批破坏红军进城、扰乱治安的坏人。我还召集各国驻长沙的领事馆、教堂、医院、商团和记者等外国人参加的会议，有三百多外国人参加。会上我用法文和英文给他们讲演，向他们宣传红军占领长沙后的各项政策，要他们不要惊慌，红军保护外国人合法的经济利益和贸易信交自由，并明确告诉他们，不准做危害红军的事情，通知本国兵舰迅速撤离湘江。各国记者要如实报道消息，不能反宣传，各教会只能正当传教，否则就是敌意，红军将采取不友好的措施。最后我还详细地阐明红军宗旨和纪律，并请他们监督。这时有个人递条子问，外国人如何帮助红军？我说，我们现在急需抢救双方伤兵，但医药器械不足，你们可以用国际红十字名义，本着人道主义原则支援我们一些医疗器械和药品，尤其是外国的手术器械和麻醉药品。我讲完后，发现他们都一个个显得很惊奇的样子，但刚进会场的恐惧心情都已消失。后来直到一九三一年宁都暴动后，毛主席找我谈话要我到红五军团十三军任政治委员时才弄明白原因。当时刘伯承同志告诉我：你们五、八军占领长沙以后，当时共产国际一些老头们（指老布尔什维克党员）都很惊讶。他们根据英国路透社报道一个英国主教目击红军攻占长沙的文章说，有一个青年军人，看起来

班长模样，给外国人讲话，外文流利，讲得不错，有人说红军是无组织没文化的一群粗暴队伍，其实大谬不然，实际上他们是一支有文化、纪律严明的军队。刘伯承同志说那些共产国际老头问，你们红军为什么成立不久能战败湘军打开长沙这样大城市？这位青年军人是谁？连我们当时几个在场的中国人也费猜测。这时毛主席笑着补充：“他和陈毅是外国游子，陈毅打长沙没去，一定是长工。”这是后话。可见，当时打开长沙城，确实被当作奇迹，震惊中外。

进城后，我们还及时抓了内部整训。一方面组织红军和群众到敌人的刑场悼念就义的烈士，让烈士家属和我们一起控诉敌人的罪行，另外还请从狱中解放的同志控诉敌人对他们施用的各种酷刑和摧残，并由领导干部带领，组成慰问团到医院慰问伤兵，从而教育部队和群众进一步激发革命义愤，防止麻痹轻敌，时刻准备应付敌人的捣乱和反扑。把缴获的武器弹药，装备平江、浏阳赤卫队，红军自己也都全部换了新的武器。城郊的浏阳、平江群众武装在张启龙同志带领下，进城帮助红军搬运武器弹药和伤兵，还协助捉土豪劣绅，维持秩序。有些工厂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市内由于红军的措施严密，政策大得人心，也没再发生什么大的动乱。工人、市民等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红军，家家门口都挂起了红灯庆祝解放。工人还组织了宣传队和我们联欢。尤其是狱中在押的几千名同志，他们当中有的第二天就要被杀害，如向仲华、曾佑生、许建国（又叫许

力清)等,把他们从狱中救出来,个个都热泪涌流,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等口号。当时长沙的群众为了庆祝胜利编了很多民歌,还记得有这么几句:

七月里来创奇迹, 五、八军将士大显威力,  
三战攻克长沙城, 消灭何键整整五个旅。  
七月里来讨军阀, 五、八军部队力量大,  
三战突进长沙城, 解放同志向仲华。

占领长沙的第八天,我们发现何键主力一部由桂林向长沙急进,分别在衡阳、益阳集结。这时,我曾经两次向军团建议,我们是孤军进入长沙,现敌人主力已迫近,或主动越过湘江向敌人进攻,把敌人赶至常德山地,或是和湘鄂西贺龙、段德昌领导的红军取得联系,与他们会师,结果都未采纳。过了两天,敌人就占领了长沙西郊岳麓山。军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军撤出长沙。省苏维埃也召开会议,研究红军撤退后,党组织转入地下如何开展秘密工作的计划。八月七日拂晓,敌人从大北门、小北门攻进市内,我们边阻击边交替掩护撤退。当敌人从东南门过江时,我们又乘敌混乱之际,消灭敌人两个团。然后才从乌梅岭、朗黎市撤出长沙城。这时五军在易家湾、猴子石一带一边阻击敌人,一边掩护我军撤退。

部队到浏阳休息了一天。晚上有人报告说,在离浏阳十五公里的地方,我们的后方警戒哨兵和敌人的前哨侦察接触,打了一下,敌人也没再前进。我们决定第二天拂晓

再走。这时五军也赶到浏阳。军团却要我们继续前进，让五军在浏阳宿营。我估计敌人一般晚上不敢轻易行动，部队又刚刚休息不久，对五军在此宿营也没有影响，于是就让邓乾元同志去军团请示，让部队休息半夜，拂晓再走。邓回来说，彭德怀不同意，让八军再前进十五公里。这时部队已熟睡，我也睡得迷迷糊糊地说：“还是休息到明天拂晓再走吧，出了事我负责。”没想到第二天竟突然下命令撤销邓乾元政治委员职务，并派来保卫队缴了他的枪，牵走了他的马，说是因为昨天夜里不执行命令。弄得我当时也心情紧张，惶恐不安，心想不知会对我怎么办？下面部队也有议论。但我知道彭德怀同志的个性，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说服部队要执行命令，不准随便议论，就带领部队继续向平江前进了。记得当时部队很疲劳，处理此事军团没有开什么会议。在第二次打长沙中，原八军参谋长卢毅才因为过去在莫斯科学习，回来时说了几句斯大林的坏话，在战斗中又有争执，就被当作托派杀掉了。现在看来处理得都有些草率。

我英勇的红军战士三战三捷一举攻克了湘军何键盘踞的老巢——长沙，歼灭敌人近五个旅，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通讯器材（军用电台九部和九百部电话单机及被复线等），筹款四十万银元，解决了红军被服和医药困难，扩大红军七八千人，大大增强了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同时处决了党内叛徒和一大批反革命分子，解放了几十万长期遭

受反动统治的全市人民和狱中几千名党的优秀儿女，建立了第一个全省的苏维埃政权和总工会，这些胜利将永远载入革命的史册，否认这些胜利是不合事实的。从军事意义上讲，红军当时正处在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转变中，在攻占长沙中及时分析敌情，审时度势，根据敌我力量急剧变化，乘虚袭击，穷追猛打，迂回包围，强攻和巧妙伪装相结合等战法，都为红军完成从游击战发展为运动战、阵地战的战略性转变提供了宝贵经验。当然，第一次攻打长沙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期发生的，它虽然不是按照立三路线的命令去打的，但它的胜利却对于推行立三路线起了支持作用。它虽然胜利了，但不能用这些胜利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这一局部的胜利也补偿不了这条错误路线在全国其他方面的损失。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一历史事实。

再战长沙。

八月中旬部队进到长寿街附近宿营。这时部队又进行了整编补充，统一把纵队改为师，八军辖四、六两个师。四师师长是黄云桥，政治委员彭雪枫。六师师长为谢振亚，政治委员黄克城，每个师辖三个团，军部还有特务营。整编以后，机关精简了，战斗部队加强了，教导队又充实了。

一天，部队正在训练，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同志带着一个连到我们驻地，说一军团在牛行车站从报纸上看到我们占领长沙的消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指示，一军团要来和三军团会师，部队已向万载挺进，派他们先来



联系。随后我们三军团也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他们一起回去，当面向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汇报，和一军团取得联系。袁国平回来后说，朱、毛决定两个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准备按中央指示成立第一方面军。这时，一军团在文家市消灭湘军戴斗垣一个旅。

八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永和市附近集结。会师后召开了两个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朱德同志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任方面军总政委。并建立总前委，书记是毛泽东同志。各军的负责人为前委委员或常委。整编后一军团辖三、四、十二三个军和地方部队的二十、二十二两个军。三军团辖五、八两个军和地方鄂东南的十六军。会议奉命决定第二次攻打长沙。

根据方面军命令，八月底，红军分二路向长沙城推进，三军团沿第一次打长沙路线在乌梅岭一线占领阵地，一军团在长沙东门、南门和三军团形成围攻长沙的态势，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亲临前线观察敌情。长沙敌人虽然城内有近三十多个团的兵力，红军只有十几个团，但因为敌人有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戴斗垣又在文家市被歼，一个旅在猴子石被歼，所以敌人再也不敢在城外恋战。他们对原来的工事进行了加固，就凭借工事顽强坚守，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时我军缺乏强大的炮火，又无攻坚经验，因此数次猛攻不克。有一次，八军六师攻破守城工事，正在扩大战果时，遗憾的是，突然后面我们的预备队向前打枪，顿时引起混

乱，贻误了战机。无奈拂晓前又撤出城外，尔后红军就采取诱敌出击而歼之。一天，敌人果真从南门出击，敌人刚一出城，就遭我军迎头痛击，使敌人又慌忙缩回城内，只歼灭敌阎仲儒旅两个团。以后敌人就再也不敢出城了。我军围攻半月，估计敌人出击的机会不多，敌人援兵也逐渐赶来，我们久留长沙不利，于是就有计划撤出，分头向袁州和吉安前进。攻下吉安后，召开了峡江会议，确定在赣江与闽江之间建立根据地。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红军第一次攻占长沙就是处在当时军阀内战方酣，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空前发展的形势下进行的，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红军官兵（包括敌人内部）推翻何键反动统治的强烈要求。尤其是军事上根据敌我基本力量的急剧变化，利用敌人空虚、乘虚袭击的有利时机才取得了胜利。在今天新的长征中，这些历史经验仍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 峡江会议前后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全国革命形势很好，农村革命根据地一块块的建立起来，红军和赤卫武装不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但是，正当革命事业向前推进的时候，党内“左”倾情绪又有了新的发展。李立三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了起

来。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下的党中央，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以及鄂省党代表会议。这些会议是为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当然它的形成也有其国际背景）作准备的。我以双重身分（红五军、鄂东南根据地代表）出席了这三个会议。会议精神集中到一点，还是“城市中心论”，提出了“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左”倾冒险口号。后来，在这条错误路线推行之中，不论白区党的组织，还是农村革命根据地、人民武装力量，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对此，广大党员、军民极为不满，由怀疑、抵制，走向反对。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二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围攻长沙的部队撤围，进占萍乡、株洲待机。为此，在易家湾开了一个会，说服领导干部。这时，一、三军团给养业已告罄，所以把部队分散到萍、醴、攸三县（均是白区）之后，必须在此一面大力筹款，同时还必须帮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赤卫队。十三日总前委在株洲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作出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团攻取峡江、新淦的决策。此后，红军分几路开回江西。三军团和我们红八军进驻临江府一带，担任对南昌、九江方面敌人的警戒任务。这样，经过一系列会议，一次次的争论，总算把方面军从长沙周围撤下来了。

可是，事物总是曲折前进的。就在一军团于九月二十

九日午后在宜春发出“照原计划拟于明（三十）日由此地（宜春城）出动，经分宜向吉安前进”的命令之后，当晚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同志，带着长江局的命令来了，准备说服一方面军党的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要方面军仍开回去打长沙。周一到宜春就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盛情款待，并向他进行了通宵达旦的叙谈，陈述打长沙与打吉安的利弊，说明了第一次打长沙进而又出没站住脚的主要原因是群众条件不具备，红军在力量上亦不足。第二次打长沙，还是缺乏群众条件，成为单纯的红军攻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攻大城市的条件还不具备。结果，周以栗同志被毛泽东同志说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和来此的使命，并完全接受了正确路线。

之后，在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支持下召开了袁州会议。因为当时我在临江府一带执行任务，没能参加这个会议。事后听说，会是在一个中药铺里召开的。会议决定了不再回师打长沙，也不马上去打南昌，而是要打吉安。此举是战略转变中的重要一着，可使赣西南广大红区连成一片，而进一步“经营江西”革命根据地。袁州会议可以说是红一方面军反对“立三路线”斗争的一个前奏，或者说是思想准备，因为第一次打长沙攻占了又放弃，第二次打长沙为时半月之久未克。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员。它在启发教育着一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明显地证明了“立三路线”是行不通的。

十月五日，一军团夺取吉安后，就召开了吉安会议。之后，于十四日移师北上。在向袁水流域推进中，毛泽东同志在沿途主持召开了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除了开会，毛泽东同志还忙着找干部谈话，继续解决行动问题。

峡江会议和稍后的罗坊会议我参加了，由于当年戎马倥偬，事过境迁，时间久长，一些事情被易逝的岁月冲淡了，但有些事情至今印象深刻，记忆犹新。我记得总前委是十七日在峡江一个资本家的店房里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即峡江会议。对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均有决议。参加会议的总前委委员、军以上干部有：毛泽东、朱德、朱云卿、杨岳彬；一军团林彪、罗荣桓、黄公略、蔡会文等；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邓萍（五军军长）、张纯清（五军政委）、我（八军军长）、袁国平（八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长江局代表周以栗；还有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一部分同志，如曾山、曾炳春、李文林等。李井泉、古柏同志作记录。与会者一共不到三十人。

会议开了一夜。上半夜对所议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主要问题是：

- 一、是不是继续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 二、过不过赣江及诱敌深入，也就是说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还是赣江以西白色区域。

会上毛泽东同志有个敌情报告，谓敌军罗霖、毛炳文、公秉藩、张辉瓒、邓英、谭道源等六个师的兵力开到南昌，

向樟树蠢蠢欲动。正象毛泽东同志十九日在峡江致湘东特委信中所指出的：“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一九三〇年七月我们打长沙时，敌人曾嘲笑我们“小丑不能跳梁”，可是偏偏“小丑”抄了他们的老巢，一举攻克长沙城，几乎生擒何键老贼。从此他们看到了红军的力量，不可小视。这时，蒋冯阎军阀混战已告一段落，他们的反动统治受到了革命的威胁，就勾结、“和解”，妄图扑灭革命，对我们方面军渐成“围剿”之势。敌人磨刀霍霍要来进攻了，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当时的大前提还是敌强我弱，而具体看湘敌强，赣敌弱，我们要“诱敌深入”，以弱胜强。同时，西岸夹在湘、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之东呢，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的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实际上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经验的继续。

三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相反，主张不过赣江，还要打南昌、九江，怕丢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三军团的兵源在这一带的占优势，不愿意离开这里。一军团也有人认为，从秋收暴动时起，在赣江西岸就有基础，也不愿意离开这里。当时“立三路线”的盖子在下面还没揭开，打南昌，攻九江，取得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

份的首先胜利的影响还严重存在，所以会上的争论，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没为大家所接受。但是，毛泽东同志反复用敌情变化的事实，阶级力量估量的观点来分析形势，教育大家。

会议一直争论到下半夜才休息一下，这时三军团的同志砸了个头，我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这样坚持下去，势必一、三军团要一个河东、一个河西，就不能集中拳头砸向敌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权衡利弊，赣江西不如赣江东。滕代远、邓萍、张纯清也持有类似的意见。彭德怀同志也感到若再这样坚持下去，一、三军团有可能就要分处赣江东西，则不能集中兵力对付敌人，必然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大家的思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只有袁国平同志的思想还未全通。从整个会上看，我记得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意见一致，一军团的罗荣桓同志发言少，是拥护毛泽东同志主张的，地方上的几位同志很少发言，主要是“看会”，看军队同志的态度。曾山同志是很好的，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但是向南浔路发展，打南昌、九江的问题还有少数同志并未得到完全解决，因而峡江会议还留下了这样一条尾巴。这反映在一方面军的历史文献和毛泽东同志的信函中。有等待大多数干部、战士觉悟之意，还有斗争策略问题在其中。

总之，我认为峡江会议是一方面军总前委反对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我们党内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

斗争开始。

客观形势的急剧变化，给我们提出了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为继续解决“立三路线”问题，十月下旬的一天，我们一方面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罗坊的陈家闹召开了联席会议，这就是有名的常说的罗坊会议。记得峡江会议的参加者均出席了这次会议。彭德怀同志没参加。

罗坊会议是峡江会议的继续和具体化，具有集体办公会议的性质，把峡江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决定下来了。所以这次会议不象峡江会议争议得如此激烈；但这次会议还是要割留下的尾巴。主要议题：

一、关于打不打南昌、九江这样的大城市问题。通过这段，大家认识到了敌强我弱的形势，总结了两战长沙的教训和建设农村根据地的经验，两相对比，感到再不能进攻中心城市了，很需要在吉安、南昌间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壮大革命力量，筹款筹粮准备反“围剿”。因为敌情较前更严重，高安、上高一带有敌公秉藩、罗卓英两个师，樟树有张辉贇师之两个团，丰城有邓英师，万寿宫有敌一个师，彭启彪旅在南昌附近，许克祥开往湖口附近，谭道源师胡祖玉旅在南浔路，蔡廷锴、蒋光鼐两师已开到鄂南，湘敌李觉师进到袁州，计有敌军十万，开始向我前进。大家深感大敌当前，形势逼人，现在不是进攻大城市的问题，而是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了。从而纠正了“立三



路线”打南昌、九江的军事冒险计划。

二、关于如何反“围剿”的问题。战场是摆在赣江以西还是以东？是就地打还是后退打？在打法上是“诱敌深入”还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由于前一个问题得以解决，所以在作战方针上，峡江会议提出的“诱敌深入”，这次会议就决定下来了。红军东渡赣江，退到根据地内作战，打破敌人的进攻，粉碎蒋介石的“围剿”。

会议于二十六日通过并印发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简称罗坊会议决议），讲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个决议，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我体会它的基本精神是反“立三路线”，这只要和“立三路线”的言行稍加对照就一目了然了，兹不赘述。至于文件中有些“左”的词句、“左”的口号，都是历史的痕迹，要历史的对待，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它的精神实质。同时要看到，一条路线、方针、原则的转变不是一下子能够实现的，不是一个命令，一个指示马上能够解决的。要团结大多数，尚要等待人们的觉悟。在罗坊会议前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还没传达下来，多数人不了解。其实还有个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问题，尤其部队是打仗的战斗组织，更要保持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

罗坊会议的主要功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不打大城市；一个是“诱敌深入”，决定十一月一日发布命令东渡赣江。这不仅又回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来，而且在军事

上由进攻转入积极防御，由游击战向着运动战转变。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从实际行动上就完全否定了“立三路线”，基本上解决了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方针、原则问题。这个胜利的取得是与一方面军党的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和严守纪律，顾全大局，既反“立三路线”，又团结大多数的政策分不开的，也是和毛泽东、朱德同志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分不开的。

总之，袁州会议是反“立三路线”的良好开端；峡江会议开始转变；罗坊会议是峡江会议的继续。文件和基本精神峡江会议就有了，罗坊会议正式形成。现在史料上和党史界一般讲罗坊会议的多，讲峡江会议的少，因为罗坊会议的招牌响亮一些，它把峡江会议的内容决定下来而且具体化罢了。

罗坊会议决定了过赣江的日期。我们三军团大概是在十月五号，在峡江与樟树之间的新淦过的江。过江时是架的双浮桥。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及总部是在峡江过的江。“文化革命”期间，我到峡江去落实峡江会议的旧址时，峡江县的同志还找了当年的一个船夫同我会面。他回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峡江过江的情景。现在看来峡江会议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才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 第九章

## 从创办红军学校 到建立红军大学

### 受命创办红军学校

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在白色区域包围的红色根据地，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大事。星星之火，渐成燎原。对此，蒋介石气急败坏，纠集反动力量妄图扑灭红军的规模越来越大。为适应这一形势，正规培养提高红军指挥员的任务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为此，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决定在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建立和扩大军事学校。

在这片红色区域的土地上，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的时刻，一天毛泽东同志在宁都小布找我和邓萍谈办学校的事。他说，我们决心下点本钱“镀”这个红点子，开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国共合作时有黄埔，我们现在要办一个

“红埔”，调你们两个军长和四个师长，还有十几个团长和政委来办学校。根据蒋介石其人的本性，估计战争形势会越打越大，“围剿”的时间距离也越来越短，如果我们给他有力地打击，我们反“围剿”的时间就会拉长，那么，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培养红军干部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们必须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色指挥员。毛泽东同志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它有几个系：一是保定系，如陈诚是保定军官学校的；一个是日本士官系，如汤恩伯等；一个是胡宗南的黄埔系；还有一个如湖南程潜、康生智及其他省的讲武堂毕业的讲武系。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虽有人民的支持和参加，为战胜敌人，也需办校、治军，学习战略战术，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

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我军在初创时期，为适应游击战的特点，各地红军都办起了教导队或随营学校“随战随训”。一九二七年，我们党发动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起义后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攻打平江、浏阳等长沙的卫星城的战斗过程中都失利了。这固然有其诸种因素，但从军事上讲多数指挥员尤其是基层的指挥人员，没经过培训，军事知识差，技术战术也不大懂，不能适应这种新形势；再加上毛泽东同志虽为秋收起义前委书记，但由于在从安源去铜鼓的途中被民团阻截，在机智脱

险后，但没赶上当时秋收暴动司令部。这是部队遭受严重挫折的血的教训。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就办起了教导队，有学员一百来人。吕赤为队长，陈伯钧为支部书记。吕、陈以及游雪程、敬梦修、徐彦刚、王良等人，原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为军官教导团的。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他们有的就从事教导队的工作。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和朱德、陈毅同志在井冈山上会师之后，又在原来教导队的基础上办起了教导大队，学员一百五十余人，陈毅、张之江曾先后负责过这项工作。一九三〇年在立三当政时期，让我们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守敌何键有几个旅，同时还有帝国主义助战。这是一场大仗、硬仗、恶仗。虽然歼敌三个步兵旅、一个炮兵旅、一个骑兵旅，打垮四个步兵旅，占领长沙，我们获得胜利。但是我们伤亡也很大，如纵队司令何时达和政委郭一清，还有纵队长陈毅安牺牲了。好在我们有随营学校和教导队，随时可以向部队补充干部。还从部队中提拔了一些经过战争考验的战士。所以在长沙战役之后，红三军团由打长沙时的一万多人，迅速扩大到二万多人。战争的实践，使我们对于开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重要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了。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谈话不久，我和邓萍等同志肩负着党和红一方面军首长的重托来到瑞金集合，开始了筹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工作。这在我们的革命生涯上也发生了

重大变化，由战场转向学校。当时为集中统一训练各类干部，把肖劲光、林野负责的闽西彭杨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命名）和一、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组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始内部叫总队，我任总队长、邓萍为训练部长，周以栗为政治部主任后欧阳钦接任。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任命叶剑英为总参谋部部长，肖劲光为校长。肖到任不久就调走了，由我负责学校工作。我走后，刘帅任校长，后来，我又回校工作，直至分编红校。红校组织精干，只有校、训、政三个大的部门，教工人员少，我们既是校领导干部，又是学员，还兼教员，一身三任。红校是培养红军连排基层干部的综合学校。又把红校作为总预备队用，随时准备参加反“围剿”的战斗，因此它的编队是保持着战斗序列的。学校开头有四个步兵连，后又编为政治营、军事营、特科营，以至团。时隔一年又成立了一个上级干部训练队。从此，我们红军的中高级干部才开始有了培训的机会。红校第一期大约有四百来人。随着反“围剿”战争的加剧，在通过扩红创造百万铁军的过程中，为红校全盛时期，学员达到了六千人之多。学制三个月至五个月，但学制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根据战争的需要、前线的需要而定。红校共办了六期，造就了许多红军干部，现在我们部队中的一些高级干部都曾在这里学习生活过，在这里洒下了他们辛勤学习的汗水。红校学员质量好，来自红军中身经百战、实战经验丰富的工农分

子，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党团员。同年冬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从上海来中央苏区瑞金，还特地到红校视察。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我们红校还组织了军事体育运动会。学员们身着深灰色的列宁装，迈着威武整齐的步伐，气宇轩昂地参加运动会。这位当年曾任过黄埔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看后极为高兴，称赞不已，对我说：长工，这所学校比当年黄埔办得好，军政素质高，都是从战场上调下来的骨干，有这么一个好的学校，我们的腰杆子就又粗又硬了。这虽说是鼓励，但也说明了红校情况。

红校之所以办得好，除了上面说的一些原因外，首先是置身于战争环境之中的党和根据地人民对办军事学校非常重视，用了很大力量来办这样规模的学校，它集中了既热爱教育事业，又有军事专业知识的各类人才。学校领导除叶剑英外，刘伯承同志也负责过学校工作；并且陆续调来左权、黄火青、陈赓、伍修权、吴亮平、张日新、周子昆、苏进、孙毅、韩振纪、庄田、阿金、宋发明、郭化若、陈伯钧、方维夏等红军中的领导干部和留学生以至教育家来校任教；还有专职文化工作者如赵品三等；还有从上海左联来的知识分子崔音波（朝鲜人）和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李伯钊，从上海来的石联星以及台湾的施月娥、施月英等等。在我们党直接领导下，开办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军事学校还是第一次。它既无现成的教材，又无多少治校经验，也没有供军事训练的现代设施，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办起来

的。

虽说这里是学校，但它是一个很实际的大课堂，学习军事知识，总结战场上的亲身实践。就是说，在敌强我弱、“围剿”反“围剿”的频繁战争环境中，怎样把仗打好，怎样把敌人的优势变成劣势，把我们的劣势变成优势，又怎么变弱者为强者……针对蒋介石的那一套，要总结出我们战胜它的办法。敌人有比较现代化的装备，且有兵工厂、大后方，帝国主义的援助。我们呢，我们要靠敌人装备我们，我们所占优势的也是我们藉以欣慰的就是我们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我们的强大后盾，也是我们的基础。因此我们在战争中要趋利避害，扬长避短。你蒋介石纵使有八个拐杖，我们有九个，这就是比他多一个广大的人民群众，又有我们军民坚如磐石的团结。在战法上我们和蒋介石完全不同，你打阵地战硬拼消耗，我打游击战，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你在外线，我在内线……敌变我变，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实就虚，掌握紧、松、虚、实的规律，随时取得指导战争的主动权，我们红校，就遵循着这样的训练方针，来提高我们人民武装力量指挥官的指挥能力。

训练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教育。进行政治教育的总的目的是巩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使每个学员都懂得为党的事业英勇奋斗。为此，它的内容是以党的纲领、政策来教育全体学员，借



以提高全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水平，不仅使红军指挥员、战斗员英勇善战，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同时进行时事政策、形势任务教育。还讲革命故事、游击区的地形、地理、现实情况等等。在教学方法上，按照《古田会议决议》中所讲的教授方法，采取讨论式，发给教材，学员分组讨论，组长小结。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提出问题，再作解答。这样，学员学习兴趣浓，所以收效也比较大。

二是军事训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我们红军自己的经验为主结合苏联的建军经验、日本的战斗纲领、法国的战斗条令、苏联的合同战术和蒋介石的大杂烩，制定出适合我们红军特有的战斗条令，培训指挥员，以提高全体红军的军事技术。至于战术的学习，开始以苏联陆军步兵操典第二册为主，后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一方面研究蒋介石的战略战术，因为要战胜敌人，必须了解敌人；同时，要向学员要教材，也就是说学员来自前线，把他们各自斗争的生动情况，拿到学校里来。那时刘伯承同志，以他丰富的军事知识，把他所指挥作战的亲身体验，所掌握的战术特点和实际斗争经验有条不紊的加以整理、总结、提高 成为一套与实际、作战、训练相结合的，适合当时反“围剿”的军事理论，使战斗得来的经验更有理论性和系统性，编成教材，灌注于学员之中。这样来自部队又回到部队中的富有生命的东西，若不是王明机会主义者

瞎指挥的干扰，肯定在反“围剿”的战斗中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三是学文化。在旧社会，广大工农群众是没权利学文化的。因此，我们这支工农子弟兵文盲、半文盲占了多数，这是学习军事科学知识的拦路虎。要打开知识的宝库必须有钥匙，所以扫盲是当时红校教育训练的一个任务。红校是在扫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好文化的。配有专职文化教员，有自编的学文化教材，首先从易记而又和每天打交道的生活用语开始，到学写家信，以至批条和战斗文书……这样抓重点，由简而繁，由易到难，由浅到深，收效不小。文化学习，对学好政治、军事起到了“拐棍”的作用。

红校经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教育，学员们的阶级觉悟、军事技术以及文化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红校在红军革命化、正规化建设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由北方调往江西“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宁都举行起义，参加红军。起义后的第三日中央军委就宣布了成立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毛泽东、朱德同志亲笔签名委任原二十六路军的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等为军团领导人，并编为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为加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加速进行改造工作，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的一条就是从老红军部队中，调进一批优秀的各级政治工作和供应工作的干部，同时提拔了一批在起义部队中表

现较好的军官和士兵充实领导层，还挑选了一些人如黄镇、蒋耀德等送红校深造。

一九三二年一月的一天，毛主席在瑞金叶坪找我去谈话。在座的还有刘伯承同志。毛主席很诙谐地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动一下，为要加强对宁都起义部队的领导，帮助他们整顿和改造，准备调些骨干去。但他们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压压台。肖劲光去当五军团的政委，刘伯坚去当政治部主任，十五、十四军政委要由左权、黄火青去担任，你到十三军当政委。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毛主席说过之后，我思考了片刻就说，准备给我配个什么班子？毛主席看我愿意前去，高兴地说：你点吧。我就点了刘型、欧阳健、慕容初强（于化民）几位红军的师政委，还有赖传珠去做秘书工作。同时要求派聂荣臻同志以中央代表身分到十三军，以便及时取得十三军和毛主席的联络。毛主席说罢，刘伯承同志插话说，毛主席叫我接你的红校工作，我从上海中央刚到这里不久，对红校的情况还了解不多。他说，一九三〇年秋，我和左权正在苏联学习时，你们占领了长沙城，共产国际的老头们找我们谈话，其中问你们红军为什么能打开长沙？湘军是强的，说明了红军的力量已不可小视。原来英国路透社一个主教写了一篇报道，说是你召集了三百多个外国人讲话，

作了政策性的宣传。主教说，一个青年军人用一口流利的外语讲话，有人说红军是一股赤匪，野蛮无文化，他说却不然，红军是一支有组织、守纪律、有文化的军队。从中可见红军办的随营学校、教导队对军队建设的重要作用。刘帅言未及卒，毛主席欣然大笑，说：何长工、陈毅是外国游子。

到十三军后，部队经整顿和整编，在战争的烽火中逐渐成为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一九三二年春部队调至南线，参加了不应该打的赣州及南雄等战役。之后，在宁都的小源召开政工会议期间，我要求聂荣臻同志转达我去苏联学习并治疗伤腿的意见，当时周恩来副主席批准了，由王如痴接替我的军政委职务。我准备到瑞金办赴苏手续。可到了瑞金事情变了，中央组织局任弼时同志通知我，暂不去苏联治腿，让我重返红校接替刘伯承同志的工作。于是，我带十三军的一些同志，记得有参谋长周子昆，还有孙毅、韩振纪和苏进等二十多人来红校工作。刘伯承等同志热烈欢迎我们回来，一见面便跟我开起玩笑来：你这个跛子，跛来跛去的，到前线还没把你跛倒？

## 红军大学起瑞金

回到红校工作一段之后，于一九三三年夏秋间，根据我军武装和技术的发展，需要增设新的学校。中央军委决

定要扩编改组红校，让我筹建红军大学。一提起大学，人们总是要和繁华喧闹的大城市联系在一起。可这所大学倒也特殊，它既不在城市，也不在村庄，而是在瑞金西郊没人居住的山沟里，名字叫大树下的地方。这里，苍松掩映，泉水淙淙，环境雅静。我们经过现场勘察，由我和几个同志设计，当年我在比利时学点建筑本领，如今才有机会得到第一次的运用。此后，上级又拨给两个劳改连建造校舍，在政府和群众的热情支持帮助下，再加上红校工作人员和学员的创造精神，不久校园里一栋栋在苍松翠柏环抱下的两层楼房拔地而起，那边小小的山岗上是防空掩蔽部，这边是课外活动的中心——俱乐部，还有模型室……这欢腾的森林中的大学，把这万年沉睡、僻静的山沟唤醒了。我们看到用辛勤的汗水建成的我们党培养红色指挥员的最高学府，有谁不心花怒放呢！

同时，红校还分编彭杨步校（第一步校）、公略学校（第二步校）、特科学校 还有通讯学校等。已经办了六期的红校，不论对部队建设，还是对军校建设，都起到了酵母和种子作用。

红大于一九三三年冬开学，军委任命我为校长兼政委。红大当时组织极为简单，分高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指挥科，参谋科，后勤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专职教员仅有十六人，其他均由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兼课，或从前线回瑞金的将领来校作报告 如：周

恩来、朱德、王稼祥，还有董必武、瞿秋白、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等负责同志都曾来校作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专题报告。红大还赋予改造俘虏、改造白军军官的任务，对转变过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如郭化中、陈士骥、何迪宙等，我们量才录用，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他们原系保定和黄埔军官学校出身，又熟知我们的敌手国民党，我们把他们留下充任教员，发挥他们的作用，这对搞好教学是非常必要的。红大学员来自中央红军，各部队是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调学的。来校学习的都是些很好的同志，他们久经战争的陶冶，又在红军建设上有很大的功绩，是多次反“围剿”中战功卓著者，其中有荣膺中央军委红星奖章的。现在我们党政军领导人之中，在当年的红校、红大校园里曾留下了勤奋好学的足迹。

红大是培养红军干部的熔炉。红大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以及适应这一方针、内容的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上，总的说来是随着党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红军的技术、装备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红大和红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和联系实际基本相似，不过红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教学对象上和深度、广度上都和红校不尽相同。两者较之，红大是前进了。红大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之后，在蒋介石准备百万大军行将第五次“围剿”之前，形势处于非常紧张，战斗相当频繁，教学任务极为繁重的情况下开学的。它详细总结了前几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并化为红大

全体教工、学员的政治营养，使学习和斗争不断提高。但由于王明机会主义者过分强调正规化，干扰了正确的东西。不过来红大深造的这些干部，在以往跟随毛泽东同志的战斗中，其正确的战略战术，一些传统的人民战争的战法，在他们之中有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红大很重视干部素质的提高，研究如何把红军造就成真正的人民军队，把工农组成的游击队变成正规军，以迎接严重的斗争。研究在平时怎样教育管理部队，建立正规生活，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巩固政治委员制度，特别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军阀残余。要求每个学员干部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韧不拔的战斗作风。

红大联系实际广泛开展校际和社会活动。与彭杨、公略、特科、通讯、供给、卫生等学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本来是一家，有着共同之点，情同手足的兄弟学校，更可取长补短。不过红大起着教育的核心作用，各校的教育计划中央军委指定由红大统一拟制，并经常派出考察小组到各校指导。一切为着前线，无论是何种突击动员，如扩大红军、选举、查田、春耕秋收、慰劳祝捷以及整理新兵师团等等无不参与。曾受到《红色中华》、《红星报》的好评。特别是红大和部队的联系是血肉不可分的。学校是红军的缩影，红军是学校的扩大。红大所教所学的，也就是红军所作所用的。红大之所以联系实际好，还在于它有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校领导班子，学校的负责人和教工人员经常是部队、

机关、学校轮换和交流，经常是前线后方，后方前线。红大为党为红军培养了好多人材，如宋任穷、韦国清、程子华、曹里怀、周建屏、郭天民、彭雪枫、张宗逊以及刘道生、吴克华、唐亮、杨梅生、陈外欧、蔡顺礼、刘兴隆、帅荣等等，都曾在这里学习生活过。

尽管红大工、学人员处在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为适应这一环境的文体活动搞得却相当的出色。俱乐部成为课外活动的中心，到处歌声嘹亮，斗志昂扬。每两周一次文娱晚会，还有赵品山主持的话剧团经常演出。学校各队都有列宁室，各单位墙报办得有声有色，文图并茂。红校和红大办了几种刊物：《红校周刊》，后改为《红校生活》；还办过《革命与斗争》、《红色战场汇刊》以及后来办的《红炉》，颇受校内外同志们的欢迎。同时，定期组织军体会和球赛（当时篮球不易买到），使学校生活更加富有生气。文体活动之所以搞得好，除与领导上重视外，还同热爱这方面工作的专业人员如赵品山、石联星、危拱之（红大总支部书记）的具体组织领导有关，又有校外胡底、李伯钊等的热情赞助，加之上海来的搞文艺的知识分子如左联的音乐家崔音波努力参与俱乐部的工作。由于红校、红大办的生动活泼，所以成为红色指战员仰慕的地方。因此，其他根据地来中央苏区和本根据地来瑞金的同志，总是被吸引到这里参观一番。

艰苦困难象块磨刀石，它在砥砺着每个人。红大也同



我军一样是在同困难搏斗中生长、壮大起来的。内有人力、物力、财力和开始办校经验不足等困难，特别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外有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红大成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空袭的目标。但这一切都不能阻碍它的前进。我们虽然被敌人封锁，日常用品奇缺，连食盐都很困难，经常吃带苦味的硝盐，吃草包饭（因食粮困难只有吃用草包包着定量的份饭），但困难是吓不倒富有创造精神的红军的。为战胜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自力更生创办了军人书店、军人合作社、畜牧场、碾坊、园圃。同时，这又是教职工、学员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地方。我们用双手创办的校园，可惜在我们离开中央苏区长征之后，被那一小撮“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民族败类、反共专家们所毁。

一九三四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的火药味更浓了，这时我由红大调往中央苏区的南大门——粤赣军区，由周昆接替了我红军大学的工作。由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长征北上。长征开始，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变成了干部团，在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委以及肖劲光、罗贵波等同志的带领下，在长征中发挥了他们专业知识和勇敢战斗的重要作用。

## 第十章

# 长征前后

### 奉调粤赣军区

一九三四年初春，我在参加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由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奉调粤赣军区工作。

这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阶段。不甘休四次“围剿”被红军挫败的蒋介石，置日本扩大侵略、国土日趋沦丧、面临即将亡国灭种的危险于不顾，在“攘外必先安内”和“宁赠友邦、勿赠家奴”的卖国逻辑下，根本不听我们党和海内外爱国人士抗日救国的正义呼声，反而热衷于打内战、变本加厉地进攻苏区。纠集百万大军，聘请德国顾问，于一九三三年秋对红军及其根据地发动了新的进攻。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天上用了百架飞机，地上布下五十万重兵，四面合围。北路顾祝同，西路何键，东路蒋鼎文，南路陈济棠，实行“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新战法，妄图达到彻底消灭红军，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

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经过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已连成一片，人口达三百多万，中央红军拥有五六万，还有更多的地方武装。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土地革命、经济、文化建设获得了可喜的成就，创造了模范的后方工作，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在这之后，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为使南方战线的军事指挥统一，以便集中力量，更好地开展反“围剿”的斗争，就以江西军区的三、五两分区合并，改设粤赣军区，以统一于都、赣州、信丰、会昌、安远、寻邬等十县的军事指挥，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正式宣告成立粤赣军区。在我去之前，毕士梯、张云逸担任过司令；罗屏汉等曾担任过政委；陈漫远等担任过政治部主任。他们都领导过粤赣军区的工作，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过。这不仅对南方战线，就是对整个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都是非常有利的。可惜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使战争每况愈下，越打越糟。

王明是在一九三一年被推上台的。他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气势汹汹地夺取了全党的领导权。博古、李德继承其衣钵，推行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脱离中国实际，完全背离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在我们多年的奋战中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正确路线，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把错误推向极端。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混淆

革命性质，打击排斥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同志，打击排斥支持毛泽东的在福建的和中央苏区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他们挥舞打着“洋”字烙印的权棒，大反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一整套的战略战术原则，撤去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开展查田运动，加强经济建设，发展农业生产和文教事业，支持革命战争，改善民众生活，做打“基础”、筑“铜墙铁壁”的工作，从实际行动上批判了王明的机会主义。

在红都瑞金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一天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反“围剿”战争当前比较吃紧。为防患于未然，为了前线，需要加强领导力量，我们考虑来考虑去认为你比较合适，想把你的工作岗位换一换，到粤赣军区去当司令兼政委。接着，周恩来同志站起来把双手向前一伸，加重语气说道：长工同志，这是一副放在你肩上的重担……。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寻思着我们党内分明摆着的正确与错误的现实，使我陷入沉思之中。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一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从事红军运动，开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深受毛泽东政治、军事路线的熏陶。但王明他们上台之后，这些都吃不开了，借肃反之名，来打击陷害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搞得人人自危，心有余悸，我去了怎么办，这如何是好？此时此刻，

我的心境象十五个吊桶提水——七上八下的，思量着我去能担得起这副重担吗？我的心思一下子被恩来同志的眼光照透了。他跟我谈思想，作指示，现在回忆起来记得有这么几点：一是要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二要注意同南线对手、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统战工作。陈对蒋介石来说是很顽固的地方实力派；三是补充前线；四是供给给养。接着朱德同志也给我谈了话，主要讲南方战线的军事斗争。他说，要以防御为主，不要主动去进攻，也不要刺激他，当然他要打来，我们应予还击。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从来是相辅相成，巧妙结合。周恩来和朱德二位领导的谈话，给我指出了工作的方向，也解去了凝结在心头上的疑团，增强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去南方战线斗争的信心。

但在当时，由于王明冒险主义者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折腾，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不适当地搞正规化、阵地战，和蒋介石国民党军兵对兵、将对将、集中对集中、碉堡对碉堡地硬拼起消耗来。这样，我军所在之处，碉堡林立，战地除禾，劳民伤财，有失人心。堡垒主义者不仅没有挡住敌人的进攻，反而竟搞得捉襟见肘，鸡飞蛋打。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方门户——广昌，经过激战，于四月陷落。敌分兵四路向我们进攻，形势十分紧张。“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显然是彻底破产了，博古、李德（华夫）又来了新花招，叫做“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在我们红军的整个兵力部署上，虽说是北（北方战线）重南（南方战线）轻，但

和其他战线有着同样的情况，也是分兵把口，以碉堡对碉堡，和敌人拼消耗。同时，在地方工作中，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限制中农发展的错误的土地政策，使部分群众发生动摇，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部分群众“外逃”的现象。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正在设法改正这种政策。但也是困难重重，力不从心。

在与敌人闯进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的同时，南方战线也紧张起来，为配合北线向根据地腹地的进攻，蒋介石喝令一直覬觎韶关的南线总司令、广东军阀陈济棠，向我南线粤赣军区进攻。于一九三四年，李扬敬的第三军两个纵队（其中有两个“王牌”师）的兵力，向我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发起了全线的攻击，遭到我军的英勇抵抗。一时中央苏区的南方战线，杀声震地，烽火连天。“左”倾冒险主义者虽高喊碉堡对碉堡，可我们是什么样的“碉堡”？说起来实在可笑，它是用泥土石块堆起来的，因此既不能“碉”，也不能“堡”，只能作茧自缚，自欺欺人罢了，怎么抵挡住敌军的飞机和大炮，所以敌人一攻就破了，更何况地处南线的粤赣军区只有很少的部队呢。好在陈、蒋为了各自的利益矛盾很深，陈和我们拉关系，有默契。

粤赣军区只有一个二十二师的正规红军和三个军分区以及十来个县，每个县一个独立团的地方部队。一分区是在于都的小溪；二分区是在福建的河田；三分区是在筠门

岭。二十二师是我南方战线的主力部队，驻守筠门岭一带。它在一九三二年六月是独三师九团，于一九三三年六月间，奉中央军委命令，由粤赣军区二十三军改编为二十二师的。在我去粤赣军区之后，奉上级之命，这个师又得到了充实，辖有六十四、六十五和六十六三个建制团，全师约有八千人。龚楚、程子华、周子昆先后任过师长，方强、黄开湘当过政委，孙毅当过参谋长，史友生、刘道生等担任过政治部主任。由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打阵地战和敌人顶牛，仗打得十分艰苦。陈济棠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向蒋介石显示他的“武功”，决以拿下南线军事重镇筠门岭。根据他们军事上的企图，我红二十二师分三线筑堡布防，第一线在岔口，第二线在盘古隘，第三线在筠门岭。在进攻中敌人实行堡垒推进，占一地修一地。当敌军占领岔口，又突破了盘古隘的时候，都遭到我们英勇的抵抗，与敌浴血奋战，给敌大量杀伤。我特等射手一枪击中了敌团长邱福成。敌人不得不说，红军虽然少，但战斗勇敢。战事终因敌众我寡，政策不对头，而节节失利。盘古隘既失，那么筠门岭就失去了屏障，数倍于我的敌军如探囊取物；可王明冒险主义，仍然命令二十二师修筑碉堡，“死守筠门岭”。但在敌军一、二纵队的合围和飞机大炮的轰击下，我们付出了重大牺牲，一个个英勇的战士牺牲在王明错误路线之下。今天回想起这些无畏的烈士来，还觉心中难过。四月中旬，在敌军强大攻势下，我们弃守筠门岭。部队在大雨

滂沱中，踏着泥泞崎岖的道路，撤到筠门岭以北的新开河高地，连夜筑工事，严阵以待。一方面敌军遭我英勇抵抗，红军并非好惹，另一方面陈济棠主要为了自身的利益，给蒋介石耍起了“外打内和”的鬼把戏。这当中，一来和蒋讲条件，二来和我们秘密谈判，因此他停止了对我们的进攻。这时我红二十二师退守站圻，在中村召开全师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进行筠门岭战斗总结。

当时，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蒋介石反动派又发动的对苏区的大规模的“围剿”，内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酷统治，真使我们处于忧心如焚的艰难境况之中。每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每个正直的中国人，都在为中华的前途着想，都在为中国的光明谋出路。我们中央苏区正在北方战线打仗，在南方战线的严重时刻，毛泽东同志又来到了赣南会昌。

山城会昌是粤赣之间来往的要道。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在向广东进军中曾在这里激战过。一九二九年春，毛泽东、朱德在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时也在这里战斗过。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它距离红都瑞金不远，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是粤赣省苏维埃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在第五次反“围剿”日趋紧张之际，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为我们红军的前途计，曾多次来到这里。

我自从来粤赣工作之后，就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了，处在王明路线统治之下不免有思念之情。



为毛泽东同志工作方便，我和他住在一起，生活予以关照，工作上多方支持。当时他身体不好，又处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特别是蒙受王明路线的迫害和打击。尽管如此，但从他的言谈和行动中却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愁闷和不快，他总是那样情绪饱满，豪爽乐观，不计个人恩怨，从全党全军团结的大局出发，光明磊落，模范地遵守组织纪律，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的出路着想。白天，他不是置身于群众之中，就是到粤赣省委了解情况，或者深入部队做调查研究。筠门岭战斗后，毛主席亲自给在站圻总结工作的二十二师政委方强打电话，询问筠门岭战斗的情况。后来，大约是炎热的夏天毛泽东又亲临站圻前线接见了部队的领导干部。他身着和战士一样的灰色的红军服装，脚穿一双粗布鞋，和蔼又亲切地同大家促膝交谈，询问敌情、作战经过，询问红军战士、干部的生活和思想，询问群众情况和地方工作。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找边沿区一些县区干部谈话，了解党、政、军的情况。晚上不是找人谈话，就是看书或是伏案写作，为了中国革命事业，不知他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在这当中，我作为军区司令兼政委又是粤赣省委常委和宣传部长来说，理应向他汇报南线军民反“围剿”的情况及我的看法。我说，领导上不从实际出发，在我调来粤赣军区之前，命令部队在筠门岭一带修了些堡垒，但都是土造，没钢筋水泥，一摧即垮，贻误战斗，不仅毫无用处，

反而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因此，我来这里之后就没大修筑这玩艺。

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很感兴趣地问道：

“为什么？”

我说，根据现在的敌我形势，在敌强我弱下，我们仍要搞老套套——游击战法，家家是堡垒，户户是哨所，没必要修人为的碉堡，在乌龟壳里怎么能打游击？净挨人家的揍！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和我们一起制定了作战计划和部署，并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利用矛盾，壮大自己。又说，目前仍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我们不能按教条主义者的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这叫以卵击石。为保存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毛泽东同志明确指示我们，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在地方党、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还要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并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同时还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派小分队化

装到敌占区去作宣传，也取得了统战的良好效果。由于“左”的政策，又加上敌人利用当地“铲共团”，欺骗群众，挑拨群众与我们的关系，特别是站圻、罗田那个地方的群众工作比较复杂，因而我们和群众的关系不大好，甚至有些对立。一次二十二师在罗田打仗时刚过了一座桥，群众把桥给破坏了。当毛泽东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特别强调了军民关系。他说，我们所说的游击战，就是农民群众的战争。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做好群众工作，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毛泽东同志的话音没落，我立即想起了一件事：那是一九三二年，毛泽东同志在住老古井医院时，他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作社会调查，写成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草稿。尔后用壁报的形式张贴出来，公诸于群众，请工人、农民、干部、战士阅读提意见。每天晚上，房子里灯光闪闪，济济一堂，笑声琅琅，边读、边议、边修改。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根据在兴国和才溪乡、长冈乡的调查，又作了补充修改，这就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报告的一个部分，给我们提出了“组织战争，改善群众生活”两大任务。

毛泽东同志的话如同灿烂的阳光，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粤赣省党政军工作开始有了新的转机。从部队到群众，从对敌斗争到根据地建设，在毛泽东同志指示后的短

短的时间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军事上，主动地、有计划地到敌后去打游击。如在寻乌境内就打了几个小胜仗。消灭、抓获了许多敌人，获得不少战利品。使部队生活稍有改善，还第一次吃到牛奶罐头呢。就在毛泽东同志即将离开会昌的前夕，于七月中旬在一个碧空如洗，清风拂面的早晨，他和粤赣省的一些负责同志，从文武坝出发，渡绵江，过五里排和黄坊，健步登上会昌城外高峰——岚山岭。毛泽东同志站在高山之巅，纵览郁郁葱葱、山地起伏的粤赣锦绣河山。他回到文武坝之后，急忙欣然命笔，写下了题为《清平乐·会昌》的激昂诗篇：

东方欲晓，	会昌城外高峰，
莫道君行早，	颠连直接东溟，
踏遍青山人未老，	战士指看南粤，
风景这边独好。	更加郁郁葱葱。

这首词当时在省委常委中进行传阅、讨论，她以“风景这边独好”的形势教育我们，以“踏遍青山人未老”的革命精神和坚强斗志来激励我们。

然而，王明机会主义者，却下达文件批评我们粤赣军区存在脱离战争、和平训练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扬言要无情打击这种观念。可见它和实际斗争是多么的大相径庭。

一九三四年秋，我离开粤赣军区机关去和陈济棠的代表搞统战谈判。而粤赣军区随着党中央及中央红军的转移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 长征前的一次和谈

一九三四年春夏之间，毛泽东同志多次不辞辛苦来到中央苏区的南方战线——会昌，指导工作，虽不在位仍谋其政，为党为红军为人民的出路操劳。会昌是粤北赣南通往的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他在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在这里写下了《清平乐·会昌》不朽的诗篇。“风景这边独好”是对南方战线统战和谈稳定局面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同志来南线的时候，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紧张的阶段。当时蒋介石纠集了五十万大军，兵分四路，从四面八方合围中央苏区。东、西战线尤其北方战线，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指挥下，采取“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硬顶的战法，在敌人现代化的武装下，战争打得残酷、激烈，我们损失相当大；可在南方战线却不然，有一个局势比较缓和的“奇观”。从中可见，我们在兵力部署上，为什么北重南轻，只有一个红二十二师？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挫败，党中央及其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北上抗日，为什么又选择南方战线赣南粤北作为突破口转移西征？此情此景当时大家是历历在目的，我们今天来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为史学界所关注。

在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中，南路总司令为陈济棠系粤军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争权夺利，同

床异梦，历来矛盾很深，曾三次通电反蒋。在这次“围剿”中虽把他绑在战车上，给予总司令的桂冠，但陈与蒋出于自身的利害，都打自己的小九九，因此在这次“围剿”中，也并不想在粤北、更不愿意在江西替蒋卖命，消耗实力。陈深知蒋介石其人，奸险狡诈，反复无常，对他忽打忽拉，居心叵测。蒋介石要他从南路进攻红军乃是“借刀杀人”、“一石两鸟”，想使他与红军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与蒋介石及红军的三角关系，事关他能否独霸广东地盘，永据“南天王”宝座。因此，陈济棠“进剿”红军行动缓慢，一直覬觐韶关，未完成碉堡封锁线，目的是防堵蒋介石中央军入粤，力图偏安广东地盘。所以他在兵力部署上是在粤东的兵力大于入赣兵力，为十七个团与十个团之比。与其说是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倒不如说“主要是为他们自身的利害着想，目的是防堵红军入粤桂地区。”<sup>①</sup>迨至十九路军闽变失败后，蒋介石遂即派其嫡系李玉堂等部，陈兵闽西南地区，威慑广东。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庐山给陈济棠派出的代表杨德昭巨额助金，促使进军；又为配合西路何键向河西、湘鄂赣的进攻，蒋介石一再向陈济棠发出催战令。在威逼和利诱下，陈知道进攻红军没有好下场，而按兵不动又怕蒋介石翻脸。于是他只好对蒋介石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他一面

<sup>①</sup> 宋希濂：《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期）。

派部队向我筠门岭进犯，一面又同我们拉关系，作试探性的和谈。

一九三四年四月，敌人攻占了中央苏区的北方门户广昌，向我腹地推进。这时，在南方战线，陈济棠派李扬敬的第三军为骨干组成南路军，有两个纵队，投入六个师、一个航空大队、一个重炮团的兵力，向我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在这一带，我们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是作战的主力部队，对于敌人的进攻，在澄江、岔口、盘古隘连续进行了英勇而顽强的抵抗，给敌以很大的杀伤。这一胜利得到我们《红星报》的赞扬。就连陈济棠也为之惊叹不已，说：“红军的勇敢善战、射击技术精良、构筑防御工事的巧妙”是没有想到的。但因敌众我寡，六个师与一个师之比，又加上统战上的关系，筠门岭终被粤军占领。但陈济棠看到，在赣南粤北红军的存在是隔断蒋介石中央军从江西进攻广东最好的力量。他既深惧奸狡的蒋介石入粤，又怕红军乘虚反击。同时，陈也看到蒋介石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的另一个企图，就是把红军赶入粤境陈的地盘。所以，他在占领筠门岭之后，就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面虚张声势，谎报“向会昌城进攻，摆出打的架式。所谓支票尽管开，付钱就要考虑了”<sup>①</sup>；另一方面暗地里给我们送来一批弹药，同

<sup>①</sup> 曾其清：《陈济棠进攻筠门岭红军的经过》（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期）。

时又秘密派他的高级参谋杨幻敏赴筠门岭向红军作试探性的谈判。蒋介石虽然怒斥陈济棠“借寇自重”，但是他因疲于“围剿”红军，也莫奈陈何。

说起和粤军陈济棠的统一战线，这事由来已久。早在我们这次去寻乌和他们的代表谈判之前，我们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就同陈方有过接触。陈济棠曾派人找过我们红军的一位高级将领在广州的亲属，要他向周恩来传话。那时他主要是想同我们通商做买卖，在筠门岭我们失守之后，为互不侵犯，为和谈作出积极响应，创造条件，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我们红军中革军委就与陈济棠谈判让出红军西进转移的道路等问题，给一、三、五、八、九各军团发出了通知电。在当时，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委加紧同陈搞统战工作的真正意图，在我们去同陈的代表谈判，尤其在长征开始后，才明白了让出西进道路的奥妙，是为我们党及红军找出路。

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同志因受“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离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他从大局出发，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身分，时刻关心着战局。对于南线的和缓形势，毛泽东同志早就给以关注。一九三四年春，正值反“围剿”战事紧张之际，他多次从瑞金来到会昌，对粤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曾对当时的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和我作过指示。他说，我们要抓住这一



有利时机，利用敌人的内部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又说，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象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拚，也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加派化装小分队，潜入陈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促使陈军反蒋抗日。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指出：根据前线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为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消除赤白对立，促进陈济棠和我们谈判，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会昌地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在军事上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一些小仗，既不吃掉陈济棠的主力，也使陈济棠认识到红军并非好惹。就在毛泽东同志从会昌回瑞金后不久，他要在这里打出一个和谈局面的预言就实现了。

一九三四年，大概是秋天，陈济棠派来了姓李的代表，此人系黄埔学生，来到我们中央苏区，要求和我们谈判。因我是南线红军的负责人之一，并提议由我担任我方军事全权代表。之前军委主席朱德即致信陈济棠，首先申述民族主义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信中说：“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在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陈等深知为

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它对协定具体提出了如下几条。这就是：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在赣州沿干河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近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

四、真正切实实际武装民众，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各项准备工作。

五、请作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辅。

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得当派员至筠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

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间，忽接周恩来同志的通知，要我急去瑞金有要事相商。于是我迎着朝霞，策马扬鞭，急驰在绵水河畔的崎岖道路上。抵目的地后，周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南天王”陈济棠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朱德同志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

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和潘汉年（公开职务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幻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立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密谈。周恩来同志亲切而又郑重地对我说：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他还向我交代了联络密语等项事宜。在场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兴致勃勃地嘱托道：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于是，我们带着朱德同志署名的一封介绍信上路了。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sup>①</sup>、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幻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我们奔驰在去寻乌的路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边走边琢磨着福建事件的教训。来到筠门岭赤白交界处的

---

① 即潘汉年。

羊角水附近，天色已晚，前来迎接我们的是对方陈济棠独一师二旅长严应鱼（严碧生的心腹），特务连连长严直率全连和严旅长的四名轿夫等，并派旅参谋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严连长同我一见面就悄悄地讲：“何先生，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为掩人耳目，他们还为我们专门准备了两顶花轿，每遇岗哨盘问，连长就高声说，“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把他们喝令回去，故一路畅通无阻。经过轿夫的跋涉，轿子抬到罗塘镇一处寂静的山村，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门前停下了。这里是独一师二旅所在地。我们被安排在楼上，对方谈判代表住在楼下。翌日，在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密谈开始了。经过连来带去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

-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 3，解除封锁；
-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为保密起见，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的记事本上，并未形成正式文件。这是继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们同蔡廷锴十

九路军谈判达成停战同盟协定之后，又一个停战协议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胜利。

在我们谈判期间，接到了周恩来同志事先和我商定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得此消息后，对方代表很敏感，问我们：“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我平静而婉转地回答道：“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但我心里明白，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瞎指挥，使第五次反“围剿”终于遭到失败，红军已经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跟对方说明了情况，话别之后，即离寻乌，返回会昌。当时中央军委机关已从瑞金的白石山转移到于都去了，周恩来同志特地派人等候我们，并留下了一封信。信上简略地说：“长工同志，我在于都等你们。”我们立即动身前往于都，见面后便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谈判情况。他得知谈判成功，达成了五项协议，异常高兴，并且说，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下达了中央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行动的命令。由于掌握大权的李德等人的瞎指挥，采取了“甬道式”的大搬家，使部队相当臃肿。在我们从于都以南向外转移突围时，蒋介石一面命令部队追击，一面命令广东、湖南军队在赣粤、湘粤边布下三道封锁线，以便把我们消灭在这些地方。本来这样累赘、笨重的部队，要想突围谈何容易。然而由于在此之前红军与南路总司令陈济棠已有了默

契，使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据事后了解，我们和陈济棠的代表停战谈判所达成的几项协议，他还是信守的。当我们向赣粤边转移之际，陈把他们同我们协议基本内容转达到同红军接触部队少将以上的军官，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又为掩盖蒋介石的耳目，广筑工事，要口设防，拿出一副与我决一雌雄的架式。二十日我们在安远、信丰一线发起突围战役，在这一线是余汉谋的第一军，当突围大部队红军至这里后，他们边打边撤，退居赣州、南雄等城镇据点。我们从王母渡、新田间全部渡过信丰江，沿大庾岭边缘进入粤北，突破了蒋介石责令由粤军组成的第一道封锁线。蒋介石得知这个情报后，大为惘然，这时便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忙跑回南昌，原以为红军经过湘南再进北上，不会以“不利之路”的粤北作为转移的突破口。红军这一英勇果断的行动完全打乱了他的阵脚，当他察觉到我们的企图时，即令陈济棠、何键火速出兵，在粤湘边之汝城、仁化至乐昌组成第二道封锁线。陈济棠接到电令后，着将北区绥靖主任、韶关作战地区司令李汉魂率独三师、独立警卫旅赶至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在设防中李对其下属军官说明已同共产党达成不互犯协议，让出红军西进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有些趋向进步的军官坚决信守，如警卫旅少将副旅长黄国梁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早年入云南讲武堂，曾与叶剑英同居一室。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北伐，后被蒋介石革职，

流落南洋，被陈济棠起用。在这次防共、“剿共”行动中，他作了有利于我的布置，并且他在调动部队时把一些最反动的军官留在后方，以备不虞。十一月初，长征的队伍分两路从南雄经江西的聂都、王润进入仁化县的长江地域。布防在这里的警卫旅第一团，发现我们大队人马徒涉绵江的时候，他们请示旅部，批准该团出击，当时旅作战值班室负责人、少校旅政训室主任黄若天，即以黄国梁旅长交代为由，告诉他们：上司严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当旅部发现刚从广州开来粤北的第三团何汉武营违反旅部命令布防在给红军让出的通道与红军交火时，责令何部撤出战斗，并严辞正告：“违抗军令，军法从事！”事后，在仁化召开的警卫旅营以上军事会议上，黄国梁还严斥何汉武违抗命令，扬言要枪毙他云云。正因为他们遵守了协议，所以我们得以顺利地转向城口。城口是敌人第二道封锁线上的重镇，但师长李汉魂只派一个连防守。我们占领城口稍事休整后，急向粤湘交界地势险要的军事要冲九峰山进发，从这里我们安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事实表明，我们能够如此顺利、迅速地通过陈管区，是我们与陈济棠的统战工作分不开，所达成的五项协议起了作用的，使蒋介石的一、二、三三道封锁线落了空，使他如梦初醒，眼巴巴地看到陈济棠把红军放过，为之大为恼火，给陈发了措词严厉的一分电报，怒斥陈“拥兵自重，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

污点”。并急令“集中兵力二十七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落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陈济棠慑于蒋介石的余威，考虑到自己的地位，乃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师分头沿乐昌、坪石尾追红军入湘，以作出反共的“积极”表示，显示“恭顺”。

这就是红军在长征之前，巧用军阀陈、蒋之间的矛盾。和陈搞统战、订协议，以及在长征初期所起作用的主要情况。这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革命斗争策略的灿烂一页。

## 长 征 路 上

我和潘汉年同志到广东省寻乌县附近的罗塘镇同陈济棠的代表进行谈判的第三天，即被召回了。在这之前，党中央及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已经移往于都。我们到会昌见到周恩来同志派来的等候我们的同志给的简便信函之后，就马不停蹄地急奔于都，向恩来同志汇报了此行谈判的情况和所达成的协议。听完汇报后，周恩来同志非常高兴地对我们说：“我军主力已经开始转移了。这次谈判，对我们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你的工作我们已作了安排，不回粤赣军区了，军委已决定，你去新近成立的教导师任政委。”

教导师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战役失败之后，



反“围剿”的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在瑞金组建的。由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主管这项工作。选调军委五局局长张经武担任师长，我为政治委员，孙毅为参谋长，李熙为政治部主任；还有陈奇涵、毕士悌（朝鲜人）、刘汉、裴周玉等同志在司、政、供、卫领导机关工作。开始组建教导师的时候，我在南方战线的粤赣军区工作。其间中央军委派我同陈济棠的代表和谈，我未到职，孙毅也在南线，李熙也没来，只有张经武同志带着三个参谋和一个特派员裴周玉在那里工作，可以说他是一个“光杆司令”。筹备、组建的艰辛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教导师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的一支新部队，成为培养军队干部的大学校。它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及军委机关。在业务上与政治保卫局有关。周恩来同志同我谈话之后，我从于都起程追至信丰赶上了教导师，见到张经武同志。我和他是老战友，又在瑞金红军学校共事过，彼此都非常了解，这次又并肩战斗在长征路上，格外亲切。因戎马倥偬，战乱频繁，他向我简短地介绍了部队情况，即随队征战了。

由于敌人的前堵后追，我们且战且走，部队牺牲数量大。因此，黎平会议前后，教导师所剩人员无几，基本上补充到部队里去了。当我军攻克文化名城遵义时，我随军委纵队进驻这里。由于长时间的工作紧张，战斗的频繁，生活的艰难，我身力不支，染上重病。我的心情非常急躁，卧伏病房，心在战场。当时军委纵队编有三个小司令部，也

就是常说的梯队，第一个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由刘伯承和陈云兼任，我为第二个司令部的司令兼政委，第三个司令部则是罗迈（李维汉）的司令兼政委。我们这个小司令部主要管后勤方面，由叶季壮同志负责，我还兼干部休养连的连长，原来的连长是李坚真同志，她从事过医院工作。陈子芳同志在这里当过医生。我们这个连还是挺热闹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红军战士，邓颖超同志、蔡畅同志、康克清等同志，还有谢老、成仿吾和凯丰的爱人等都在这个连。在二渡赤水之后，我大病渐好，一天毛泽东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到红九军团任政委。他说，你有善于团结人的美德，你是能够和罗炳辉这位起义将领搞好关系的。当时，我对九军团的情况是有所闻的，它要离开主力，执行别动队的任务，远离领导，单独执行任务，感到责任的重大。因此，我有些踌躇。在场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忙说，既然主席让你去，你是有能力搞好九军团的。这时，我也无言以对了，只是说：“党这么相信我，纵有天大困难，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红九军团是一支很好的红军部队。虽说红九军团在中央红军是一个新的军团，但是它以三师（其七团原是中国工农红军模范团）、十四师（一九三四年春该师编散）老红军的部队为基础组成。它从一九三三年冬组建以来，就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经受了锻炼。红九军团短小精悍，宜于机动，周恩来副主席常称誉它为“战略骑兵”。

长征中红九军团在以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委、郭天民为参谋长、黄火青为政治部主任、赵镛为供给部长的领导下，从闽西长汀、宁化和赣南瑞金等地区出发，开始了历尽万水千山的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后不久原粤赣军区的二十二师编入该军团。遵义会议以后，根据会议精神，部队进行了整编，将原有的两个师缩编成了三个团，军团机关也作了相应的精简。红九军团参加了土城打川军的所谓模范师郭勋祺的激烈战斗，击溃了敌人，直逼桐梓娄山关、十八道水，接替第二次占领遵义的后防；直到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我红九军团担负着中央军委和方面军主力的后卫，单独活动，深入敌后，甚至敌后之敌后，执行别动支队的任务。根据党中央毛儿盖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制，于是红九军团编入四方面军改为三十二军。张国焘违犯中央决定阴谋南下，后来二、六军团长征到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三十二军又划归第二方面军。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几经反复，终于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建立，二方面军编为一二〇师，三十二军为陕北宋时轮同志之二十八军编入三五九旅七一八团，留守陕北执行警备任务。一九四四年由王震同志组成南下支队，七一八团全部编为第二大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整个部队组织精干，连队充实，更加强了它的机动能力。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九军团继广昌战斗遭受很

大损失后，又在温坊战斗中退兵休整，即去瑞金，在这里军委给补充了五个兵站，支援千把民工。他们挑着坛坛罐罐，携带大批的辎重、石印机械，开始了大搬家式的转移。在长征中，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分左右两路执行后卫任务，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和主力红军，北挡敌人，南阻援兵，分兵把口，穷于应付，走路最后，减员最大。红九军团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边。面对严重的形势，王明机会主义者更是一筹莫展，只能是死打硬拚，寄托与二、六军团会合。虽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但人员损失过半。

大家面对现实，看在眼里，想在心里，疑虑不满之情，与日俱增，为什么我们几乎濒于绝境呢？为什么与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每况愈下呢……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挤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大有使我军遭致全军覆没的危险。正在危难之时，还是毛泽东同志救了红军。他坚决主张改变方针，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在进军中一举攻下黎平，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向贵州前进。部队稍事休息，在此整编之后，立即出发，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打下了遵义城。王明机会主义者再也混不下去了，于是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胜利地结束了王明机会主义者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开

始形成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使我军获得了新的生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遵义会议精神，一经传达到部队，全军上下无不振奋，好象拨开迷雾，重见了阳光，压抑在心头上的忧虑不满情绪一扫而光。部队经过十几天的休息，又进行了整顿，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又挥师前进。遵义会议的光芒照亮了新的征程。在三月二十日开始四渡赤水之后，我军摆脱了自长征以来那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又生动地得到了体现。

军委在三月二十六日的命令中说：现在我军已经胜利地摆脱了蒋匪军的堵击与尾追。敌人目前拼命赶筑鸭溪到遵义线，打鼓场（金沙）到黔西线，桐梓到仁怀线，以及沿赤水河域的封锁线。到处都筑碉堡据点群，企图重演江西时期对付我军的办法。为此，我们目前决定脱离黔北向贵阳方向前进。为了保障主力南渡，决定红九军团暂留于黔北地区活动，执行别动队的任务，积极抑制、迷惑和牵制敌人，并可发展游击战争，开展游击根据地。就在这个时候，我到红九军团接任蔡树藩同志的工作，而他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任司令兼政委接替我的工作。

我到军团后，党委立即开会研究军委指示，确定单独行动方针及今后和主力会合的办法。为适应这一艰巨而光荣

的任务，我们一方面向全体人员作思想发动传达动员；一方面整顿组织，将原来的二个师缩编成三个团，机关、后勤也作了相应的精简。这样思想明确，组织精干，适宜奔袭和机动作战。三月二十六日前敌司令员朱德发来了电报：

“罗、何：甲、现我一、三军团已封锁白腊坎、鸭溪之敌一团余。五军团明二十八日上午转移至枫香坝之南。军委纵队明日十二时越过白腊坎。乙、为吸引长干山一带之敌北向，以掩护我野战军主力越过封锁线，九军团明二十八日拂晓应以主力依托马鬃岭为枢纽，经倒流水向长干山西南李村之敌积极佯攻，务使该敌不能向枫香坝移动。另以小部（两连）逼近枫香坝之敌佯攻，与五军团相呼应……

朱”。这时主力疾趋南下，我军团旋即投入战斗，在金沙县的马鬃岭，大造声势，故作姿态，以诱敌上钩。中央军委和一、三军团于三十一日渡过乌江。则在沙土、安底附近抗拒敌人。为配合五军团南渡，此时朱总司令又来了电报：

“罗、何：……丙、我九军团有向西南转移，配合五军团主力抗击周、吴主力的左侧翼，迟滞敌前进以便争取野战军全部渡过乌江，并争取自己在两日内渡过乌江的任务。丁、九军团今夜在窑上应即准备南移，并侦察由窑上、青元、太平场通马蹄石的道路，以便今夜得军委电令后即行动。”

牵制任务一经完成，军委急令我军团昼夜兼程前进，于第三天八时赶至沙土，尾随主力过江。可是形势突然发

生了变化，南岸发现敌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已由西南沿鸭池河北上了，向迎面我渡河点逼近，后面又有黔军犹国材紧紧咬住我们的屁股不放。我们冒雨穿插敌人空隙间，赶到沙土时，按规定时间晚到六小时。我们守桥部队，恐“引狼入室”，在主力过后已将浮桥破坏了。

欲进不能，欲退不成，我军团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必须迅速抉择，于是我们当即召开会议，研究情况，讨论如何部署，分析追兵阻敌之特点。决定立即转移，离开江边，迎击敌人。中央军周浑元部，我们曾碰它多次了，周虽武器齐备，但它知晓红军并不好惹。因此，这次和我们打交道中，行动迟疑，蝇行蛙步。而追敌黔军则多数是肩负步枪和腰插大烟枪的“双枪兵”，战斗力较弱，装备也差。鉴于敌军上述情况，我们还是来它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把黔军作为打击的主要对象。并且估计到中央军周浑元是不会很快到来的，我们在数量上是不占优势的，要想甩掉敌人的穷追，获得主动，必须给它点眼色看看，那就要捕捉战机，集中兵力，打垮它一路。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战斗，直接配合着正在向云南挺进的主力。

决策已定，即作部署。我军团在乌江北岸东绕西转，迷惑敌人；既按我们的部署，又调动了敌人。选定打鼓新场的老木孔地区作为打击黔军犹国材部的前沿阵地。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大约是四月的一天下午，我军进抵老

木孔地区。老木孔是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镇，这里地形条件很好，大道两侧丘陵起伏，灌木丛生，便于部队隐蔽。

我们在政治运动之后，作了具体的战斗部署：九团摆在正面，七团在右翼，八团在左翼，埋伏在离老木孔十公里的山林内，在这段山道上密布了一个伏击圈。为确保战斗的胜利，又令九团申副团长率领第八连去我左前方约五公里处山间，大摆疑兵阵，搞的声色俱厉，使周浑元部不敢轻易前进。俗话说，打蛇先打头，我集中火力伏击走在队伍中间的犹国材的指挥机关，使之指挥系统瘫痪，以击溃全军。而战机又发起在中午他们犯烟瘾，浑身软绵绵的时间。当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从丘陵丛林中犹如猛虎出山，枪口喷射出仇恨的火舌，跃然下山。这突如其来的“天兵”，只打得敌人懵头转向，顿时乱作一团，抱头鼠窜，嚎叫着夺路奔命。指战员们发扬了猛打、猛冲、猛追，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一鼓作气追敌二三十公里，击溃敌人的反扑。迨至黄昏时分，战斗暂告结束，缴获千余支枪，俘敌一千八百多，据军委通报，此战役何知重的参谋长魏金荣负重伤。从敌人口中得知，这路敌人共有九个团，同我们作战的有五个团，由旅长白辉章率领，本想紧紧跟踪我们，会同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部，将我军团围歼于乌江北岸，却未曾料到其迷梦被我们打破。老木孔之战是我们红九军团单独行动以来，打的一次转危为安的漂亮仗，不仅打击了正面之敌，而且附近敌人也闻风披靡，出



现了前无堵军后无追兵的局面，且大大策应了兄弟部队的战斗行动，使我军从紧急的情势下，迈向新的胜利。

我军团在老木孔地区击败多于我五倍之敌的兵力以后，便乘胜向西北挺进。在进军途中巧取长岩圩，缴获民团七十多支枪。我部打扫战场收拾压榨人民的盐税卡，并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劣绅，将没收来的谷物和盐巴分给贫苦群众。群众见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买卖公平，十分关心人民的疾苦，使原来不明真相的人了解了红军。我九军团自一月间从贵州省湄潭县出发以来，到飘儿井才有第一次的三天休整。在此作了必要的补给，增加新兵三百余人，筹款三千多元，还补充了军衣、粮秣和其他若干军需用品。

部队乃由飘儿井出发，穿行于大定、黔西间的公路上，向乌江上游的三岔河前进。大约在四月十三日傍晚到达大定县（今名大方）的猫场。猫场是一个较大的集镇，若在此宿营不成问题，但地势对我很不利。整个村镇坐落在一条深深的狭谷之中，背后仅有名曰梯子崖，又名鸡飞崖的通道。我们对这样的地形，在此宿营曾犹豫过，又考虑到部队连续行军疲劳不堪，但主要是接二连三的胜利，产生了麻痹思想。部队往下后命令八团注意警戒来路，并让该团特地设了一个连哨。真是无巧不成书，不是冤家不聚头，当天夜晚从黔西方向跟踪而来的黔军王家烈部队的一个师，到了猫场北山后边的一个村庄。当时我们连哨发现火

光和听到嘈杂的声音即报告团部，但团长崔国柱正在酣睡，又麻痹轻敌，没有在意，亦未向军团报告，结果敌人突然向我袭来，我部干战虽英勇奋战，但终因敌人占了有利地形，掌握主动，我军处于不利境地。从拂晓起，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我军边打边撤，交替掩护着翻越了鸡飞崖，在附近的一个地点隐蔽休息，这时失散的同志也陆续归队。

猫场一战，损失较大，它给我军团一次严重的考验，坏事变好事，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从反面教育我们提高了警觉，锻炼了意志，丰富了作战经验。

这时，我军团司令部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我部继续迷惑敌人，阻滞追兵，然后进入云南，在金沙江渡口会师。为了更有效的迷惑、牵制敌人，配合主力行动，于是我部在贵州西部绕起圈子来，时东时西，忽南忽北；使敌军琢磨不透我军意图。正当我军这样迂回运动之际，约摸是四月二十一日接军委来电，命令我团在打龙场附近相机渡过北盘江。我们奉命日行百里，疾趋渡点。据侦察报告，渡口敌重兵把守，难以通过。这时我军离江边不远，若是被敌发现我们的意图，对我十分不利。怎么办呢？天大的困难，只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那是不难克服的。经过宣传，群众知道我们是穷人的队伍，过江有困难，许多人自报奋勇，愿助一臂之力，由王三爷引路，劈荆斩棘，穿丛过隘，通过天然桥梁——虎跳石，就这样我们从容地渡过了北盘江。

跨江以后，我军便甩掉了黔军王家烈、犹国材和中央军的追击，进入云南境内。五月九日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掩护主力巧渡金沙江的任务。时值云南军阀龙云的一支部队向东川逼近，因而又留下我们军团担任后卫，破坏沿江船只，扼住东岸追敌，以掩护主力行动的任务。并以一个营带小电台从小路向巧家对岸侦察前进。东川县是唐继尧的家乡，不堪受蹂躏的人们，千余之众参加了红军。“金沙水拍云崖暖”。在船工们勇驾飞舟的护送下，我军团人员和军需物资全部渡过金沙江。过江后我们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急向西昌前进，会师中央红军兄弟部队。当我军进得川南，刘文辉急送两个营的“礼品”。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打它一下，入川首战告捷，顺利前进。记得在五月十一日我军进至宁南县境，来到彝族地区，通过“通事”（翻译）向彝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团领导，亲自和有关彝民谈话，讲明我党我军政策。次日出发时彝族头人派来一名向导为我们开路，沿途受到彝民群众的盛情欢送。途中又几经战斗，来到礼州。至此，我红九军团离开主力单独活动两个多月，转战数千里，由于军团党委正确的领导，执行政策，严守纪律，宣传群众，在地方党和群众的热情支持下，我军团胜利地完成了掩护军委和主力抢渡乌江、金沙江的光荣任务，重新与主力会合，在中央军委统帅下，挥师大渡河。

一九三五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在大凉山地区接到

军委电令，万一会理与西昌之敌会合，将你军团与三军团后卫隔断，你军团就单独活动于大小凉山地区。我们接到命令后，精神极为紧张，立即与红三军团联系，并报军委。我军团决定以一天一夜的时间，高速度进军，争取在礼州与红三军团会师。顷接彭德怀同志复电，他率后卫部队在礼州为监视西昌之敌——刘文辉部，掩护我们顺利通过，在此等候，迎接我们。我们乃重新与主力会合。上级要我军团接替五军团防务，仍担任方面军后卫。这时，我们红九军团在泸沽彻底击溃刘文辉三个团之后，军团领导开了个碰头会，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北进路线。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道：一是经越西至大树堡（今属石棉县），过大渡河经汉源，可去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到安顺场，这是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特别是要经过历来被人看作“畏途”的彝族聚居区。由于反动统治者对广大少数民族的歧视和镇压，造成了民族仇恨，所以汉人尤其是军队要在此通过那是很难的。我们若要在此通过，正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因此，他们防守薄弱。两条道路摆在面前，走哪一条呢？我们军团领导发生了“路线”分歧，最后统一到我和黄火青同志经冕宁去安顺这条道路上。

我们部队来到冕宁县时，毛主席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同志率领红军主力，离开这里才五六天，为我们打开了前进的道路。他们在这里短短的几天，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建立了以李井泉、陈野平

同志为正副主席，廖志高（冕宁地下党员）、李祥云等为委员的冕宁县抗捐军为基础的游击队，准备在这一带发展游击战争。当我们红九军团挺进到冕宁县附近时，遇到了主力过后留下的王首道、李井泉同志发展的游击队，而没见到游击队的司令黄应龙同志（湖北麻城人，黄埔三期，曾任我红八军副官长），以后听说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惨遭杀害。我们会合以后，王首道同志带领游击队和军用物资、白洋以及二百多头骡马补充主力去了，李井泉同志还和我们一道参加了有限度地破坏泸定桥的战斗。由于我们在这一地区宣传和执行民族政策好，又散发了不少白洋及他们爱喝的酒，更利用了罗炳辉这位彝族将军在彝民中的影响，较为顺利地通过了孟获岭（传说是七擒孟获的地方）。在部队进抵安顺场时，大约是五月底了。

安顺场原名紫打地，是现今石棉县西的一个小场镇，是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蒋介石狂妄地预断我们要做石达开第二。那料到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以无坚不可摧，无险不可渡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十七勇士率先抢渡了天险大渡河，随之我先头部队以高速度沿河两岸进军，出敌不意地抢占泸定桥，开辟了北进的要道。在这里我们接到军委命令，要我红九军团接替红一军团，坚守战略要地泸定桥，担任后卫任务。我们沿大渡河西岸行进在毛主席亲自率领的左纵队后面的道路上。从安顺场到

泸定桥，沿途是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羊肠小道，西倚高入云霄的峭壁，东濒深达数丈惊涛怒吼的大渡河，稍不当心就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随着河水的浪滔，我们心潮起伏澎湃：遵义、赤水河、娄山关、乌江、北盘江、金沙江……历数我们自乌江北岸执行别动队以来的战斗历程，如今我们重新与主力会合后，又担负着后卫中央军委，将要坚守我军的生命线——泸定桥，去迎接新的战斗，怎能不使我们心花怒放，思绪万千呢？在十七勇士飞夺大渡河的英雄事迹鼓舞下，我们指战员暗下决心，不怕苦不怕饿，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守好泸定桥。我们到达这里时大约是初夏的六月。泸定铁索大桥位于泸定县城西面，这是解放前唯一的桥，是从四川腹地成都通往康藏高原的咽喉。它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在这以前大渡河只有用“皮船”过渡，或用藤索、竹索悬“溜”过去。在我先头部队攻桥之前，守敌已将桥上的木板烧掉，仅有横卧而又摇曳于奔腾咆哮的河身之上的碗口粗的铁链，人行其上，随桥起伏，大有“绳桥惊险”之叹。军委命令我军团要坚守战略要点泸定铁索桥，这确是我军跨越大渡河进退机动的命根子。正因为如此，敌人拚命与我们争夺，陆续向该桥增兵，不断地炮击。情况越来越严重，我先头主力在天全河被阻。时值初夏，天全河上游万年雪山，冰消雪化，河水与日俱增，洪水泛滥，冰冷刺骨，难以徒涉。敌人四川军阀杨森部有两个旅严防天全河北岸的天全县城、

始阳和飞仙关一线，而我九军团又受日益增加的敌人的严重威胁，中央军薛岳、周浑元、吴奇伟已抵安顺场、汉源一线。他们拥有较现代化的架桥技术和收集渡河船只的便利条件。因此，泸定桥将要受到东西两岸敌人夹击夺桥的危险。面对天险敌情，我们能否完成军委的重托，是对我军团全体人员的又一次考验。我们主力在天全河南近一周的时间了，坚守泸定桥也已一周了。我们建议军委有限度的破坏桥梁。军委复电说，在破坏桥梁四小时前报军委。

“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红九军团召开了一次军团党委扩大会议，决定一面有限度的破桥，一面迂回天全。关于破桥，既不能全破，又不能不破，既顾此，又不能失彼。泸定桥是川康人民的运输线，全破了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但又不能不破，这是军事的需要、斗争的需要。因此，决定有限度的破坏桥梁，将几根铁索链，每两根之间锯掉一根，还剩六根，这样，估计敌人每天只能开进一个营的兵力，加之我军后卫的阻击，敌人“欢送”我们的速度就会大大的缓慢了。与守桥、破桥的同时，红九军团主力由军团长罗炳辉、参谋长郭天民率队直插天全河上游，因为这里河面宽，水浅，易于徒涉。过河后沿河北岸下天全，于第二夜出其不意的和我们方面军先期到达河南岸的主力，南北夹攻了天全县城守敌杨森匪部杨杰生。接着又猛击天全两个旅的逃敌，直追过始阳镇到飞仙关的铁索桥。我军团决定迂回天全，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果然奏了奇效。

假如我军受天全敌人据险被阻，不能北上，那么势必要回师泸定桥，向西康寻找北进道路。这里崇山峻岭，人迹罕至，大有饿垮、冻垮、以至全军覆没的危险，可见迂回天全之意义。

我率领守桥部队并后方人员于他们占领后的第三日深夜抵达天全。最使我感动的是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及刘伯承参谋长熬着夜，派骑兵前来迎接我们。当我们汇报了这次行动的决心与布置以后，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表扬了我们军团领导及其全体指战员。为犒劳我们，庆祝迂回天全的胜利，还特地给我们下鸡丝面条吃。同时，要参谋接通了飞仙关的电话，我与罗炳辉同志在电话里讲了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勉励及有关情况。最后刘参谋长和朱总司令鼓励了红九军团，自乌江以北执行别动队任务以来，历尽艰险，光荣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在斗争中越战越强。此次，红九军团又正确、果断地作出了破桥与迂回天全的胜利之举，为红军北上打开了便利条件。当晚刘伯承同志又说，为什么破桥四个钟头以前一定要报军委批准呢？这是在万一全天拿它不下，而雅安、汉源方面敌中央军也相当疲惫需要喘息，现时对我们威胁还不算太大，还有充裕的时间供我们考虑，否则后退之路一破就不好办了。他说，总之你们的行动帮助军委下了决心。我们在北上途中又遇到林伯渠同志，他笑容可掬地把两手伸到我面前说：

“长工，你们小老九（指红九军团）还是挺厉害的，打得



蛮不错。”

遵义会议以后，由于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在伟大的战略转移中，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仅指挥我们，而且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也由我们拨动。难怪滇军军官们发牢骚说：我们的司令部究竟是谁人的司令部？是“剿”红军的司令部呢，还是替红军剿我们的司令部？红军让我们向西我们就乖乖地俯首听从，红军迷骗我们向东，就调转屁股向东，这样使红军钻了空子。蒋介石辈还自欺欺人的吹嘘红军要过大渡河就要重蹈石达开的覆辙，实在可笑。

是的，他们的哀鸣，正反映了我们红军高奏了胜利的凯歌。此时，我们已登上了川康边界广阔地区，在泸定、荣经、天全、芦山、宝兴补充了给养，部队趁机休整、恢复战斗力，去迎接更艰巨的斗争，准备在岷江之西的邛崃山主峰夹金山与懋功、达维一线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已是六月下旬了。中央军委命令我红九军团仍为一方面军殿后，严密监视天全、芦山方面的敌情，以掩护我一方面军胜利地翻过长征途中初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海拔四千米以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杳无人烟。它活象一尊身披白纱的威严巨人，大军在它身上走过，恐怕还是第一次惊险的尝试。

当红四方面军获悉红一方面军在滇黔西南广大地区，与后追前堵之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时，这时红四方面军

抢渡了长江上游嘉陵江，向岷江流域急进，亦企图与我方面军在邛崃山脉少数民族藏族（又叫番人）区会师。蒋介石得意忘形，在其电讯中，一再狂吹什么朱毛红军已成强弩之末，不难在滇黔地区予以歼灭，任弼时、贺龙、肖克二、六军团一股在川黔湘鄂边界流窜，实力最弱，只有徐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极为猖狂……如此云云。

敌人总是低估革命势力。当我红军先头部队进抵懋功时，蒋介石如热锅上的蚂蚁，急调其嫡系胡宗南部向岷江上游的松潘地区冒进，妄图堵塞我军北上的既定道路。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六月间，一、四方面军，这支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组成的举世无双的、经得起任何考验的铁军，克服了历史上少有的困难，奇迹般地到达懋功、达维之线，两支英雄部队胜利会师了。这象久别重逢的兄弟，该是多么高兴啊！我们举行了联欢会、文艺晚会，全军上下，一片欢腾。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我红九军团奉命接替红四方面军红九军的后卫任务。因为我军团经常脱离主力，独立执行任务，在敌后甚至敌后之敌后进行游击生活搞习惯了，也锻炼出来了适应这一斗争生活的一套本领。

六月十六日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懋功，而张国焘未到，他住在理番县（理县）的杂谷脑镇。毛主席和党中央根据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即正确地确定了两军会师后向东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川陕川甘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促进抗日救亡运动高

潮的继续发展。在中央首长抵达懋功的次日即电告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对形势作右倾机会主义估计，与党中央背道而驰。六月十七日张国焘复电党中央，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提出向西的退却逃跑路线，主张向荒僻的西部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苟安一隅，逃避斗争。为了解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分裂阴谋进行斗争的一次重要会议。由于我红九军团执行后卫任务，因此，我们不知道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的会议情况。会后，据当时在总政工作的老战友袁国平同志在懋功与我话别时，向我秘谈了两河口会议精神。他说，会上讨论和制定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同时严肃批评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张国焘不服气，自恃他人多、枪杆子多。他知道中央红军经过长征的天灾人祸减员太大，由九万减少到今天的万人左右。说到这里，袁国平把嘴贴到我耳边窃窃私语：“张国焘胃口不小，想当中央书记，妄图夺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两个方面军分裂的隐患。我个人感到极为不安，大敌当前，又系远征疲劳之师，我们都希望团结，团结是取得新的胜利的可靠保证。”红九军团从懋功奉命调到孟沽、卓克基、马尔康、马塘、松岗一线，休整、筹粮，待命准备过雪山草地。这时忽然接到改组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命令的电报。党中央在毛儿盖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红

一、四方面军混合编制，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四军编入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中央直属纵队）组成了右路军。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九军团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左路军总指挥朱德（兼红军司令），政委张国焘（毛儿盖会议后任红军总政委），左路军分设左、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红九军团编入左路第二纵队，这时我红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因为红四方面军下设是军的建制），电台密码和人员均全部换掉了，从此我们与中央失掉了直接联系。

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率领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经过七天七夜的艰苦历程，于八月下旬胜利地走出草地，进抵班佑。与此同时，左路军大部分从马塘、卓克基一带出发，然后到达阿坝。我红九军团在左路军第二纵队领导人倪志亮司令和周纯全政委的直接领导下，仍滞留在松岗、孟沽、卓克基之线，作全军的后卫。但离主力太远，我们以焦急、疑虑不安的心情，请示上级向北挺进，但回电仍就地筹粮、整训、作群众工作，待命北上。因此，经我们研究作了如下的准备工作：

（一）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番族（藏族）风俗、生活习惯，我们研究了他们的风土人情、婚姻制度（一妻多夫制）喇嘛教义以及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我们了解到喇嘛寺庙又是知识分子集结的场所，研究了如何作上层人

物的统战工作和如何对付藏族的反动武装骑兵部队。因此部队开展了一个打骑兵的教育运动，并编了四首打骑兵的歌曲。

(二)为了克服困难，广开食路，由各级政治部门动员部队，自我就地筹粮，并组织了捕鱼组、打猎组。同时，我们研究了野草、禽兽、糌粑、特别是青稞（麦的一种）的吃法。了解当地有什么传染病、流行病、如何防止这些疾病，本地出产什么草药，可以治什么病。并在连队举办了各种训练班。特别是要组织好通过水草地的互相抢救组，要多备绳索。普遍动员攒毛绳，作皮坎肩，积极准备冬服。

(三)古人讲要入境问禁。我们调查研究了高原瞬息万变的恶劣气候，这对我们来说是应该首先学习的新课题，摸清变化规律，以利行军作战。忽儿雪雨交加，骤然冰雹大作，一般是每天下午四点钟后有一阵大雨或雪或冰雹。规定每天只能行军六十华里。因高原气候稀薄，战士负重更影响呼吸，必须在下午四点钟前设好营地，同时还要作好防备反动藏族骑兵武装夜袭的工事。

(四)研究通过雪山草地之后，要组织得力的工兵部队开道。对古森林、栈道、豁口悬崖陡壁如何通过。在前军过后如何守关隘、防渡口。通过漫无人烟、雾气腾腾的草原时，搞好通讯联络，除骑兵外，还得用烟火。

(五)做好收容工作，要政工人员带领骡马、粮食。沿

途要准备熟食和开水，并组织医护抢救队，收容病残者。对落伍掉队、无组织的散兵要耐心说服，并给予纪律教育。

(六)要做好向导的工作，因向导是部队行军作战不走错路，不迷失方向，达到预期目的重要因素。向导要有喇嘛寺的担保，如请坏了向导或中途逃跑了，就会给我们增加困难，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在行军路上每到岔路口，要把指路标插定，重要路口要设标兵联络。

(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注意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曾检查了一个连队的纪律，藏人如实反映了我们进驻藏族区初期的情况，他们说我们的短枪兵、伙夫兵、马夫兵不如长枪兵好（连队管理严格），经耐心教育后他们认识了军民关系的重要，都转变好了。

(八)通司（即翻译）是我们与藏民打交道的桥梁和宣传群众的喉舌，因此，要做好他们的工作。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和革命斗争的需要，我们还开展学习通俗藏语。

我们做好了北上的准备工作，直待令下。然而野心勃勃的张国焘，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自恃人多势大，为实现其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分裂红军的阴谋，公开提出南下川康边，与毛儿盖会议决定北上的正确方针相对抗。张国焘利令智昏，不顾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从领导到广大战士的激烈反对，于九月三日强令已进入葛曲河的左路军先头部队转头南下阿坝，借口河水陡涨，电告中央不能渡河北上。不久中央电示张国焘：“目前只有

北进才有出路，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这时，毛主席、党中央机关在从班佑到下巴西的途中，得知前方传来包座战役取得完全胜利的喜讯。原来我红军先头部队在到达毛儿盖之前，蒋介石急令其嫡系胡宗南派兵扼阻红军北上，企图掐死我出川入陕的必经之路，阻止与徐海东、刘志丹陕北红军会师。因此，党中央决计要打下包座，特别是要消灭援敌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代理军长程世才接到命令后，急率部出发。当部队经过中央机关驻地毛儿盖时，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三十军的领导同志，全军指战员深受鼓舞，结果打下包座守敌，全歼援敌四十九师约一万二千人。毛主席、党中央机关在下巴西停留两日，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就在这时，野心家张国焘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破坏团结，分裂红军，妄图危害党中央领导同志。当时任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获得了这个消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立即从前敌指挥部飞马扬鞭赶到下巴西党中央住地，亲自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毛主席。当晚，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研究决定在巴西寺院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揭露了张国焘南下逃跑阴谋，并果断决定，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中央直属队近万余人，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支队（陕甘支队），在毛泽东同志率领下，迅速继续北上，避免冲突，脱离险境。这是叶剑英同志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的又一杰出贡献，结合以后的功绩，所以后来毛主席给予他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赞誉。

在这之前，过草地的先头团（红四团）由杨成武等同志率领，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三军九十八师的张仁初同志率领的二九四团编入先头团建制，已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开进草地。这时，三十二军仍在卓克基、马尔康、松岗之线整训待命。张国焘密令部队从阿坝南下至卓克基、松岗之线，在这里召开了所谓高级干部会议，成立了自任为头子的伪中央，不承认原来的党中央，与“六大”按党章及共产国际批准的正式中央相对抗。这是张国焘野心的大暴露，是他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在松岗，我和黄火青同志商量组织了一个秘密收容所，收容“落伍”、掉队者。因为我们电台已调换，隔绝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系，在这处境困难之际，我们再三考虑，我们军团不能在大分裂后再来个分裂，出其无奈，被迫只好违反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饮恨随张国焘南下，向天全、芦山、名山一带进军。在此打了几个胜仗之后，即在泸定、经荣、汉源以及天全、芦山地区休整、筹粮、扩大红军。敌人主力陆续集结对付我军，使我军处于不利的形势。在汉源战斗后，即调换了我的工作，由李干辉同志接替我为三十二军政委。于是我到驻芦山的组织委员会报到，指示我协助供给部筹粮、动员青年参军，并开展部队文化娱乐活动。组织委员会由陈昌浩、周纯全、张琴秋三个组成，直接向张国焘负责。不久调我任粮食总局局长（归总参谋部



管辖)，张广才为副局长，王建安为政治部主任，文经武（或文经伟）为参谋长。我们全力担任筹粮，工作是相当艰巨的。要西进翻越海拔七千米的党岭雪山，在六霍、道孚地区整训筹粮，积极准备过冬被装，后来又西进到甘孜地区，并与二、六军团（后改为二方面军）会合。此后又随总部行动。这段工作是非常艰巨的，也是非常可喜的，我们与兵站部（主要管运输）部长吴先恩同志，兵站大站站长秦基伟、张瑞德等同志，尤其是管后方医院的张才千同志，配合得很密切，基本完成了交给的筹粮任务。红四方面军派三十二军由罗炳辉率领南下理化（理塘）迎接二、六军团，阻止李抱冰部南进，六军团王震政委得知这一消息，告知部队指战员时，全军欢腾。部队在向理化进发中受到藏族同胞手捧酥油、糌粑的盛情夹道欢迎，并竖起大拇指口里喊着：“耶莫，耶莫（顶呱呱之意）。”二、六军团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为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根据中央电令，成立二方面军，除下辖二、六军团外，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经贺龙同志提议划规了第二方面军。原来三十二军张国焘要解散的，我为了保存这个战斗集团，找到周纯全，通过他找张琴秋活动，把三十二军保存了下来。

这时，由于张国焘南下钻牛角尖，四处碰壁，阴谋暴露，人心丧尽，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胜利喜讯传来，我们广大指战员无不兴高采烈，

纷纷要求北上。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和耐心帮助教育下，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的觉悟督促下，同时张国焘又遭到共产国际的指责，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势下，张国焘不得不随二、四方面军继续长征。我二、四方面军自进入甘肃地区，以英勇无畏的战斗，在一个月的短短时间内取得了洮州、漳县、通渭、渭源四个县城，岷州、陇西、武山等地，甘谷、定西、礼县等十多个县已多半被我军占领，并且新区的范围随着红军的胜利开展急剧扩大。这个地区物产丰富，人口多（近百万），是创造抗日根据地的大好地区。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了关于建立甘肃省红军新台地区党的组织的决定，建立甘陕川省工委和甘肃省工委。甘肃省工委以岷、洮、漳、陇西、渭源、通渭、武山七县为基本地区，准备向兰州、定西、天水一带发展。省工委委员由十九人组成，省委常委有傅钟、曾传六、何长工、刘少文、郭潜、华民、邵式平七人，傅钟为书记，我为省革委主席兼政府党团书记。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谱写出了长征的壮丽史诗。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伟大的长征，实在不平凡。张国焘阴谋南下，违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跟随张国焘钻进了死胡同，这里不管经

过多少曲折和政治上的压力，但最主要的是我要从主观上认识这些问题，跟随张国焘南下犯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当时，我任军团政治委员，又是军委书记，作为军团的主要领导者，我们军团参加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南下，为拉拢我们还把我委以所谓“中央委员”，这就影响和损害了九军团广大指战员的政治热情，其责任应由我个人负，红九军团其他领导同志及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尽管在南下中撤去我九军团政委的职务。然而，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红四方面军和原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留在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非常关心的。我们长征到甘肃会宁三个方面军的红军胜利会师之后，我以悲喜交集的心情即去保安，毛主席把我及我的夫人尹清平安排在他住的隔壁的窑洞里。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曾用两个下午的时间跟我谈话。第一个下午我向毛主席汇报了红四方面军和三十二军（九军团）内部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认为我对红四方面军的看法是客观的，公平的。第二个下午，我作自我批评，执行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南下的政治路线错误。主席说，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哪个人的责任，应由张国焘负责。中央对你是了解的。我想让你负责四局的工作，这个工作是艰苦的工作，你能胜任。我建议毛主席让我到红大去学习，我这辈子还没有系统学习过，通过学习要把这笔流水帐认真清算一下，我推荐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同志担任，能负重望。主

席说，你当局长还是当学生，我跟恩来商量一下。过了两天周副主席找我谈话，他说，主席跟你谈话的事给我讲了，你作了检查，这就完了，难道张国焘和我们大分裂之后，你还能和他来个小分裂吗？你可以去学习，但作为机动干部，随时可以调出来工作。朱德、任弼时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说，你有错误，有自我批评，同时指出你做了两件好事：一是你和大家千方百计筹备了可供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所需用的粮食及代食品，竭力克服吃食上的困难；二是组织了秘密收容所，保护了红一方面军“落伍”掉队的干部和战士。他们的汇报内容中央是作了记录的。周恩来同志和我谈话之后，我便去红军大学高级班学习。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让出了延安，红大改为抗日军政大学。这期间于三月份党中央召开了延安会议，解决张国焘路线是非问题，从而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起来。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当我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再次要求去党校学习，毛主席在约我谈话中说，新的形势已经到来，一再勉励我继续办好抗大。毛主席说，这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至解放全中国准备干部、培养人才，任务是光荣艰巨的。

### 毛主席要我办荣军教导院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的炮弹，落到了文

明古老的北平城郊区，接着日本又在黄浦江畔上燃起了战火。从此国共合作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那时，我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刚刚走出校门不久，准备奔赴抗日前线。在太原失陷前后，山西战局吃紧，同时毗邻陕甘宁边区的（黄）河防也逐渐紧张起来。这时为了加强河防，保卫抗日的策源地，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对千里河防进行了部署。其中清涧、米脂、绥德、葭县、吴堡五县设警备司令部，于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肖劲光同志委我为司令员，郭洪涛为政治委员，张际春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改变部署，从临镇河以北到清涧之河口设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我于十一月中旬又调任那里任司令员工作。记得是一九三八年大概阴历正月十五日灯节过后的一天，一个参谋前来报告：延长、延川、宜川等县残废医院有二百多名伤员，已在延长集合，要去延安“请愿”。果然，不久他们就派了几位代表来找我了，我把他们请进窑洞，问他们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出来。这几个同志就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原来，长征到陕北根据地后，中央卫生部成立了几个医院，收容伤病员。由于医院设备差，药物缺乏，医护人员对伤病员关心照顾得也不够，伤病员意见很大。再加上有些伤员病愈后，体质过差，有的成了残废，不能重返战斗部队。他们不愿继续留在医院，在当地安家落户生活又不习惯，家属问题也无法解决，于是就纷纷要求回南方老家去，并要上延安“请愿”。

开始，我想上延安“请愿”可不是件寻常的事情，根据地还很少发生过。大家有事就上延安，这会给党中央增添多少麻烦！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怎么能有时间过问这类具体事情呢。因此，我心里感到有点恼火。不过，仔细想想，这些同志还都是通情达理的，并没提什么过份的要求。有的同志甚至还替党和陕甘人民着想，他们说，三个方面军在陕甘会合，人民负担很重，物资供应困难，我们在这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不如回老家去好，可以减轻这里人民的负担，又可回到家乡做些工作，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这些同志想的是多么周到、多么合情合理呵，这些同志多么好啊！真不愧是经过长征锻炼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红军战士。我越发冷静地思考，就越觉得我们工作没跟上，对这些同志关心不够，对他们的思想很不了解。因此，我当场作了自我批评；对他们要上延安找毛主席的事，我作了劝阻。我同他们商量说，有问题我们一个个解决，解决不了再找毛主席好不好？我的意见他们高兴地接受了。

我一面向延安师范学校借房子，安排这些同志住宿，一面打电话向八路军负责后方工作的杨立三同志报告。杨立三同志说，他们马上派人来处理这件事，叫我先婉言劝阻伤员，千万不要到延安来。放下电话我在琢磨，这件事应该报告毛主席，于是，我又打电话给毛主席，毛主席听我说了情况，停了片刻，问道：

“怎么处理的?”

“安排他们住下了。准备把他们生活搞好一点，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再说。”

“你发火批评人家没有?”我拿着话筒，感到自己象小学生逃学被老师捉住了一样不自在，因为开头我对这件事还是有点恼火的。幸好毛主席这时看不见我尴尬的神态。我赶紧回答：“没有批评他们。我作了自我批评了，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没有责备他们就好。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贡献，现在残废了，没有向党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要求回老家去也是合理的。是些好同志啊!”稍停片刻，主席又说：“长工，这个事情我们没搞好啊!”从话筒里传来毛主席简洁而又认真的声音，一字一句打入我的脑际。先前我也感到自己有责任，但在主观上总认为，河防司令部不过替卫生部临时代管一下残废医院，负直接责任的还是卫生部。听到主席认真的自我批评，我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能遇事委过敷衍，不负责任，要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地去解决问题，把工作做好。我正在领会着“这个事情我们没搞好”这话的深刻含义，这时又从话筒里传来了毛主席的声音。他说，我们确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员给我们提意见，“动手术”医治这官僚主义。他要我转告伤员同志们：就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住，整

整我们的官僚主义。我听了毛主席的话，内心很不平静，放下电话就跑到延安师范学校向伤员们转告毛主席的话。伤员们都深受感动，都说毛主席总是和群众血肉相连，心心相印，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一个中年伤员捶胸顿足地说：“长工同志，请你转告毛主席，我们不去延安了。”这位同志激昂的谈吐，反映了伤病员们共同的心声。此后，我想把伤员提的意见归纳一下，尽量努力改进工作就行了。没想到几天以后，毛主席还要我到延安去，向我详细询问残废医院和伤员的情况。毛主席说：“不能再叫残废医院了，这个名称对伤员人格不尊重，任何人到那里去，都会对这个名词反感。我和富春同志议了一下，准备把残废医院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你就做总院院长，再给你派个政委和卫生科长，河防司令部另派人去工作。”当说到这里的时候，主席停顿了一下，把目光集中在我身上，和颜悦色地说：

“这个事情很重要，搞不好会影响前方部队士气。现在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你先去工作吧。”在毛主席面前，我对工作的事从来没讨价还价过，于是，我坚定地说：“主席放心就是了，我去。”毛主席又说：“我们还要召集伤病员代表和卫生部门一起开个教导院工作会议，伤员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好的办法都拿来。”他还着重交代，会要在延安开，伤病员多派一些代表来，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给中央添麻烦。要尊重群众的意见，它是我们党的路线的根基，况且他们是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应当尽量满足他们的



愿望。以前有问题没及时处理，让问题成了堆才处理，这是个深刻的教训……

毛主席又嘱咐我回去搞一个筹建荣军教导院的方案。我回到延安，迅速搞了一个建院方案派人送给主席，他看后回了一封信，又作了许多明确的指示：

长工同志：

你提的办法，原则上我完全同意，请会同王群同志切实办一办，一定要力改过去错误方针，积极的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名称拟改为教导院，废止称残废院。你为院长兼政治科长，就是你们三个人负总院责任，靠近军委留守处找一、二间（房）子办起事来。不日即起始的教导院工作会议好好的开一开，由你主持，王群辅之，我可以来讲一次话。先找富春，滕，肖，谭，莫<sup>①</sup>一商开会要点，即将你拟的东西先行讨论一番。

乘此次开会，彻底的把各院全部情形调审清楚。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五日<sup>②</sup>

月底，会议在延安抗大旁边的房子里召开了，到会的六十多人，其中伤员代表和医护人员代表占一半。李富春、

---

① 即李富春、滕代远、肖劲光、谭政、莫文骅。

② 时为一九三八年。

滕代远等同志都到了。八路军总部、供给部、卫生部的有关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因为是毛主席请来提意见、研究工作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都畅所欲言，提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端正思想，做好工作，帮助极大。我把这些情况反映给毛主席，毛主席到会并讲了话，意思是欢迎大家提批评意见。为解除伤员提意见的顾虑，毛主席又作了自我批评：过去工作没搞好，责任在我们上面没有组织好，缺乏主动精神去抓这一工作，当然，客观上也确实存在好多困难，需要谅解。最后，主席说，有的同志要求回南方老家，这个问题请周副主席同国民党交涉，人身安全有保证才能送你们回家去。

后来，毛主席果然让周副主席同国民党交涉好了，把二千余名荣誉军人送回老家。而我们的荣军教导院，由我和王群同志、卫生科长孙仪之同志一起，在延安城西南的军委留守处旁边找了一排窑洞房子办起来了。

## 第十一章

# 从抗大到东北军大

### 从红大到抗大

红大没有第二期，抗大没有第一期。我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到红大的。赶上了第一期的末尾。到一九三七年初，红大迁往延安，遂改成抗日军政大学，我转入第二期。后在抗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深入敌后开办第五期，直至抗大第八期。一九四三年六月，我率抗大总校返回陕北。任过队长、大队长、教育长、副校长等领导职务。抗大，这个战斗的名字一直刻在我的心头，每当唱起抗大的校歌来，当年那火热的斗争生活就展现在眼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抗大，是伟大时代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肩负民族救亡的责任，毅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胜利到达抗日最前线。这时，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进一步取得了全中国广大人

民的拥护和同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自己的要求与主张。全国处于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指出：

“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党为着把自己全部政策的转变，贯彻于全党的干部之中，迅速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对日直接作战，担负起抗日的重任，因此，“重新训练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同志决定将原江西根据地的中国红军大学继续办下去。一九三六年夏天，在中国的西北角——陕北瓦窑堡诞生了一个为着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培养干部的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简称红大）。红大初创时期就有一千零六十三人。共分三个科，其中第一、二科为中高级干部，约二百八十余人，特别是一科，共有三十二名高级干部，其中有罗荣桓、罗瑞卿，以及苏振华、张爱萍、杨成武等同志。这些干部平均年龄二十七岁，都有八年多战争经验，平均每个人多达三处战伤。三科主要是红军中连、排干部，及一部分老战士。第一、二科初设于安定县的瓦窑堡，一九三六年七月迁到保安。第三科则住在甘肃环县的木钵镇。当时，学校一切管理教育制度都从部队需要出发，确立了“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教育原则。设置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著作”、“军事战略学”、

“政治经济学”等教育课程。这一期教育的最大成效，使多年从事对国内反革命势力进行战争的红军干部，对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等政治、军事的新问题，在理论上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实际上有了充分的准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由于我党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和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去工作。因此，“红大”的第一期红军干部学员陆续毕业，奔赴全国各地，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大任务。

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我来到了红大学习。不久，第一期结业了。我荣幸地转入第二期学习。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第二期在延安开学。

这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基本上实现了和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准备开展抗日战争。所以干部的需求就十分迫切。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也稍见放松，国内外一些爱国青年开始投奔延安，要求进抗大学习。因此，第二期就接受了新的任务，在培养训练红军干部之外，还要培养外地来的知识青年，为革命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对红军干部的培养也扩大了。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大批干部成了第二期的学员。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学校迁往延安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这一期编有四个大队，学员共二千七百六十三人。一、二、三大队主要是一、二、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其中有一部分高级干部。赖传珠、陈赓、胡耀邦、康克清、洪学智、王建安、许世友、周纯全、谭友林

等同志都是这里的学员。第四大队主要是参加过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平津学生，占全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还有一部分是东北军张学良部队及西北军杨虎城部队的进步军官子女。在四大队里还开设了一个女生区队。四大队一共分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个队，聂鹤亭同志为大队长，董必武同志是大队政治委员，我被分配在第十一队当队长。我们所有队的干部同时又是一大队的学员。

抗大第二期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期，它是在新的斗争形势面前开学的，它负责培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较全面的干部任务。因此，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开学那天，毛泽东同志亲临会场，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开学不久，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教育委员会，政治部、训练部也先后建立起来。特别有意义的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为抗大的建设和后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从此，抗大以它的非常革命性、非常战斗性开始有计划、有目的、有成效地培养造就着一代抗日人材。我就在这样一个难得的环境中开始了有意义的生活。

“抗大，革命熔炉。”这句话是我来到延安，毛泽东同志和我谈话中谈到的。当投身到抗大之中，开始新的斗争生活之后，感到这座熔炉名不虚传，用熔炉火旺来形容它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抗大，是名符其实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学校，是在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中确立的。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从极“左”跳到极右，公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是抗大团结胜利的基础”。毛泽东同志再三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学校。毛泽东同志还亲自领导抗大的干部、学员参加了当时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毛泽东同志教育下，广大干部、学员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有力地抵制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对抗大的干扰破坏，落实了毛泽东同志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坚持了抗大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一九三七年三月，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张国焘错误的决定》，系统地分析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内容和根源。号召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错误作坚决的斗争。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南下逃跑和另立伪中央由张国焘一个人负责，其他同志一律不负责任。批判张国焘路线是教育同志，提高觉悟，不准整人，更不准搞狭隘的宗派主义。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还专门抽出时间给我们讲授抗日战争的重大

意义，以及北上抗日的唯一正确道路；张国焘南下逃跑和另立伪中央的危害等问题。使广大干部、学员不仅了解了张国焘路线的危害，了解了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更重要的是从上到下懂得了党内两种思想的斗争。从而最大限度的调动了广大学员、干部的积极性，进一步认识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反动本质和对革命的危害性，提高了路线觉悟，决心同张国焘划清界线，决心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在新的斗争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 抗大校风

抗大，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创立起来的，又是在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成长壮大起来的。

红大第一期到抗大二期、三期、四期的校址都是在党中央所在地域附近，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来学校讲课或作报告，关心学校的建设。毛泽东同志对抗大的教育极为重视，在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除了参加决定学校重大问题和活动，还经常亲临学校讲课，当普通教员。学校还在保安时，为了使学员树立抗日的信心和认清抗日救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专门讲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后来成为抗大的基本政治教材。为了使学员了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军事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加深对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理解，积极投入民族解放战争，



毛泽东同志亲自讲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了回答干部、学员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到深夜才摸着黑走山路回去。在讲课时，他引用了大量活的材料，十分生动。讲课以前，每天晚上他都在窑洞前的大树下，挂起马灯，总是请来学员、干部了解情况，一直到深夜。讲课时，他引用大量事实说明问题，分析得条条在理，大家越听越爱听。一次讲课中，毛泽东同志讲到对问题要多加分析和研究时，他说：我们有的指挥员对情况就缺乏研究，别人一鼓励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一个鲁莽家。当毛泽东同志说到“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时，有个学员越听越感到毛泽东同志讲的象是自己来抗大学习前的情形。由于调查研究不周，指挥过一次失利的战斗。于是，他没等主席讲完课，就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接着又有几个学员说：不！主席讲的是我。从此，“不当鲁莽家，要作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大家的座右铭。

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凤凰山麓居住时期，专门抽出时间为抗大学员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哲学课，从四月份一直讲到“七·七”事变，历时三个多月，共讲了一百多个小时。从而使学员懂得了党内两种思想的斗争，懂得了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掌握抓住主要矛盾的本领，努力克服教条主义。每次讲课，毛泽东同志总

是提前到校，从来没有误过一次课。

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学校教学方法要“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毛泽东同志身体力行，讲课中运用这些合理的教育方法。讲哲学课时，理论联系实际，观点突出，重点明确，少而精。后来他回忆时曾说过：“我过去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毛泽东同志讲课时，为了使学员学好，在讲法上，对一般章节用高度的概括力，比较少的时间，讲较多的内容，重点章节重点讲。讲哲学课时，他用了百分之七十的时间讲《矛盾论》、《实践论》。为了使学员听得懂，他讲课中用大量的例子，由浅入深，深入浅出的进行讲解。从自然科学讲到社会科学，从世界革命讲到中国革命，从党内斗争讲到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从反对教条主义讲到反对经验主义。这样，本来一些深奥的哲学原理，经过他这么一讲，就非常浅显好懂。每当讲到这些生动的例证时，听课的老同志笑了，新同志笑了，教员笑了，炊事员也笑了。一把钥匙开了千把锁。

毛泽东同志讲课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当前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形势，用简明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抓住了蒋介石，我党派周恩来副主席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当时，许多同志一时不理解。讲课中，毛泽东同志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教育大家，

讲了一个“毛驴上山”的故事。毛泽东同志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它，这就又要联合又要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讲课发人深思，一方面使干部、学员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了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又结合国内政治斗争形势，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大大激发了抗战的热情。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转变学生的思想，根本的是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哺育抗大学员成长的指路明灯。

来抗大学习的学员，有的是跟随毛泽东同志南征北战的老战士，有的是刚从敌人占领区和蒋管区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有的是工人、农民，也有高级知识分子。由于阶级出身，社会经历的差别，每个人的思想基础、觉悟程度、文化水平等极为不同。尤其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自由散漫等不良习惯。但是，经抗大学习后，很快提高了思想觉悟，成为坚强的抗日战士。怎样教育改造这些爱国热情高昂的青年，把他们熔炼成为工农化的抗日干部？怎样在数月之中，就把一个普通学员培养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干部呢？关键是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为中心，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以中国当时最迫切的问题为教学内容，以转变学员的思想为当时学校的中心工作。

抗大对学员加强马列主义的教育，教育学员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观察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抗大的基本教材。《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反对自由主义》等都曾是抗大学员必修课。《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抗大军事教学的依据。学员们从中学习阶级斗争的理论，学习人民战争的思想，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哲学思想。

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来抗大学习的青年学员除二、三期较少之外，其他各期都较多。他们有革命热情，但还只是朴素的，对什么是阶级、阶级斗争，对什么是抗日民族战争及统一战线的认识，特别对路线斗争的认识还是十分肤浅的。只有经过深入的阶级教育，才能进一步认清地主、资产阶级的面目。正确领会毛泽东同志为全党制定的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认清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从根本上转变学员的思想。

在阶级教育中，抗大学员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结合中国阶级斗争的现状教育学员。他们从来自全国各地

青年的调查中，用大量阶级斗争的事例，生动地讲述着阶级的区分，引起了学员们热烈讨论。从农村来的同学讨论到地主和农民谁养活谁的时候，大家争论起来。通过这种生动活泼的争辩，学员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深山里没有不吃人的豺狼，社会上没有勤俭起家的地主、资本家，他们都是靠剥削起家的。

阶级教育象春风化雨，吹掉了抗大学员身上的灰尘，滋润了抗大学员的心田。使大家思想上来了一个大飞跃。很多学员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克服了，代之而起的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抗大的反帝反封建教育也是这样。紧紧抓住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的。抗大学员要最鲜明地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来抗大学学习的爱国青年，都有着抗战热情高的特点。但是，由于这些青年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的生活环境，所处地位各不相同。因此，革命觉悟就不同，对抗战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以及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认识就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抗日救国心情迫切，斗志很高，但他们对抗日的前途和途径并不十分清楚。社会上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散布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也在人们中传播：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费大气力。这两种错误思想影响着抗大青年，

妨碍他们正确地认识抗日的形势。在这时，又是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指明了方向。

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同志讲演了《论持久战》，驳斥了这种谬论。他精辟地分析了敌人是帝国主义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我们是“大国、进步、多助”，敌人是“小国、退步、寡助”的本质。指出了抗战是持久的，而必须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伟大战略思想极大地鼓舞着抗大的学员。通过认真学习，领会了这一战略思想的伟大意义，批判了“亡国论”思想，批评了“速胜论”的错误。抗大学员在提高认识的同时，组织宣传队到地方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当时，延安连娃娃都能掰着指头说出：抗战三阶段：防御、相持、大反攻。

来抗大学习的部分干部和青年，对我党为什么要和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统一战线不理解。还有少数人则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抗大就以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引导大家。他说：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势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抗大坚持用阶级斗争观点教育学员认识抗日统一战线，并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十五路军早就和我党合作的例子，帮助学员

认识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我们党和全国人民逼迫蒋介石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队和我们一起抗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敌，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

再者，建立统一战线以后，抗日战争到底依靠谁的问题，也作为抗大每一期的重要课题，组织学员进行讨论和辩论。开始有的学员认为，共产党虽然坚决抗战，但不是抗战主力，主力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军队多，有飞机、有大炮、有钱。绝大多数学员反对这种论点。他们用蒋介石对根据地不断发动反共“围剿”，制造磨擦，在蒋管区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抗日志士，屠杀共产党员，百般阻挠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封锁真理，阻挠青年投奔延安的种种倒行逆施，得出了国民党是“抗日的口号贴在嘴上，枪口却对着抗日的共产党”的结论。从前线来的学员则列举了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制造磨擦，阴谋挑起内战的事例揭露了国民党投降反共的真面目。使学员真正理解了蒋介石是被迫答应抗战的。只有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劳动人民才是抗日的主力。从而使学员们懂得了：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全中国人民大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奋起抗战，才能拯救祖国，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在此基础上，学员们树立了钢铁般的信念：抗战必胜。

阶级教育和统一战线教育，使抗大的学员提高了觉悟，

懂得了作为一个革命战士肩上的责任，处处用“革命到底”要求自己，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战士。

## 抗 大 一 分 校

一九三七年八月，第二期结业，我奉命调出任河防司令，负责指挥剿灭陕北残匪（实际上是国民党部队化装成的土匪）和保卫河防不让日寇西犯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一一五师过黄河后，我又奉命完成了往老根据地遣送千余名伤员的任务。到西安又动员青年学生一千多人回延安，编为抗大第三期的第五大队。毛泽东同志和罗瑞卿提议，让我留在抗大五大队任大队长。同时，组织决定洪学智、王建安、罗华生同志等同我一起主持队的工作。以后，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抗大。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抗大逐渐扩大。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抗大举行一·二八抗战纪念运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为大会题词：“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一致前进，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同时，在纪念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宣布罗瑞卿同志由教育长升任副校长，刘亚楼同志由训练部长升任教育长，张际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许光达同志任训练部长。一九三八年三月第三期毕业，毛泽东同志在同三大队的学员谈话中就指出：“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



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鼓励抗大学员到前线去，到斗争中去学习。特别是第四期，学员猛烈增至五千五百六十多人，分为八个大队。这时，延安已住不下去了，在蟠龙、洛川、瓦窑堡、庆阳等地分别住了四个大队，此外，还成立了教员训练班、参谋训练班，以解决专业干部的急需。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毛泽东同志在抗大四期开学时就题词：“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特别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强调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确定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敌占区。并号召到敌占区办学校。就地就近培养我军的干部。十二月十三日罗瑞卿同志正式宣传成立抗大第一、第二分校的决定。同时，罗瑞卿副校长还详细说明了建立分校的目的和意义。他说：“一、为了迎接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二、为着不因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影响学校的教育事业；三、为了便利于敌后广大青年来校就学；四、为了理论和实际更能打成一片，使教育方针能更好的适用与发挥；五、为使毕业学员更便于分配工作；六、同时也为着更能实际吸收前线我丰富的战斗经验，使理论与实际更紧密的结合。”十二月十五日宣布了第一、二分校的组织、干部配备的命令。任命我和周纯全同志为分校正、副校长，韦国清同志为训练部长、黄欧东同志为政治部主任，校址在晋东南。以抗大第七大队

及陕北公学一部为基础，组成第二分校，由陈伯钧、孙毅同志先后任校长，邵式平同志为副校长、袁子钦、李志民同志先后为政治部主任。校址在晋察冀边区。

我们第一分校由庆阳和洛川五、六大队的全部，第三、四大队各一部，陕北公学桐邑分校的大部分，三原安吴堡青年抗日训练班一部合并组成。

十二月中旬，上述各单位均开至陕西的延长县会合，我任支队长，刘智远为副参谋长，开始编为七个营。十二月二十日从延水关渡黄河，进入山西和永和、石楼等县，在吕梁山区与一一五师陈士榘支队会合，由他们派部队护送我们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我们于灵石附近涉水渡过汾河，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于一九三九年二月进驻晋东南长治、潞城、屯留之间的故县村、岗上一带，距八路军总部驻地中村仅十余华里。

在通过同蒲路敌人封锁线后，我们派军事主任教员贾若瑜同志带少数机关人员到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向杨尚昆同志、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傅钟主任汇报和请示抗大一分校的驻地、供给等有关事宜。当时，总部作战科长是罗舜初同志，队列科长是李寿轩同志，贾若瑜同志详细向他们汇报和研究之后，经总部首长批准，把总部特务团驻地故县村让给抗大一分校作校本部驻地，围绕故县村部署各个营的驻地。

抗大一分校进驻晋东南后，组织编制又作了调整。校

设训练部，部长韦国清同志。训练部下设军事总教，由贾若瑜同志担任，并兼校刊编辑主任。政治总教由李培南同志担任。教务科长郑文卿同志。

校政治部下设：组织科，科长刘浩天同志。干部科，科长先后由程坦、欧阳平同志担任。宣传科，科长安征夫同志。锄奸科，科长陈德先同志。民运科，科长记得是罗野岗同志，还有文工团。

校供给部长李原坤同志，下设供给科、财务科、卫生科、管理科、运输队等等。

校务处（相当于办公室）处长周贤同志、副处长李文昌同志，下设队列科、文印科。

本期学员三千二百三十九人，编为三个支队（相当于团）、九个营，每营属四至五个队，队设三个区队，区队下属三个学习班。

第一支队下辖第一、二、三营，均系一般军政干部营。支队长杜义德同志，参谋长黄经深同志，政治部主任铁坚同志。

第二支队下辖第四、五、六营，也均系一般军政干部营。支队长阎捷三同志、参谋长赖光勋同志、政治部主任刘惠东同志。

第三支队下辖第七营（特科营，下属炮兵、机枪、工兵、防化等专业队）、第八营（直属干部训练班，下属区队训练班、教员训练班、其它干部训练班、女生队）、第九营（有一般军政干部队、工人干部队）。我兼任支队长（后为

贾若瑜同志),刘智远同志任副支队长,参谋长叶荫庭同志,政治部主任廖海光同志。

一分校的课程设置,政治课基本上与延安相同。军事课设:步兵战术、游击战术、射击、兵器、爆破、筑城、地形、防化、军队卫生和《步兵操典》等等。

一分校自二月初开学后,北方局杨尚昆同志、八路军总部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其他首长对学校关怀备至,常来巡视和作指示。在前线供应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抗大一分校的供给,都得到了优先的保障。

晋东南既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可以及时得到总部首长和领导机关的指示,同时,又是一二九师的驻地,可以及时的向部队学习丰富生动的作战经验、建军经验,使理论更能联系实际。我和校其他领导多次去总部驻地汇报工作和听取指示,许多军事干部以部队为老师吸取经验,编写教材。军事主任教员,第三支队队长贾若瑜等同志曾去三八六旅听陈赓旅长做关于长乐村急袭战斗的经验介绍,我们校的领导及全体教职员还听了一二九师在阳明堡、神头岭、响堂铺、七亘村等战斗的战例介绍。这一期恰好又赶上香城固战斗,又听了对这次战斗的经验介绍。这些战例后来也都成了我们当时学习的部分教材,许多学员掌握了这些战例的精髓,到部队以后指挥作战都有许多不平常的建树呢。

学校为了保障供给,减轻人民的负担,组织各个学员

队养猪、种菜、自己运煤。学校供给部的运输队还运盐同敌占区群众互通有无，交换我们的生活、学习的必需品。训练部的油印室自制油墨以保障教学和节约经费。这些对当地群众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一九三九年七月，日军出动五万余人对我晋东南根据地大“扫荡”，我校奉总部的命令，从上党盆地迁到太行之巅的平顺、陵川、林县一带地区，配合太南地委和以黄克诚同志为书记的太南军政委员会，坚持太行山区斗争。对外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直属第三纵队，开展对高树勋、孙殿英部的统一战线工作。我们分校同国民党的新五军、四十军及骑兵独立十五旅驻地不远。三支队就驻在距新五军孙殿英军部驻地树掌村约五华里的神郊。过去只是在报告里、讨论中来理解理论，这次到了敌后，在实践中学到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本领。出于抗日大计，我们之间来往较多。比如：篮球比赛、互相参观等。开始，他们对我们很戒备，也看不起我们。但是，来往多了以后，很多官兵看到抗大学员严格的战斗训练，紧张有序的生活，朴素大方的内务，生动活泼的民主空气，都很惊讶，特别是我们组织的文艺宣传队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道理，使他们倍受教育。不少官兵成了我们抗日救国的义务宣传员。他们纷纷表示，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我们绝不同友军闹摩擦，不做对抗日不利的事，共同抗日。总之，初到敌后的学习战斗生活使学员们提高了思想觉悟，增长了军事知识和在敌

后战斗与生活的本领。

我们还配合了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和独立游击支队讨伐土匪的战斗，也掩护了“河北民军”的第四团起义来陵川附近休整，还开展了边沿地区的游击战争。

学校还抽调学员组织了五个工作团，参加太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抗日自卫队，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协同主力兵团巩固根据地。

由于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给我们的教学和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那时，太行山上的粮食奇缺，我们有时只能吃柿面拌谷糠度日。有时，为了弄到一点粮食，我们往往从太行山上经长途跋涉到上党盆地同敌人展开抢粮斗争。在太行山上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情绪都很高。

一九三九年九十月间，第五期学员毕业了。很快分配了他们的工作。我们学校又进行了一次整编，把全校编为五个大队，各大队下属五个队，撤销了支队和营。与此同时，开始接收第六期学员。到十月已来校一千多名学员，大部分为我军营、连、排干部，也有个别的团职干部。

一九三九年冬接总校命令，总校拟从延安迁到太行山区，一分校由太行山区迁往山东。要我率一个留守大队迎接总校。北方局和总部决定由周纯全同志任第一分校校长，李培南同志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同志任副校长，率五个大队、二十五个队的干部，和第五期分配给一一五师和新四军的学员进入山东。

就这样，抗大一分校又开始准备从太行之巅到黄海之滨的第二次东征。

抗大第一分校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到达山东根据地后，除第一大队外，即同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合并。此时，韦国清调任津浦支队司令员，周纯全同志任校长，李培南同志任政委兼主任，袁也烈同志（山东军政干校校长）任训练部长，阎捷三同志任副部长，李厚坤同志仍任供给部长，周贤同志仍为校务处长。一分校的一大队奉命进到胶东，同胶东军政干校合并为抗大胶东支队，培训胶东部队营职（含）以下的军政指挥干部和机关干部。对外称八路军第一纵队教导团，贾若瑜同志任团长，廖海光同志任政委兼主任，黄经深同志任参谋长。

### 总校东迁敌后

抗大总校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经过一个时期的检查。对学校教育工作、行政管理、医疗卫生等各项工作，进行了检查。使抗大更加革命化、战斗化了。鉴于抗战形势的发展，一九三九年六月，党中央决定抗大总校也要离开延安到敌后办校。

抗大总校将要离开延安向敌后挺进。这一消息一经传开，就给整个延安城、整个边区以莫大的振奋。因为这时正是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国民党反动军队节节败退，全国人心浮动，很多人对抗战前

途悲观失望的时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令抗大开赴敌后，无疑给全国人心以镇定，给投降派和恐日症者以沉重的打击。当抗战两周年纪念活动刚刚渡过，七月十日，抗大总校就在万人热烈欢送的人海中集合，乘着微风细雨，准备离开母校——延安的怀抱，向河东进发。在欢送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抗大师生讲话，教育大家坚持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法宝，亲切鼓励抗大干部、学员要抗战到底。

临别的时候，罗瑞卿副校长兼东征司令员，代表抗大全体教职学员作了“敌寇企图‘扫荡’华北，我们就要到华北去保卫华北，到敌人后方去坚持敌后抗战”的誓词以后，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行军队伍中的笑声和歌唱声象一条奔腾的激流，翻滚在延伸东去的延水和大路上，碰击着连绵重叠的嘉岭山壁，在延安的上空回荡着。中共中央代表，边区各机关团体代表，马列学院、鲁艺、女大、党校以及抗大留在延安的三分校的欢送队伍，组成一条“人廊”，展现在辽阔的清凉山麓的草原上。

抗大原计划直接向晋东南进发，由于汾河涨水，不能通过，因此，决定向敌人重重封锁的晋察冀进军。历时三个月的东征，行程是十分艰辛的，白天冒暑，夜来耐寒，迎风披雨，忍饥挨饿；抢渡奔腾咆哮的黄河，翻越高耸云天的吕梁山、云中山和太行山；穿过敌碉严密封锁的同蒲、正太两条铁路干线，途经三省二十五个县，行程二千五百



余里，于十月十日到达晋察冀根据地，举行远征祝捷大会。一九四〇年过春节时，总校与二分校干部联欢。晋察冀军区、一二〇师及晋察冀分局的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等同志，还有聂荣臻、彭真同志，都先后到总校看望。

东征是个大课堂。在深入敌后的长途行军中，学员们自己提出了要求，每天行军如不足四十里，到宿营地仍然坚持学习两个小时。每天出发以后，学员们一边行军一边讨论问题，教员插在行军行列里，跑前跑后布置讨论会和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学员为了学习，放弃了游戏、午睡，甚至晚上也很少睡觉。有时学校为了照顾学员的健康，发动大家建立公约，规定非学习时间一定要休息。

东征是个大练兵场。在长途行军中的军事学习理论更联系实际了。尤其在避免敌人堵击、埋伏、追剿上收获更大。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活动，斗争更加尖锐、复杂、艰苦。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歌谣：“敌后方，敌后方，前面有虎后有狼，反动派进攻要打退，鬼子一来要反‘扫荡’。进攻、‘扫荡’都不怕，我们在夹击中成长。”这首歌谣充分体现了抗大同志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豪迈的英雄主义气概。

一九四〇年二月，总校到达山西武乡县蟠龙镇，三月，一分校由晋东南迁往山东。我遵照军委命令带领一分校留下的一千多新学员到武乡同总校会师，中央军委任命我为抗大总校教育长。这时，抗大第六期在敌后正式开学，学

员共四千九百人。主要是来自八路军及山西新军(决死队)的干部，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半文盲占百分之四十三，但都有一定的工作与战斗经验。开学那天，朱德同志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你们这一期比哪一期都幸福，主要是能直接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来受教育，能接触更多的实际。他要求大家要发扬前五期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

四月，罗瑞卿副校长调任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任副校长。

这一期教学的特点，主要是流动性、战斗性和艰苦性。经常要在反对日军的“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中一面学习一面战斗。学校住址在一年中就变迁过两次，一次由武乡到黎城，第二次由黎城到邢台的浆水。学校各队住地分散，学习环境各异。有的在屋里上课，村边屋外放上便衣哨；有的在青纱帐里；有的则在壕墙山壁之下，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等著作，造就着一批批抗日战争的骨干力量。

抗大的学员用战斗来保卫学习。一九四〇年日军对晋东南的秋季“扫荡”。抗大的一团六连、青年连和二团的二、三连及校部的警卫连，都英勇的投入战斗，在黎城进行阻击战，掩护学校及地方机关安全转移。洪岭、长岭背战斗，粉碎日军合击抗大的企图。当时有的连队距离战场仅隔一个山包，头上有日机盘旋，耳边有枪炮鸣响，还坚持着上

队列课。抗大在战斗学习时，更派出武工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袭击敌人，帮助地方空室清野，参加群众减租减息斗争。

抗大也是在艰难困苦中生存的。这一年正赶上华北大旱灾，加之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还没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粮食给养非常困难，有时几个月尽吃高粱、黑豆，而且，每次都要到几十里以外去背粮，以坚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克服着一切困难，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胜利毕业。抗大不但没有在敌人和困难面前缩小，而且逐渐扩大，同年先后成立了三个分校，三月在安徽涡阳成立了第四分校，彭雪枫、张爱萍同志先后担任校长；六月，总校派华中大队予以加强；十一月，以皖北、苏北的两个干校的一部分合并，在淮南组建成第五分校，陈毅同志兼任校长；十一月，一二九师的随营学校与总校派出的第四团合并，在山西武乡组成第六分校，刘忠同志任校长。从此，抗大的旗帜已从黄河之滨飘扬到江淮两岸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日军又加紧“扫荡”革命根据地。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为了巩固与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中央军委给抗大指示：“由于分校的分散，对分校之具体领导，应责成各地党的分局及最高兵团负责。”“总校应当注意总结经验、指示方针，统一教材之编印，统一各种教法，培养教员，调剂干部，以及帮助和加

强各分校的领导。”“各分校不仅办下级干部班，且当办中级干部班，过去军委及总政在延安集中办高级班，在抗大集中办上级班的计划，应有部分变更。”在这一指示精神下，第七期在邢台之浆水镇开学了。这一期二千五百五十一名学员，均为我八路军的团、营、连干部，全校分上干科和基本科。同时，办了一个军政教员训练班。

根据军委的指示，抗大在正规训练中，加强对分校的领导，统一了教材，对抗大五年来的教学工作、政治工作、管理工作、后勤工作作了认真的总结，写出四十余万字的《抗大五年来工作经验》向中央军委报告。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改进了教授方法和学习方法，改善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另外，成立了军事研究室和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政治工作等三个研究班及教员训练队、供给人员训练班、医务人员训练班。建立了在职干部的学习制度，定期举行测验、考核，定期举行学术研究和时事报告。对长期分散在外的供给、粮食、采购等人员，分批调回学习，以提高政策和业务水平。

在敌后，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抗大还开展了生产节约运动，实行严格预算、决算制度，提出“节约一分钱，增加一分抗日力量”的节省开支的口号。在生产上，各伙食单位生产蔬菜自给，烧柴自给。学员积极性高极了，每天吃饭后，只见三五成群的人们在田间锄草、施肥、浇水，每逢星期日那天就更热闹了，成群结队

的学员，有的上山砍柴、背柴，有的到外地背粮，使学员不但学到了军事本领、敌后工作的本领，也学到了实际生活的能力。

战斗和艰苦的环境促进了学员的学习热情，带来了学习的好成绩。从这期上千科、基本科一次军政测验的成绩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第七期四个队在军事上共进行了战术、兵团战术、游击战术、战术概则、筑城、地形学、特种兵、射击学、工兵和各种勤务十一项考试，平均分数均在七十分以上。政治上共进行了中国问题、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常识四项考试，平均分数都在六十分以上。军事和政治的主要科目均在九十分左右。

特别使人难忘的是在敌后庆祝抗大成立五周年时还召开了别开生面的大规模的运动会。运动大会选在“六一”进行，会前向各大单位发了请柬，届时参加的有中共北方局，十八集团军总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各机关团体、学校，各军分区，各地委、各县委等，都组织了代表团来学校庆祝。学校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临时招待所，指定专人接待来宾。大会开幕前，举行了阅兵式，彭德怀副总司令亲临学校代表中央军委检阅学校队伍。并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抗大已经培养了数万青年干部，走上了民族解放的战场，希望继续培养大批模范干部作为提高八路军到铁军阶段的骨干……”运动大会上进行了各种运动项目的比赛，举办了学习、生产等展览会。每天召开晚会。如此节日的

气氛，宏大的场面，在偏僻的太行山的农村中确实是件了不起的盛事，至今老战友相逢谈及这段往事，仍誉赞蔚为壮观呢。

为适应严酷的抗日战争形势，抗大从第七期开始注意抓了正规化建军，军容风纪和各种制度，认真贯彻了三大条令，严格组织纪律，注意养成教育。同年十二月第七期学员胜利毕业。为满足抗日战争指挥人材的需要，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又先后在晋绥地区的兴县成立了七分校；在淮南天长县成立第八分校；在苏中南通县成立第九分校；在鄂豫皖地区成立第十分校；分别在太行、太岳地区成立了太行分校、太岳分校。

## 突 围 返 陕

抗大，是革命的熔炉。它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优秀的军政干部，成为抗日人民军队和民主政府的坚强骨干。如同一颗颗火种不断地撒向前线、后方，使抗日烽火越烧越旺。抗大培养出来的干部所具有的坚强革命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博得全国人民的赞扬。日军又恨又怕，他们要求部队及特务机关，“宁牺牲二十个日本人，以换取一个抗大学生”。特别是第七期以后，抗大在敌后目标和影响越来越大，成了敌人心里的一颗炸弹。因此，也就开始成了日军“扫荡”的主要对象之一。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九四二

年五月，日军在华北以抗大总校浆水为目标的大“扫荡”。那次“扫荡”中，日本军队分四路合击总校驻地浆水。北路的敌人由河北的临城、赞皇经宋家庄向浆水猛扑；一路由邢台向浆水直插；一路由沙河向路罗猛进；西路的敌人，由山西的昔阳、和顺经松烟向浆水进发。敌人的胃口很大，他们扬言这一次合击要一举“剿灭”总校，剷除心头之患。

我们抗大的领导同志，对敌人这一手早有准备，还在第七期时就曾经制定了反“扫荡”的预备方案。根据前线大量战例研究，曾提出跳出敌人合击圈的时机选择问题。当时的提法叫“利害变换线”。所谓“利害变换线”，即是当敌人进至合击地点前的一日行程距离上的这一线，大家习惯称之为“利害变换线”。当敌人进至这一“线”时，我们就要全力以赴的迅速动作、勇猛的起跳，以迅速动作从两路敌军中间穿插过去。如果跳早了，敌人会调头尾追，犹豫不决跳晚了就要遭致合击。这是用鲜血总结出来的经验。针对当面四路之敌的情况，我们决定采取当敌人进到“利害变换线”时，我抗大则用“敌进我进”擦帮而过的办法，插到他的后方去。同时，针对敌军队形密集之特点，全校分为几个独立单位，多路转进。

基本系向北转进，只一个夜晚就转进到北路之敌的后边去了；上干科经验更是丰富，他们采取同敌人“小转圈”和“大换班”的方式，先转圈迷惑敌人，待敌人追击时爬

上太行山，敌人撤退时下太行山，两上两下太行山，甩掉了敌人，躲过了敌机的轰炸，安全跳出重围；总校各部向西南拐儿镇、黄泽关方向挺进，发现敌人在前面不远，又折而东进，奔路罗镇、浆水而去，和敌人转开了磨盘。抗大校部人员多、物资多，行动不灵。为了缩小目标、提高灵活性，校领导决定把校部机关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一百余人。滕代远副校长带领一部分，张际春主任带一部分，我负责带一部分。供应部门、卫生部门等就地分散隐蔽，最后在王莽寨（山谷）会合，乘夜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达赞皇县境时，各单位在转进中虽敌情紧张但还算顺利。只有陆军中学在向路罗川以南转进中，与优势日军一个大队遭遇，他们顽强抗击，击毙敌军百余人。我第五连伤亡较大，子弹、手榴弹打光后，同敌军展开了肉搏战，史紫千校长被俘英勇不屈，壮烈牺牲。学校运输队被敌人合围了，损失了骡子数十匹。抗大，在同优势敌人两个多月的转战中，边战斗边学习，彻底粉碎了敌人“剿灭”总校的计划，胜利地返回了原驻地，开始了更紧张的教学工作。我们抗大成功的粉碎了敌人“围剿”的情况，是我分别通过贺龙（一二〇师师长）、刘伯承和秦基伟（六分区司令员）的电台报告了党中央的，因为当时我校的电台和党中央直接联系不上。捷报传到党中央以后，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十分高兴。专门发来了祝贺电。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有了抗大我们腰杆子就硬了。朱德



同志还说：我们在延安要为你们开庆祝会呢。

在反“扫荡”中，我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不幸在辽县牺牲，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滕代远同志接任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升任张际春为抗大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任命我为抗大副校长。

华北日寇的“五一大扫荡”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并不甘心。为了蚕食抗日根据地，在平汉路两侧我们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大修碉堡、筑封锁墙、挖封锁沟，妄图以此扼杀我抗日军民，缩小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新的斗争形势，我们抗大派出了警卫连和抽调一批军事干部到边沿地区，帮助各县独立营、基干民兵队与敌人展开反“蚕食”的斗争。宣传和组织群众，平沟填壑、破堡毁墙，实行反封锁，搞得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整天蹲在乌龟壳里不敢动弹。我则乘机发动群众，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要最大限度地保存干部。党中央决定抗大重返陕北，命令我负责把所有学员安全带回。听说要回陕北，回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身边，从上到下高兴极了。很多学员换上了只有节日才穿的新鞋新装。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我们几位领导和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及时研究了返回陕北的行动计划以及当地的各项善后工作。同时，欢送张际春同志调任十八集团军野政副主任工作。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四日，除陆军中学由陈鹤桥等同志率领仍暂住浆水一带外，抗大全体教职学员，从邢台出发，在地方武装和群众掩护下，胜利地通过了白晋路 and 同蒲路两条封锁线，历时四十余天，于三月初到达绥德。

总校到达绥德前，原三分校，先期到达绥德。总校到达后，第二、七分校也奉命到达绥德，此时三个分校都与总校合并。七分校的一部分与后来回陕甘宁边区的陆军中学在甘肃之合水合并，成立了新的七分校。

抗大返回陕北以后，党中央极为重视。之前在绥德组织一个军事学院，准备接收回延安的抗大学员。特任徐向前同志为院长、李井泉同志为政委（未到任）、彭绍辉为副院长兼训练部长。后来毛泽东同志提议，不叫军事学院，因为抗日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仍叫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为好。这样，名字又改为“抗大”。毛泽东同志专门为返回陕北的抗大题了词：“站在最前线。”

回到陕北以后，抗大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和挖窑洞建校舍的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又有了新的锻炼和提高。

抗大，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过程中，它为国家培养了近二十万优秀的军政干部，对国家对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拿斯诺在《西行漫记》上的话来评价：“这个大学，大约是世界上唯一的。”

抗大，你光荣的业绩和艰苦的历程将永载史册！

## 赴东北开办军政大学

“国家多难正需才，军政大学志士旗；勇往踏入新生路，英雄不负少年时。”这是当年加入军政大学学习的一位东北青年写下的诗。

东北军大的前身就是抗大。我把总校全体学员干部带回延安，经过层层封锁线无人区，行程八十多公里。由于疲劳过度，组织安排我到晋西北贺龙同志司令部休息了一个月。后来，徐向前院长考虑我熟悉抗大工作，曾打招呼让我继续在抗大工作，但没有正式任命。那时，大家有些意见。毛泽东、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了解这个情况后，专门让我将总校经难历险平安带返延安的情况写个报告，我写好后亲自去延安汇报。汇报后，中央十分满意，伯承同志还表扬我们说，八十多公里碉堡林立，你们突围出来，也算奇迹呀！当年诸葛亮搞了“空城计”，你们搞了一个“空枪计”，手无寸铁过无人区不简单。以后中央陆续安排了抗大干部。后来，我请示中央是否让我到党校学习，毛泽东同志让我找陈云部长，陈云部长同意并让我到组织科找王鹤寿科长具体研究定。在组织安排下，我到党校旁听学习三个月。同时，边听课，边受组织之托，负责两个干部的清查工作。一天，毛泽东同志找我谈话，他说：

“中央决定开往东北办学校，培养当地人才。由你当副校

长代理校长。军政大学的名字不要改，只改前二字即可，叫“东北军政大学。”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后不久，抗大即奉命迁移东北，执行培训东北青年的教育使命。这一决定受到了全校干部学员的欢迎，大家预感到革命向前进，学校大发展，曙光就在前面。

学校出发以前，已经开始了变动。原辖五个大队的第二大队、第五大队分别开赴晋察冀、太行区，接着又抽调大批人员组织华中大队、山东大队及东北干部队。临出发前，又有一部分干部抽出帮助绥德分区建立机关。学校从绥德出发时直辖一、三、四三个大队（一个大队为一个团）和校直属队，四千多人，于十月十二日自绥德出发踏上了北去的征途。

十月的天气已进入初冬，天气寒冷，渠冻河冰。然而，全校教职学员无不兴高采烈。他们迎着塞外风雪，踏着遍地冰霜历山跨水，粉碎反动派的重重封锁，第一站是承德。程子华同志当时任承德党委书记，当时，承德我们部队很少，出事无部队掩护，程子华同志再三劝我们留下在承德一带办学。我说，我的任务是去东北，困难再大也得去。当时随队行动的还有一二十位中央委员的爱人，其中有不少女同志是孕妇。当我们通过义州（现义县）时，锦州失守，钟威同志一个旅和邓开明同志一个旅掩护我们到达彰武县。从彰武出发时，由李新泉旅长派出部队掩护我们到了法库县。一天夜里，突然遭到三百多人的土匪骑兵

袭击。我命令部队处于战斗状态，由一个营去攻打匪帮，让其他同志就地取材，燃起一团团火堆，照亮四周。这一下很有效，当掩护部队一出击，一片片火堆照的半天通明，土匪害怕了，以为遇到了我军主力，纷纷落荒而逃。队伍重新聚拢之后，一大队大队长韩先楚同志埋怨我说：你怎么心肠这么好，一下子把队伍中增加了这么多个“大肚子”，弄得部队行动跟牛一样慢，这个部队怎么带呢！我笑了笑说：同志，我们这是个特殊的队伍，这二十几个怀孕的女同志都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家属。他们在前线，在危险的地方斗争，我们把她们安全的带到目的地，这对他们的工作也是个支持啊！

在路上，我们曾经碰到一队苏联红军。那时，他们瞧我们不起，看到我们的队伍男女老少参差不齐，就说风凉话：“你们是来东北打江山的，还是来坐江山的。你们手无寸铁，别说中央政府军，就是土匪也会把你们吃掉！”我迎了上去顶了他几句，大意是我们也是红军队伍，别看我们男女老少一大堆，我们不怕土匪，更不怕中央军，我们是培养人才的人，是大工厂里的工作母机，我们身上背的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战略思想。懂吗！当翻译朱如正同志把我的话传给他们以后，他们有点发窘，问：他是什么官？朱如正随机应变说：他是我们的中将。这些下级军官一听我是中将，马上敬礼，并跑步把他们的政治部主任请了来和我接谈了一番。

到了法库以后，西蒙军区书记黄克诚同志热情地欢迎我们，并且坚持要把抗大留下来。我说：“要不得，要杀头的，还要请示中央。在承德时，子华同志挽留，没有留住。”黄克诚同志说：“先请示东北局林枫组织部长，我们这里斗争复杂，骨干缺乏，中央会同意的。”林部长电请中央后，同意把韩先楚同志和一大队（高级干部队）留下，以后，我又把二十多学员给了黄克诚同志，当时，他高兴的不得了。说：“长工，这回可救了急了，今后，我开辟这个地区有资本了。”出发时，他专为我们饯行并补充了不少物资粮秣。

我们从法库直趋铁岭，在那里休整半天后就奔梅河口。到达梅河口后，军政大学的校部就暂安排在这里。这时，我就到海龙县找林枫部长，他在那等着接收干部，我又将四个干部队计三百多人交给了林部长。其中有抗大的干部，党校的、文工团的各种干部队。为了行动方便，我把二十几位中央委员的爱人及子女也一并交给了林部长。其他的同志由我率领直奔伪满时期的一个省会——通化。通化是个山区，傍依鸭绿江。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天，投降后的日本人未等接收又以淳化发电厂为中心发动一场万把人的暴乱。他们以刀枪棒棍向通化军区大楼进攻，并把我校先到的吴溉之同志的住房也包围起来。于是，吴溉之同通化军区副司令员刘西元指挥一个旅，向日本暴动人群发起进攻，暴乱被镇压下去，把俘虏关进山洞之中，经过清理杀

了暴动的头子，其他人经过教育后经北朝鲜撤回到日本。

这样，我抗日军政大学横跨陕、晋、绥、察、热五省区，于一九四六年二月胜利的到达东北的通化。由于环境、任务的变化，抗大遂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林彪；代政委吴溉之；副校长、代校长何长工；教育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刘型。其任务有两个：第一、分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加强地方工作；第二、接受东北知识青年培养干部。学校到东北以后，又陆续调出大批干部、学员到部队和地方工作。同时派出大批干部分别创办了北满、东满、南满三个分校。北满分校校长是王泮清同志，校址在佳木斯。东满分校校长由军区司令周保中同志兼，校址在吉林老城。南满分校校长为肖华春同志，校址在丹东。主要培养蒙族干部。其他所留干部因尚未招收学员到校，乃组织两个大的工作队，分别帮助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直属队组织一个工作队帮助通化市各机关学校工作。医务人员则参加战时医疗工作。四月二十六日，我军占领长春，军大即奉命迁移至长春，接受十二个新兵团的工作。此时，军大与原抗大一分校已合并组成一、二、三大队。并成立长春军区，我为司令，吕正操为副司令。在长春一面加紧训练新兵补充部队，一面派出干部在东北各主要城市招生。这时候，正值四平拉锯战。四平一失，唇亡齿寒，长春必定遭敌强攻。开始，东北局决定要我们把长春做为马德里来防守。当时，我们感到新兵团成分复杂，缺乏训

练，抗大干部学员本身又力量不足，死守长春不现实，也不可能。因此，我们极力向上反映改变了计划，在四平一旦失守后，我们即刻转移。事情果然象我们估计的那样；几经争夺四平失守，部队分东满西满两路撤退，林彪由铁路先下来，半夜到了我们司令部，稍事休息，当夜又赶往松花江以南的吉林省去了。我们把情况向他汇报之后，他讲，我们的决心对，同意我们第二天早晨撤退到德惠的计划。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即准备完毕，部队徒步，家属机关人员坐火车。当我们刚刚出城不久，侦察员报告，敌人的先头部队、坦克和骑兵已抵长春近郊约十五里路了。由于我们走的匆忙，除必须的物资外，好多东西没有带走。我最感惋惜的是当时收缴的十二架钢琴没有拿走，如果那玩艺搞到军大校址去，文艺活动无疑会有点“洋味”。现在想起来还直后悔呢！此时军大干部学员都不是赤手空拳了，在通化统统换上了日本装备。东北局的安全转移，还有我们掩护一功呢！事后，林枫同志讲，长工你们的反对票投的对，如果死守长春，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我们到德惠一个星期，集中队伍过松花江去哈尔滨。五月末学校迁至北安，大队改为支队。由二大队负责招收和培养新生的紧张准备工作，一、三大队，则组成两个工作队到海伦、拜泉两县帮助群众工作。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军政大学在北安城东大广场举行了第九期开学典礼。李富春同志亲临大会讲了话。这一期



共招收男女青年六百多人。教学内容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中国近代史、现代中国社会、新民主主义概念、社会发展史、建军思想、根据地建设、军事常识。尤其针对东北青年特点进行时事教育。当时，汉奸、国特造谣：

“军政大学是共产党的招兵处，男的当兵，女的配给”。教学中，军大用现地参观、校史展览、文艺演出及家属恳亲会等形式彻底粉碎了这一谣言。这样一来，军大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刚刚获得解放的东北青年学生的心。投考军大的人越来越多。仅七、八、九三个月就有二千一百多名学员入学。这中间有个插曲，即我们犯了一个不小的“左”的错误。由于东北是沦陷区，很多青年有“正统”思想，有的还当过警察之类的差事。我们开始保守，怕把阶级阵线搞混，就淘汰了一百多人。这一下挫伤了青年人的积极性，有的要自杀，有的吵闹着不走。东北局领导知道后，批评了我说：“青年人可以教育，除少数有劣迹的外，其他人是受蒙蔽的，要以教育为主。”之后我们又重新招回这部分青年就学。事实证明这些青年人是很有不错的，后来不少人成了接收东北的骨干力量。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九四七年三四月分别举行了第九期毕业典礼。一九四七年四月间，为适应东北斗争形势，总校组织机构进行缩减，三支队到部队中成立三个教导团，二支队调往西满成立西满分校。校长由军区司令李享兼任。总校直辖两个大队及数个直属连队，校直各机关则大量精简，抽出干部调往部队，加强部

队力量。学校形式上是缩减了，实际上是扩大了，质量提高了。总校除直接属有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四个分校外，还有三个教导团，这就更增加了学校广泛培养人材的职能。同时，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在东北原有基础上，由军大派出骨干建立了航空学校、工兵学校、坦克学校、三个医科大学等。

一九四七年第十期开学。这一期招生条件限制较前严格，但投考的男女青年较前大为踊跃，所录取的新生成分更加纯洁。他们不再观望犹豫，瞻前顾后，而以条件不合感到遗憾和痛苦。学校迁至东北之后，为东北和全国培养了几万名干部，其中还有不少是蒙古族和朝鲜族等少数民族优秀人才，为东北的解放和全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五〇年东北军大完成了她光荣的历史使命，开赴华中，改称中原军政大学，后为“汉口高级步兵学校”。

在东北军政大学以后，分别成立了以叶剑英为校长、肖克为副校长、谭家述为副校长、陶汉章为教育长、向仲华为政治部主任的华北军政大学；以张云逸和陈士榘先后为校长、钟琪光为政委、聂凤智为教育长、余立金为政治部主任的华东军政大学。还成立了西南军政大学等。从此，我军院校开始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而造就着新型的军政人材。之后，我受命到东北军工部工作。

## 第十二章

# 在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战线上

### 东北军事工业的艰辛创业

东北军事工业是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白手起家”方针指导下，在接收日本的一部分机器设备、物资，修复日军一部分破烂兵营、仓库、房舍作厂房的基础上，在来自老解放区的军工干部及全体职工的努力下，克服种种困难，才得以建立起来的。

一，琿春地区是东北我军军事工业的精华，是由沈阳等地搬运部分机器建立起来的。

日本投降后，我党从延安、晋西北等地抽调一批军工干部随军挺进东北，相继进入沈阳、鞍山、长春等城市，接管了一部分工厂和机器设备。当时，沈阳由苏军驻守，大部分精密机器、新式工厂的设备苏军已运走了。我们接收了一部分他们剩下或尚未搬走的物资。即使如此，这些物资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然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苏军迫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款的约束和国民党的压力，突然决定将沈阳等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要我们迅速撤离沈阳。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均在沈阳，接苏方通知后，只好马上准备撤离。中共东北局令军工部在三天内搬出接管的物资。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我们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所以在紧张、忙乱的情况下，仅从沈阳的孤家子以及辽阳、抚顺、本溪、鞍山等地搬出了少数机器、器材、金属材料、无烟火药、钢管等军工原料。这些物资在运输过程中又有所丢失。十二月中旬，几经周折，克服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将这些物资运到了通化，一面积极建厂，一面继续收集机器、材料，并组织部分力量进行生产。

一九四六年三月，杜聿明由沈阳沿中长路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展开“扇形攻势”，对通化构成严重威胁。此时，东北局当即决定，将军工厂东移延吉地区。由于国民党军于五月又先后占领四平、长春、吉林等地，我们的搬移工作只有绕道临江、抚松，经长白山深山老林而行，七月才到达延吉、图门。正待建厂生产时，国民党军又进占了吉林市以东的拉法新站，对吉东造成威胁。我们遂决定将工厂迁至琿春。

琿春在吉林省东南图门江下游，地处中苏、中朝边境的三角地带，是延边偏僻山区的一个小县，交通非常不便，但有利于我们躲避敌人的破坏。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跋涉，

约三百余车皮的各类物资才经朝鲜运到了琿春。我们在一个日本陆军医院仓库的废墟上，建起了炮弹厂、子弹厂、炼钢厂。

二，鸡西地区的军事工业主要是从哈尔滨搬移了一部分机器设备建立起来的。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党军占领长春后，继续北进，直抵距哈尔滨一百二十多公里的陶赖昭附近，哈尔滨形势一度十分紧张。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一方面积极组织军工生产，支援前线作战，同时责成乐少华、钱志道等率一批干部和工人，从哈尔滨将一百余车皮的物资材料，百余台机器运往鸡西，利用鸡西的煤、电、交通方便、地理位置紧靠苏联等便利条件，建立又一军事工业基地。他们利用日本铁路职工遗留的宿舍，建起了手榴弹厂、炮弹厂等工厂。

三，北满佳木斯地区兴山的军事工业是由琿春迁一部分工厂设备建立的。由于琿春军工厂过多，交通不便，又缺煤电，东北局决定将一部分军工厂迁往佳木斯兴山地区。兴山地处黑龙江省东北，有鹤岗的煤可以利用。搬迁工作由王逢源同志负责。先后搬去三个厂，再加上合江的兵工厂，经过调整，利用日伪遗留下来的旧房舍，建起了手榴弹厂、翻砂厂、子弹厂、小型炼钢厂。

四，哈尔滨的军事工业，完全是自力更生，白手起家搞起来的。这座北国名城，日伪时代只有一些木材加工厂，粮食加工厂，烟草加工厂和修理厂，而且在日本投降时遭

到严重破坏，根本没有军事工业。从延安到东北的乐少华、钱志道以及崔振东等带领一批军工干部和工人，利用发掘的日军遗留下的火药、炸药，首先造出了反坦克燃烧瓶，这可算是哈尔滨军事工业的萌芽吧！尔后，他们克服困难，挖掘铁路工厂的一些设备潜力，把市内几百家铸铁锅、犁铧的私营小铁工厂组织起来，采取加工订货等形式进行军工生产，造出了雷管、马刀、炮弹、宣传弹，爆破筒等，随后建立了一个弹药装配厂和实验总厂。

五，西满地区的军事工业是新四军第三师进入东北后，利用从阜新、八面城、齐齐哈尔等地接收的部分机器建立起来的，先后建立了子弹厂、小型手榴弹厂、六〇炮弹厂、修械厂。第三师成立了军工部抓军事工业，以后改为嫩江军区、西满军区军工部，田汝孚任部长。先后在通辽、白城子、嫩江县等地流动生产，最后定址在齐齐哈尔。

六，南满的军事工业是在日本投降后，我党派干部收集了通化、安东新开岭地区的一部分机器设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后在通化、新开岭，桓仁、临江大栗子、安东等地建起了炮弹厂、手榴弹厂、掷弹筒弹厂等军工厂，并具备了一定规模。

七，大连是我军在东北军工生产最重要的基地。那里有个大连建新公司，是华东局干部在那里创建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大连港国际化”

等条款，由苏军管辖大连，行政管理权属“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按此规定，国民党军队和我军均不得进入。但在苏军默许下，我党还是派了东北抗联干部韩光等一批人进去，成立了中共大连地委。当时的公安总局局长、副市长均是我党干部担任。我们的一切活动，只要不给苏方造成外交方面的困难，他们一般不予干涉。这种情况，对我们在大连地区开展工作是很有利的。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一九四六年八月，指示各地，要利用大连拥有近代工业的条件，建设我们的兵工基地。根据这一指示，华东局和华东军区首先派干部到大连调查了解组织军工生产的可能性。一九四七年春，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朱毅带一批干部来到大连开始组织军工生产。此时，从延安来的江泽民也带了一批干部到达大连。朱、江二人在大连地方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同苏军交涉后，从他们管辖的工厂中接管了四个较大的工厂，连同大连地委掌握的几个工厂，组成大连建新公司。朱毅任总经理，江泽民任副总经理。九月，东北局又派张珍等十余名干部到大连作统一的准备工作，张任该公司副总经理。江泽民后来任军工部副部长。至一九四七年底，建新公司初步建成，并具备了大规模生产的条件。建新公司所属工厂主要有化学厂（生产硫、硝酸等）、钢铁厂（炼制弹体钢料及工具钢）、机械厂（为各厂制造机械设备等）、金属厂（炼制弹体钢料及加工）、炮弹厂（分一厂和二厂）。这些厂都有很好的设备和一批

技术力量。建新公司是一个门类较多的综合性军火企业，主要生产后膛炮弹。为了保密起见，也为了不给苏方带来外交方面的麻烦，所以对外以商业企业的面貌出现，称建新公司。它开始是由华东局出人、出钱办的，那时，华东局在山东益都一带，与大连只有渤海海峡之隔，海上交通虽有国民党军封锁，但往来还是较方便的。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一九四五年秋我军进入东北，到一九四七年秋东北军工部正式成立，东北的军事工业经历了一个选点、搬家、建厂的极不稳定阶段。一九四八年我在第一届军工生产职工代表大会上，曾把这一阶段说成“工厂搬家，机器打游击的艰苦阶段”。但是，我们终于在艰难中走过来了，走得较稳妥、踏实。这为以后军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军工部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工作的基础上展开的。

## 东北军工部的成立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中共东北局就开始酝酿正式成立军工部了。成立军工部，有两个战略性的打算：一是从当时战争形势发展需要出发，有必要成立一个统一领导东北各地区军事工业的军事工业部，以加强对军工生产的领导，促进东北及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二是考虑到东北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东北军工的发展必然在技术人才上先行一步，成为未来全国军工发展之基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我十万大军相继进入东北，同国民党展开了争夺东北的激烈斗争。国民党以“接收主权”为名，在美国帮助下，从海上、空中、陆路向东北大量运兵，至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国民党运往东北的主力军七个军，共二十五万余人，再加上收编的伪满军、土匪等地方团队十五万人，总兵力达四十余万人，远远超过我军的数量。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乘我军立足未稳，来不及补充和休整，以及主力部队尚未集中，新组建的部队既缺乏战斗力又不巩固之机，向我军大举进攻，先后从我军手中夺去山海关、锦州、辽阳、抚顺、四平、本溪、长春、吉林等城市，从苏军手中接管了沈阳等城市，一时气焰十分嚣张。特别是四平保卫战我军失利，有生力量损失较大之后，国民党军向北猛犯，我军被迫撤至松花江以北，蒋军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仅在南满有我第三、第四纵队坚持斗争。那时，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独占东北的想法难以实现。在这样的形势下，东北的军工生产不可能有一个稳定安全的生产环境，也不可能集中统一领导，只能采取与这种动荡形势相适应的“多巢主义”，在高度分散、东搬西挪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多生产一些子弹、手榴弹，多维修武器，以满足部队的需要。再说，当时的战争规模也不如后来那么大，我军的兵力较少，缴获的武器弹药还能解决一些问题，靠自力更生发展军工生产以解决部队的需要的矛盾，还不十分突出。

但是，由于东北我军认真贯彻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和一九四六年七月中共东北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东北的形势与任务》（又称《七七决议》）的决议，不到一年的时间，东北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我军取得歼敌四万余人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从此，蒋军在东北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五月，东北局召开了会议，作出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又称《五五决议》），向东北全党提出了新的任务：“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接着，从五月十三日至七月一日，发动了“夏季攻势”，收复城镇四十二座，歼灭敌人八万三千余人，扩大解放区十六万平方公里，使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和冀察热辽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这个新的形势的出现，给东北的军工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我军兵力的发展来看，一九四五年底，我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只有十万人，但至“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我军发展到五个纵队、八个独立师、两个保安旅，加上总部直属部队和东北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兵力达四十六万余人，到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后、秋季攻势前，已发展到七十三万余人。同时，中共中央曾要求东北局在两年内发展一百二十万军队，其中留二十万守家，一百万入关作战。这是一个

宏伟的战略计划。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个要求，东北局和“东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简称）作出了扩军计划，要在一九四八年新组建一百二十六个独立团，共三十万人。但是，实际上，到年底，组建了一百六十四个独立团，三十七万余人。此时，东北人民解放军（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由“东北民主联军”改称）兼东北军区已编成十二个纵队，十四个独立师，三个骑兵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一个坦克团，总兵力达一百零五万人。建设这样一支大军，光靠战场缴获已难以满足需要了，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当时罗荣桓同志曾指出，建设正规军，有三件工作是少不了的：第一是参谋工作；第二是训练干部；第三是军工建设。他把军工建设作为建设正规军的三要素之一提了出来。由此可见，东北局、“东总”领导，已把军工建设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来了。因此，在我军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加强军工建设，成立统一的军工组织，势在必行了。再从战争的规模来看，我军进入东北初期，相对来说，战争的规模是较小的。但是，自“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随着我军的发展壮大和战争的不断胜利，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攻坚战、纵深战将成为主要形式。这样一来，火力的使用不知要比过去大多少倍，武器弹药的消耗也越来越多，攻坚武器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只有加强军工生产，根据我军的需要，生产更多的、适合我军情况的武器弹药，才能满足我军作战的需要。

东北军工生产要肩负起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重任，这也是成立军工部的重要原因。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曾致电东北局：“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这就是说，东北的军工生产不单供给东北我军的需要，也要担负起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任务。事实上也是如此。这样，东北军工生产的任务就更重了。要完成这一任务，不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是不行的。

从东北根据地的环境来看，由于我军在东北的连连胜利，使东北各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这就为东北的军工建设准备了安稳的后方，为军工生产改变战争初期那种“多巢主义”而走向集中统一领导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所以，在上述形势下，东北局酝酿成立军工部是非常及时的，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成立目的为实现统一领导的军工部之前，东北军区名义上已有个军工部，由军区第二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兼任部长。当时没有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各军工厂归他直接领导，各军区的军工生产由他个人联系指导。当时由于形势处于不稳定状态，所以军工厂流动很大，边搬家，边建厂，边生产。可以说一切没走上正轨，游击作风很浓。伍修权只有两名秘书协助他抓这一工作。他带着秘书到各军工基地了解情况，实行面对面领导，当场解决问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适应当时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他在一份《关于军工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中曾提

出要上级派一名懂技术的干部主持军工部工作，由他从旁协助。没想到，这个差事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和伍修权同志是老战友了，在江西红军学校时我们就认识。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公正，很纯朴，很忠诚，工作勤勤恳恳，我们一直合作很好，感情也很融洽。

不久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同志代表东北局首先找我谈话，让我出任军工部部长。他说，我们没有军事工业作后盾，想打大仗，解放东北、解放全国是不可能的。他问我组织军工部有什么困难，能不能组织起来？当时我们的军工生产非常分散，条件也很差，搞军工困难很大。但是，我这个人向来对搞开辟工作、搞薄弱环节的工作有那么一股子劲，不怕苦，不怕难。当年上井冈山改造王佐、袁文才的部队不是困难更大吗？还不是迎着困难上山了吗？再说，我又是学机器制造的。这一点，李富春同志非常清楚。这在当时缺乏技术人才的情况下，我学的这个专业，也被人家看作是行家里手哇！大概就是由于以上原因，才让我出任军工部部长的。我愉快地接受了党的这一重托，走出军大校门，走上军工战线。李富春同志还同我讨论了军工生产的方针等问题，他还告诉我，到任后，一定想办法，软缠硬磨，把苏军当时存在满洲里待运的那批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争取过来。

随后，罗荣桓同志又找我谈话。他是刚从苏联治病回到哈尔滨的。他在倾注全力抓扩军、编组部队、政治工作

的同时，还致力于抓后勤、军工生产等工作。罗荣桓对我说：

“长工同志，毛主席要我们在两年内建设百万大军，准备百万大军入关。东北局决定你来抓军工建设，搞武器弹药。我们请修权同志作你的政委，后勤所有的汽车和司机由你调动，家里的事让修权他们多管一些，你就在外面跑跑跳跳，你看怎么样？”我说，富春同志已同我谈过了，我服从党的决定。接着，他同我就如何把军工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谈了大半夜。他鼓励我说，一定会把这一工作干好的。我说：“搞军工生产，我们应当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但是，目前我们缺乏技术人才。我想，尚未遣返的日本侨民中，有一些技术人才和军工工人，我们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予各方面的优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我所用，让他们帮助我们，教会我们再走，你看怎么样？”他非常高兴地说：“你这个主意很好，咱们有工厂，有原料，就是缺乏技术人员。要注意网罗人才，也要注意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队伍。有了技术力量，我们的军工生产才会大发展。你回去做个计划，开始干吧！”他还要我继续挖掘日本人在东北埋藏在地下的秘密武器仓库，寻找弹药武器。

一九四七年九月，在东北局和罗荣桓同志领导下，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军工会议。共开了二十多天，十月七日结束，所以又叫“十月会议”。这是我军到东北后第一次全区性的军工会议，也是军工部成立时召开的一次具有转折性的会议。到会的都是东北各军工基地的负责人和军工

部的领导，计有，何长工（部长），伍修权（政委），韩振纪（副部长兼琿春办事处主任），王逢源（副部长），高长久，乐少华（鸡西），钱志道（西东安直属一厂），王立，崔振东，刘正栋，王雨果，徐良图（伍修权秘书），刘元义，肖声远，沈毅（牡丹江），吴云清，王清才，周建南（东安直属二厂），田汝孚（齐齐哈尔）等。会议由伍修权同志主持，中心议题是讨论军工建设问题。经过二十余天的热烈讨论，在思想上明确了必须把东北建设成为全国的军工基地，必须积极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在组织上，确定东北军工生产企业统统划归军工部统一领导，各军区、各纵队、各师所辖之修械所交军工部接收，统一制度，统一生产计划，统一分配产品。南满、吉林、西满等军工部门直接辖于军工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军工部，何长工任部长，伍修权任政委（兼），韩振纪、王逢源任副部长。一九四八年又增任江泽民为副部长。

军工部机关设在哈尔滨，干部来自四面八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建，陆续设立了办公处、材料处、技术工程处、供给处及部党委办公室与顾问室。后又成立了政治部和工会，高长久任政治部主任，马文任政治部副主任。

军工部隶属东北军区，但实际上受东北局直接管理。我们有什么事直接找军区和东北局领导人。当时和我接触最多的是李富春同志和罗荣桓同志。李富春是我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很熟悉。在东北期间，他分管后勤保障工作，

他给我很大支持和帮助。东北局的决定由他向我们传达。罗荣桓同志和我的关系也很密切，我经常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对我们的工作也很关心、支持。刘亚楼同志是军区参谋长，我们之间接触也很多。

我任军工部部长不久，又兼任了军械部长。军工部是管军火生产的，军械部是管武器弹药及其分配的，都是战场保障工作。所以，那时我的担子更重了。

### 拚了命也要把军工生产抓上去

军工部成立时，东北的军事工业虽说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军工生产的条件仍然是很差的。我到任后，一大堆问题摆在我 and 伍修权同志的面前，主要是组织分散，没有统一领导；技术力量薄弱，设备陈旧，生产方式落后；产品规格不统一，不标准，产量低，质量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原材料缺乏；职工生活也有很多困难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我吃不香，睡不好，很着急。前线的仗打得非常激烈呀！而且越打越大，需要大量枪支弹药！当时，杨立三同志带着三人小组坐镇东北，督促军工生产，筹集弹药武器送往前线！形势不允许我们畏难，拚了命也要把军工生产抓上去。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跑遍各军工点，有的点去过几次甚至上十次，找军工干部和厂长谈话，同大家研究把军工生产搞上去的办法。根据“十月会议”精神，我们首先抓



了组织统一工作。这是非常复杂而又极为重要的工作。所谓复杂，是因为东北军工部门的干部来自全国各解放区的各个“山头”，各自一摊。要铲平“山头”，集中统一于军工部，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所谓重要，是因为这一着关系到调动东北军工战线浩浩荡荡几万大军的积极性，最大地提高生产力的问题。由于来自各解放区的军工干部非常顾大局，组织纪律性很强，这一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撤销了各军区的军工部，在各地成立了军工办事处，置于统一的军工部领导之下；把各师、各纵队的修械厂（所）一律划归军工部统一管理。实施的具体步骤是先北满，后南满。至一九四八年春，完成了统一北满军工部门的工作。四五月间，又先后将大连、辽东、辽南的军工组织划归军工部。尔后，又陆续接收了各军区、纵队、师的小型修械所十一处，从而实现了东北军工的统一领导。在这个过程中，在各地先后成立了第一至第九办事处，各办事处进行了适当的分工。第一办事处，设在琿春，主任由韩振纪同志兼，主要生产八一、八二迫击炮弹；第二办事处，设在兴山，主任由王逢源兼，主要生产手榴弹、子弹；第三办事处，设在鸡西，主任乐少华，主要生产六〇炮弹、手榴弹；第四办事处，设在安东（今丹东，由临江迁至），主任吴云清，主要生产八二迫击炮弹、山野炮弹、六〇炮弹、手榴弹；第五办事处，设在齐齐哈尔（其八一炮弹厂设在北安，由琿春迁至），主任田汝孚，主要生产六〇迫击炮

弹，八一炮弹；第六办事处，设在牡丹江，主任沈毅，政委许兴，主要修配各种后膛炮；第七办事处，设在吉林（是后修建的），主任由韩振纪兼，政委张广才，主要复装九二和山炮弹；第八办事处，设在哈尔滨，主任王盛荣，主要生产六〇炮弹、掷弹筒；第九办事处，设在大连，主任朱毅，政委李一氓，主要生产“四一式”七五毫米的炮弹、发射药、硫酸、硝酸。每个办事处辖若干军工厂，尽量做到配套。为了解决燃料、资金、运输、技术等问题，军工厂尽量设在大煤矿、大企业、大工厂附近。此外，军工部还直辖第一、第二厂。第一厂是化学厂，设在西东安，厂长钱志道，主要制造发射药；第二厂是电器厂，设在东安（今密山），厂长周建南，主要制造各种通讯器材，如手摇马达，收发报机等。

统一组织领导的实现，为集中机器、器材、人员和实行统一计划分工协作，提高产量和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底，东北军工部共有大小工厂五十五个，全部人员至七月底止共二万零七百三十五人，其中干部（含技术干部）二千五百余人，工人一万一千余人。这是一股凝聚在一起的强大力量。对此，东北局领导非常满意。李富春同志曾以赞扬的口气对我说：“长工，把这支力量组织在一起，可真不容易啊！”我笑着说：“我个人没多大能耐！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全靠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功劳是大家的！修权同志出的

力很大。”

在统一组织领导的过程中，对一些工厂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搬迁，新建或扩建了一些厂。珲春地区的一些厂因交通不便，后来迁往吉林。也曾确定把鸡西、兴山、北安、东安等几处进一步建成永久性基地。

我们到东北后，由于未注意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到军工战线，故军工的技术力量显得很薄弱。为解决这个问题，在罗荣桓同我谈话时，我曾提出使用尚未遣返的日本侨民中的技术工人问题。实际上，在军工部成立之前有些军工厂已这样做了。这批人情况很复杂，有的还有军国主义残余思想，有较大抵触情绪，闹着回国。但当时我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们是有罪的，一小撮战犯是不可宽恕的。但是，广大技术工人是受骗的，他们也不应负侵华的任何责任。再说，他们毕竟是工人，一些错误甚至反动的思想是可以纠正的，他们一旦觉醒，就会痛恨过去，会为我们出力，把他们的技术传授给我们，成为我们发展军事工业的一股力量。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不歧视；另一方面给予优待，保护他们的地位，很好的安排他们的家庭，把他们的子女送进学校。他们的伪满票子不能用了，我们给他们兑换成东北币。我向他们公开宣布：“待条件允许，我一定负责亲自把你们遣送回国！”他们非常感动，努力为我们工作，有的当上了先进，有的成了职工会的代表。应该说，他们对我们的支持是不

小的。技术上有了难点，我们就组织攻关队，日本工人教我们的工人学，解决了不少问题，我们的工人也学到了技术。后来他们被遣返回国时，我实践了原来的诺言，亲自送他们登程。临别时，他们恋恋不舍，有的痛哭流涕，有的家属竟向我跪拜致谢！

此外，我们还办了一些技术学校，如哈尔滨工业学校，曾收学员五百四十余人。沈阳解放后，我亲自勘察校址，筹办高级职业学校，计划培训中、高级兵工技术干部，各办事处举办了各种培训班。

东北军工生产最大的困难是原料不足。当时，我们组织人员到处购买。但由于物价波动很大，货币贬值，经常出现从作出预算到领到现金时，已不能按原预算买到原数量的材料的情况。向苏联订货到的也不及时，经济也很困难。为解决原料问题，我们组织了“挖窑”（日本地下军用库）。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期间，建造了许多地下仓库，里面蓄存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这些仓库非常秘密，都是钢筋水泥铸成，存放的武器弹药和物资不靠墙、不沾地，都放在架子上，保存的非常好。他们万没想到这一批财富竟成为我们的战利品。我们专门组织了“挖窑队”，挖出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能用的武器弹药送往前线，军用物资由军工部统一分配。“挖窑”解决了我们相当大的困难。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军工部在《东北军区军工部军工工作报告提纲》中曾这样说：“生产最大的问题是原料

供给，东北材料虽然比其他地区多，但基本上是用过去敌人剩余的东西”。

军工部对大连建新公司是全力支援的。特别是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封锁了渤海海峡以后，建新公司在经济上发生了严重困难。我们根据东北局指示，全力予以支援，要粮给粮，要煤给煤，要钢给钢，要铜给铜，缺什么给什么。在长春、吉林、沈阳未解放以前，从北满到大连是比较困难的。当时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走北朝鲜，由郑南浦海运到大连；另一条是走通化到安东（今丹东），经普兰店到大连。我们克服运输方面的种种困难，秘密地把各种物资运到大连。我也曾不下十次来到建新公司，每次去，都带大批物资，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鼓励职工们坚持自力更生，加紧生产。

产品的质量是军工生产的生命，是直接影响战争胜败，决定战争力量的重要因素。当时东北军工产品的质量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废品率较高，因包装防潮不好，炮弹、手榴弹有的不爆炸。有时竟从前线退回几万发炮弹，十几万发子弹，这是很惊人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军工部狠抓了产品的质量，提出质重于量，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努力增加产量。

一九四八年五月，军工部专门召开了“炮弹会议”，研究如何提高炮弹质量，增加产量与统一规格标准问题。到会的都是各炮弹厂领导及有关人员，他们大胆地摆出了炮

弹生产方面存在的质量问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找出了原因，广泛交流了经验，明确了方向。这次会议对军工生产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会后不久，产品质量产量都有很大提高。如琿春生产的炮弹由月产一万余发上升到四万余发，废品率大大下降；哈尔滨的六〇炮弹体翻砂由于改进了技术，不仅质量提高了，产量也由月产五六百枚增至二千余枚。我们组织了攻关队，由技术熟练的工人参加，技术上有什么难关，攻关队就上，群策群力，难关很快就攻下来了。我记得八二迫击炮弹的引信总是过不了关，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我们派干部到琿春组织攻关队，专门研究引信过不了关的问题，很快解决了。

军工生产任务的完成，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作保证是不行的；在当时环境艰苦，待遇菲薄，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就更重要了。军工部党委是很重视这一工作的。成立和健全了政治部以及各种政治工作制度。一九四七年底在哈尔滨召开了军工系统的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修权和我主持。这次会议分析了军工系统政治思想工作的形势，总结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作出了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确定了政治思想工作的方针、任务。八月，又召开了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这个大会虽不是专门的政工会，但特别强调了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我向大会致了开幕词，提出：“虚心学习，大胆创新，反对自满和保守，生产质量好，数量多，成本低的产品支援前线”

的要求。修权同志在闭幕词中指出：“政治学习是一切事业成功之母。只有很好地学习政治，提高政治水平，方能高度发挥技术的作用及才能。当然我这样说，决不是否认学习技术及业务的重要，而是说，只有关心学习政治的技术人员，才能真正学习技术掌握业务。”这次会议决定成立军工系统职工会。职工会的方针是：“团结教育全体职工，加强政治、文化、技术学习，提高阶级觉悟，以新的劳动态度对待新的工厂，举办福利互助事业，保护职工日常利益，与行政同心协力，巩固与发展军工生产，积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这次会议还明确提出在全体职工中开展忆苦和立功创模运动。会后，这一运动在军工战线轰轰烈烈展开了，规模很大，效果很好，涌现了一大批模范人物。军工部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的一份总结报告中谈到开展立功创模运动的体会时说：“立功创模运动是保持工人情绪推动工作最好的方法。只有按时庆功，及时记功，使立功成为政治工作中经常工作之一，才能保持情绪的经常性。”当时的政治工作很注意对职工进行时事教育，政策教育，随时用前线的胜利激励职工们的热情。那时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比较好做，因为没有什么更多的个人利益纠缠着大家，道理讲明白了，问题也就解决了。例如，在东北我军连连取胜的形势下，有许多军工干部认为军事工业没有什么发展了，打完了仗就失业，不安心做军工工作。我对大家说，军事工业是重工业，它的前途是无量的，仗打完了，可以

转为和平生产，我们现在发展军事工业也是为新中国建设工业的基础。这么一说，大家的思想问题很快解决了。事实上也是如此，从一九四九年六月起，我们就开始紧缩东北军工机构，缩减军工生产，许多工厂合并后转为和平工业，约有一万三千余名军工干部转为和平生产或转为其他职业。

军工部抓了上述工作之后，东北地区的军工生产走上了正轨，并很快出现了飞跃的发展。

我到军工部后，还抓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前面提到的李富春同志的指示，与苏联代表谈判满洲里的武器问题。那批武器数量很大，是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的，存在满洲里，准备拉到乌拉尔去炼钢。这批武器对我军来说是极其需要的。为把这批武器弄到手，李富春和肖劲光同志曾和管理这批武器的苏联代表卡瓦洛夫进行了多次谈判，但没谈出结果。李富春同志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是军工部长兼军械部长，搞武器弹药是我份内之责。我和卡瓦洛夫一开始谈判，他的态度就很硬，你硬我也硬。我说：“关东军这批武器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你们不能拉走。我们用废钢铁对换，一吨换一吨。”他硬不干，非拉走不可。我有些急了，说：“你是个保守分子，没有一点国际主义。你如果不答应，我只好来抢，我推着你走在前面，看守武器的苏军开枪，先打死你。你硬要拉走，我就给你拚命，我给斯大林打电话，告



你的状,告你没有国际主义。”他看我真火了,态度就软下来了。我听说他有两个嗜好,一是爱喝烈性酒,一是爱跳舞。于是,我搞了一些烈性酒给他喝,又利用我们的文工团组织了几次舞会。当时很困难,能喝上酒,跳上舞实在不易。他喝的很舒服,跳得很痛快。当我们的谈判进行到第三天夜里,他端着酒杯就在协定上签字了。当然,卡瓦洛夫在协定上签字不是个人的行动,是秉承苏联政府的旨意,是苏联政府对我们友好的一种表示,不能说我的烈性酒或舞会起到什么作用。一大批武器弹药到了我们手了。李富春同志很高兴,给我开玩笑说:“长工,你真是个油子呀!”我哈哈大笑:“毛主席说我是个外国油子!”这批武器数量不小,具体数日记不清了,有各种枪炮,还有坦克,我们用几列火车拉了几天才拉完,解决我们不小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九月,以攻打锦州为开端的辽沈战役揭幕了。军工战线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积极生产,支援辽沈战役。许多职工吃在机器旁,睡在工房里,日夜奋战,生产大批武器弹药运往前线,保证了前线战役的需要。辽沈战役开始后,我奉命指挥整个战役的运输队。前线几十万大军的武器弹药、给养服装,都要由运输队送上,任务之重,需要之急,在和平时期是难以想象的,不能有丝毫差错和怠慢,否则军法不容呀!那真是日日夜夜,紧张极了。我办公室里的几部电话响个不停,时刻同前线和后方保持联系。整个战役期间,我没

睡过一个囫圇觉，有时几天几夜不合眼，眼红肿了，人消瘦了。当时国民党空军欺我们高射武器火力不强，空袭很严重。他们有几个轰炸机队专炸我们的运输队，给我们的运输造成很大困难，迫使我们的运输队只能夜行昼伏。这怎么行呀！当时前线还有三个纵队没穿上棉衣呀！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很着急。一天，罗荣桓同志把后勤部司令员黄克诚、副司令钟赤兵和我找去，专门研究如何把武器弹药、冬装和几百辆汽车用的油料等安全、准时地运到前线的问题。他说：“一定要准时送到战地，保证供给，时间就是胜利。”他还要我负责把十五辆日军坦克修好送往前线。我当即表示坚决完成任务。我想，东北冬天是白雪覆盖，如果我们的运输队用白色伪装起来，敌机不就看不清了吗？于是我下令，运输物资的车辆一律用白布蒙上，马匹也穿上“白衬”。各运输队车辆之间拉大距离，一百米一辆车，按照一辆装军需物资车，后跟一辆油料车，油料车后跟一辆弹药车的顺序错开，一字排列行进，以减少遇敌机空袭时彼此燃烧的可能。这样做果然有效。运输队在雪地行进，就好象一个个雪堆，敌机在高空是难以看清的。就这样，我们的运输队把大批物资运到了前线，保证了前线作战的需要。我负责修复的十五辆日军坦克也按时开到锦州前线参加作战。这十五辆坦克在锦州城外一滚，范汉杰吓坏了。据一个俘虏说，当时范汉杰惊呼：“这个仗有苏军参加，我没法打了！”因为我军原来没有坦克，所以当坦克出现在锦州街

上时，大出其所料，误认为是苏军的坦克参战了。

辽沈战役我军俘虏了范汉杰、廖耀湘等国民党一批高级将领。李富春同志对我说，根据中央指示，这批被俘虏的高级将领由你负责谈话教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这些人虽成了俘虏，但仍不大服气，还有各种思想问题。我多次找范、廖等谈话，每次谈话，起义的郑洞国将军都参加。我问他们：“你们几十万大军，又有美械装备，为什么战败了哇？”我想，如果不让他们弄清战败的原因，他们始终不会认输；他们不真正认输，就很难收到好的教育效果。我提的这个问题，也正是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他们也都在思索这个问题。然而，对我的问话，开始没有一个人吭声，随后他们就是大骂蒋介石指挥无能，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他身上。言外之意是他们这些人还是能打的。我说：“蒋介石指挥无能，你们呢？你们是总指挥、总司令，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将在外，君命可以不受嘛！你们为什么不恰当部署，正确指挥，取得胜利呀？难道你们没责任？”我这么一问，他们哑口无言了。我接着说：“你们之所以战败，蒋介石指挥无能是一个原因，但最根本的是你们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反革命的。人民需要和平，你们却违犯人民的意志，发动内战。你们失道寡助，人民不拥护你们，你们能打胜仗？你们的官兵关系也很紧张，士兵不愿为你们卖命，你们能打胜仗吗？不要不服气，如果不服气，我把你们放回去，我们再打一仗，你们看怎么样？”我这么

一说，有的将领忙摇手：“不敢，不敢！我们已领教了！”我对他们讲了党的政策，希望他们好好改造，争取成为新人。对他们这些人，我们尊重他们的人格，生活上给予照顾，不没收他们的个人财产，妥善安排他们的家属和孩子。他们很感动。

沈阳解放不久，军工部由哈尔滨迁往沈阳，在哈尔滨设立了军工部分部，管辖吉林、黑龙江地区原有的军工企业。军工部迁沈后，根据东北局指示，从琿春、兴山、齐齐哈尔、牡丹江、鸡西、哈尔滨等军工基地抽调大批军工干部，先在沈阳集中学习，随后分派到沈阳地区接管国民党所属的兵工厂。先后接管了沈阳的第一、第二、第三兵工厂（沈阳兵工厂），汽车总厂、分厂等，以及辽阳炸药厂和抚顺的军火工厂。接管工作是很复杂、很细致的。接管既要保护工厂的机器、设备、物资和各种设施不受损失，又要安定厂里秩序，稳定留下来的职工的思想，在短期内恢复生产。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旧人员。我们对旧人员，除极个别暗藏搞破坏的国民党特务采取坚决镇压外，对绝大多数采取了团结、改造、留用的方针，例如原国民党九十兵工厂总厂（接管后改为沈阳兵工总厂）厂长陈修和，在结束对该厂的军事管制后，我们仍任他为厂长。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我和王逢源同志带着宣传队和慰问品到该厂慰问，每人发十万元东北流通券以及粮食、羊毛背心、衣服等物，我向全体职工讲话，鼓励他们进步，安心生产，为革命多作贡献。军工部宣传队还为他

们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等歌剧。一九四九年春节，我在沈阳明春饭店设宴，招待各厂干部和劳模，陈修和等人也应邀参加，这对他们是很大鼓舞。由于我们的方针正确，所以接管沈阳、辽阳等城市的十几个大中型兵工厂进展都很顺利，机器设备、工厂设施都比较完整的接了过来，并很快恢复了生产，支援前线。

一九四八年冬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军工部根据新的形势和生产任务，适当调整了工厂的人员、机器，并适当并厂、迁厂、增厂、分厂，使生产组织更合理化，生产技术专门化；整理了各级机关与工厂的组织编制，调整了干部，裁减了冗员，使机关更适合企业生产部门的要求；在较有基础的工厂实行民主化管理，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议，实行厂长负责制，取消政委制。为恢复东北地区国民经济，根据中央军委和东北局指示，把一些工厂如沈阳汽车总厂、分厂和安东迁到沈阳的电厂等，交给东北工业部，转入生产民用产品。此外，对军工战线的干部进行了合理安排，有的转入民用工业部门。经过这样的调整，东北军工生产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一九四九年十月，我奉中央之命，离开沈阳到北京就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促进了东北军事工业的发展；东北军事工业的发展有力的支援了解放战争。从一九四五年底我军挺进东北，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仅三年多的时间，东北军事工

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游击式逐步走上正规化，从仅能修理枪械小炮、生产部分弹药到修理坦克火炮，生产各种枪支大炮，发展是飞速的，成绩是显著的。对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东北局、东北野战军领导的赞扬；同时也有力的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特别是对华东战场支援，受到战场指挥员的好评。一九四九年初，贺龙同志来到东北参观军工生产。他先到沈阳军火生产基地，后又到大连炮弹厂、化学厂、哈尔滨军工厂等地。他给东北军工生产以很高的评价，高兴地说：东北的军工规模这么大，设备这样好，这样全，关内可没有呀！你们不仅能生产子弹、手榴弹，还能生产各种枪炮，榴弹炮弹都造出来了，真了不起呀！看了你们的军工，我的腰杆也硬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第二次全国军工会议期间，刘少奇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说，中央对东北军工生产是很满意的，希望继续努力。一九四九年一月，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同志亲自从前线写信给建新公司总经理朱毅同志：“朱毅同志：非常感谢你！你们做的威力很大的炮弹，保证了我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他还说，华东的解放，一是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二是离不开大连的炮弹。需要指出的是，东北军事工业的发展，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军工干部。这些干部中，有的随军南下华东和中南，有的转到重工部门或其他工业部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军事工业和工业建设的骨干力量。

## 在重工业部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搞经济建设，搞工业化，成为中心任务。我们从战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根本的一条就是要重新学习做建设工作，以战斗的姿态实现这种转变。当时，搞经济建设，就要全力发展自己的工业，尤其重工业，只有优先搞重工业建设，才能以重工业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发展重工业困难很大。我们接收了旧中国的一个烂摊子，当时整个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得很。国民党搞了一些兵工厂，发展了一些轻工业，还都是依靠帝国主义，没有独立的作战能力，钢铁工业更没有基础。石景山钢铁厂是北洋军阀段祺瑞他们搞的，年产仅五万吨钢铁。阎锡山搞的钢铁工业也只有年产五万吨的规模，可怜得很。困难虽大，但难不倒我们。我们经过千辛万苦，流血牺牲砸烂了一个旧世界，我们也将战胜任何困难，建设一个新世界。那么，谁是搞重工业的合适人选呢？我当了重工业部副部长后才知道，当时毛主席、周总理为此曾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确定由我来担任副部长。他们说我有那么一股子干劲，在东北军工部干的不错，有贡献，让我任重工业部副部长。我原没打算搞重工业，因为能力有限，知识也有限，恐怕难负重任。后来周总理、李富春同志多次找我谈话，毛主席又拍了板，我不好推辞，答应了。陈云同

志兼部长、党组书记。他是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全面抓经济建设，忙得很。不久，嘱我以代部长名义进行工作。这样，在重工业部我的担子就更重了。

当时重工业部的副部长还有刘鼎和钟林同志，办公厅主任为赖际发同志。刘鼎同志早年曾在德国学技术，会开飞机、汽车、火车，是我党二十年代的老同志。他在促成我党与张学良将军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是立了功的。他主要分管兵工总局及机器、汽车、船舶等工业局（筹备组）的工作。钟林同志是留美学化工的，解放前是国民党四川成都兵工厂厂长，中共地下秘密党员，与在重庆的周总理联系。他主要分管钢铁、化学、有色金属等工业局的工作。我还兼任航空工业局局长的工作。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工作了近三年的光景，彼此合作得比较好，为新中国重工业的建设作了一些初期的开创筹建和准备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方面的工作。

重工业部，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的架子为基础，并从东北等大区陆续调入一些干部组建起来的。华北企业部原有煤、电方面的企业，则划归中央燃料工业部领导。华北企业部直属的其他重工业企业，由重工业部直辖领导。重工业部对各大区工业部，主要是规划、计划方面的领导或指导，如大区间主要技术骨干及熟练工人的相互调配，重要物资原料供应的保证等方面的工作，不直接管理大区的工业企业。但应指出：各大区的军事工业，重工业部成立



后不久，即成立兵工总局，统一划归重工业部领导。原属军委通信部的各大区电讯通信器材方面的企业，也是全国统一的。重工业部成立电信工业局后的初期，仍以军委通信部的领导为主。

重工业部是一个综合工业部。除煤、电力、石油等重工业外，当时它所管理的工业范围已相当广。重工业部从成立到一九五二年八九月份分成三个部（重工业部和第一、二机械工业部）改组之前，先后已成立有钢铁工业局（刘彬、陆达）、机器工业局（韩振纪、郭栋材）、化学工业局（张珍、李苏）、有色金属工业局（王逸群）、兵工总局（刘鼎〈兼〉、郑汉涛）、航空工业局（何长工〈兼〉、段子俊）以及汽车工业筹备组（郭力、孟少农）、船舶工业筹备组（程望）、建材工业筹备组（杨思九）等管理及筹备机构。加上电信工业局（王士光），一共涉及了十个方面的工业。

成立重工业部，是为建立起领导全国重工业的系统，在政务院领导下拟订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政策，起草规划，审定全国年度生产计划等等，并逐步实现统一领导全国各大区的重工业。我到职后不久，曾邀请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以及华东、西南、中南、西北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工业部的负责同志共同讨论了如何恢复和发展重工业等方面的问题。接着，重工业部还先后召开了全国钢铁、化工、有色金属工业会议等，进行了商定年度生产计划、

明确管理体制（当时管理体制为重工业部——局（或大区工业部）——企业三级）、调查和登记技术人才，以便做好大区间相互调配的工作。为提高技术，刺激生产，在当时实行低薪制的情况下，对生产管理已上了轨道的企业，也曾提出了试行超额奖金制的办法。

重工业部成立后，曾聘请了苏联专家帮助和指导我们编制计划、制定企业管理的条例、规程以及指导钢铁、机械、汽车等工业的生产技术工作。重工业部在编制第一个五年重工业计划之前，还派了徐驰率一个小组，到苏联计划委员会实地考察，学习了苏联编制计划的经验。当时国家财经还很困难，不可能一下拿出很多钱来投入重工业，但我们注意到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必需兴建的新工业的筹建。如鞍钢的三大改造工程（大容量高炉、轧钢及无缝钢管厂）、沈阳重型机器厂的改造、汽车和坦克制造厂的筹建、上海几个造船厂的改建和扩建等等，都是当时重工业部着重抓的工作。这些工作开展得都相当顺利。

那时，我们的指导思想，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把国内的专家集中起来，以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来建设自己的工业；另一方面也注意吸收国外的经验，当时在美国封锁、敌视我国的条件下，主要是苏联的经验。我国新兴的航空制造业、汽车和坦克制造业，都是在这种精神下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的。在此期间，还应提到的是：山西太原重型机器厂的建设，主要是由李秉渊为首的设计组

自行设计，同时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支持下，以日本的赔偿物资，国民党政府扔在上海张华滨仓库的一些机器为基础建设起来的。山东张店的铝厂，也主要是由陈岱为首的设计组自行设计建设起来的。成渝铁路的建设，需要重型钢轨，这些钢轨也是我国的技术人员，利用抗战时期由汉阳搬迁到重庆的清朝末年的轧钢机及一些其他机电设备，通过他们克服困难加以修复后，才轧出了一米三十八公斤重的钢轨。后来又轧出了一米四十三公斤重的钢轨，保证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需要。记得一九五〇年，我们为了要自力修筑成渝铁路，我和吕正操同志一起出差来到四川，他是去解决修铁路及桥梁，我是去解决轧钢轨。我们之间的这次合作，配合得很好，成渝铁路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就全线通车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都为铁路的建成题了词。

为发展我国的钢铁企业，我提议建立武汉钢铁厂，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周总理说，这是有眼光的。随后开始建武汉钢铁厂，即现在的武钢。

在重工业部期间，我和刘鼎积极支持并建立的北京工业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国防工业大学。这是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它的前身是经由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华北联合大学工学院等多个阶段发展而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华北联合大学工学院自石家庄迁来北京时，开始设于东皇城根原中法大学的地方。后来，重工业

部以此为基础，一九五一年在北京择址新建，成立北京工业学院。目前该校已是我国国内有名的科技大学之一。

总起来说，重工业部成立后的头三年里，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对国民党留下来的乱摊子，首先要抓恢复生产及恢复性的建设（主要是对华北直属企业）。通过企业民主改革，把这些官僚资本的旧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企业。同时，也为某些必需新建的重工业进行了筹建工作。当时管理和技术人员都很缺乏，前者，成立干部学校，招青年学生通过短期培养，解决了急需；后者，从长远着眼，下决心办工业学院，以正规培养技术人才。在此期间，也为全国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了相应的调查和准备工作。这些工作，为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 赴苏谈判援建航空工业

我在重工业部还做了一项工作，就是赴苏联谈判援建航空工业问题。建立航空工业是个战略问题。现代战争没有航空工业怎么行？中国是个大国，没有航空工业怎么行？当时我的想法是，用尖端带动一般；又用一般推动尖端。就是说，以发展航空工业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又以其他工业的发展推动航空工业。因为发展航空工业需要其他门类工业如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地质勘探等跟上。同时，建立航空工业也是从抗美援朝的需要考虑的。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并把战火烧到我国鸭绿

江边。美国空军不断侵入我国东北狂轰滥炸。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但是，敌人欺我们没有制空权，大批飞机轰炸我地面部队和交通运输线。我深切感到，要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要想保卫我国的神圣领空不受侵犯，必须建立强大的空军，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这种形势促使我下决心抓航空工业。

发展航空工业在当时来说，困难确实很大。什么也没有呀！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争取苏联的援助。我是中央财委委员，在一次中央财委会上，我谈了自己对发展航空工业的想法，陈云同志和副主任李富春、薄一波同志都不反对。他们说：还要请示毛主席和周总理点头，建立航空工业要战胜许多困难，要花很多外汇，要做许多说服工作，我们一般工作基础都很薄弱呀！我说：“困难是很多，只要毛主席点了头，斯大林那里由我去拜佛。”后来我又把自己的想法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得到他的支持。他又向毛主席作了反映。毛主席说，何长工这一炮放得好啊！应该早点抓。毛主席拍板了，问题就算最后定下来了。

当时确有不少同志反对先抓航空工业。他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基础那么薄弱，经济状况又不好，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穷得叮咣响，还去搞尖端，这不是想入非非吗？“小孩子不会走就想飞呀！”有的同志甚至带着讽刺的口吻对我说：“你这个跛子还想上天啊！”我回答说：“我这个跛子从

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跑了半个中国，跛了大半辈子了，现在也该上天了！”好在周总理、陈云、李富春以及一些元帅、将军们都赞成，毛主席又点了头。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组成了赴苏谈判代表团。此事，周总理事先已和苏联政府有过交涉，估计问题不大。我任团长，段子俊、沈鸿二同志为团员。段子俊同志是个俄文通。周总理在他办公室里亲自召集我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刘亚楼空军司令员。会议着重研究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方针问题及赴苏谈判的问题。讨论非常热烈。总理最后作了结论。他说：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作战，大批飞机需要修理。我们又是大国，靠买飞机，光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发展航空工业的方针应当是先搞修理，后搞制造，再自行设计。周总理还一再叮嘱我们：这次赴苏谈判一定要谦虚谨慎，规模搞得小些，主要解决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战场作战。这是因为我们刚建国，还很穷，搞大了没有力量。我国的航空工业没有基础，谈判时原则上依靠他们，一定要争取苏联同志帮助我们建立起来。我问周总理：“我这个团长权力有多大？”总理说，你是全权代表，你说的话算数。为了这次谈判，头几个月我就准备俄语，熟悉俄文中有关航空工业的一些术语。

一九五一年元月一日，我们代表团乘苏“伊尔—12”飞机，由北京出发，经齐齐哈尔、苏联的赤塔，飞往莫斯科。临行前，陈云同志说，长工坐飞机上天了，我也要“上马”了。意思是说，中财委将要花掉一大笔外汇。苏联政府对这次谈判是很重视的。我们一下飞机，就受到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的迎接。我驻苏大使馆的一秘曾涌泉也到机场迎接，并任代表团翻译。对葛罗米柯到机场亲自迎接代表团，曾涌泉同志很惊讶！他说：“这个第一副部长向来不轻易到机场接送客人的。今天，他到机场接你们，你们是什么代表团呀？”我故意唬他：“我们是特殊代表团，现在还要对你保密。”其实，葛罗米柯对来自抗美援朝第一线的中国朋友是很热情的，他把我们一直接到莫斯科一个高级宾馆，送进房间才回去。

正式谈判前，我单独约见了主持这次谈判的苏方代表团负责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曾涌泉担任我的翻译。维辛斯基是苏联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外交家。他身着部长制服，袖口等处都镶嵌着金边，风度翩翩。我穿一身普通西装。这在维辛斯基看来，有几分土包子气。从他的神态我看出，他有些看不起我。当时我想，我是新中国的使者，在他面前我既不能失新中国的国格，也不能失我团长的人格，我要不卑不亢，与他展开一场“舌战”。谈话一开始，他就不主张我们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他说：“你们没有一点工业基础，连飞机轮胎都不能制造，

怎么谈得上建立航空工业，怎么能上天？看来，这笔生意不容易做啊！”我说：“没有什么不容易，毛泽东主席一个电报，斯大林大元帅一批准，不就解决了吗？”他耸耸肩，意思是说问题没那么简单。我用英语、法语同他争辩。我说：

“怎么！你看不起我们？我们中国人不是傻瓜，更不是笨蛋，你们会的东西我们也一定能学会。”他看我这个土包子并不土，几国语言说得很流利，就有些奇怪。他仔细打量我一番后，就问：“你是什么军事学校毕业？我看你象个中学英文教师！”我说：“我是游击大学毕业的，是战争大学毕业的，是毛泽东战略大学毕业的。我的学历是二十二年，天安门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我们才发了一个集体结业文凭。”

会谈中还是有不少争论的。在激烈的争论中，我曾要求打电话给斯大林。他一听很惊讶，连忙阻止我，问：“你给斯大林打电话干什么呀？”我说：“第一，斯大林把希特勒消灭了，世界人民得到解放，我向他表示致谢和祝贺；第二，我问候他身体健康；第三，我告你的状！你是个爱国主义者，不是个国际主义者。你要两面派，你又赞成，又反对，赞成的成份少，反对的成份多！”我这几句话对他刺激很大，他听后“哎呀”一声，接着说：“向斯大林告我的状，我还没见到过。我接见的代表团中你是最‘调皮’的了！”我说：“我还是中等‘调皮’的，大‘调皮’的还没来。没有这些‘调皮’的，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怎么能打垮呀！”我又接着说：“维辛斯基同志，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流血牺牲，



才夺取全国的胜利，来之不易呀！过去，你们支援过我们，我们感谢；今天，我们胜利了，虽然困难还很多，但中国地大、物博、人多，经过我们的艰苦奋斗，再加上你们的援助，我们一定要富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有信心，有能力。强大的新中国的出现，对苏联，对世界革命也是一个支援嘛！”其实，维辛斯基对我们还是友好的，他主要是不了解我们的情况，头脑中有些固有的偏见，有许多“担心”，如担心我们搞不起来，即使搞起来了又怕被帝国主义夺去，不放心。针对他这些“怕”，我又用中国革命从弱到强、从小到大，最后打败蒋介石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建设强大的新中国的决心、信心和能力。他被我的一席话打动了，态度转变了，诚恳表示：“何同志，我接受你的意见，我召集几个部来商量一下。既然客人进了门，不能不谈，可是你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说实话，原先就估计到这次谈判会有斗争的，但没想到一接触就这么激烈。维辛斯基是这次谈判的主持者和领导者，如果不说服他，谈判的前景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这次开门见山的“舌战”，虽然我的言辞有些激烈，也有些刺激，但没有出格的地方，效果也是很好的，基本上解决了要不要援助我们的问题，这为下一步的正式谈判打下了基础。

一月八日，正式开始谈判，共进行了十八天。

苏方参加谈判的是以维辛斯基为首的、包括外贸部副部长考瓦里、航空工业总设计院院长波依索夫以及国防部、航空工业部的代表在内的七人谈判委员会。谈判由维辛斯基领导，日常谈判由考瓦里主持。苏方给我派了两名女秘书，一名专门给我保管文件，我每次去谈判时，她把文件送给我，回来后立即交给她，很负责，看得很严；另一位负责我的生活，照顾很周到。我们代表团进出都有保卫人员接送。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出色。

由于我同维辛斯基“舌战”的胜利，所以正式谈判开始后要不要援助我们建立航空工业的问题已不存在了，参加谈判的大多数苏方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都很明朗，积极赞成帮助我们建立航空工业。所以，谈判一开始，就直接洽谈援助什么，怎样援助的问题。这方面争论也不小。谈判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几乎每个问题都有一番争论。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方针问题。前面我已说了，我们的方针就是周总理提出的先搞修理，后搞制造。按照这个方针，苏联的援建项目不仅仅考虑修理的问题，而且要从长计划，考虑将来的制造问题，就是说，苏联帮助我们建厂时，从布局、土建、设备安装等方面，都要为将来的制造做好准备。但是，苏方对我们这个方针不很理解。他们提出，中国不需要搞航空制造业，需要飞机及器材，向苏联订货就行了。谈判只谈修理问题，至于制造，以后再说。我们一再说明我们的方针的正确性和必

要性，并据理力争。最终，苏方同意我们的主张，达成包括修理、制造在内的全部工程由苏联包下来的协议，并决定待协定正式签订后，苏联即派八名顾问、一百名专家来中国。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修理的规模。双方议定，当年苏联帮助我们修理发动机一千五百台、飞机三百架（主要是米格——9、15，雅克——11、18和拉——9、11等），建设规模为年修发动机三千台，飞机六百架。在进行这次谈判时，我提出请苏联派一修理列车来华的建议。这种列车也叫列车工厂，约有三十五至四十节车皮，工作人员在车上食宿，车上安装有车床，试验设备和小型发动机试车台，并带有较齐全的零部件，能对飞机、发动机进行中、小修理。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来莫斯科谈判，不能光拿着一纸协定回去，必须捞一把实实在在的东西。修理列车对抗美援朝是极需要的。

第三个问题是援助中国的工厂在哪里设计。这个问题争论最激烈。苏方提出在莫斯科设计，然后把图纸送到中国施工。对他们的这一提议，我真莫名其妙。在哪国施工，应在哪国设计，这是常识性问题。因为基本建设很复杂，要进行选点、水文地质勘探和设计才能进行。在莫斯科设计，能符合中国的实际吗？如果不符合实际，又要修改，我们不能每天坐飞机往来莫斯科——北京之间呀！那样，既费时，又误事，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苏方提出这样的动

议可能有他们的打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在中国设计，在中国施工。为求得他们的支持，我分别向苏方代表作了工作，最后，苏方多数代表都赞成我们的意见。他们多是青年人，中国对他们很有吸引力，他们很想到中国显露一手。决定在北京搞设计，是这次谈判最大、最重要的胜利，这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有深远意义。

经过十八天的努力，谈判终于获得成功，达成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草案。当天上午，将协定草案送给斯大林，据说，他中午没休息就审批，下午两点多钟就批下来了。他批道：谈成的草案要不断修正、补充；一定要支持中国兄弟办航空工业，中国的基础薄弱，我们要全力帮助。

在协定签字的头一天，我从莫斯科给周总理打电话，汇报谈判情况。总理一听是我的声音，就急切地问：长工，怎么样了？我答：谈判顺利，明天可以签字。随即我向他汇报了在中国设计、修理列车等情况。总理说：这是对的！他又问我：规模有多大？我说：规模相当。总理说：要算细帐，他们一个卢布都舍不得的。我说：外贸部长米高扬都到了。总理说：外贸部长到了还是要钱的。我们外汇不多，一下子过多地把钱用到航空工业上吃不消，其他工业就顾不了啦，你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减三分之一。我们接总理指示后，当天晚上按总理的指示，修改了计划。第二天，我和苏方代表在“协定”上签了字。

“协定”签字后，代表团准备回国。维辛斯基为我们举行宴会送行。他举杯：“祝贺这次中苏谈判圆满成功，干杯！”大家也为中苏人民的友谊频频举杯。维辛斯基还幽默地说：“何同志，你下次再来时，希望你带两个飞行团在莫斯科红场降落！”我说：“也许带三个团来！”在场的人都笑了！宴会充满了诚挚友好的气氛。

在苏期间，我们还参观了莫斯科工业学院、航空学院、航空工厂等，受到热情欢迎和接待。

二月二十六日，我们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根据考瓦里的建议，留下段子俊同志承办善后事宜。（一），等待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对协定的正式批件。根据苏联的惯例，协定必须有正式批件才开始工作。三月十日，苏联政府正式批准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二），具体落实修理列车事宜。经协商，苏联政府决定在两个月内从空军抽调一列修理车来华。（三），确定对苏方派往我国的八名顾问、一百名专家的待遇（均按一般技术专家待遇），并签定聘请专家合同；确定由中国偿付苏联因派专家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四），根据苏方建议，研究并决定我航空工业局在莫斯科设立专门接收机构，派驻工作人员，并在满洲里也派一至二人，负责接收、转运资料、器材问题。上述几项工作进展很顺利。三月二十日，段子俊同志回国。

回国后，陈云同志对我说，我方所提方案有两点很好：一是在北京设计；二是搞一个流动的修理列车，这样就能

做到哪个机场的飞机被打坏了，修理列车就开到哪里去修理。他还带着赞扬的口吻说：长工，你这两下子很厉害呀，这是很大的胜利！你很聪明呀！

我回到重工业部后，除照顾全面工作外，主要集中精力抓航空工业的建设，抓工厂接收等。四月十八日，中央发出正式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局的通知，段子俊同志任局长。五月十五日，我又以重工业部代部长的名义转发了政务院四月二十九日财政齐字八十一号文件，批准航空工业局正式成立，并颁发《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方印、长章各一枚。航空工业局设在沈阳，这是研究后经周总理点头定的，主要是为了工作方便。七月十六日，政务院任命我兼航空工业局局长，段子俊、陈一民、陈平同志任副局长。在中央关怀下，在有关部门、特别是空军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为建立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努力工作。不久，苏联政府根据协定，派来了七十多位设计人员，送来一批设计器材、资料等。在他们帮助下，我们先后在哈尔滨、沈阳、南昌、株洲等地建起了飞机工厂。五月一日，苏联的修理列车也来到我国。对于苏联人民的援助，我们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 第十三章

# 投身地质事业

### 受命于地质部

我是一九五二年九月调到地质部工作的。

记得一九五二年八月上旬的一个下午，薄一波同志约我谈话。他首先谈了重工业部改组的问题，接着对我说：

“这次改组，你的工作要变动一下。组织上决定调你到即将成立的地质部去工作。”当时，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听了很感突然。心里想，我不懂地质，早年学的是机械，隔行如隔山。搞工业还稍懂一点，和搞地质上山找矿，那可完全是两回事；何况我是个二等残废，要我这个跛腿去爬山越岭，确实也有困难的啊！于是我说：“一波同志，这可为难喽，我一辈子对组织分配工作没有讲过价，这次可不可以讲个价。我这个跛子爬不了山，搞地质是要爬山的啊！能不能让我到机械部或别的部门去工作。”一波同志断然回答说：“变不了啦！今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要讨论

通过啦！”他还说：“你这次调动，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提的，主席说你有那么一股劲，同意你去地质部。事情决定得很急，也来不及事前和你商量。地质部部长由李四光担任，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仍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要保证他有一定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地质部的日常工作，你和刘杰、宋应同志要多做一些，共同把地质工作抓好。地质工作陈云同志直接抓，有什么困难，可以多向陈云同志请示。”听了这些话，作为党的一个高级干部，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据我所知，成立地质部是李富春同志向中央建议的。当时正在制订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很多想上的项目上不了，原因就在于缺乏地质矿产资料的依据，拖了后腿。地质情况不明、矿产资源不清，就不能设计工程项目。虽然一九五〇年九月，已成立有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文教委员会共同领导的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但是它还难以承担发展和扩建地质队伍的任务，因此中央决定在这个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立即组建地质部。

一波同志找我谈话不久，重工业部就改组了。部里的干部，分别分到一机部、二机部和重工业部。地质部也分到很小一部分。随我一起来地质部的，共二十五人。

我先来到西城粉子胡同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所在地接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李四光，他自一九五〇年回国后，就兼任了这一机构的工作。副主任委员是尹赞



勋、谢家荣和宋应。尹和谢是有经验的地质学家。宋应同志前几个月刚从成都市委调来。他一九三七年由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就深入工农群众，参加革命。听了他们的工作介绍，再联系一波同志和我谈的任务，我吓了一跳，使我感到肩膀上担子很重。建设地质事业，比我原来的想象要困难得多。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地质力量很薄弱，成立地质部可以说是处于从无到有的一种局面。

时间过得很快，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到“文革”开始那一段时间，我在地质部工作了整整十五个年头。建国前，我有十五年是在红大、抗大和东北军政大学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建国前后这两个十五年，占了我一生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十五年的地质工作，我也是很有感情的。每当想起这十五年，地质工作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已建立起一点工作基础，查明的矿产资源基本上可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时，心里总是难以忘怀广大地质职工长期奋战在野外，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的情景。在广大地质工作者辛勤劳动所取得的种种地质成果的基础上，一个个新兴的矿山建立起来，一座座水坝修建起来，一条条新的铁路铺设起来，一个个油井喷出原油和天然气……从而一座座新兴的工业城市相继增添在祖国锦绣山河的国土上，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图画啊！应该说，对于这些美景，每一个地质工作者都会有发自内心的喜悦。在这幅

祖国建设伟大成就的图画中，也汇集有地质工作者浇灌的汗水，奉献的青春，甚至有的同志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常想起我到过的勘探工地、宿营地，想起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存在的困难，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很多是无名英雄。我们千万不能忘掉了他们。我对地质工作的回忆，就是怀着一种和全体地质职工一起回忆的心情写成的。

## 艰难起步

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不是一个管理性的机构，它的任务是对全国各地地质调查单位的计划进行协调、指导。委员会本身只有二十多个干部。直接指导的单位：一个是财经委员会的地质勘探局，地址在西四兵马司胡同原北平地质调查所，在南京还有一个地质勘探分局。当时已开始担任一些重点项目的勘查；还有两个是建制属中国科学院的地质研究所与古生物研究所，都在南京。四个单位中，规模最大的只有二百多人。那时，一部分大区和有些省已设有地质调查机构，也接受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指导。这些就是地质部的家底。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在兵马司胡同刚建成一幢二千七百平方米的三层楼的楼房，这就成为地质部第一幢大楼。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地质专家，据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

员会统计，说是只有二百九十几人，这就是我后来常讲的“二百个老头”。说他“二百个”，是因为有的人毕业后没有干地质，改了行；在那时候，大部分人才三四十岁，也还有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相对于解放后新毕业的一代，也就可以说是“老头”了。他们有的在学校中任教，大部分在有地质工作的工业部门和地质调查研究部门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增加了一些新从大学毕业的地质专业的学生。到建部前，能归到地质部门的新老地质人员一共也才三百来人。这就是全部骨干，搞地质少了他们就不行！但这个数字离实际需要实在少得可怜。

这一批人，过去搞地层、古生物和一般地质构造的调查，从事研究工作的居多数。做过矿产勘查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这部分同志，过去工作大半限于地表观察，推测估计，缺乏勘探手段和系统的实际工作经验。在三年经济恢复的时期内，地质勘探工作已有一些加强，但终究起步晚、基础差。大规模建设开始后，一大批项目要上，但相当大一部分建设项目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家底仍然不清。“一五”项目需要的勘探、普查、测绘等工作量，按照国家的需要，每年要成十倍地增长，才能与之相适应。所以更感到力量远远不够。

人力是如此，勘探工作的钻机等主要勘探装备，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一九五二年初，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在华北、东北地区只有十八部旧钻机，五月以后，因为

新购的钻机陆续运到，到六月底也才开动了四十部。钻机不同于技术干部，不够可以向国外订货，但骤然增加钻机，没有相应的人力与管理工 作配套，有了钻机也是难以开动。

九月三日，地质部在西单曲剧场（现西单剧场）开了成立大会。地质部成立后，立即开始统一各大区及省的地质调查队伍，并调集人员。全国由部直接抓的六个重点直属队是：庞家堡的221队，白云鄂博的241队，铜官山的321队，大冶的429队，白银厂的641队，渭北的642队。那时，刘杰同志也已从中南工业部调来地质部。

一九五三年开始了“一五”建设。“一五”对地质工作的要求，是一种陡然的、跳跃式的增长，显然是不能按一般的常规发展速度就可以完成的。

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反映到周总理、陈云同志那里。周总理对我说：“主席说了，只要资源能够保证建设的需要，长工！你要什么给什么。”我说：“要什么给什么，事情就好办，否则我就只好辞职，不干了！”周总理、陈云同志撑地质部的腰，我们的胆子也就更壮了。当然，党和国家支持地质工作，我们可也没有随便伸手，伸手只伸在节骨眼上。

具体怎么办？在部党组讨论时，总的主张我要抓三条：一抓干部；二抓装备；三抓科学研究。要充分调动已有力量，千方百计增加新生力量。中央组织部从各方面给我们调来有经验的老干部作为骨干。在江西袁州专区撤销时，将专署的一百二十多名干部全部调给了地质部。察哈尔省

撤销时，又将原省直机关五百名干部调给了地质部。这样，部机关及一些下属单位的管理干部基本配备起来了。一九五二年又从全国大学毕业生中分配来一百来名应届毕业生。有地质、采矿、物理、化学、财经、测量、土木等专业，因而各方面的技术力量也有了增强。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地质部召开了建部后第一个重要会议——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会议着重研究力量小、任务重，计划如何安排的问题。十二月四日，陈云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为我们明确了指导方针，这就是要来一个大的转变、来一个大的发展。

大的转变，要求地质工作要根据国家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探明一定的储量，不能象过去那样做多少算多少。国家要有整体规划。地质工作不能按照现有的力量规定工作的任务，要按国家的需要来安排和完成国家的计划。地质工作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要采用非常规的、创新的办法，有效地、迅速地培训人才，增加装备，并合理使用人才，提高原有地质工作人员的本领，努力完成任务。

陈云同志还提出了各种具体措施。

这次讲话对地质工作建设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我们一直按这一指导方针进行工作。

## 大军指向何处

增加新的力量，主要是增加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

我们的办法是：大力抓正规学校的建设、举办各种专业短训班与师傅带徒弟等办法并举。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在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时期，教育部已同意建两所地质学院：一所是北京地质学院，以原北大、清华、北洋、唐山铁道学院等大学地质系、科为基础，它集中有尹赞勋、袁复礼、张席禔、冯景兰等知名的教授。当时暂借端王府夹道原北大工学院开学上课；一所是长春地质学院，是在长春地质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并入山东大学、东北工学院地质系和大连工学院的教授、讲师组成。长春地质专科学校说是专科学校，但师资力量很强。喻德渊教授任副校长，他动员了一批南京地质研究所的地质学家俞建章、马振图等同志前往任教。校址暂设东北工学院原长春分院旧址内，教职工学生则分散在多处居住。两所学院一九五二年共招生近二千四百人，其中两年制专科生将近半数。此外，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等高等学校也招了大量两年制专科生。这样，一九五四年我们就可以有近二千人的专科毕业生走上地质战线。这在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史上来说，可是一个破天荒的数字，这些学生，经多年工作，现大多均已成为地质队伍中的骨干，是很值得珍视的一支力量。这两所学院，在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时，李四光、宋应同志在抓。我到地质部后，非常关心这两所学院的新建工作。后来加上成都地质学院。从建部开始，直到三所学院建

成，我确实为之花了不少精力，因为这是我们最初的本钱。

光有大专生显然还不行，还要有中级人才。在南京原有个华东军事测绘学校，我们在它的底子上办了南京地质学校。一九五二年，我去长春，确定以原长春技工学校为基础，长春地质学院支援一部分教师，又办了长春地质学校。接着，在原重庆地质勘探干部学校的基础上，另选新校址，办了重庆地质学校。还在武汉、西安、宣化办了三所地质学校。这样六个大区每个大区都有了一所中等地质学校。一九五三年一年内一下子办六所中专，这个速度是不慢的。这几个学校开始都是先办各种专业的短期训练班，第二年才开始正式招生。

为解决当时人才的急需，地质部各业务司局也举办各种短训班。这些训练班都是专学一行。“开机关枪的专学怎么打机关枪”、“开迫击炮的专门练开迫击炮”，时间短、收效快，上了岗位也真顶用。这些短训班有钻探、化验、测绘、山地工作、技术安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物探、劳动工资、会计、统计等等。我叫这种办法是“现炒现卖，热炒热卖。”当时不这样搞，就不能迅速组成那么大的队伍。这一部分同志中，不少经过努力自学，后来都已成为该专业的骨干。

我们强调：“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所以还在工作中师傅带徒弟，“边做、边教、边学”。这样有

利于很快为各专业培养大批的技术工人。通过办学校，办训练班，师傅带徒弟三个渠道，基本上满足了当时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急需，初步克服了任务重，力量小的困难。

部机关的老干部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也迫切需要学习地质知识。我们也曾组织部机关部分领导干部参加“业余大学”的学习。我同李四光同志说：“李老！你是教授，是不是先给老干部讲一课？”随后，由李老带头，许多老地质学家轮流为机关部分司局领导干部讲课。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我们在北京地质学院办了老干部班，选调处以上干部脱产参加学习。许多曾参加过“业余大学”或“老干部班”学习的同志，由于他们结合岗位工作刻苦钻研，后来都逐渐成了内行。

北京、长春地院借地方开了学，这是临时应急的办法。两个学院新校的建设，可是个既繁重又紧迫的任务。选址、设计、施工、建筑材料等等，都需逐个解决，而且要争分夺秒地解决。

北京地质院校址定在北京市西北郊。那里，北京市规划建八大学院，地质学院占居中的位置。但是那块地，坑坑洼洼，有坟堆，有砖窑，还有好几个大水坑。当时有人反对，认为平整土地的工作量太大，还说在那个兔子窝里能建什么地质学院？钢铁、石油、矿业、航空等学院，他们各部都有自己的施工队伍，地质部没有。怎么办？我带着北京地院王鸿楨教授、教育司高之秋一起到建工部、



北京市人民银行等处，要求各方支援解决土地、建筑设计和施工力量等方面的问题。万里同志当时是城市建设部部长，我亲自找他，请他撑我的腰，问题解决很干脆。我从部队借来三台推土机，不到一个月，就把院基推平。我当时还说留两个大水坑吧，将来修游泳池，学生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冰。只短短一年，北京地院就建了五万多平方米的教学楼、宿舍，一九五四年学院就从端王府夹道迁到新址上课了。

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尹赞勋教授，是地质界的老前辈，他负责教学工作。但我为了找一位既热心办学，又懂得尊重知识分子的老干部来当校长，正在操心时，一天，我听到湖南省委秘书长刘型同志调来了北京，还没有确定任职单位。在井冈山时，我俩是战友，他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我马上去找中组部安子文同志。我说：“刘型同志的工作不要再考虑别的了，北京地质学院缺一位院长，刘型同志正合适！”后来中组部同意了我的推荐，并由教育部任命刘型同志为北京地质学院第一任院长。

长春地质学院的新校址当时没有选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我去参加长春地院的成立典礼。那时，学院的教学活动分散在鸽子楼、二院、三院等处，全院处于类似“游击”的状态，学生们的活动可以说都是在断壁残垣之中。成立大会后，我与长春市委副书记汪小川同志商量校址问题。原先学院计划在解放大路南面一带旧建筑废墟上

建院。汪小川同志从长春市总体规划出发，提出：伪满皇宫那块地方，地基已打好，只有具有相当规模的单位，才有力量利用旧基继续修建，分散给几个单位就可惜了。经过商谈，确定把旧皇宫作为长春地院的校址，并将周围的地皮一并划归地质学院。皇宫已建起一楼和二楼一部分，按照林枫同志指示，为避免浪费已建工程，续建要尽量按原设计的水平修建。这个意见，经地质部党组讨论后，报经国家计委得到批准。接着，为解决施工力量，我专程去沈阳找欧阳钦同志，商定从辽宁调施工力量去长春施工。大楼定名为地质宫，民族形式的建筑，大屋顶、琉璃瓦。烧制琉璃瓦因缺少原料钴，我又找了国家计委给予解决。一九五四年大厦落成，面积三万多平方米。由于在皇宫旧基上兴建，基本建设节省了一、二年时间。地质宫及地质宫广场，由于地点适中，以后还成了吉林省、长春市节日检阅游行活动的场所。

汪小川同志对地院的工作很支持，后来还出任了一任长春地质学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

一九五三年，地质部的投资总额中，用于院校建设的投资，占总财务预算的四分之一。这就保证了校舍能迅速建设和优先进口大批仪器设备充实学校。建部之初，我们把建学校、培养干部列为重要的工作。

对学院的教学工作，我认为应该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意见。按教学规律去办事。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我同教育司

的同志去北京、长春两院检查工作，发现学生、教师负担过重，这是由于学习苏联经验要求过急，教学计划订得过高，培养目标没能根据我国当时国情出发，把苏联的五年制简单地套成四年制。一九五三年八月部召开第一届教育会议，统一了对各专业本科、专科的培养目标，提出从我国需要和可能出发，稳步提高教育质量的方针，具体研究了各专业课程的删减合并的办法。当时主要困难是教材缺乏，这一年，宋应同志访苏带回一批苏联教材，长春地院文士楨院长，通过我国驻苏使馆购买了一批书。我们前后分别组织部里翻译室以及学校的力量翻译，供编写教材作参考。这些在办学初期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此后，逐步走上正规，并根据地质科学技术的力量，又陆续增设了新的专业。

已建的两所地质学院都靠近沿海，而西南、西北两地区幅员辽阔，矿产资源丰富，少数民族众多，却没有一所地质学院。同时，从地质人才的结构讲，当时高级地质人才的培养仍感不足。因此，一九五六年部党组报经教育部批准，决定在成都再建立一所地质学院，地点在十里店。以重庆大学地质系为基础，并从北京地院、长春地院、南京大学地质系调部分师资支援。当年招生，九月开学。一年级新生原计划先在重大就读一年，第二年再转到成都地院新校舍。招生后重大因故不能接受借读。这时，十里店的基建虽在快速进行，但开学前只完成一万七千余平方

米学生宿舍、礼堂及浴室等辅助性房屋，于是勉强在新落成的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学生只能在简易草棚里学习，在洗脸间里做化学实验。一面加快基建。为筹建成都地院，为加快教育楼及宿舍的建设，我在成都住了一个月，一再与李井泉等同志商量，请他们多方给予支援。应当感谢四川省委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从学院修建到干部配备，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使成都地院做到了当年筹备，当年建设，当年开学。

要不要办三所地质学院，当时意见并不一致。开始有的同志认为一下子办两所地质学院没有必要，办好一所北京地质学院就行了，长春地质学院可以取消。我说：我们国家那么大，那么多省区的地质工作还没有开始做，两个地院并不多，即使办三个也不算多。经力争最后没有撤销。后来，我邀请国务院苏联专家顾问阿尔希波夫去长春参观长春“地院”。他看了学院后说，当时幸亏没有撤销，否则太可惜了。

对于建成都地院，高教部有的同志开始也不赞成。说中国有两所地质学院也就够了，你们好大喜功。我说：“西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从国家建设战略上讲，成都地质学院应该办，办得对。就说是‘好大喜功’，建立在正确的思想基础上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最后，各方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一九五六年，又增办了郑州、昆明、北京、广州四所

地质学校。此外建部以来还陆续建立了通州、正定、西安等干部学校和一批技工学校。

到此为止，短短几年间，已建立起一个布点基本合理，专业基本配套，大、中专学生比例基本适应的教学体系，地质战线的各类专业干部得到了补充、更新，为保证地质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抓“母鸡下蛋”

进行地质调查，探明矿产储量，没有先进的机械仪器装备不行。旧中国连最简单的地质罗盘都不能生产，更谈不上制造钻机和精密的物理探矿仪器。地质部建部时，这些装备主要从苏联进口。临时应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期这样做当然不行。我对供应司司长张彦文说：“你这个供应司不能光管供应一般材料，要做到：一是供应地质勘察的装备，要自己搞设备，靠自己生产；二是供应生活用品，这一点是由于地质工作特点决定的，地质工作者常年爬山涉水，在野外作业，没有一定的生活装备保障，不能克服艰苦环境所造成的困难，队伍的巩固和发展就有困难。”我要他们进行调查研究，规划和实现自己生产地质勘察装备。

为保证地质勘察工作的进行，要有多种类型的生产工厂。钻机与钻机工具制造、钻探配套机具制造、地质、物

理探矿仪器、化学分析等仪器的制造，不可能各省都搞。因此规划布点要从全国的角度考虑，要有利于协作生产，并做到面向全国。供应各省则应逐步建立修配力量，解决钻机的修配、配件和工具等的制造。

地质部那时一个小厂也没有。没有技术人员，没有技术工人，没有管理工厂的经验，光盖工厂、购置设备是生产不出东西来的。办法是依靠一些性质相近的工厂起步。最初建厂更需要兄弟部门、地方上的帮助。等到办起几个骨干厂，“母鸡下蛋”就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

不久，供应司先在北京天桥附近搞了一个小厂子，修复损坏了的钻机。显然这只是从无到有的开始，那时部说明还需要直接抓修理钻机。这是地质部的第一个工厂。

要建设正规的机械厂，就不得不从别的工业部，从地方去要一点厂子，作为改建扩建的基础。要别人的工厂，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办的事，协商中会遇到各种困难。我对他们讲，有困难告诉我，我去拜访解决。为了地质事业，要我亲自去磕头，也可以做到。另外，搞机械制造，我也有点发言权，可以在决策时拿点主意。

最早决定办的装备制造厂是张家口探矿机械厂。这个厂原是张家口铁路工厂，有相当的历史和规模，是铁道部当时的一个大厂。一九五二年底两部商谈过程中，我找了吕正操同志，请他同情地质部的困境，支援这个工厂。吕正操同志了解我们的情况后，满口答应：“行了，我这个铁

路大厂全部交给你们！”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下来。接着我去张家口看了这个工厂，确定了把这个厂改建为钻机制造厂。第二年列入部的计划加以扩建。一九五四年建成投产，该厂先仿制300米、500米钻机，以后发展成为自行设计，并成为钻机主机的骨干制造厂。这个厂规模比较大，从修建新厂房到机械设备更新添置，不亚于重新建设一个工厂。

接着又建了衡阳探矿机械厂、上海探矿机械厂及北京探矿机械厂。衡阳探矿机械厂原是市的一个机床厂，是一九五五年我去湖南与张平化同志商定后划归地质部的，一年后就建成有相当规模的专用装备制造厂。因为野外一般都没有电源，钻机靠柴油机发动；另外还需有泥浆泵等辅机，衡阳探矿机械厂主要生产这些装备。上海探矿机械厂的前身是一家铁工厂，并入了其他一些小厂；“北探”厂前身是由十多家私营小厂合并改建的一家钻探机件厂。这两个厂都在原有基础上新建，专门制造钻机。与张家口厂一起，形成地质部钻机系列化生产的主要制造厂。加上后来的无锡钻探工具厂、天津探矿机械厂、重庆探矿机械厂，形成了各种类型钻机、各种深度的钻机配套系列的生产能力。

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生产自己设计的钻机，结束了仿制的历史。先从100米钻机开始，到六十年代初经过三轮研制，设计制造出第一台国产600米钻机，即后来广为应用的XU-600型钻机。到一九六五年，基本上做到100米、300

米、600米、1000米钻机形成系列,并准备试制更深的钻机。与此同时,还设计制造了各种深度的水文水井钻机以及其他类型的钻机,研制成功了金刚石钻头。设计机构也从机械司的一个设计室,发展成地质机械仪器研究设计院,力量有了显著的增强。

第二方面是地质仪器的制造。地质仪器种类繁多,先后一共安排了北京、上海、重庆三个工厂来生产。重庆地质仪器厂建厂较晚,主要以上海地质仪器厂内援的力量为基础建成的。上海地质仪器厂,北京地质仪器厂都是利用市里同类性质的工厂扩建而成的。上海地质仪器厂前身是由景华仪器厂与中国仪器厂合并而成,合并后的厂,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就已经为地质部生产一些仪器。以后划给地质部,在安亭修了新厂房。北京地质仪器厂则是在北京市一个文教用品试验厂和部物探局的一个修配所为底子而建设起来的工厂。从五十年代开始仿制地质仪器,到一九六五年新建重庆地质仪器厂,已从仿制走到了可以自制的阶段。六十年代初期,中期,我们陆续试制成各种物探仪器,三个工厂的产品则各有侧重。

地质工作的成果最后体现在各种地质图件、报告、文献资料上,地质图件彩色印刷的精度要求高,一般印刷厂无法承印。在物色工厂的过程中,得知天津有一家工厂是为银行印钞票的,这个工厂彩印力量较强,条件比较合适。一九五六年我去天津商量,天津市同意支援,但这个厂属



财政部管辖，天津只能作一半主，于是我又找了财政部达成协议，将该厂划归地质部，成为专门印制地质图件的专业厂，即现在的五四三厂。此厂一度迁到山西长治，据称现正迁往保定。

上述工厂的建成，它生产的地质装备，不仅保障地质部的需要，还供应其他部门的地质队伍。一些援外队伍使用的设备，大都是国产装备。

至于生活装备，野外队需要大量的帐篷、登山鞋、工作服等等，这方面要有定点的厂专门生产，地质部本身就不再建工厂。生产这些东西，我要他们特别注意保暖、防水、轻便等问题，供应司在部机关大院搞过展览，请各方面的同志来评论，并提出改进意见。

到一九六六年，一共办起部直属工厂十一个。各省局基本上建起了以大修为主的探矿机械修配厂，可以大修钻机，生产零配件，有的也可以生产钻机或勘探设备。到一九六六年，省、自治区已建起二十六个这样的厂。其中无锡探矿机械厂、辽宁探矿机械厂等具有一定的制造能力。各个地质队均有修配车间，那时，各省、自治区地质局已做到小修理不出队，大修不出省。

地质部要不要自己建工厂，开始也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地质部只能管地质调查工作，生产钻机、仪器应是机械工业部的事情，地质部不必揽过来。事实上那个时候一机部管通用机械、重型机器还忙不过来，很难照顾

各部的专用设备生产。地质部自己建成了这样一个工厂系列显然主动多了，而且为及时开发新产品奠定了基础。现在回顾，那时那样做是对的，否则每年都得为找谁来生产地质装备，跑断了腿，也不一定落实得了，那可就干着急也没有用了。

感谢兄弟部门支援我们建厂，我们也应该为兄弟部门作力所能及的支援。我们曾将武汉探矿机械厂支援四机部；六十年代，不少工厂也还承担了支援越南的军工生产任务。

## 闯开科研关

地质工作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工作本身带有很强的科学研究性质。地质工作要十分重视科学研究，没有地质科学技术的发展，地质工作就不能提高。所以，我主张要狠抓地质科学技术研究。这方面工作，宋应、许杰、张同钰同志是主管的，我是从旁“大声疾呼”。

与培养人才、生产装备不同，建部前，我国地质科学研究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但有局限性，主要侧重在古生物、地层、大地构造方面，力量也太小。旧中国的地质科研机构就是归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指导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建部初期，这两个所按协议支援地质部门工作，大部分人员奔赴野外，从事勘查矿产的工作。一九五三年开始，地质部也陆续建立了直属的孢粉、

岩矿鉴定、矿产综合、物探化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研究室，逐步开展过去薄弱或缺门项目的地质科学研究。

一九五四年，中国科学院武衡同志来部商量，是否可把地质所、古生物所早日归还中国科学院领导。这两个所原本是中科院的。建部初期，地质力量薄弱，这两个所借给地质部是一种支援，讲好要归还的。中国科学院在地学研究方面如果没有地质、古生物，也就不完整。他们已全力支援了我们，所以这样两个所理应归还给中科院。中国科学院也是为了发展我国的地质科学。

建部初期，忙于探明急需的储量，投入科研的力量不多。还给中科院两个所后，更需要充实科研的力量。到一九五六年，已经有可能为原有的几个研究室再增调一些技术力量，集中搞科学研究。同时，经过几年的工作，各项地质工作已积累有大量丰富的资料。如果这时再不加强力量发展科学研究，就会贻误时机。于是，一九五七年地质部在北京先后成立了地质矿产研究所、矿物原料研究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探矿研究所以及地质力学研究室等科研机构。这些科研机构都是紧密结合地质工作的实际的，与中科院的两个所互有分工，各有侧重。到一九五九年，地质力学研究室扩建为研究所。

这些研究所由部直接管，显然很难做到加强领导。经部党组讨论，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规划、管理地质科研的机构。一九五九年三月，部党组作出了成立地质科学

研究院的决定。部直属的研究所为该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地质古生物学家、副部长许杰同志兼任首任院长。

一九六二年，国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部党组考虑到各省从事地质研究的力量还较单薄，决定省局不设研究机构，将这些研究力量和当时每个大区已设的古生物研究站合并，分别在沈阳、天津、南京、长沙、西安与成都，成立六个大区地质科学研究所，归地质科学研究所领导。中南研究所后来从长沙迁到了宜昌。此后，又增设了海洋地质科学研究所，并对原有的研究机构，作了些调整，分别改建新建为地质研究所、矿床地质研究所、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地质科技情报所、地质力学研究所。有的研究所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探矿研究所，由于专业关系，改由专业局领导。到一九六六年，地质科学研究所直属研究所和一些专业局所领导的研究所，加上六个大区地质研究所，共发展到了十六个。

地质科学研究的开展，深化了对我国基本地质特征和成矿规律的认识，建立起我国自己的矿床类型，指导了各项地质找矿工作；提高了对矿产评价和利用的认识，推动了地质工作向广度深度发展，也促进了工业部门对矿产的开发和利用。

### “三馆”建设

地质工作最终要取得对地质条件的认识。地质调查、

矿产勘查的结果最后都反映在文字报告、地质图件和选存典型岩矿标本上,才能为更多的人提供这种了解和认识。因此,地质资料馆、地质博物馆、地质图书馆这“三馆”的重要地位是地质部门所特有的。这是地质部门与其他的产业部门不同之处。

一九五二年建部时,就设置有地质资料司,搜集建部前散存各地的以及建部后取得的地质资料。一九五五年,国务院指定由地质部负责集中管理全国的地质资料,并批准在原地质部地质资料局的基础上,成立全国地质资料局。新成立的全国地质资料局限于当时的条件,局址几经变迁,没有专门的资料库,大量地质资料存放于一般办公室,管理与借阅都十分不便。因此下决心修建资料馆,存放全国地质资料。一九六四年甘家口资料馆大楼建成。大楼按资料保管借阅的要求设计。库房能防火、防虫、防尘、防光,同时附有各种工作室、阅览室以及相应的附属设施,总面积达五千平方米。从而大大改善了地质资料的保管和借阅条件。全国地质资料馆是我国收藏地质资料最多、最全的专业技术档案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质局也建立有相应的地质资料管理单位,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级地质资料管理体制。

旧中国在南京、北京的地质调查机构,都附设有地质矿产陈列馆,规模很小。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曾将在南京的一些陈列馆、室集中起来,扩建成南京地质矿

产陈列馆。一九五六年，地质部决定在北京建立一座规模较大的地质博物馆。以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为基础。经过两年多的基建，建成了建筑面积达一万余平方米的六层展览大楼，并于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时正式对外展出。它收藏有较丰富的国内外各类地质标本和各种图表照片模型实物，供各方面研究学习之用。此外三个地质学院、地质科学院以及一部分省局，也都先后设有地质矿产陈列馆（室）。象成都地质学院陈列馆的恐龙就十分珍贵。到一九六六年，地质系统的陈列馆已达十三所。三年困难时期，有些博物馆的存在成了问题，我坚持保留。我还表示，如果动北京、南京、北京地质学院的地质博物馆，必须征得我的同意。这样陈列馆才没有下马。

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曾把南京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及其北京分所的图书馆合并，它较完整地保存有建国前的国内外大量地质书刊。随着地质工作的发展，近年又陆续收藏了很多国内外新出书刊，因旧馆址太窄小，影响开展工作。周总理很关心这件事，让国务院文教办公室钱俊瑞同志作了了解。在了解了南京、北京地质图书馆存书等情况后，周总理亲自批准在北京建立全国地质图书馆。一九五六年新建的五千平方米的图书馆楼，是新中国地质图书馆的中心。各地质学院、地质科研单位、省地质机构也都有规模不等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与全国地质图书馆形成地质图书馆网，业务上也有一定的联系。

## 建立省地质局

下面的工作怎么管？建部时，为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及急需的矿产资源，当时地质力量也薄弱，部主要直接抓了重点队的工作。以后地质力量有很快发展，各地有更多地质项目要做。即以一九五三年来说，就拿出百分之十六的力量搞了普查，以准备后备勘探基地。中国地方那么大，地质项目的增长又那么快，所有项目的审查和批准显然不可能都拿到北京来管理了。有必要在地方建立相应的机构以加强地质管理工作。一九五二年年底前，中南、西南两个大区的地质局已经成立起来开始了工作。从成立地质局的经验来看，应普遍成立大区地质局。经陈云同志批准，在东北、华东、西北、华北各大区协助下，这几个大区地质局也迅即建立起来，使地质部能更多地考虑全局性的问题。并集中力量抓好重点勘探项目。

一九五三年七月，毛泽东同志曾亲自听取地质部的工作汇报，并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他指出，地质工作很象军队，“要独立作战”，还生动地比喻：地质工作的“普查是战役，勘探是战术，区域调查是战略”，要我们部的工作逐渐更多地转到战略方面来。经过三年的发展，到一九五七年，地质队伍无论人力物力或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的增长。一九五七年可以投入普查工作的力量已达到野外总力量的百分

之四十左右。一九五六年开始，中苏合作进行南岭、秦岭、大兴安岭和新疆阿克苏地区的一比二十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各省、自治区区域地质工作也得到加强和发展。因为大区地质局在一九五六年已随大区的撤销而撤销，建立省地质局的问题不能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是否要建省地质局的问题上，党组内部也有不同的认识，因此，反复进行了讨论，一种意见是地质条件不同于行政区划，为有利于地质工作的部署，宜按区域性的地质单元跨省区设局。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按省、自治区行政区域建局。按地质构造单元设局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有可取之处；但考虑到诸如党的领导，生活供应，户口、子女上学等一连串问题，地质局不依靠省委、省人委，工作就难以开展。所以，地质局只能按省、自治区来设。经中央批准，一九五六年先在勘探工作量较大或当前工作量虽不大而第二年工作量较大的省、区成立地质局，第一批共十八个。其余，以后陆续建立。省地质局直接接受地质部领导，政治上受省委（区委）领导，业务上受省（区）人民政府的指导和监督。到一九五八年全国已设有二十四个省、区地质局，到一九六六年，中间虽一度有过下放的变化，大体仍然是这个数字。未建局的省、区、直辖市，其地质工作暂由邻省兼管。现在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有了地质局或相应的地质机构，说明地质工作已成为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队伍向前进

随着地质工作的发展，我们认识到，在抓建设矿产普查勘探队伍、区域地质调查队伍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建设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伍，同时也必须重视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建设物探化探队伍。

建部时，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方面只有一个小组，二十多人，一九五三年成立一个处，发展相当快，到一九五五年成立水文地质局时，已成为一支配备有一定的勘察设备和实验手段上千人的专业队伍，并先后组成十个直属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如：北京市队、上海市队、三峡队、丹江队等。以后又开展区域水文地质普查工作。截止一九六六年，水文地质专业队伍已发展到一万四千余人。

一九五二年秋国家分配约五十个大学物理系毕业生给地质部，在老专家的短期培训后，从事地球物理勘查工作；并以他们为师傅，带领青年，开赴矿区开展工作。地球化学勘查工作，是以东北地质调查所十几个大专学生的化探队为基础，充实了部分化学系的毕业生，在一九五三年春开始，如同物探队伍一样，迅速发展起来。到一九五五年，物理探矿、化学探矿方法较大规模的普查找矿已逐步展开，并相应地成立了物探(包括化探)局。到一九六六年，物探、化探队伍已发展到一万二千余人。其中航空物探工作一九五四

年即已开始试验研究，一九五五年正式试飞，一九五七年成立航空物探大队，六十年代，航空物探开始在渤海、近海地区的海上飞行测量。飞机一是租用民航的飞机；二是地质部自己购置，由民航管理飞行。一九六六年前，航空物探飞行的飞机最多时达十架，形成一支具有一定经验的专业队伍。一九六〇年在天津塘沽成立了第五物探大队，开展了海洋物探工作。开始，他们是搬用陆上的物探仪器，租用木船去海上作业，逐步地提高和发展。到一九六六年已经配备了“星火”、“燎原”、“奋斗”等小型专用物探船只，形成了一支海洋物探队伍。那时也已开始钻探平台的设计工作，但只是设计，没有进入试制。

回顾这十五年，地质部已建立了以上这些可以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这里也应讲到苏联专家的帮助。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〇年，地质部先后聘请了为数不少的苏联专家担任顾问。和我经常有接触的顾问专家有：罗吉诺夫、柯罗特基、库索奇金、戈别尔柯、帕甫林诺夫等。他们热情地提出了建立和健全组织机构的建议，草拟了各种有关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的制度和规范的方案，在制订地质工作远景规划，建立新的技术工种等方面作了很重要的工作。在苏联专家的合作下，在发现、勘探具有工业价值的矿产地的的工作中，他们作出过很多贡献。在学校建设和工厂建设中，苏联专家也都热情地从各方面给予了帮助。匈牙利的石油地球物

理、石油地质专家与我们共同组成“中匈技术合作队”，在西北、东北地区工作中作出了成绩。苏联、匈牙利及波兰专家给予我国地质工作的帮助，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 战 果

地质工作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项科学调查工作。它不仅综合应用了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地质数学（也称数学地质）各学科的成就，也广泛采用了探矿工程、测绘、近代分析鉴定、管理科学等不断发展着的技术方法和知识。近年来，地质工作又利用了遥感、计算机技术等新技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应该说，地质工作再也不是罗盘、锤子加放大镜的所谓“三大件”的时代了。多学科、多技术、多工种是近代地质工作的重要特征。

地质工作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多阶段。毛主席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听取地质部的工作汇报时所概括的：“普查是战役，勘探是战术，区域调查是战略”，是非常精辟的比喻。按地质工作程序来说，首先应有区域的、面的了解，这就需进行区域地质调查。接着选择有远景的、重点地区进行普查，真正解决找矿或具体查清地质条件，最后解决战斗的阶段是勘探。在整个勘探过程中，要经济合理地勘探矿产储量。要注意经济地理等条件，注意矿石的质量和今后

开采、加工的条件，并正确地确定应有的勘探程度。

“一五”期间，我们的力量太小，只能以确保重点勘探项目为主。那时，我们顾了勘探，就顾不上区域调查和普查。虽然我们认识到不先做好区域调查、普查工作，就难以发现新的矿产勘探后备基地，难以扩大发现新的矿种；但我们力量不足，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只能是在被动中挣扎。在一九五四年秋季以后，我们新办的大、中专地质院校，已可逐年陆续输送专科、本科及中专毕业生充实和加强地质队伍，这个“任务大，力量小”的矛盾，直到五十年代末，才逐步有了缓解。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进一步加强了区域调查和区测工作，并开始加强地质科研工作，建立了相应的科研机构。在地质装备方面，随着勘探设备及地质仪器厂的相继建成，已开始扭转单纯依赖进口的局面。

如前所说，到一九六六年为止，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成立了二十五个地质局。而全国地质系统的职工则由一九五二年底的六千四百多人，发展为二十万人，其中大中专以上程度的技术人员占了几乎四分之一以上。应该说这个队伍知识密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仅次于中科院和教育部。当然这个数字有一定的扭曲，因为一九六二年精简中，大量地精简了工人，保留了技术人员，所以一九六六年比例数字显得比八十年代还要高。三年调整时期，地质部职工从一九六〇年的三十四万减少到只剩十四万多

人。这是国家全局调整的需要。从我个人的心情说，我当时总想多保留一些。

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期间，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地质工作的重视，还可从国家用于地质事业的勘探费用来说明。如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则一九五三年为六百二十，一九五七年为四千八百四十，一九六六年为六千八百七十，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到一九六六年，地质部已建立起一个可供进一步发展地质工作的工作基础。从全国已探明有储量的矿种来说，一九四九年仅两种，一九五二年增为十种，一九五七年时增为七十四种，到一九六六年已扩增为一百零三种。我到地质部时，开始听到说“中国贫铁、缺铜、少油”，我就不相信，中国这么大的地方，地质调查工作还没有做多少，怎么就能说找不出矿？通过“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全体职工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克服种种困难，团结一致，辛勤劳动，取得了丰硕的地质成果，基本上满足了“一五”、“二五”建设的需要，并为以后开始的“三五”、“四五”准备了一定的矿产资源。

为了感谢广大职工的努力，我在这里有必要简要地回忆一下十五年中所取得的主要地质成果。

### 能源矿产

能源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命根子，煤和石油是我国当前主要的能源。

我国的煤炭储量是十分丰富的。在一九六五年以前煤田地质工作，一直是地质部工作的重点。在“一五”、“二五”期间，不仅在渭北、淮北、黔西——滇东、准噶尔盆地南缘、哈密——吐鲁番盆地、内蒙古准格尔旗等地找到了大型的、有的可露天开采的煤田；同时也探明了平顶山、石拐子、卓资山、中梁山、两渡、义棠、宝鼎等大中型炼焦煤基地的储量，保证了新建、扩建大型钢铁基地的需要。一九六五年四月以后，根据上级指示，地质部的煤田地质工作作了很大的压缩，地质部已安排并正在进行勘探的项目，如宝鼎、水城、珙长、闸河等煤田则仍由地质部勘探完毕。煤田地质工作基本上已交由煤炭工业部负责。近年听说地质部门又继续了这方面的工作。

二十年代，有的外国地质学家曾认为我国是一个贫油、没有希望找到大油田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靠自己的认识和志气，坚持开展石油普查工作。一九五四年以前，石油的普查勘探工作，主要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负责。国家为了加速石油的普查勘探，国务院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确定地质部也要担负油、气资源普查勘探的任务。因此，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地质部以原主管普查各种固体矿产的普查委员会为基础，转过来专门从事找油、气的工作。一九五四年地质部虽然已在华北平原为普查石油作了某些物探方法的大剖面试验，但采取“战略展开，全面侦察”的方针，明确提出以华北、四川、鄂尔多斯、柴

达木、准噶尔盆地为石油地质工作的重点地区，那是一九五五年一月地质部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以后才决定的。同年，华北、东北平原小比例尺的综合方法的地面物探工作，一比一百万的航空磁法测量工作也先后展开。这一年的秋天，在松辽平原开始了地质路线踏勘工作，沿松花江和哈尔滨——沈阳铁路线、锦州——阜新一带做了调查。根据李四光同志的学说及意见，还有其他各位地质专家的建议和两年来各项地质、物探工作对各主要盆地的含油气远景及地质构造方面新的了解，一九五七年冬，地质部党组作出战略东移的决定，将石油地质及石油物探队伍移师东部，有步骤地加强东部平原、东北、华北两大覆盖区的找油力量。并且认为松辽、华北的地质条件相似，都有深厚的中、新生代沉积，存在含油岩系的可能很大，决定加紧进行工作。通过大量的物探、钻探工作，终于先后在松辽、华北平原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等有利于油气富集的构造带。

东北石油物探大队经过地震检查，发现从葡萄花到萨尔图以北是个地下长垣，并从中圈出了葡萄花、太平屯、杏树岗等局部构造。松辽石油地质大队通过大量浅钻，证实了构造的存在。根据地层含油情况，还作出了这个地区找油希望很大的推断，并提出了基准井井位。结果，在大庆长垣构造上，石油部、地质部在两个不同构造上，分别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下旬先后几天内，试油取得成功。石油

部的钻井，还获得了自喷的工业油流。

接着，一九六一年七月和九月，冀东、鲁北也传来了出油的消息。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京津凹陷和下辽河凹陷也出了油。喜讯一个接一个地向全国传来。还应指出，不久，地质部在江汉平原也获得工业油流，经过地质部长期工作的苏北平原，听说后来也获得了工业油流。

回忆那些年，在松辽、华北找油的日子里，地质部和石油部之间，每年开一次会，共同讨论年度工作计划的部署，并协调相互间的工作。两个部之间，还及时互通情报。每次碰头会议，气氛崇尚团结，也开得活跃。有时在余秋里同志家开，有时也在我家里商量些事。我曾开玩笑地说，这叫做“国家的大事在家里开会”，是开“国家”会议。余秋里、康世恩和我可以说对找石油都是着了迷的。大庆、扶余、黄骅、山东、江汉等地区我都去过，有的地方去过不止一次。对于那些地方石油地质工作的进展，我十分关注。当我看到在东北中央凹陷带，按照物探和地质资料圈定的储油构造上打钻，几乎百发百中，无一虚打时，不禁心底里称赞我们在东北的石油地质、石油物探队伍的工作质量。我在江汉见到工作多年尚未见油时，我说了一句“打不出油来，我只好去跳长江！”想不到这句话在职工中引起了反响。他们说：我们说什么也要争口气，决不能让何老去跳长江。经过他们不断的钻研和努力，后来终于在潜江打出工业油流。我感谢他们，但油的存在决不可能是



我一句话所能逼出来的，是他们按地质科学办事，才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中国贫油的帽子是摘掉了，但是石油不怕找得多，越找得多越好啊！

铀矿是一种新兴的能源。二机部（核工业部前身）成立三局后，地质部投在这方面的工作量就有所减少。我部职工为找铀也贡献过力量。五十年代就在广东南雄、仁化和四川若尔盖，找到了较突出的大型铀矿。南雄矿首先是一比二十万区域地质调查中发现的，接着专门组队进行了勘探。移交二机部后，不久即进入开采，成为我国最早的铀矿重要生产基地之一。一九六四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事后，二机部部长刘杰同志向国务院各部领导做报告时，讲到由于地质部职工找到了一个大的铀矿，使原子弹能及早投产。我想这是对地质部职工的最好鼓励。

### 金属矿产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主要集中力量勘探白云鄂博、大冶、庞家堡、攀枝花、海南岛石碌、甘肃镜铁山以及长江中下游、冀东和邯邢等铁矿，为兴建武钢、包钢、攀钢、酒钢和扩建首钢、马钢等钢铁厂提供了资源保证。

“二五”期间，在二十一个省、区内都探明了可供建设大、中型钢铁基地的铁矿资源。过去说中国“贫铁”，现在看起来，铁矿的储量，我国在世界上占第四位，不算少，可惜富矿不多，这是今后仍须努力的。

一九六六年以前，已探明有储量的大、中型铜矿计有

甘肃白银厂、云南东川、湖北铜绿山、山西中条山、安徽铜官山、江西德兴、青海德尔尼等几十处，不少已开采冶炼，并建成了新兴的矿山城市。现在看来，经过广大职工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铜并不缺，只是还不能算很丰富就是了。

金川镍矿的发现，使我国从贫镍一跃而成为富镍的国家，它还伴生有铜、金及铂族元素，听说后来探明的储量足够开采一百来年。现在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金昌市已建立起来。

此外，在“一五”、“二五”期间，我们还先后发现和勘探了其他有色金属矿产，如赣南、湖南、广东的钨，广西大厂的锡，金堆城的钼，锡矿山的锑，锡铁山凡口、兰坪等地的铅锌，修文、清镇的铝，都是很有经济价值的矿产地。还应指出，白云鄂博铁矿伴生有大量的铈及其他稀土元素，是世界上罕见的稀土元素大矿。它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生产稀土元素的国家。国防尖端工业需要的铍、锂、锆以及钽等，那时也已探明了相当储量。

### 非金属矿

“一五”期间，非金属矿产地质工作的重点是解决发展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所需的冶金辅助矿物原料和化工矿产资源。列入国家重点的矿区有大石桥菱镁矿、金华的萤石、晋冀豫等地的耐火粘土以及凤城的硼矿，柴达木的盐矿等等。同时为适应建材工业的需要，也勘探了四川石棉，

青海茫崖的石棉，阿勒太、土贵乌拉白云母，苏州的高岭土，辽宁、广西等地的滑石，海南屯昌压电石英等等矿产。此外，我们也开展了在山东沂沭河和湖南沅水流域勘查金刚石的工作，相继发现了产地。在磷矿资源方面，说来很有意思，大磷矿都与“阳”字结了不解之缘，它们是云南的昆阳、贵州的开阳、湖北的襄阳，我把它们称之为“三阳开泰”。

“二五”期间，我们重点安排了发展农业的矿产勘查工作。继上述“三阳”磷矿之后，又发现了四川绵阳、湖南浏阳两个大磷矿，从“三阳开泰”进而到了“五阳争艳”。后来又在贵州瓮安、湖北宜昌等地，也发现了大磷矿。我国发展农业，有丰富的磷矿资源，这已是肯定的了。在硫矿方面，我国缺少自然硫，但黄铁矿资源极为丰富。广东云浮、安徽卢江、内蒙东升庙、炭宫口都已发现有大型的硫铁矿。“二五”期间，金刚石、压电石英、蓝石棉的工作也有进一步的生长，石棉、滑石、重晶石、石膏等等矿产，也有较大的增长。

####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

在五十年代，地质部在确保的重点项目中，也安排有重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的项目，协同水利、电力、铁道等部门承担了长江、黄河、淮河、黑龙江等流域规划和我国东部地区的河流规划调查。在三门峡、丹江口、佛子岭、梅山、新安江、新丰江等水库坝址的选址工作中，在长江

大桥选址，宝成、鹰厦、成昆等铁路的选线工作中，在为河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山区、黄土高原以及牧区解决农、牧业用水和城市供水等工作中，水文地质调查、工程地质调查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少调查工作的质量，博得了中外各方的称誉。过去我们没有承担过那么重大的项目，也缺乏经验，但一个个的难关，都被工作同志不怕艰难的精神所攻破。如武汉长江大桥桥址钻探，创造了利用趸船在洪水期间不间断工作。三峡坝址经过长期工作，已有丰富的资料供水电部门设计选用。地质部还为国防部门承担了一些项目。在这些项目中工作的，有很多的无名英雄。随着各兄弟部门地质力量的成长，地质部在这些方面的工作有所减少。从六十年代起，地质部主要开展大面积区域水文地质调查，重点放在干旱半干旱区的水资源方面调查，这对解决人畜用水、灌溉农田、改良土壤等等，给所在地区的各族人民带来了健康和欢乐。

### 地质科学研究工作

不加强地质科学研究，就不可能把大量地质观测所得的资料，从中总结出规律性东西，上升为理论；也不可能把其他学科新的成就，综合到地质工作中去。简要地说，就不能不断提高地质工作的水平。

“一五”期间，如果说我们是忙于建设队伍、培养干部，确保重点任务项目的完成；那末从“二五”起，我们已自觉地感到必须开始建立自己的科研队伍及机构了。

一九六五年，全国统一的百万分之一国际分幅地质图包括矿产分布图、大地构造图、金属成矿规律图以及各相应图件的说明书的出版，是建国十六年地质工作的系统总结，为地质工作部署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地质图件和地矿资料。这在当时世界各国编图工作中也是比较罕见的。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八年，通过中苏合作组队，在南岭、秦岭、大兴安岭、阿尔太地区进行的一比二十万区域地质调查，不仅取得了成果，也学习了工作方法，取得了经验。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有计划地广泛开展了全国一比二十万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通过这一工作，地质部门地质编图和区域地质综合研究的工作加强了，地层古生物的研究提高了。六十年代中国各门类的化石丛书陆续出版，全国各地不同时代的地层表也相继编制出来，全国地层规范也拟订并施行。在岩石、矿物、新矿物发现等方面，在构造地质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后者更为活跃，新的见解及理论不断涌现。此外，在黄土地质研究、岩溶地质研究以及新技术、新方法研究方面也都作出了一定的成果。凡此种种，明显推动和促进了地质科技水平的提高。

以上简要的回顾，反映了地质部成立十五年间所取得主要成果，在这里我不可能一一细说。这是全体地质大军辛勤劳动得来的成果，也有兄弟部门的配合。特别应该感谢常年在第一线饱经风霜寒暑的同志们，正是由于他们取

得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经过他们和有关部门的共同综合研究，才有这么多的丰硕成果。现在还奋战在地质岗位上的年轻同志们，在他们工作的岁月中，将不断为祖国增添新的矿产地，提供新的地质资料，开辟新的领域，在科研中攀登新的高峰。我作为一名老地质战士，每时每刻都在关心这些新的捷报，分享着胜利的喜悦。

## 情在山水间

地质队伍是一支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的队伍。在地质部工作的十五年，我天南海北，跑了很多的山山水水，到野外地质队、学校、工厂，去看望战斗在各个岗位上的地质职工，除了听他们的工作汇报，也更想深一些了解他们的生活条件及思想情况。人的思想是活的，不能说每一个人都安心搞一辈子地质。要巩固队伍，就需了解他们的情况，切实解决他们存在的困难。我每到一处，特别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鼓励他们立志为国家、为社会主义献身地质事业，鼓励他们刻苦钻研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我也经常到宿舍、食堂等地方去看一看，与基层同志谈话，以增加对他们的了解。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我是长者，我的一些鼓励话，我发现职工们对我还是比较尊重的。

每年，北京、长春或其他地质院校的开学典礼、毕业

典礼，只要我时间安排得开，凡有约我都愿意去讲话。当年的青年学生，现在都已在地质战线上奋斗多年，成长起来了，中间有的现在已担任了领导职务。当他们现在见到我的时候，有的还说：何老，你当年的讲话，我们还记得！有些话你批得我们很痛，可我们听了觉得很对，一直到现在还对我们有帮助的啊！你说“迷信外国、不相信自己”的思想，是“王八蛋”思想，这话有道理。当然我的话是讲得粗一些，有的学生给我提过意见，说不文明。我接受意见，不骂了，但这样的道理我还是要讲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地质部重点勘探的矿山，我基本上都去了。长江中下游是个大的富铜矿带。我到铜官山去，那里的老乡对我说：“铜官铜官，皇帝封的官”；“铜官虽小，八宝俱全，金银铜铁锡，葱姜蒜芝麻”，这些老乡的顺口溜倒也真是一条“货真价实”的找矿线索。

一九五五年后，我思想上重点抓石油普查。除几次去东北，为了找油去督促工作外，四川龙女寺找到浅层油田时，在重庆开现场会，我坐车在四川盆地转，到野外队听取地质情况的介绍。我的腿子是跛的，但我还是尽量上山，爬山，爬不了山就望山。有一次我到海南岛石碌铁矿检查工作，山坡比较陡，我是拉着茅草，一步一步爬上山去的。中途累了，坐个小板凳歇一歇。记得一九五八年，我去吉林省地质局检查松辽地区石油地质工作的部署和计划执行情况，时间紧，机关没有买到大型客机票，机关人

员告诉我买的是小型运输机，座位是“硬席”。我说：“能走就行，争取时间。”飞机上靠两侧一溜长凳，果真是“硬坐”。坐在那里，腰也直不起来。飞机中途在沈阳机场停留，大家下飞机休息，我捶捶腰，向站在机舱口的女乘务员说：

“快六十岁的人了。”后来我的秘书告诉她我是谁之后，没想到飞机从沈阳起飞，我再上飞机时，见到在机舱前面有一个用绳子捆住的单人沙发椅。这位好心的女乘务员扶着我，要我坐在沙发椅上。原来，这沙发椅是她从沈阳机场借的，回来时还要还给人家的。每当我回忆到这件事，我很感谢民航机组同志对老年人的关心和照顾。

通过我到基层的了解，我深深感到地质队伍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分散性大，流动性大。这个特点，决定了地质队伍的野外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的艰苦性。它和工厂、矿山不同，和铁路、公路部门在荒山野外工作也有些不同。他们总还有铁路、公路这条线联结起来。煤矿工人，井下采煤很艰苦，但生活安定，家庭可以团聚。地质队是又分散、又流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在野外爬山涉水，什么家庭团聚、找对象、子女教育、文化生活、急病就医、职业病的疗养，在野外都不好解决。

建部初期，大量野外人员，常因工作需要，在省与省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流动工作，连解决户口和吃饭都成了问题。一些公安、粮食部门不了解地质工作的流动性，为了减少本地的人口和粮食销量，以不在本地常住为由，



要求把户口迁出，或限期把粮食关系转走，有全国粮票也拒绝售粮。一九六一年，经过和公安部、粮食部共同向国务院写报告，才把问题解决。

地质部有一项组成撤销费，是其他工业部门所没有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地质队刚一组成，就预计着撤销和转移，大的队三、五年，小的队一两年就要重新组队变更地点。职工家无定居，两口子在一个队工作，家庭生活用品，走到哪里，扔到哪里，难以考虑安家立业。当了几年的勘探队长、技术负责人，手里有钱，山里有木材，但全部家当，只是一个随身箱子，别无大物。地质队伍大多在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区，简易公路遇到雨天，就不能用汽车运输，出了工伤，得用人抬几十里外去就医。住房简陋，板条上、苇席上抹一把泥就是房子，更说不上商店和学校。由于生活条件不具备，职工和家属长期分居。创业初期，地质队伍比较年轻，子女上学就业问题不突出。但后来渐渐大了，上了小学要上中学、大学，上不了学，职工耽心子女将来成了文盲，大了还有就业的问题，凡此种种影响了安心野外工作。一些年青人，挺好的小伙子，就是找不到对象，结不了婚。那时有那么几句顺口溜：“好女不嫁勘探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抱着一包破衣裳。”老乡中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远看象逃难的，近看象要饭的，跟前一看是搞勘探的。”话是说得过分了些，但反映了地质工作者的艰苦。我也曾在大会小会上引用过这

些话，我是从同情和理解职工的艰苦的角度来说的，也曾以这样的话，向中央、国务院领导反映过地质职工的生活。我到今天仍然认为地质工作的条件是艰苦的，要关心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条件。

地质部党组的同志都认为大力改善野外地质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当然解决问题不能单凭主观愿望，还要根据国家的财力可能。能够解决的，应尽力而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直接关系到地质队伍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地质工作能不能更好地完成国家任务。我在基层见到这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常常直接找省、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陈述意见，争取就地解决。由于地质队报不上户口，我曾向大冶县委领导同志开着玩笑地说：“在你这个地区的地质队还有非洲人啊！”县委同志一下子没有理解，问我：“你们队里还有留学生吗？”我说：“上不了户口，这不就成了‘黑人’了吗？”县委领导同志听后哈哈大笑，他表示支持，不久户口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们常把各地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组织有关司局加强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必要时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反映情况。为解决问题，有时我就直接去找富春同志，一波同志，甚至找到周总理那里争取支持和解决。

为了使职工能正确对待地质工作的艰苦性，我每到学校、工厂、野外队直接和学生、职工群众见面时，向他们宣传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艰苦奋斗的传统，宣传地

质工作在国家经济建设上的重要意义。大会小会常讲井冈山时期、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时期斗争的艰苦和在艰苦环境中应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用抗大作比喻，“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要他们学习抗日军政大学对学员的要求：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为了动员全体职工搞好地质工作的积极性，发扬当家作主的精神，我说：你们要人人当“工程师”，个个当“部长”，鼓励他们树立对地质工作的事业心。

我除了常去院、校讲话做思想政治工作外，就北京的有利条件，我特地请刘少奇同志接见北京“地院”的学生代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刘少奇同志在中南海会客室接见了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班学生代表三十多人。少奇同志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向他们进行了正确认识地质工作，为祖国建设献身地质事业的教育。少奇同志在讲话中勉励他们说：“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和侦察队”，并指着我说：“你们这位部长，也总有一天不再工作的，地质工作谁来接替呢？就是你们这批青年人。”少奇同志鼓励学生注意时事，关心国家大事。少奇同志说：“我们打游击时，看到一张报纸都是不容易的。”我说：“在井冈山的时候，看报纸要靠和敌人打一仗，去抢来。”少奇同志要求学生们正确对待野外地质工作的艰苦时说：“地质勘探确实艰苦，但至少比我们打游击时候好一点，没有敌人来追赶你们。”我插话说：“没有敌人，有时可也有老虎和狼啊！”少奇同志在

接见后，还把伏罗希洛夫主席送给他的猎枪转送给了“地院”学生，表示了他对地质工作的极大关怀。

关心地质工作者重要的是要解决实际问题。部党组要求有关司局认真研究建立野外队后方基地的方案，研究解决野外队职工福利待遇的意见。考虑筹建部直属的和各省局的地质职工疗养院，建立以活跃野外队的文化生活为目的的地质文工团。这些措施，对地质职工安心野外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野外队有了后方基地，可以解决家属住房、夫妻团聚问题，在基地办小学，搞农副业生产，搞一点服务行业，如饭铺、小卖部，可以方便职工生活，也可以解决一些子女的就业问题。文工团建立后，最盛时期发展到有歌舞、杂技、评剧三个演出队，自己创作，自己演出，足迹遍及新疆、内蒙古、云南、贵州等边远山区，轻骑出演和辅导野外队职工自己开展文娱活动。由于北戴河疗养院和一些省局疗养院的建立，医疗条件和休养条件逐步完善，使患有职业病的职工和劳动模范有了分批分期进行疗养和休息的地方。

在逐步解决一些困难的基础上，一九六四年全国地质工作会议为了进一步集中地、系统地解决野外队职工的劳动保护，生活福利问题，专门组织了有宋应、邹家尤、王泽成等同志参加的起草小组，代国家经委起草了《关于解决野外地质职工劳保、生活福利等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这个文件是经过多次反复研究，针对地质职工在劳动保护、

生活福利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实际可能，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它得到了国家经委的肯定，认为情况摆得实，问题提得准，解决的办法可行，最后由国家经委、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联合向全国颁发。这个文件从：一、关于劳动保护用品，野外生活装备的特殊需要和日用品的供应方面；二、关于粮食供应方面；三、关于家属基地和子女入学、就业方面；四、关于医疗、卫生方面对野外地质职工给予了四个方面的照顾。文件对四个方面都作了必要的规定，体现了国家对野外地质职工生活的关心。为了解决在人烟稀少，偏远地区工作的职工，在工作、生活供应特别是发生工伤事故、需要紧急就医的问题，我曾提出购置直升机，作为必要的运输工具，此事虽经有关领导同志批准，但由于牵涉到的方面较多，后来一直没有办好。对野外地质职工要不要发野外津贴，一直遭到否定。一些部门和一些地方的同志说：“野外津贴是一种特殊”。“地质队的野外津贴会影响其它行业，影响地方”。全国性的劳动工资会议一开，野外津贴问题可以说常常遭到“攻击”，要取消的空气就上升。我告诉地质部去参加会议的同志，野外津贴可不能取消，要顶住。我说：不是野外津贴特殊，是地质队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太艰苦，劳动消耗大，特殊情况就要有特殊办法，过多的劳动耗费，必须得到补偿。三年困难时期，地质职工大量裁减，国家经委要把北戴河疗养院下放给地方。我找薄一波同志说：“这

个北戴河疗养院，虽有过去冯国璋的一点总统别墅（也有人说是徐世昌的），实际就那么一点房子。你可一定不能收我这个疗养院，地质队伍这样艰苦，有这么一个疗养地对职工们也是个安慰。”最后，这个疗养院算是保住了，现在已经得到了发展，它已成为地质职工的一个疗养和休养基地。

对应该解决的问题，应尽可能立即解决。一九六四年冬天，我在湖北荆州第五石油地质普查勘探大队，发现冬天的工作服只发一个棉背心。那个地方，冬天雨雪交加，冷得不得了。我一了解，原来按照规定，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是不发棉袄的。我说：“这不合理，难道只有身体是爹娘生的，两个胳膊是树上长的吗？”队上按照我的意见发了棉袄。地质职工的艰苦，当然不只是一件棉袄的问题，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特别是野外队的后方基地离城较远，职工许多后顾之忧仍然存在。我在地质部门主持工作十五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希望随着国家经济的日益富裕，地质矿产部门要更好解决这个问题。

## 一点反思

通过以上这些短短的回忆，可以大致看出我国地质事业发展的一个轮廓。到“文革”开始，全国基本上都已成立了省、自治区地质局，每个局拥有的地质人员及设备条

件，绝大多数都比地质部成立时的全部力量还大。这是多大的变化呀！如果那十五年里，少一些“左”的干扰，我们的工作再做得好一点，可以肯定，基础会打得更好，地质工作可以做得更多，更出色。

以上，只是历史的回顾。当时许多事情的决策，有当时的特定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正进行改革，执行开放、搞活的方针，地质工作的服务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地质工作如何深入改革，如何使地质工作充满活力，地质队伍的素质如何进一步提高，工作中某些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苏联模式影响的进一步消除，以及地质工作必须讲求经济效益等，这些是广大地质职工面临的新任务。相信广大职工们会写出新的出色的答卷的。

还要说明一下，前面所谈到的一些工作中的不同看法，是同志间在讨论工作中的不同认识，决定后我们的行动都是一致的。建部初期，刘杰、宋应同志，后来的刘景范、卓雄同志以及旷伏兆、胥光义等等同志，我们之间是团结的，相互支持的。尤其在我身体不太好，精力有所不及时，一些重担子主要是他们在挑。对此，我是十分感谢的。

我对地质工作，从开始不想来地质部，来了之后，一干就十五年，于是就对它产生深厚的感情。我之离开地质部，只能说是历史造成的。“文革”一开始，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点我的名，说什么我是要反党的，在这种情况下，地质部的同志当时批我、斗我，我是能理解的。这

个期间，我虽然受了不少苦，但我心里明白，事情总有一天会清楚的。现在一切都已经清楚了。

这里，我不能不回忆到，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四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我以老地质工作者的身分，应邀参加了全国地质系统评功授奖大会的授奖仪式。这次大会非常隆重。邓颖超同志、王震同志等都出席了。会上表扬了建国三十年来地质找矿有功单位、集体和个人。有二百五十三个地质找矿有功单位荣获地质部颁发的嘉奖令，二百八十二名工作人员获得了奖章和奖金。授与功勋单位的二十四四个单位中，有：发现大庆石油构造的地质队和石油物探队；有发现和探明金川镍矿的地质队；有突破了在广东花岗岩地区找铀，并找到了大铀矿的地质队等单位。其中不少队，我当年去过，过了这么多年，再听到他们的事迹，我非常高兴。那天在场的地质职工给我鼓掌的持续时间相当长、相当热烈。这掌声还起伏了两次。我当时很为感动，也很激动。我心里想，地质部的同志确实是理解我的，这说明我决不是什么“三反分子”，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同志们和我的距离已完全消失。我从内心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爱护和关心。

地质部的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到“左”的思想的种种影响，给工作带来了损失，使一些同志受到委屈。如果当时我认识得清楚一些，多一点抵制，少受点影响，那么地质部全体职工为国家所作出的成绩就会更大。



特别要提出的是：一九五七年反右，如果我能减少些失误，就有可能多保护几个同志，让地质部少划些右派，那我今天就可少一点遗憾，少一点对自己的责备。在此回忆之际，我谨向这些受委屈的同志深表歉意。

## 第十四章

# 在动乱的日子里

### 祸起萧墙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在我国刮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这场风暴是毛泽东同志“左”倾错误的发动、领导，被一小撮如同林彪、“四人帮”这样别有用心坏人利用，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动乱。

那时，我在国务院地质部工作。“文革”开始不久，我这个参加民主革命、驰骋疆场的老兵，就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了。也和其他的领导干部一样，在那些日子里，经历坎坷，倍受委屈。但始终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正由于我们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各级领导干部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左”的错误抵制，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使“文革”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从我参加共产党、

参加革命的历史事实来看，我们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能战胜自身的错误，这是值得我们庆幸的。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是他错误地估量形势的结果。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三〇年李立三同志错误地估量形势，要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达到最后建立全国政权的目的。这时，毛泽东、朱德同志带领我们去攻取长沙不克，我们红军从长沙撤围。在撤围后，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一再给我们讲形势，由于他对形势估量的正确，所以取得了在红一方面军反立三路线的胜利以至反“围剿”的胜利。在“文革”开始之前国际上发生过复杂的情况。在国内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并得到了发展，全国人民渴望安定、富强。党的主要任务应当是领导人民实现党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但是毛泽东同志错看形势，把主要精力放在所谓“反修防修”上。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入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估计全国城乡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人民手里，各地都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理人……过去的运动——斗争——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文化大革命”才能解决问题。

于是毛泽东同志召集会议，准备发动大的政治运动，

把他的这些观点付诸实施。

一九六六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这是“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文革”的开始。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这场“文革”首先从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界开始。这时，北京市委和地质部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地质部党委派出党委委员、副部长邹家尤同志为队长的工作队到北京地质学院指导运动，不久群众分成了派，出现了三个群众组织，有两个群众组织观点基本相同，认为工作队在指导运动中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另一派群众组织则认为工作队压制群众运动，要把工作队赶出地质学院，派仗就此开始。六月二十二日，薄一波副总理给我和李人林（小计委副主任）、胥光义（地质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三人写了一封信，我记得主要内容有：工作队是革命的。如果再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要向全体学生说明。后来，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关锋、戚本禹等人亲自到地质学院看大字报，支持一派反对工作队，认为工作队执行了资反路线。七月七日，工作队党委给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平化同志写信，反映了关锋、戚本禹等人代表《红旗》杂志社支持地质学院少数学生的事。地质学院红卫兵、赤卫队还派人到《红旗》杂志社找关锋、戚本禹，

询问为什么支持少数学生反工作队。二十八日，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撤出大、中学校的工作队。邹家尤同志随即率工作队撤出了北京地质学院。工作队虽然撤出了地质学院，但事情越闹越大了。八月二十三日，地质学院一个组织的几百名学生第一次来地质部，要求将邹家尤同志交给他们带回去批判。地质部党委成员在当时中共中央工交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陶鲁笏同志主持下召集会议，决定不让邹家尤同志去地质学院。

九月五日至十七日，还是地质学院的那个群众组织一千多人第二次来地质部“请愿”。为了机关保密档案材料的安全并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请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都是中学生）来机关维持秩序。同时，地质部党委的同志们和机关广大干部、群众，耐心、细致地做来部机关闹事的大学生的工作。并且在地质学院停止给进驻地质部的学生送饭时，部党委一边做工作让地院给学生送饭，一边组织机关食堂做饭给学生们吃。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工作已不能进行了。

当时我就感觉到：学生们这种做法肯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背后策划，其目的是首先把地质部搞垮，然后推波助澜，冲垮其它部委，最后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及副总理们。在那紧张斗争的过程中，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几次打电话给我并派余秋里、

谷牧等同志来机关或找我去开会，要求我一定要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不能让机关瘫痪。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个部，对国务院几十个部都有很大影响。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关怀和支持下，我终于顶住了压力。我后来才知道，在地质学院一个组织冲击地质部的时候，关锋等人受陈伯达、康生、江青委派，曾秘密来到地质部观察事态的发展并暗中支持造反派，火上加油。十月八日，还是地院那派组织第三次来冲击，大闹地质部机关，召开了长达九个小时的批判大会，到深夜十二时才离去。

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编到西北局小组。康生在西北局小组会上声色俱厉地指责我：你知道不知道地质部有人写信给《红旗》杂志社，追查支持地质学院一个组织的人。他说，这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是在追查我和陈伯达。康生这两句话道破了天机，原来恰恰是中央文革小组在支持地质学院一个组织冲击地质部。

由于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向毛主席和林彪告黑状，使我和薄一波、汪锋、李范五同志受到了点名批评。刘澜涛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在西北局小组会上传达毛主席在小组长汇报会上的指示时，说毛主席讲：除薄一波、何长工、汪锋、李范五这四个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外，你们其他人在运动中都

不要承认这个问题。林彪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恶狠狠地说：“何长工对党有刻骨仇恨，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凶狠。我们不向他进攻，他就要向我们进攻。”记得当时韩先楚同志和我坐在一起，听到林彪上述几句话后，用胳膊碰碰我。很不理解的样子，对我说：“怎么这么严重？”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因为薄一波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工交党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我是地质部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工交党委委员；汪锋同志是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范五同志是黑龙江省省长。把我们四个人当靶子，就从党中央、国务院各个部委和省、市、自治区打开了缺口，进而达到他们搞垮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最终打倒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至于林彪板着凶恶的嘴脸咒我，我们在井冈山时期就有分歧，那时我是二十八团党代表，他是一营营长，在一次执行战斗任务中他临阵退却，我曾尖锐地批评过他，并要严厉处分他。我了解他的底细，知道他的丑闻，打倒我，等于清除一个历史见证人。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李富春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代表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向各部、委传达会议精神时，说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长汇报会上讲：薄一波、何长工、汪锋、李范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

犯错误的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在随后下发的关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共中央文件中没有点我们四个人，而点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志。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仅有一百七十来字的信。其主要内容是对传闻毛主席点名一事的个人想法。现在还能回想个大意：受到主席的批评，我既惭愧又遗憾。我从一九一九年在北京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和你相识，到秋收起义跟随主席同上井冈山，在主席长期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万万想不到主席培养了我几十年，居然培养出一名反党分子。不仅我个人感到遗憾，我想主席也会深深感到遗憾。请主席不要误听旁人的谗言，将昨日的功臣变为今日的罪魁；将昨日的同志变为今日的敌人……这封信是请朱德同志转交毛主席的。

## 欲加之罪

地质部机关贴出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二十九日，部机关召开了第一次批判资反路线大会。十一月一日，部机关召开十七级以上干部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当天，我写出了《我的初步检查》。十一月五日，部党委、机关党委、文革办公室被查封，此后拉帮结派，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三十日，有些战斗队贴出了打倒我和旷伏兆同志（地质部



副部长、党委副书记)的大字报。至此，地质部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逐步升级。

我被“点名”批评后，很快被变相地停止了工作。尽管党中央没有下达任何免职文件及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我正在国家计委开会，部机关一造反组织一千余人包围了国家计委来揪斗我，接着在全国也刮起了一月风暴。十六日，造反派夺了部党委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所谓革命委员会。二月二十八日，革委会决定停止我和旷伏兆同志的工作，使部党委完全瘫痪。当天，周恩来总理指示：立即恢复地质部党委的活动。

在当时那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参加地质系统各单位群众组织举行的各种各样的“批判会”、“声讨会”。每一次“批判会”都要持续两三个小时，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书“反党分子何长工”，名字上打着醒目的红叉。在批斗会上弯腰、低头，胳膊和手被反压在背后，很象“喷气式”飞机的姿式。除此之外，还要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我从西四大街步行到王府井，再从天安门广场经西单回到复兴门大街当时住所。回家后才发现大衣里边的内衣、内裤早都被汗水渗透了，可以拧出一串串的汗水。当时关于打倒我的大标语满街都是，都是什么“砸烂狗头”之类的话。造反派宣布：从二十二日起，每天上午对我进行监督劳动，下午交代问题。夜里，当全家人已经进入梦乡，经常被一阵阵急促的电铃

声吵醒，这是群众组织来“抄家”了。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在这复杂、动乱的岁月中，确有少数人利用这个机会发泄不满，乘机报复。在一次机关的“批判会”上，有位“文化大革命”前犯有错误干部的儿子跑上台一拳把我打倒在地。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曾经发生过几次。但是，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他们受过党多年的培养和教育，对这种不讲政策的做法深恶痛绝。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次，地质学院一个组织开会批斗我。在批判会结束时有几十个学生跑过来要打我，立即站出来十几名工人围住我，用手和胳膊架在我的头顶上保护我。随后，只见学生们的拳头雨点般地打在工人们的手和胳膊上，而我却免遭毒打。另一次，我在地质学院参加完批判会后罚我看自行车。刚看没几分钟，走过来一位家属，对我说：“何部长，您年纪大快回家休息吧，我替您看车。北京地质学院是您创建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机关开批判会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看到对我们这些当权派进行体罚时，经常在下边喊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体罚”等。我的警卫员李文义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刚从军队转业到地质部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我被揪斗到地质学院时，他一直努力保护我，直到造反派用武力将他赶出学校门外，他才含泪回到我家告诉了我的情况。每当群众组织到我住所查、抄材料前，有的同志还提前告诉我家，让我们有所

准备。我被批斗了一百多次，头上的顶骨被打塌了一块，肋骨被打断三根，右腿被打跛，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重伤员了。一九二九年，我在坚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在同敌人激烈搏斗时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摔下来，将左腿摔断致残，那是第一次负伤。这次是第二次“负伤”。每当我想起许许多多革命同志，他们处于对党、对革命老干部的热爱，不顾个人受株连的情景，我很受鼓舞和安慰，往往禁不住热泪盈眶，这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猖獗的年代，他们不慑于淫威，始终坚信黑暗是暂时的，胜利的曙光就要来临。他们不愧是受党教育的好同志！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部机关群众组织决定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不允许回家，也不许家属探望），我被扣压在机关西楼地下室内。每天早、晚和其他被隔离的同志们一起排队到机关北楼前“请罪”和“汇报”。因为我每天都背诵规定的那几句话，为此专案小组曾批过我，说我态度不老实。现在回想起当时的那种情景，仍感到十分可笑。被隔离审查期间，每天都要参加“天天读”，写检查、交代材料，还要和党、政、军等部门调查其他老同志的专案组谈话，写证明。当时调查材料都实行“逼、供、信”的做法，如不按照外调人的口径写证明，轻则受训斥，重则遭毒打。如：粮食部的军代表（后来知道是总后勤部的干部）和一个组织的头头对我写的一个证明材料不满意，逼我按他们定的口径写，

我不同意，当场就被打骂。尽管如此，我在隔离审查期间来找我写宋任穷、李井泉等同志的材料，我都没有违心写过旁证材料。我深知，在那“暴风骤雨”的年代，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何等的重要。任何一句不实之词和一份材料，对其他革命同志都将招致政治上和肉体上的打击、摧残。

一九六八年六月，我爱人尹清平同志也被隔离审查。尹清平同志是四川省旺苍县人，家庭出身贫苦。一九三三年，红军第四方面军创建川陕苏区时，她年仅十七岁便毅然参加了红军。长征中曾先后担任过妇女连连长和妇女营营长。她参加革命几十年没犯过错误，又不是领导干部。就是因为是我的爱人，也同样受到了审查和株连。

我被隔离审查后即停发了工资，每月只给二十元生活费。未参加工作的四个孩子和我妹妹只能靠我夫人每月一百二十元的工资维持生活。后来准许子女们隔一段时间来探视一次，给我送一些换洗的衣服等日常生活品。子女们来探视的时候，专案小组派人在旁“陪伴”，因此只能谈家常事，不能谈政治问题。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和邹家尤、刘汉生（地质部副部长）等人被送往北京市清河地质部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每天除了检查、交代问题外，还要进行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忽然听见有人隔着铁丝网在叫“爸爸”，抬头一看是我的二女儿何平生和小儿子何京生。我正要走过去说话，专案组的人看见了，两个孩子含着眼

泪匆匆离去。后来我才知道，女儿是去四川插队落户，临行前来和我辞行，遗憾的是当时连一句话都未说上。

## 在五七干校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我被送到江西省峡江县地质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此时我已经是六十九岁的人了，每天劳动强度很大，剁猪菜，喂猪，打扫猪圈……开始我用菜刀剁，速度慢并且很累。后来我“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把猪菜铺在地上，用左边的残废腿跪在地上，左、右两只手各拿一把铁锹剁菜，这样既快还省力。我年高力衰，每天劳动很累，吃饭时只准买五分钱的菜。记得有一次庆祝干校成立周年，每个人用两毛钱的菜票可以买两个好菜和一个汤。可是象我这样被“专政”的人只能买一个菜，并且不许打汤。我买好菜后顺便打了一碗汤（打汤的人不认识我），待邹家尤等同志准备打汤时，便被拒绝了。时间一长，我的体力渐渐不行。在五七干校两年的时间里，我曾三次昏倒在地上。多亏了邹家尤同志，他经常冒险帮我买些罐头，趁看管人员不注意时让我吃下去补一补身体。

除强制性劳动外，我还要定期写检查、交代材料。专案组为了逼迫我承认他们定的罪名，经常搞“车轮战”，不让我在精神和体力上有所休息。有一次竟连续七十二个小时对我进行“逼、供、信”。三天三夜不睡觉，对一个年

轻人来说也够呛，何况我已是古稀之年了。更主要的是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打击和压力，这是最让人痛心和难以忍受的。

一九七〇年后才允许我和家里通信。但是，我每次写好的信必须由专人检查后才能发出，家里寄来的信同样由专人审查后才交给我。从来信中得知，全家受到株连，八口人已分布在七个省、市。

一九七〇年底又接到家里来信，告诉我已从原住处搬家到城外的一个居民楼。看信后我知道这是“扫地出门”，心想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革得还真彻底啊！

峡江县是革命老根据地，是我战斗过的地方。当地的人民群众得知我在五七干校喂猪，便找到干校的人说：何长工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是我们的功臣。你们不要他，我们要他。我们看不惯你们这种虐待革命老人的做法。多么好的人民啊，字里行间充满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不愧是中国革命老根据地的人民！

由于几年来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受折磨，加之年事已高，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一九七一年夏天开始尿血，我及时把这一病情写信告诉了家里。九月中旬，儿子京生写信告我，准备来江西照顾我，只等地质部军代表和专案组的最后批准。他在信封背面用很大的字写了一句毛主席诗词“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用这句话暗示当时政治形势有了转折。看押我的人拿着这封信琢磨这句诗的

含义不大理解，转交信的时候还问我是什么意思。我从报纸上看出政治气候和以前不一样，林彪的名字突然不见了，便打岔把这个送信人搪塞过去。

随着病情的加重，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向组织上提出了立即回北京治病的要求。

一九七一年十月下旬，这一愿望实现了，地质部派人通知并接我回北京治病。我坐上由江西省革命根据地北开的列车，随着汽笛声，心潮起伏……

## 乍暖还寒

我从北京火车站下车后便直接住进了人民医院。在医院里住了三天还不见家里人来看我，才知道机关没有通知家属，便立即写了一封信通知家里人。见面后，我才知道，我回北京治病是周总理批的。原来，清平同志让几个孩子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批准让我回北京治病。周总理接到了这封信，立即批示给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同志，并先后两次打电话给地质部军代表，询问我的病情并指示立即接我回北京治病。这样，我才得以回京。

回京后，我才得知，孩子们都受到了株连，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上大学，不能作政治工作。儿子光伟在部队大学毕业后，不予提干，不分配所学专业，而改做其它工作。后又被吴法宪点名复员处理当工人。当时家里的生

活也困难得很，我在干校尽管每月只发二三十元生活费，但仍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百五十元钱，把它藏在被子里带回北京，想补助一下家中的生活。可爱人和孩子们也没有舍得用，在我住院期间给我买了补养品。我还得知在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有的同志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那一件件感人的事情，使我激动不已。特别是韩先楚和刘芷同志，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顶着林彪、“四人帮”的淫威，对我受难的家庭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照顾。

当时虽然林彪自我爆炸，林彪反革命集团正在被揭露和批判中。但是，江青、康生反革命集团仍然大权在握，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老同志政治上的解放也不会容易，还要经历艰巨、复杂的斗争。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自我暴露毕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政治上的一次重要转机。领袖亲自确定为副统帅和接班人的林彪居然要谋害他，他老人家恐怕会把我们这些跟他出生入死几十年打江山、现在已被“打倒”的战友们加以比较。加之周恩来总理对我们这些老同志是相当关心，他会争取多解放一些老同志。所以，我回北京住医院没几天，就给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是揭发林彪历史上的几个问题；另一封信是感谢周总理和党中央对我的关心，我已回到北京，病情正在检查、治疗中。同时汇报了自己几年来的情况和专案组在审查过程中对我历史编造的一些诬蔑不实之词，希望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明判。为了使信件能够平安送到毛主席、周



总理手中，每一封信我都抄写了几份，通过不同的渠道送出。

由于加强治疗和补养，我的体质开始好转，体力逐渐恢复。住医院前，专案组派人到医院打“预防针”（说我是反党分子），医院对我的病情没有仔细检查，把尿血误诊为肾炎，也没有拍爱克斯光片检查。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下旬决定让我出院。出院后当时没让我回家，直接从医院把我送到地质部机关西楼三层一个房间。住了三天，到第四天组织上通知解除对我的监护和隔离审查，回家治病和考虑问题。一九七二年元旦前，我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家。

一九七二年一月初，我的老领导、老战友陈毅同志与世长辞了。因为不能去参加追悼会，只好坐在家里默默地哀悼。当我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毛主席亲自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心里才得到一点安慰。

二月下旬，陈正人和曾山同志因心脏病突发得不到及时抢救而先后逝世。周恩来总理指示北京所有医院立即恢复高干病房，副部长以上干部不论“政治问题”是否解决，都到高干病房进行体检和治疗。周总理的这个指示挽救了一大批未解放的老同志生命。后经余秋里同志的关心，从一九七二年三月起，我领到了全月工资（此时扣发工资已四年），生活上得到了保障。

四月下旬，北大医院的同志们顶住了外界的干扰，对我的膀胱结石和前列腺增生症，进行了治疗，手术十分成

功，经过这次手术，解除了我的病患，这使我后来仍能重新为党和人民工作。

病患解除后，我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政治上早日获得解放。为此，从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三年四月，我给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写了几十封信，要求彻底推翻诬蔑我的不实之词，希望重新为党工作。

一九七三年四月下旬，机关派人接我去谈话，给我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何长工的历史我是了解的，中央也是了解的，他没有历史问题。我当时提出，既然毛主席对我的问题做了指示，我的所谓“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应立即得到解决。他们推说：政治结论要由中央来做。毛主席说你没有历史问题，不等于你没有现实问题等等。就这样，我在政治上仍然不能解放。

一九七四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老同志。专案组通知我每天上午去机关检查、交代问题，还召开过几次小范围的批判会。

十月一日，是庆祝我们伟大祖国诞生二十五周年的大喜日子。我原以为既然毛主席已有过指示，我肯定能在九月三十日出席国庆招待会而得到解放。不料空喜一场，我没有接到主席国庆招待会的请柬。第二天（十月一日），从报纸上看到很多老战友都出席了招待会，当时的心情既为许多老同志、老战友的解放而高兴，也为仍不能为党工

作而不安，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七五年四月，我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因周恩来同志病重，由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汇报了自己的情况。

四月三十日，一位同志从机关赶来向我报信，说中央通知我明天参加游园联欢活动，名单要见报，请柬下午即送到家里。我心里装了八年半的这块沉重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全家人自然喜气洋洋，帮我准备，忙个不停。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清平同志和六个子女政治上背着沉重的包袱，他们和我一样吃尽了苦头，现在怎能不高兴呢！

下午三时，机关来人送请柬并正式通知我第二天参加游园联欢活动，还让全家人陪我一起去。同时告诉我，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请我去谈话，现正在办公室等我（当时地质部尚未恢复，是地质总局，归计委领导）。我立即乘车来到国家计委。苏静、袁宝华、邓东哲、顾秀莲等同志都在场。在谈话中我才得知，解放我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的。

## 劫后新生

我参加了五一游园活动，标志着我的解放，但专案小组还给我留一个很长的尾巴。在给我作出的政治结论中，问题仍然很“严重”。按政治结论的内容看，我仍然还戴

着一个“反党分子”的大帽子，只不过被称为同志，恢复了党组织生活，没有受到处分而已。为此，从一九七五年五月到八月，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中，我不断向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反映这个问题。

八月，在国务院领导同志召集地质总局的一次汇报会上，李先念同志首先问：何老怎么没有来？他在地质工作中是有功劳的。地质总局的同志回答，何长工同志虽然已解放，但还未做政治结论，所以没有来。这时，邓小平同志讲：中央指示解放他，这就是政治结论，还做什么结论？

在中央几位老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共国家计委核心小组发出了计发〔1975〕22号文件。内容是同意我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给毛主席、周总理的信和检查，决定恢复我的党组织生活。

我当时已近七十五岁，继续在国务院部委担负第一线繁重的工作已确实力不从心。考虑到自己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开始，长期从事军队院校工作，不但工作熟悉，而且身体条件还是可以胜任的。于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初再次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搞我所熟悉的军事教育工作，我亲自把信送到朱德、康克清同志处，请朱德同志转交毛主席。当时朱德、康克清同志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文革”以来，多年不见了，老战友相逢，格外亲切。他详细询问了我的“遭遇”，欣然同意我要求工作

的想法，表示亲自将信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接信后批示同意到军政大学工作。

十一月下旬，中央军委任命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常委。

命令下达后，军政大学校长肖克同志、政委唐亮同志等都来看望我，欢迎我到军大工作，并对我各方进行关照，为我安排住房，配备车辆等。充分体现了老同志的关怀，大家都为劫后新生，能重新为党继续工作而高兴。

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我一边工作，一边“补课”。补什么课呢？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停止工作已经九年，这期间所有的文件、重要报告等均未看过，需要重新学习。二是我以前虽然长期从事军事院校工作，从一九八四年后即改行，已经脱离了院校工作二十七年。工作环境、工作对象、工作内容等都有很大变化，需要重新了解、熟悉和探索，仅靠经验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江青反革命集团还在台上，思想上不能丝毫放松警惕性。我重新回到军队工作，要为党和人民掌好军权，随时准备投入到和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行列里。只要江青一伙还在台上，“文化大革命”就不会结束，斗争仍然在继续。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危害党和人民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联想到在十年动乱中党、国家、人民和我自己遭到的损失，当时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特别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的崭新气象，感

到由衷地高兴。

“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结束已经十年了，它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我所以做如上的回忆，不是去算旧帐，而是让人们从我的沉浮中看到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在林彪、“四人帮”当道和“左”的思潮盛行下人们的遭遇，引起大家的反思。

要认真总结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特别是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时期，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尽一切可能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我国人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个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阶级斗争永远不能再搞了。

## 后 记

综上所述十四章，我把从青少年时代到“文革”这几十年的经历粗线条地叙述了一下。从一九七五年到现在，这段看起来还在眼前的事情，我想无需赘述了，只在这里作个概略的交代。

一九七五年底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这是我被打倒获得“解放”后盼望已久的重新为党工作的机会。当军政大学的同志把鲜红的领章、帽徽和草绿色的军装送到我手中时，我双手捧着军装，不由得热泪盈眶。军装——从建军那天起就穿上她，她伴随我二十二年。建国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脱下军装转到地方工作。“文革”十年，九死一生，又拣了我一个何长工。如今，我又成为解放军大学校中穿上新军装的一位老兵，怎不叫我心潮起伏，感慨万分呢！

一九七八年军政大学分为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我被任命为军事学院副院长。一九八〇年九月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顾委常务

委员。在这些第一线、第二线的岗位上，我竭尽全力为党的事业，为我军的军事教育事业贡献我的余生。

为响应党中央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我给党中央写了一封请退信，请求批准我辞去在中顾委的职务。这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请退。第一次是我请求从军事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第二次是一九八二年我辞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我的这第三次信是这样写的：

“一波同志并转中央：

“我完全拥护你在中顾委第十六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恳切请求党中央在今年九月召开的全党的代表会议上批准我辞去在中顾委的职务。

“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在我们这一辈子人手里，要把废除职务终身制能够定下来，要立下这个规矩。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决策，不但将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一个坚固的基础，而且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贡献。我从内心是完全拥护的。在我的晚年，能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实现党的这个规矩而尽一份力量，也感到是宽慰的。

“我今年已八十五岁了，入党也整整是六十三个年头了。几十年来无论是在东西南北，还是职务上的高低升降；不管是在顺利发展的时候，还是遇到艰辛困苦的时刻，我总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从实际



出发，从大局出发，从党的事业出发来考虑和处理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要求。目前，我们党正领导十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党和国家正在进行着方方面面的改革。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党需要更多年轻有为、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接替老一辈人的事业；党需要一些年大体弱的老同志退居二、三线，让位于年轻同志来担当新的历史重任；党需要我们这辈人来逐步完成面临的新老交替工作。这样，党和国家才能永远兴旺发达，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我们的事业也才能有连续性。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让位于年轻同志，支持年轻同志进入领导岗位，这是我们老同志的心愿和历史任务，是发自我内心的感情。前几年我虽已退出了第一线，进入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现在也仍有一个退的问题。因为在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上，我们党要建立的根本制度是退休制度，而不是顾问制度。我年事已高，且身体有病，我愿意退出中顾委，到退休岗位上，以腾出位子让比我年轻的同志进入中顾委，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这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是有利的。

“由顾问委员会转向退休生活，在我一生中可以说是又一个转折，而且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转折。在这个岗位上，我想同样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人退志不能退，人退党的信念不能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在晚年为了党的伟大事业我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吧！”

一九八五年九月，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批准了我的请求。党代会闭会不久，《瞭望》周刊、《解放军报》等报刊杂志的记者访问了我。我总是开门见山地向他们表达了我的心情。对他们说：“我现在已是不担任任何职务的人了，但我很高兴。我的眼睛虽然看不清楚，但在党代会上我能感觉到，我们国家的事情越办越好，我们的事业越来越有希望。”

从一九八五年九月退到第三线到现在，我的生活怎么样呢。一九八六年元旦前夕我应《瞭望》周刊的要求，写了一篇《余热发光，乐在其中》的文章，发表在《瞭望》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五十二期上，现转抄于此，就用它来收尾吧：

“一九八六年即将过去，进入一九八七年，我将八十七岁了。作为战斗在第三线上的一个老兵，我体会到，在第一线有第一线的工作干，他们忙于搞改革，搞建设，肩负重任，十分辛苦；我们在第三线上也有第三线的事情做，只要安排好，同样可以感到生活充实，精神愉快。

“撰写回忆录，这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也是自己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我一生的坎坷经历，是和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把它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参考，这是我晚年应该全力做的一件事情。不然，我两眼一闭，把材料带走了，觉得有些可惜。过去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干这件事，而现在我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到目前，我的回忆录绝大部

分业已完成。

“向来访者搞调查,经常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充实自己的头脑。我的来访者终年不断,他们多是向我来提问题,要材料的。我对来访者的态度是,只要身体能坚持,就从不拒绝,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也不放过他们。他们向我了解历史,我跟他们调查现在,我们实行平等交易。象我这个年纪的人,要下去搞社会调查,困难是不少的。向来访的同志搞调查,座谈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办法挺好。这样做既给国家节约经费,又使自己得知不少社会生活实际情况。这几年我的发言和写的文章,来访者给我提供了不少材料。

“人总是要学习的。前几年我的视力还好,自己看书读报学文件不成问题,而且还时常看一些法语、英语书。这几年,我完全失去了看书的能力。这样一来,矛盾就突出了。但有一条是坚定的,就是不学习不行。这就有劳于我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们。我几乎每天听他们读书读报,几年来各种文件主要靠秘书读给我听,有些中央的重要决定和文件,我都要反复听几遍,尽量吃透文件的精神。

“生命在于运动。过去我每天规定自己在一定距离上走多少来回,因故没有完成,就想法补上。早晨起来后和晚上躺在床上时,还坚持做一套自编的保健操。现在虽然走路较前困难些,但仍勉力运动。至于保健操,则从来没有

丢弃过。我这个人是个乐天派，又很喜欢唱歌，高兴时，总要来一段，尽管唱得不好，调子也不一定准，战争年代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至今仍爱好这样做。我常常是自编自唱。我觉得这样做很有好处。唱革命历史歌曲，常使我想起过去，起到鼓舞斗志的作用。唱歌本身是一种轻松乐观情绪的流露，也是一种运动，它可以增大肺活量，活跃脑细胞，增强记忆，人们常说，‘常乐者能长寿’，这句话有它一定的道理。

“总之，我退下来后确实有不少事情要做，也正在做一些事情。这使我的生活很充实，这也叫‘余热发光，乐在其中’吧！”

“新年到来之际，我祝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取得更大成绩，也祝退下来的老同志身体健康，生活充实愉快。”

何长工

封面  
目录  
正文